晚　年
毛泽东

1953～1976

陈　明　显　著

江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年毛泽东/陈明显著.—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8.2(2000.8 重印)
ISBN 7-210-01865-4

Ⅰ.晚… Ⅱ.陈… Ⅲ.毛泽东(1893~1976)-生平事迹
Ⅳ.A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5774 号

晚 年 毛 泽 东

陈明显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西科佳图书印装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 年 2 月第 1 版 2000 年 8 月第 4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9.625 插页:8

字数:500 千 印数:13001-17000 册

ISBN 7-210-01865-4/K·212 定价:29.80 元

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南昌市新魏路 17 号

邮政编码:330002 传真:(0791)8511534 电话:(0791)8514784(发行部)

E-mail:jxpph@163.net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年过六十，壮心不已
（1953年冬～1957年秋）

在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说"北京城里头有两个司令部：一个司令部就是我们这些人的，这个司令部刮阳风，烧阳风；第二个司令部呢，就叫地下司令部，也刮一种风，烧一种火。"然而高岗以两次自杀的方式，拒绝了毛泽东对其的劝告，并走向绝路。

"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列宁这把刀子"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毛泽东再次修改《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第一次明确地提出要反对修正主义。

1.六十大寿不作寿……（4）
2.中国一定要搞社会主义 ……（24）
3."一线二线"的提出 ……（31）

4.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 (48)
5.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 …… (57)
6.赎买资产阶级 …… (72)
7.不能照抄照搬苏联的模式 …… (77)
8.不能把斯大林贬到地下九千丈 …… (84)
9."中国绝不能丢掉这两把刀子" …… (90)
10.要接受斯大林犯个人崇拜错误的历史教训…… (96)
11.台风年年都有 …… (104)
12.创立正确处理两类矛盾的新学说 …… (107)
13.1957:整风与反右 …… (116)

第二章　不当画圈圈的傀儡，要作经济建设的统帅（1957年冬～1960年春）

"马克思主义就是扯皮主义，就是讲矛盾讲斗争的"。"国民党是促退委员会，共产党应是促进委员会"。

"中国人当奴隶惯了，似乎要当下去。中国艺术家画我和斯大林的像，总比斯大林矮些"。关于个人崇拜问题，毛泽东引用了列宁的"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

林彪在庐山会议上大骂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只有毛泽东是大英雄。随后林彪主持军委工作，把现代迷信推向顶峰。

1.在历史大转变中……（129）
2.在莫斯科会议上……（134）

3.发动“大跃进”运动 …… (145)
4.召开成都会议 …… (162)
5.制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 (171)
6.搞联合舰队我们不干 …… (180)
7.还是人民公社好 …… (184)
8.主持北戴河会议 …… (190)
9.在“大跃进”运动中 …… (194)
10.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 …… (208)
11.处理台湾海峡危机 …… (216)
12.提出不当国家主席候选人 …… (225)
13.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 …… (236)
14.要多谋善断 …… (246)
15.在庐山会议上 …… (253)
16.给“反右倾”运动加码 …… (279)

第一章

年过六十，壮心不已

（1953年冬——1957年秋）

在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说“北京城里头有两个司令部：一个司令部就是我们这些人的，这个司令部刮阳风，烧阳风；第二个司令部呢，就叫地下司令部，也刮一种风，烧一种火。”然而高岗以两次自杀的方式，拒绝了毛泽东对其的劝告，并走向绝路。

“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列宁这把刀子“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毛泽东再次修改《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第一次明确地提出要反对修正主义。

195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六十大寿生日。按中国百姓的习惯，人到六十为老年时期的开始。但是，对毛泽东说，似乎还像青年、中年时期一样，他雄心勃勃地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战。他站在中国历史发展的最前头，率领全党和全国人民为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建设一个独立富强的新中国，开始了比民主革命时期更伟大、更艰巨、路程更长的战斗。有时由于身体健康的原因，曾想退到二线，让年轻的同志到一线，但是，也由于种种因素，他的这个设想始终没有实现。新中国的伟大事业和历史发展的强烈要求，一直把他推到第一线，推到中心的位置上。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党和国家的大事，必须由他来拍板、敲定。他以伟大的气魄，把中国迅速地引上了独立富强的道路。他熟悉中国的国情，作出了一系列的科学决策。他了解党内外的广大干部和人民的要求，创造了一个中国历史上欣欣向荣的发展时期。他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在中国迅速地建设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他计划用15年或更长一些时间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任务。在中国历史巨大飞跃发展中，他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他提出了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增加了新的内容。他和他的战友们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把6亿中国人民引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但是，当他的思想、地位、威望达到高峰的时候，他却和中国的平民百姓一样，度过了青年和中年时期，步入了老年时期。这是人生的自然规律。不管什么人都无法抗拒，毛泽东也不例外。

1.六十大寿不作寿

毛泽东在一生中不为自己作寿，也一贯地反对党内外同志为他作寿。1953年12月26日，是他六十大寿。按中国的传统习惯，六十花甲应当作寿。在老革命家吴玉章六十大寿时，毛泽东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向他祝寿。文章高度颂扬了吴老的思想、品格，号召全党学习他一辈子做好事的精神。然而，毛泽东自己的六十大寿，没有一点作寿的意思。后来，他七十大寿，八十大寿，也都没有作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警卫员向他祝贺生日时，同他吃一顿饭就算是规模最大的了。不作寿这是他亲自向全党和全国人民立下的规矩，可以说他始终没有破坏。

194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五十诞辰。那时在延安，他也没有祝贺这个生日的到来。但在第二年，即1944年4月30日，毛泽东邀请不少客人谈话吃饭。席间，续范亭先生问起了毛泽东的年岁和生日，毛泽东如实地告诉了他。续先生听后一想，去年不正是毛泽东五十寿辰吗？然而延安各界人士没有任何向他祝寿的表示。续先生感到十分遗憾，也感慨万千，于是当即赋诗一首，献给毛泽东，诗云：

半百年华不知老，先生诞日人不晓；
黄龙痛饮炮千鸣，好与先生祝寿考。

毛泽东对续先生是十分尊敬的，然而对他写的这首诗读了后只一笑了之。按毛泽东的想法，一个人的生日，最好让他偷偷地过去，不要让他留下什么感觉。其实，毛泽东不为自己作寿，还有更重要的原因。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日益强大，也由于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不断发展壮大，尤其是在1944年、1945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历史关头，摆在毛泽东面前的不仅有领导全党全军完成抗日的神圣任务，而且还提出了如何防止革命胜利后骄傲情绪出现的问题。当时，确实有人开始担忧，也有人提出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胜利后，会不会像历史上的农民革命那样，由于胜利而骄傲，最后遭致失败呢？会不会也像封建王朝那样出现"人亡政息"的现象呢？能不能避免农民革命的历史悲剧，能不能跳出"人亡政息"的周期律呢？

1944年春，郭沫若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以纪念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军打进北京城三百周年。文章以大量的事实分析了起义军进入北京城后，由于多数起义首领骄傲腐化，又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最后导致起义军在政治上、军事上的严重失误而归于失败。毛泽东读了这篇文章后十分重视。把它印成单行本，并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给全党全军高级干部，要他们好好地学习，开展必要的思想教育。毛泽东熟悉中国的历史，也深谙革命的辩证法。他深知千里之堤虽经得起洪水巨浪的冲击，但却难免毁于一蚁之穴；参天大树虽受得住狂风暴雨，但经不起钻心虫的侵蚀。中国共产党人虽不怕敌人的枪林弹雨，但却

最怕党的肌体的腐败、党的领导人的骄傲和蜕化变质。所以，他把这篇文章作为当时整风文件发了下去。

同年11月21日，毛泽东又专门写信给郭沫若，谈论如何防止骄傲的问题。他在信中说：

> “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后》，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此次抗日战争应该是成熟了的罢，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①

后来毛泽东在报告中又曾多次讲到了这个问题，他要求全党全军的“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1944年4月12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和5月20日在中央党校第一部所作的讲演中，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结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详细地论述了关于革命胜利时因骄傲而失败，以及如何防止骄傲的问题。这两次讲演后经整理成为《学习与时局》一文。他讲演时指出，骄傲的人，一定会失败

① 《毛泽东书信手迹选》，第188页，1983年12月文物出版社出版。

的。有书为证。郭沫若著的《甲申三百年祭》就是说明明末的崇祯皇帝因为骄傲，以致到处都来了农民起义。李自成打到北京，把明朝搞倒了，但李自成到了北京后就有些骄傲，没有料到清兵会打进来。等到清兵打进来，他们就只好向后转，开步走。李自成是一个很好的农民领袖，但胜利了就有些骄傲，趾高气扬，以后失败了。还有太平天国，也是骄傲，最后失败了。毛泽东的这段话是充满着实事求是精神的，他承认农民革命的领袖们因革命胜利而骄傲，最后导致革命失败的严酷事实。所以，他要求全党接受这个历史教训，以免重犯农民革命领袖们在历史上犯过的错误。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当革命发展和胜利时由于领导人的骄傲遭致革命部分失败的事实，也是多次发生和存在的。毛泽东在报告中作了这样的总结。他说：

> “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第一次是在一九二七年上半年。那时北伐军到了武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忘记了国民党将要袭击我们。结果犯了陈独秀路线的错误，使这次革命归于失败。第二次是在一九三〇年。红军利用蒋冯阎大战的条件，打了一些胜仗，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李立三路线的错误，也使革命力量遭到一些损失。第三次是在一九三一年。红军打破了第三次‘围剿’，接着全国人民在日本进攻面前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更严重的路线错误，使辛苦地聚集起来

的革命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左右。第四次是在一九三八年。抗战起来了，统一战线建立了，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和陈独秀路线有某些相似的错误。这一次，又使得受这些同志的错误思想影响最大的那些地方的革命工作，遭到了很大的损失。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①

革命胜利时犯骄傲的错误，即使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中国共产党也难以完全避免。有人要求中国共产党不要犯错误，犯错误就不是无产阶级政党。这种要求和看法是不够实事求是的，也是不正确的。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政党是不会犯错误，犯了错误就不是无产阶级政党了，而是农民党了，小资产阶级政党了。无产阶级政党和农民党、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区别，恰恰不在于犯不犯错误，而在于他犯了错误以后，如何对待错误。无数的事实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和历史上的农民革命以及其他政党的区别之一是在于，它有能力、有办法防止骄傲的发生，即使发生了也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加以克服，这就使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免遭彻底失败的厄运。这办法就是毛泽东所指出的，不断地反省自己，不断地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断地发动群众监督自己，不断地进行巩固党、巩固军队、巩固根据地、巩固思想、巩固政策的工作和斗争。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有了这些办法，就可

①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947－948页，1991年6月人民出版社出版。

以避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避免使革命遭到失败。

毛泽东指出，在巩固党、巩固军队、巩固根据地、巩固思想和巩固政策中，最重要的是巩固思想。那么，什么是巩固思想呢？就是要向马列主义理论方面巩固。目前最主要的是总结工作，清算历史，研究经验，反省自己，使自己的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只有这样，才能完成目前党担负的任务。为了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去，并使全国实行民主，我们党一定要大发展，根据地要扩大和巩固，但不能骄傲，过去革命发展了就骄傲，一跌下来就痛啊。我们还未到北京，李自成打到北京，洪秀全进了南京，我们都还没有，一旦骄傲起来，就要失败。

如何才能防止骄傲的产生？毛泽东在报告中说，假如我有骄傲，大家就可以批评。骄傲就是包袱。一个人背了包袱就要被动，放下包袱，才能轻装前进。当然骄傲是有一定原因的。如有知识的可以骄傲，没有知识的也可以骄傲；青年可以骄傲，老年也可以骄傲；没犯错误的可以骄傲，犯了错误的也可以骄傲；男的可以骄傲，女的也可以骄傲。大家都骄傲起来，就不得了，革命一定会失败。所以现在要提倡放下包袱，防止骄傲。要做到这点，最重要的还要开动脑筋。人都是有缺点和错误的。不论是谁，说不犯错误，我是不信的。我敢断言，马克思、列宁也曾犯过错误。我们曾看到马克思、列宁的原稿有勾掉的、改掉的，为什么？因原来的有错误，或至少是有不妥当的地方，所以改了又改。我们写的东西，改的就更多了。因为原来写的不妥当，所以要改，有的还要大改，或全部改。放下包袱后要善于想问题，不善于想问题也不行。人有各种机器，脑子是想问题的，要善于思索、善于想。这话已讲过几次了。《三国志》上有“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的话，这就是

想问题。“为了争取新的胜利，要在党的干部中间提倡放下包袱和开动机器。”只有既放下了包袱，又开动了机器，既是轻装，又会思索，那我们一定能胜利。

提倡放下包袱，开动脑筋，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防止和克服党内可能产生的骄傲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独有的本色，其他的政党，或农民革命运动都是无法做到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人民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斗争中，真正地做到了胜利时不骄傲，失败时不悲观，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积极地开展党内的思想斗争，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所以它能够经得起各种严峻考验，达到了无往而不胜的境地。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点和特点。李自成、洪秀全虽然领导农民起义军打进了北京和南京，但骄傲了，并且没有办法克服和制止骄傲的滋长。他们不可能像无产阶级政党那样，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所以最后必然失败了。

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人不可能不犯错误，党也不可能不犯错误，但党掌握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依靠党自身的力量，可以纠正错误，克服错误，绝不会像历史上的农民革命那样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而遭致革命彻底失败。

1945 年 4 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确定了以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这对中国革命的发展是有极大的意义的。但是，毛泽东总感到不安，有问题。他三番五次地向全党作出规定，要求不要把他的名字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名字并列，不要以他的名字命名，也不要祝寿。特别是要在党内发扬民主，发动人民对党进行监督，为党走出一条不至“人亡政息”的新路而努力。

1945年7月初，抗日战争即将胜利，黄炎培等9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访问延安，受到了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热情接待。黄炎培在与毛泽东的谈话中，明确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能不能跳出在封建王朝中存在的“人亡政息”的周期率的问题。当时，毛泽东满怀豪情地作了回答，说共产党已找到了一条新路，可以跳出这个周期率。黄炎培等听后十分钦佩，回到重庆后，他写了《延安归来》，记录了这次谈话：

“有一回，毛泽东问我感想怎样？我答：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悖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息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

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律，怕是有效的。"①

当时，中国革命尚未在全国取得胜利，这个问题还没有提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日程表上加以考虑。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力量的日益发展和强大，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已使越来越多的社会各界人士对这个问题表示关注了。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革命的思想家、战略家的毛泽东确已察觉到这个问题了，并思考解决这个问题的对策，寻找新路。

革命胜利后犯骄傲的错误，出现"人亡政息"的现象，并不是农民革命和封建王朝特有的弱点。其他革命阶级，包括无产阶级在内，都有可能出现上述问题。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关键在于如何自觉地防止和克服这种错误。中国共产党所以能保持兴旺发达，也就在于能正确地对待这种错误，尽力防止这种错误的发生；如一旦发生了，也能正确地加以处理。这样，就使党克服错误后又进一步发展壮大。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革命的形势朝着有利于革命人民的方面发展，但毛泽东没有丝毫懈怠，他始终兢兢业业地对待每一件革命工作，继续保持着谦虚谨慎的作风。

① 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156－157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出版。

1948年8月13日，任华北大学校长的吴玉章给周恩来发了一个电报，请示党中央，他想在华大成立典礼上提出“主要的要学习毛泽东主义”，“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这样说是否妥当，请同主席和少奇同志商量后，赐以指示”。8月15日，毛泽东对吴老的电报作了回答。毛泽东说：

> “那样说，是很不适当的。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这里所说的‘中国革命经验’是包括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也在内）根据马恩列斯理论所写的某些小册子及党中央各项规定路线和政策的文件在内。另外，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将我的名字和马恩列斯并列，说成什么‘马恩列斯毛’，也是错误的。你的说法和这后一种说法都是不合实际的，是无益有害的，必须坚持反对这样说。”①

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防止党内骄傲情绪的产生，防止资产阶级思想和作风对党的肌体的腐蚀和影响，已越来越提到毛泽东思考的日程表上了。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在会上，毛泽东向全党提出了防止革命胜利后可能产生的骄傲自满情绪，明确地提出了反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303页，1983年1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

对资产阶级思想和作风对党的肌体的侵蚀，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制定了反腐蚀的方针。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是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召开的。会议为中国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为新中国的建立，在理论、思想、路线和方针政策上都作了必要的准备。

到1949年春夏，中国革命的形势已发展到了一个历史大转变的关头：中国的民主革命即将在全国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即将开始；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已经完结，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已经开始；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将发生深刻变化，从一个长期处于被敌人“围剿”、“镇压”的地位转为掌握国家政权的执政党。这个变化，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面临着执政的考验。

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后，必须继续地领导全国人民前进，即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逐步地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工作，将一个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同时也要求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必须经得起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袭击，在糖衣炮弹面前不至打败仗，不犯革命胜利后骄傲的错误。这一切已提到了党的议事日程上，要求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作出回答和解决。

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精辟地论述了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后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必然性；作出了新中国成立后党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的重大决策；科学地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地位的变化以及对党的全面估

计；指明了党面临的新任务和严峻的考验；制定了防止骄傲，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作风腐蚀党的肌体的方针。这一切，是为了保证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胜利后经得起执政的考验，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不犯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其主要内容有：

（1）要求全党保持清醒的头脑，正确地认识中国革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革命的路程今后将更长、更伟大、更艰巨，坚决防止党内骄傲情绪的出现，避免犯胜利冲昏头脑的错误。毛泽东说：

>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①

毛泽东的上述论断是完全正确的。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

① 《毛泽东选集》1991年6月第2版第4卷，第1438～1439页，人民出版社出版。

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巨大的飞跃，是一个极其伟大的胜利，但是它只是完成了中国革命的第一步，而第二步，即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任务还刚刚开始，因此，全党必须牢记党的全部历史使命，坚持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的理论，将民主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并决心为完成第二步的革命任务而奋斗。实践证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确实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工程，是全国人民长期奋斗的共同事业。由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提出了两步走的理论，使全党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也由于他要求全党正确地认识中国革命的全部任务和相互关系，使全党保持了清醒的头脑，沿着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继续前进。从而从根本上防止了党执政后骄傲腐败的可能，也才能保持党的优良的传统和作风。

在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农民革命，当他们在革命取得胜利后，就很难提出继续革命的任务和要求，也提不出制止骄傲腐败的措施，这就必然陷入革命胜利后骄傲、失败的境地。而中国共产党不同。它总是在历史性的转变关头，及时地指出全党和全国人民前进的方向和任务，提出正确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同时也不断地制定党的战略和策略，反对党内和社会上的各种错误倾向，使党总是在健康中发展。即使党内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或错误后，也能够依靠自身的力量，克服和战胜各种困难及错误。

(2)要求全党高度地警惕资产阶级的捧场，不要被它们的“糖衣炮弹”打败，要充分地认识到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后阶级斗争的规律及其变化，要防止党内新的错误倾向的出现。毛泽东说：

“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这个胜利将冲破帝

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①

毛泽东的上述分析是十分正确的。这种阶级斗争的新情况和新特点是一般人所未料及的。毛泽东正确地预见了党内可能发生骄傲腐败的现象，可能有一部分共产党人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打败，所以必须采取反腐蚀的斗争方针。要求全党充分地认识到腐蚀与反腐蚀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表现。全体共产党员应当提高阶级斗争的警惕性，识别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的另一手，坚定共产主义的信念，克服党内可能滋长的骄傲自满情绪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

(3)防止党内骄傲情绪的产生，防止胜利冲昏头脑情况的出现，以保持优良的传统和作风，关键在于党中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规定和措施，约束中央，也约束他本

① 《毛泽东选集》1991年6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第2版第4卷，第1438页。

人。这些规定当时虽然没有写入决议中，但毛泽东多次强调这些规定，要求全党执行。这些规定全党都是知道的，也是共同遵守的。在1953年夏召开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一次强调了这些规定：

> "一曰不作寿。作寿不会使人长寿。主要是要把工作做好。二曰不送礼。至少党内不要送。三曰少敬酒。一定场合可以。四曰少拍掌。不要禁止，出于群众热情，也不泼冷水。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这是学生和先生的关系，应当如此。遵守这些规定，就是谦虚态度。"①

由此可见，毛泽东是把自己作寿一事和中国革命的胜利、保持党的优良的传统和作风联系在一起的。他为了使全党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防止骄傲的出现，严格地从自己做起，从中央做起。由于毛泽东以身作则，严格要求，所以在建国初期形成了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风和政风。

1949年9月30日，毛泽东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委托，为大会起草了宣言。但在宣言的草稿中，毛泽东只写："这种全国人民的大团结，是中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经过长期的英勇奋斗，战胜了美帝国主义援助的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府之后所获得的。"没提自己的名字。但是，当大会通过宣言时，代表们坚决地提出要

① 《毛泽东选集》1997年4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第5卷，第97页。

求增加这样一句话："在人民领袖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之下，我们的会议齐心一志，按照新民主主义的原则，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决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于北京，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① 这一事实，一方面充分说明毛泽东的谦逊态度，他起草的宣言草稿中只提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而没有提及自己；另一方面也充分说明人民对他的尊敬和爱戴。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是来自于各个阶级、阶层，各个党派、团体的人士，他们济济一堂，共商建国大事。他们代表着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选择了社会主义的道路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时也一致要求确认毛泽东为全国各族人民的领袖。所以加上这一句话是必要的、正确的，而且写在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宣言中，这确是一件非常庄重的大事。对毛泽东来说，这是历史赋予了他新的使命。从此毛泽东也更加慎重地对待人民对他的爱戴。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不仅反对为他作寿，而且他还坚决反对为他塑像等。1950年5月20日，毛泽东对沈阳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拟在沈阳市中心区修建开国纪念塔，并在塔上铸毛泽东铜像一事的报告作了这样的批示："铸铜像影响不好，故不应铸。"② 同年10月27日，毛泽东又对北京市第二届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送请政府建议中央考虑在天安门前建立毛泽东大铜像的提

① 《毛泽东选集》1977年4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第5卷，第9页。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362页，1987年11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案，又作了这样的批示："不要这样做。"① 这样就制止了两大城市拟铸大铜像的行动。不然，只要北京天安门广场一铸毛主席大铜像，全国各大城市肯定会行动起来。毛泽东的上述做法，从根本上说，人民是会支持的。尤其在建国初，更有必要制止这种行动。

毛泽东也反对为他修整故居。1950年9月20日，毛泽东对湖南长沙地委和湘潭县委为他修整故居房屋以及公路一事，专门给当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黄克诚、省委第一副书记和省人民政府主席的王首道，以及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的邓子恢写了信。在信中，毛泽东说：

> "据说长沙地委和湘潭县委现正进行在我的家乡为我建筑一所房屋并修一条公路通我的家乡。如果属实，请令他们立即停止，一概不要修建，以免在人民中引起不良影响。是为至要。"②

由于毛泽东的坚决制止，为领导人铸铜像、修故居，搞纪念馆、纪念塔之风没有刮起来，这在人民的心目中，留下了很深很好的印象。不然，在50年代初，就把领导人的巨像矗立在各地广场上，不论白天黑夜，还是寒暑秋冬，风里雨里，为全国"站岗放哨"，其意义不是很大的。尤其是各单位都做起来，在经济上的开支也是很惊人的。这样做，不是把毛泽东与人民的距离缩小了，而是拉大了。由于毛泽东制止，所以在建国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621页。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529页。

初期，毛泽东与人民之间的距离是很小很小的。他随时能听到人民的呼声和要求。

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仍然反对为他塑像。当时，各单位都在筹划塑造大型的毛泽东像。毛泽东知道后，于1967年7月5日作了这样的批示：

“此类事件劳民伤财，无益有害，如不制止，势必会刮起一阵浮夸风，请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讨论一次，发出指示，加以制止。”

于是，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中央于1967年7月13日作出了《关于建造毛主席塑像问题的指示》，以制止这阵风。但是，不少单位在狂热的“三忠于”思想支配下，仍然塑造了巨型塑像。

196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七十大寿，人到七十古来稀，按人之常情，七十作寿并不过分。那天，在他身边的工作同志和警卫员都提出为他作寿。他知道后，对工作人员说：

“大家都不作寿，这个封建习惯要改。你知道，作一次寿，这个寿星就长一岁，其实就少了一岁，不如让他偷偷地走过去，到了八九十岁时，自己还没有发觉……这多好啊！”

毛泽东诙谐的劝说，使他身边的工作同志心悦诚服地放

弃了为他作七十大寿的想法。1973 年 12 月 26 日，是毛泽东八十大寿。不仅全国人民关注，而且世界各友好国家也十分重视。他们纷纷发来贺电，向毛主席作寿。据统计，有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都发来了电报。在国内，各界人士也纷纷祝贺。但是，毛泽东仍不作寿。这种情况，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

当然，有时为了满足同志们的心愿，毛泽东也曾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起庆贺他的生日，但都很简朴，有几次，毛泽东和工作人员、警卫人员吃一顿“忆苦饭”，就算度过了他的生日了。

毛泽东反对为他作寿，他自己也不作寿，是为了树立一个好的风气，也改变一下中国的习俗。但这不是说，他反对别人作寿。相反，他也不断地向别人作寿。1949 年 12 月，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为和斯大林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同时也祝贺斯大林七十大寿，率领代表团，第一次出国访问。在准备的时候，毛泽东接受了江青的提议，要他带一批生日礼品：山东的土特产大白菜、大萝卜、大葱和大鸭梨。为筹办这些礼品，毛泽东亲自起草了电报，要中共山东分局协助办理。电文为：

“斯大林同志今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七十大寿。中央决定送山东出产的大黄芽白菜大萝卜大葱大梨子作寿礼。请你们接电后于三日内(即十二月四日以前)购买每样五千斤共二万斤，由中央派飞机到济南接运。飞机于十二月四日到济南，请注意时间。你们采购上列各项物

品（大黄芽白菜大葱大梨大萝卜）时请注意选择最好的。”①

1960年，杨开慧的母亲九十大寿。毛泽东于4月25日给杨开英写了一封信，并寄去寿礼，以慰老人。毛泽东的信是这样写的：

“开英同志，杨老太太（岸英的外婆）今年九十寿辰，无以为敬，寄上二百元，烦为转致。或买礼物送去，或直将二百元寄去，由你决定。劳神为谢！顺致问候！”②

毛泽东日理万机，工作繁忙，但他没有忘掉杨老太太的生日，而他自己的生日不仅不作寿，而且常常忘掉了。

毛泽东对挂像也十分注意，曾作过规定。1953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毛泽东批发了一个通知，专门规定在庆祝集会的会场上可以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以及毛泽东的像，但不要挂成一排，可以挂成两排。在游行队伍中，领袖的像也要有顺序。第一排面向自左至右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第二排为毛泽东、孙中山；第三排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以下为各国的领袖。可见，毛泽东一直遵守着过去提出的原则：他与马、恩、列、斯是学生与先生的关系，他不能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172页，1987年11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第160页，1996年1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与他们并列，而是与孙中山平列。

在建国初期，毛泽东在处理领袖与人民、领袖与领袖、领袖与政党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为全党和全国人民、为全世界无产阶级政党树立了优秀的榜样，赢得了全党、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尊敬。

2.中国一定要搞社会主义

到1953年底，毛泽东迈入老年时期了，但是，他一点也没有老年人的状况和心态，仍像青年、中年时期一样，精力旺盛，决心写好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

当时，摆在毛泽东以及他的战友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面前的任务是，中国什么时候搞社会主义，如何搞社会主义？围绕着这个大课题，毛泽东所考虑的有四件大事：一、制定一条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二、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三、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四、制定和实施第一个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这四件大事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发展方向的问题，关系到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问题，回答了党内外人士普遍提出的我国什么时候全面地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问题。这四件大事，有的由毛泽东负责，有的由刘少奇、周恩来负责。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的基本完成，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已结束了。建立起来的新中国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社会

呢？按照当时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主张，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个论断是符合中国社会发展实际的，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创造性运用。这理论在1949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被各个代表所接受，并写入了起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中。历史证明，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前必然经历的一个历史阶段。新民主主义社会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质。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主要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把我国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即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变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为公有制。完成这两方面的任务，是需要很长的时间的。现在看来，几年的时间是很不够的，它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因此，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独立的社会发展阶段。它不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一瞬间，而是前面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面与社会主义社会相连结的一个社会历史阶段。它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而带有明显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痕迹。只有通过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消灭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变私有制为公有制，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总结历史经验，我们应当既看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性质，但又要看到它的相对独立的特点。如果只强调它的过渡性，很可能导致越快越好，加快过渡，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的现象；但如果过分地强调它的独立性，那也可能会出现保守的倾向。

早在1951年2月中旬，中共中央在通过的有关决议中提出了“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这思想充分表

现了毛泽东对新中国建设的考虑和估计。对我国的建设思想是很初步的，还没有提出一个完整的计划。仅仅是一个设想。到1952年下半年，由于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基本完成，以及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巩固，对“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思想有了很大的发展和丰富。在8月4日，毛泽东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38次会议上宣布：“经过两年半的奋斗，现在国民经济已经恢复，而且已经开始有计划的建设了”，“我们要争取十年功夫建设工业，打下坚固的基础。”这就是说用两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完成发展工业，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基础工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除充分相信和依靠国内力量，贯彻自力更生方针外，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争取苏联的支持和帮助。当时最迫切需要的，一是关于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方针；二是关于经济建设的物资。于是，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苏，与斯大林讨论协商，争取苏联的支援。周总理在访苏中，就苏联帮助中国今后五年如何进行经济建设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周总理回国后，于9月24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进行研究。在会上，听取了周总理关于就“一五”计划的轮廓问题同苏联商谈情况的汇报。毛泽东听后作了讲话。其中最重要的是他认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便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了，大约用10年到15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而不是10年或者10年以后才开始过渡。毛泽东的讲话使与会者为之兴奋，认为我国开始搞社会主义了，这是全党梦寐以求的大事。同时也认为这是毛泽东根据国内外有利形势作出的新判断，为全党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于是中央书记处作了多次研究。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听后非常高兴，向政法委员会和公安系统的干部作了传达。但是，毛泽东对这个

问题非常慎重，他批评了罗瑞卿的做法。10月2日，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苏联，参加苏共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中共代表团与苏共中央的领导人进行了多次接触和会谈。10月20日，刘少奇受中央及毛泽东的委托，给斯大林写了一封长信，陈述了中共中央关于我国经济建设的思想，以及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看法，尤其是对过渡到社会主义所需的时间和能够实现的条件，作了细致的分析和估算。刘少奇的信的开头是这样写的："毛泽东同志曾要我们就以下几个问题向您请示"，信中叙述了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具体情况和问题。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在内对我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还在逐步形成中，还没有一个成熟的意见和具体的做法，更来不及作具体深入的分析研究。斯大林收到刘少奇的信后，于10月24日接见了中共代表团。他对刘少奇信中提出的问题作了答复。他说："我觉得你们的想法是对的。当我们掌握政权以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应该采取逐步的办法。你们对中国资产阶级所采取的态度是正确的。"因为刘少奇在信中提出：

"我们估计：再过五年，在苏联帮助我国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工业中国营经济的比重将会有更大的增加，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比重则会缩小到百分之二十以下。十年后，则私人工业会缩小到百分之十以下，国营工业将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私人工业在比重上虽将缩小，但它们在绝对数上还会有些发展。因此，这时候多数资本家还会觉得满意，并与政府合作。他们的企业大体都

要依赖国家供给原料、收购和推销成品及银行贷款等，并纳入国家计划之内，而不能独立经营。到那时，我们将征收资本家工厂为国家所有。设想多数情况下采取的方式是劝告资本家把工厂献给国家，国家保留资本家消费的财产，分配能工作的资本家以工作，保障他们的生活。有特殊情形者，国家还可付给一部分代价。"①

这是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改造的一种设想。当时估计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迅速地发展国营经济，缩小私人经济，完成对资产阶级私有制改造的历史任务。而对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刘少奇在上述信中作了这样的分析和估计：

"在农业中，在土地改革后，我们已在农民中发展互助合作运动。""我们准备今后大力地稳步地发展这个运动，准备在今后十年至十五年内将中国多数的农民组织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集体农场内，基本上实现中国农业经济集体化。"②

当时中共中央已确定把农民引上集体化的道路，完成对农民个体私有制的改造任务。而对于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刘少奇在上述信中作了这样分析：

① 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218～219页。
② 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220－221页

"对于这些手工业，我们准备用力帮助小手工业者组织生产合作社。"但是，"我们在改造手工业和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运动中将会有更多的困难，而时间也可能需要更多。"①

这封信虽然由刘少奇执笔，但信中的思想是代表了中共中央的意见，尤其是代表了毛泽东的看法。这封信得到了斯大林的肯定后，毛泽东也就多次讲到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同时也引起了中央多数同志的共同思考，从而逐步地形成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思想。其主要是：过渡时期所需要的时间；过渡时期的主要任务，即关于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经过半年多时间的讨论和酝酿，就明确地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中共中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正确指导的产物，是国民经济基本完成后必然提出的一条马克思主义路线。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讲话。他在讲话提纲中作了这样的表示："总路线是照耀一切工作的灯塔。""党的任务是在十年至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所谓社会主义改造的部分：（一）农业；（二）手工业；（三）资本主义企业。"这些表述已清楚地说明毛泽东把"一化三改"作为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总任务确定下来了。这是十分正确的。同时也反映了这条总路线

① 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22页

的形成是十分慎重的。毛泽东在上述讲话的提纲中还批判了下面三种观点:(一)确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二)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三)确保私有财产。他批判这三种观点的目的,是要强调过渡的性质,是要贯彻这条总路线。

1953年8月,中央在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时,周恩来把毛泽东关于上述提纲中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表述写进了他为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所作的结论中。同年9月,中央把这条总路线向全党和全国人民作了公布。随后,毛泽东又修改和审定了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编写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同年12月,中共中央批准并转发了这个宣传提纲。在这个宣传提纲中,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了更完整的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1954年2月10日,在中国共产党七届四中全会上,通过决议,正式批准了这条总路线。并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了学习宣传和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群众运动。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接受了这条总路线,并把它作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载入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

毛泽东作出制定和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决策是非常谨慎的,是集中了全党的智慧,考虑了各方面的因素后才决定的。首先,他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历

史时期看成了一个过渡时期，看成了一个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转变时期，并且把转变时期的起点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开始。这思想对全党来说无疑是一个为之耳目一新、对全国人民来说是为之振奋的新思想；其次，他把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改造这两项任务结合了起来，制定了一条发展生产力和改变生产关系同时并举的路线。这是毛泽东在完成国民经济恢复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任务后又作出的一大贡献。这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又一决定性的行动。

中国一定要搞社会主义，是毛泽东的决心，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决心，离开了社会主义，中国将不可能发展。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中国人民才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毛泽东决心搞社会主义，全党和全国人民才选择他为领袖。历史证明，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也正是由于毛泽东等领袖坚决地搞社会主义，才使中国避免了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迅速地建立起一个独立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繁荣富强作出的杰出贡献。

3.“一线二线”的提出

人到老年，伴随而来的往往是各种各样的疾病和力不从心。毛泽东虽然人到花甲，还奋不顾身地工作着，从解放战争开始到现在，他从没有休整过。他确实老多了。尤其到1953

年底，他需要休养，需要调整和恢复。然而在这个时候，他考虑的问题仍很多。除要筹划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等问题外，还考虑了中央工作的接班人问题。他设想把中央的工作分一线和二线，他从第一线退到第二线。他想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到第一线，自己处在第二线。1953 年底，他向党中央提出了这个思想。可是，他没有估计到提出这个问题后，会引起高岗问题的出现，因而他不得不领导全党开展了反对高岗阴谋活动的斗争。

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以防止资产阶级思想和作风对党的肌体的腐蚀，防止革命胜利后骄傲情绪的产生，防止部分共产党员经不起执政的考验，提出了防腐拒变的思想与战略，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在整体上不犯错误。但是，仍出现了一部分腐败变质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在 1953 年前后，党内出现了两种类型的人：一种是贪污盗窃分子、腐化堕落分子，如在“三反”运动中揭发的刘青山、张子善等；一种是野心家、阴谋家，高岗、饶漱石就是这类人，他们个人主义膨胀，权欲熏心，不满足于手中已有的权力，企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从这两种类型的人身上，毛泽东十分清醒地看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动员全党向他们作斗争。如果不打击刘青山、张子善，就不可能挽救几千几万个受资产阶级思想与作风腐蚀的干部，党就会丧失执政的地位；如果不清除高岗、饶漱石等人，党就要分裂，党内的大批干部就要被他们打倒。毛泽东率领全党与他们作了坚决的斗争。但是，这场斗争打乱了毛泽东退到二线的计划。1954 年春，毛泽东作了一段休整后，又站在第一线，指挥全党和全国人民向社会主义

前进了。

中共中央与高岗、饶漱石之间的斗争是党在建国初的一场重大的党内斗争。这场斗争关系到全党的团结和统一，关系到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贯彻，关系到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对于这场斗争，邓小平在1980年3月19日为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与中央有关同志的谈话中又一次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

> "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至于是不是叫路线斗争，还可以研究。这个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泽东同志在1953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高岗想把刘少奇同志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对高岗的斗争还要肯定。"①

①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第76页，198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

邓小平的这段讲话，是针对起草决议中提出的问题讲的。当时提出的问题有：一、对高岗、饶漱石的斗争是否正确；二、这场斗争叫不叫一次路线斗争；三、高、饶是否是野心家、阴谋家。所以后来在决议中写了这样几句："1955年3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总结了反对野心家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重大斗争，增强了党的团结。"这几句话充分地肯定了这场斗争的必要性、斗争的性质、以及对高、饶本人的定性。

对于高、饶的斗争，在毛泽东看来，不解决高、饶的反党问题，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无法贯彻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是无法召开的。因为，高岗要篡夺党中央和政务院的最高权力。他要当中共中央副主席和政务院总理。1955年3月31日，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所作的结论中有这样一段论述：

> "党的代表大会，十年没有开了。当然头五年不应当开，因为兵荒马乱，又开了'七大'（应是七届二中全会——本文作者注），后五年可以开而没有开。没有开也有好处：高、饶问题搞清楚再开。不然他们要利用'八大'大做文章。"①

高、饶问题已严重地干扰着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工作部署。高、饶的目的是要打倒刘少奇和周恩来，想当中共中央副主席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55页，197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

和政务院总理，由他主持中央的工作。这与毛泽东的计划是完全矛盾的。毛泽东提出中央工作分一线二线，目的是让刘少奇、周恩来到一线，自己退到二线，而现在高岗要到一线，这在党中央是不会同意的。毛泽东也是不会同意的。这点高岗是没有估计到的。所以，高岗在林彪等人的支持下敢于大肆地搞起阴谋活动来。高岗调到中央工作后，不断地到中南海找毛泽东，毛泽东也比较信任他。高岗抓住这个机会，认为只要打倒刘少奇或周恩来，党和国家的权力就会落在他的手中。他利用1953年夏召开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以及同年九十月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企图通过反对薄一波、安子文，达到打倒刘少奇、周恩来的目的。

1953年七八月间，中央召开了全国财经工作会议。这次会议要讨论的议题是很多的，有"一五"计划的问题，也有如何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问题。凡是不符合过渡时期总路线精神的，必须坚决地纠正。高岗利用这个会议，搞起了反薄一波倒刘少奇的活动。把薄一波在工作中的错误夸大为路线错误。毛泽东及时地察觉到高岗的这个阴谋。采取了坚决的措施，制止了财经工作会议上对薄一波的过分批判。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极为重要的讲话。本来，周恩来已为会议作了结论，毛泽东是可以不讲话的。但是，毛泽东有点不放心，他还是要讲话。他一方面认为，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是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是违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这主要是指薄一波主张推行的"新税制"，即对国营企业、合作社企业、私人企业在税收上改变过去的做法，实行一律平等的税收制度。这是一个错误，必须坚决纠正。但是，另一方面，毛泽东又指出，薄一波的错误不是路线

错误，是一个点的错误，一个点构不成一条线。“新税制”错误是跟刘青山、张子善的错误不同的。“新税制”是思想问题，是离开了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对国营经济和私营经济一律平等收税，只能有利于私营经济，不利于国营经济。刘青山、张子善是贪污犯罪的问题。毛泽东的讲话正确地分析了“新税制”的问题，同时他还肯定了薄一波在工作中的成绩。这就从根本上挫败了高岗利用财经工作会议进行反薄倒刘的阴谋。同时，毛泽东也尖锐地指出，现在王国甚多，八百诸侯，谁也管不了谁，有极少数人是坚决反对集体领导的。这是对高岗、饶漱石发出的严重警告。

高、饶对毛泽东的讲话和警告置若罔闻。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后，高岗并没有停止倒刘的阴谋活动。饶漱石自中央调他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后，见高岗十分活跃，也常去见毛泽东，于是和高岗结合起来，配合高岗的夺权活动。特别是在1953年九十月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也公开地进行倒刘的活动。一方面，他带头批判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另一方面公开点名批判刘少奇，以此配合高岗的夺权活动。对于这种情况，可以说是很少发生的。因此，必然引起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的重视。毛泽东曾提出，立即停止组织工作会议的进行，把饶漱石的反安倒刘的活动端到大会上解决。后来，由于周恩来的建议，才没有端到大会上，而是先召开领导小组会议，严肃批评饶漱石。这样才使会议重新按原计划进行。

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和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高、饶的阴谋夺权活动已经败露，毛泽东已着手处理了。但当时还是以批评教育、加强团结的方法进行。然而，高岗利令智昏

，摆出了一副不打倒刘少奇决不罢休的架势，更加猖狂地活动起来。1953年冬，高岗到处找人谈话。曾找过邓小平、陈云、彭德怀、黄克诚等。他企图联合中央各方面的领导人与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当时，高岗的家里门庭若市，车水马龙。高岗家的会客室内放了不少刘少奇的讲话稿，随便让人翻阅，他也大讲其讲话稿中有什么错误等。高岗散布反对刘少奇的言论，目的是要拉拢人。表现得最为突出的，是1953年底毛泽东提出中央工作分一线二线以后，他认为时机已到。特别是毛泽东生病，在休养期间，党中央的工作按惯例由刘少奇主持，他更是竭力反对，企图把刘少奇拉下来，使自己成为毛泽东的唯一助手，准备自己将来做领袖。高岗已发展成为一个十足的野心家。这必然引起毛泽东的警觉，同时也促使毛泽东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1953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主持了这次会议，并把高、饶的问题端了出来。毛泽东在讲话中有这样一段：

> 北京城里头有两个司令部：一个司令部就是我们这些人的，这个司令部刮阳风，烧阳火；第二个司令部呢，就叫地下司令部，也刮一种风，烧一种火，叫刮阴风，烧阴火。我们的古人林黛玉讲，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现在呢，不是阳风阳火压倒阴风阴火，就是阴风阴火压倒阳风阳火。他刮阴风、烧阴火，其目的就是要刮倒阳风，灭掉阳火，打倒一大批人。"①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1页，1977年4月人民出版社出版。

毛泽东称这次会议为揭露高、饶问题的中央会议。在会上，毛泽东还提议：中央一定要起草一个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是相当尖锐和深刻的。可以说，是经过半年时间的调查研究后作出的判断，这个讲话为后来处理高、饶问题打下了基础。

会议经过讨论，决定召开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以解决高、饶的问题；由政治局起草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提交七届四中全会讨论通过。

会议后，毛泽东到杭州休养。

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委托刘少奇主持召开了。

1954年2月6日至10日，中国共产党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召开的第二个中央全会。毛泽东没有参加会议。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在会上作了报告，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44位同志在会上作了发言，全面地揭露了高、饶的反党阴谋活动。会议通过了由中共中央政治局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是一个写得十分精采的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初期党内斗争中形成的一个重要文件，也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不愧为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把党的团结提高到党的生命的高度作精辟的论述，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决议》中说：

"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破坏党的团结就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

就是帮助敌人来危害党的生命。”“党的团结必须是也只能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在正确的政治原则和正确的组织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对于那种与党对抗，坚持不改正错误，甚至在党内进行宗派活动、分裂活动和其他危害活动的分子，党就必须进行无情的斗争，给予严格的制裁，直至在必要时将他们驱逐出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党的团结，才能维护革命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

历史证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是非常必要的，上述论述也是十分正确的。国内外的一切敌人，总是千方百计地要破坏党的团结和统一，在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从而瓦解党，分裂党。高、饶的阴谋反党活动，正是阶级敌人所需要的。在建国初期，毛泽东提出加强党的团结，提议通过决议，是一个深谋远虑的决策。特别是在决议上还有六项规定，以维护党的团结，更具有深远的影响。这六项规定是：

(一)党的团结的利益高于一切，因此应当把维护和巩固党的团结作为指导自己言论和行动的标准，即有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就说，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就不说，有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做，不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不做。

(二)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的统一的集中的组织，党的团结的唯一中心是党的中央，因此，必须把任何地区、任何部门的党组织及其工作看作是在中央统一领

导下的整个党及其工作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派别思想、小团体习气、地方主义、山头主义和本位主义，反对任何妨碍中央统一领导、损害中央的团结和威信的言论和行动。

（三）党的团结的重要保证之一是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严格遵守集体领导的原则，因此必须坚决地反对分散主义和个人主义，反对把自己领导的地区和部门当作独立王国，反对把个人放在组织之上，反对不适当地过分地强调个人的作用，反对骄傲情绪和个人崇拜。

（四）全党高级干部的重要的政治活动和政治意见应该经常向所属的党的组织报告和反映，其关系特别重大者则应直接向党中央的政治局、书记处或中央主席报告和反映；如果避开党组织和避开中央来进行个人的或小集团的政治活动，避开党的组织和避开中央来散布个人的或小集团的政治意见，这在党内就是一种非法活动，就是违反党的纪律，破坏党的团结的活动，就必须加以反对和禁止。

（五）全党高级干部应根据增强党的团结的原则来检查自己的言论和行动，凡是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言论和行动都必须改正。

（六）对于任何有损害党的团结的言论和行动应当进行批评和斗争。

以上六条，对于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是有重大意义的。当时，全党已有几百万党员，但如果没有严格的纪律约束，党就会成为一盘散沙，没有战斗力；如果不采取坚决果断的行动

措施，制止阴谋家、野心家的活动，党的团结和统一，是无法保证的，党将会被这些野心家搞垮。这六条原则，对于今天党的活动、党的建设、巩固党的团结和统一、仍然是适用的，有重大指导意义的。毛泽东紧紧抓住了党发展壮大的规律和特点，不断地强调全党的团结和统一，与野心家作不调和的斗争，才使中国共产党保持旺盛的战斗力和生命力，不断地发展壮大。

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揭露高、饶的反党阴谋活动，目的还在于挽救和教育他们，而不是把他们完全打倒，或一棍子打死，也没有作为敌我矛盾对待，在斗争中还有意识地保护了一批干部。如果高岗能采取正确的态度，接受党对他的批评，认真地改正错误，那么他还是一个中共中央委员或中央政治局委员。然而，七届四中全会后，高岗并没有像在会上表示的那样去做，而是以自杀的方式来对抗中央。虽然第一次自杀未遂，但他的恶劣态度已充分地表现出来了。

对于高、饶的反党阴谋活动以及错误，党中央和毛泽东总是采取慎重的态度。为核实会上揭露的问题，七届四中全会后，周恩来主持召开了高岗问题座谈会。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召开了饶漱石问题座谈会。高岗、饶漱石也分别参加了座谈会，让他们听取对他们的批评，同时也让他们在会上作了检查。周恩来为高岗问题座谈会作了总结，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为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向中央作了报告。在会议上和报告中，充分地反映了是重事实、重教育的。在周恩来作的总结中指出：

“高岗的极端个人主义错误已经发展到了进行分裂

党的阴谋活动，以图实现其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个人野心。在其野心被揭穿和企图失败以后，他就走上了自绝于党和人民的自杀道路。”

关于高岗分裂党及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阴谋活动，周恩来在总结中，指出了如下事实：

(1)在党内散布所谓“枪杆子上出党”、“党是军队创造的”的荒谬理论，即制造所谓“军党论”作为分裂党和夺取领导权力的工具；

(2)进行宗派活动，反对中央领导同志；

(3)造谣挑拨，利用各种空隙，制造党内不和；

(4)实行派别性的干部政策，破坏党内团结，尤其是对干部私自封官许愿，以扩大自己的影响，企图骗取别人的信任；

(5)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看作个人资本和独立王国；

(6)假借中央名义，破坏中央威信；

(7)剽窃别人文稿，抬高自己，蒙蔽中央；

(8)在中苏关系上，拨弄是非，不利中苏团结；

(9)进行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

高岗所以发展到进行分裂党中央和企图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是有他的思想根源、社会根源、历史根源的。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高岗有其正确的一面，为党为人民作出功绩的一面，因而得到了党的信任，党和人民也给于他很

高的地位和荣誉；但是另一方面，他的个人主义思想和私生活的腐化堕落没有得到纠正和制止，并且在全国革命胜利后更大大地发展了，膨胀了、这就使他走向自我毁灭的一面。高岗的这种黑暗面的发展，使他一步一步地变成了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的实际代理人。尤其是在建国后进行的反党行为，正是他的黑暗面发展的集中表现。同时，也代表了资产阶级企图分裂、破坏和腐蚀共产党的一种反映。在他的身上，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完全压倒了一个共产党员所必须具备的为人民服务而始终不渝的耿耿忠心。高岗成为党内的野心家不是偶然的。

高、饶事件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中共中央为吸取这个教训，在党和国家干部中有计划、分层次地传达了高、饶的问题，在党内开展了一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宣传学习运动。一切骄傲情绪、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宗派主义、小团体习气、分散主义、地方主义、本位主义都应当受到批判。“军党论”的荒谬思想必须肃清，个人主义野心家必须防止。党内的非法活动必须禁止。派别性的干部政策必须反对。独立王国的思想必须消灭。党的统一领导和集体领导的原则必须坚持。党内的民主及批评和自我批评必须发展，党内任何干部必须无例外地受到党的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必须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教育必须加强。

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为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向中央写的报告中认为：

> “饶漱石同志是一个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野心家，他个人野心的欲望是日益上升的，而最尖锐的罪恶，是一九五三年他和高岗共同进行分裂党的活动。”

高、饶两人的共同特点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随着革命的胜利而日益膨胀，终于步入了阴谋反党的泥坑中。这是他们黑暗面发展的必然结果。

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并没有马上对高、饶等人在组织上作出处理。这是党的一个传统的做法。对犯错误的同志，重在思想教育，使犯错误的同志能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组织处理是辅助手段，其目的也还是为了教育本人。然而，高岗并没有进一步认识自己的错误，也不珍惜党给他的机会。他在1954年8月17日又一次走上了自绝于党和人民的绝路——自杀了。这样，他就拒绝了党对他的挽救。

1955年3月21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在会上，对高、饶问题作出了组织处理。毛泽东在为会议作的开幕词以及结论中都讲了高、饶的问题。他认为，高、饶之间是一个反党联盟。这联盟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现象，是现阶段阶级斗争的一种激烈尖锐的表现。这个反党联盟的罪恶目的是要分裂党，用阴谋方法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为反革命复辟开辟道路。他要求全党，尤其是党的干部，从这个事件中吸取教训，引为戒鉴，不要重蹈覆辙。共产党人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应该随时公开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对于每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表示自己或者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而绝不可以学习高、饶那样玩弄阴谋手段。

鉴于高、饶事件的历史教训，毛泽东强调：个人的智慧必须和集体的智慧结合起来才能发挥较好的作用，使我们工作少犯错误，中央和各级党委必须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继续反对个人独裁和分散主义两种倾向。必须懂得集体领导和个人

负责这两个方面不是互相对立的，而是可以相互结合的。而个人负责与违反集体领导原则的个人独裁，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

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会议通过决议，开除了高岗、饶漱石的党籍，撤销了他们在党内外的各项职务。

反对高、饶的反党阴谋活动，是毛泽东在建国初期领导全党进行的一次党内斗争。这场斗争是非常成功的。它维护了党的团结和统一。几十年以后，邓小平说，这次斗争"还要肯定。高、饶问题的处理也比较宽。当时没有伤害什么人，还有意识地保护了一批干部。总之，高、饶问题不揭露，不处理是不行的。现在看，处理得也是正确的。但是，高岗究竟拿出了一条什么路线？我看，确实没有什么路线。"①

这场斗争，对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是有重大意义的。对党内野心家、阴谋家的清除也是完全必要的。还必须肯定，认为没有必要开展这场斗争的观点是错误的。我们还应指出，当时的确过分地估计了高、饶的力量，把他说成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并以开展运动方式进行，则必然增加了党内斗争的紧张空气。同时把高、饶之间说成是一个反党联盟，则又容易造成斗争的扩大化和过火现象的发生。其实，他们之间是没有联盟的。这两点，对党内斗争是很有影响的。在处理中，当时对所谓高岗反党集团的五虎将：张明远、张秀山、赵德尊、马洪、郭峰等处理是比较宽的，没有开除他们的党籍，只是降级处分，然而事实上，他们与高岗之间只是上下级的工作关系、

①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第76页，198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

领导关系，而不是反党集团的司令与虎将的关系，所以即使降级处分也是不合适的。至于对当时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的向明和任上海市公安局长的杨凡等人开除党籍、撤职查办的处分更是错误的。

几十年以后看这场斗争，一方面要充分肯定它的必要性和正确性，另一方面也应指出它有过火的现象和扩大化的地方。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地总结这场斗争的教训。毛泽东也曾说过，高岗不自杀，不仅可以留在党内，而且还可以担任一些重要的工作。这话是很中肯的，从中我们是可以得到启示的。在高、饶事件中处理错了的，现在都已得到了甄别平反，作出了正确的结论，不少同志又都担任了党和国家的许多重要工作，为人民的事业作出了新的贡献。

高岗走上自绝于人民的道路，也是他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作祟的结果。如果高岗表里如一，正确地对待党中央对他的批评教育，不玩弄两面手法，会上一套，会下又一套，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搞鬼，是不至于如此的。毛泽东对他是很信任的。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前，高岗给在杭州休养的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示在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承认自己犯了错误。毛泽东收到信后，于 1954 年 1 月 22 日给刘少奇发了一个电报，电文如下：

"杨尚昆同志到此，收到所需文件，并收到高岗同志一信。高岗同志在信里说完全拥护和赞成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并说他犯了错误，拟在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想于会前来这里和我商量这件事。我认为全会

开会在即，高岗同志不宜来此，他所要商量的问题，请你和恩来同志或再加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关于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除文件表示者外，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这后一点我在一月七日致你和书记处各同志的信中已说到了。你们同意这个方针，就请你们据此和到会同志事先商谈，并和高岗同志商谈他所要商谈的问题。尚昆留此几天即回北京。此电请送高岗同志一阅，我就不另复信了。"①

这说明当时毛泽东对高岗还是信任的，希望他能作自我批评，改正错误。四中全会确定了对任何同志不展开批评的方针。然而，高岗并不重视毛泽东对他的态度，而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出发，出尔反尔，最后越陷越深，使自己滑入了身败名裂的错误深渊。这也是一个极其深刻的教训。

1954年8月17日，高岗自杀后，中共中央曾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名义向苏共中央作了通报。其中写了这样两段话：

"在最近半年，根据中共各个地方党的组织所揭发的材料，更加证实了高岗的罪行。但是，高岗在被管教的这一期间，却仍毫无悔悟表现，反于八月十七日实行第二次自杀，充分暴露了他的坚持仇恨党的立场和自绝于中国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440～441页，1990年9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人民。

高岗死后，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以便确切查清他的死因。根据医生所作的临床诊断、尿便化验、病理剖检的各项结果和公安工作同志的调查、现场检查情形等，可以肯定高岗确是自杀，是服用多量安眠药致死的。同时，从其他各方面所作的进一步调查，亦证实了高岗在他的阴谋被揭穿后，早就有意识地积存安眠药和准备用这种办法实行自杀。"①

从上述可以看出，高岗的自杀是中央没有料及的，也是不希望发生的。然而，高岗却走上了这一步，这就不得不把他的问题向全党公布了，以此吸取深刻的教训。

4. 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1954年春，毛泽东在杭州休养期间，一直在为筹备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会大会的第一次会议忙碌着，尤其是对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诞生费尽心思。他把宪法小组的起草工作也带到了杭州，由他直接组织起草。

1954年1月15日，毛泽东向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和中央发了关于宪法起草小组的工作计划的电报。其中计划是：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537页，1990年9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宪法小组的宪法起草工作已于一月九日开始，计划如下：

（一）争取在一月三十一日完成宪法草案初稿，并随将此项初稿送中央各同志阅看。

（二）准备在二月上半月将初稿复议一次，请邓小平、李维汉两同志参加。然后提交政治局（及在京各中央委员）讨论作初步通过。

（三）三月初提交宪法起草委员会讨论，在三月份内讨论完毕并初步通过。

（四）四月内再由宪法小组审议修正，再提政治局讨论，再交宪法起草委员会通过。

（五）五月一日由宪法起草委员会将宪法草案公布，交全国人民讨论四个月，以便九月间根据人民意见作必要修正后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最后通过。"①

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宪法草案初稿已写出来了。2月17日，毛泽东派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的张一平专程到北京送宪法草案初稿。送时，毛泽东向刘少奇发了电报和信。电报中说：

"现将宪法初稿（五份）派人送上，请加印分送政治局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437页，1990年9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及在京中委各同志，于二月二十日以后的一星期内开会讨论几次，将修改意见交小平、维汉两同志带来这里，再行讨论修改（约七天左右即够）。然后，再交中央讨论，作初步决定（仍是初稿），即可提交宪法起草委员会讨论。因此，小平、维汉原定二十日动身来此的计划，可推迟到月底动身。送初稿的人明（十八）日动身，二十日可到北京。”①

毛泽东对宪法草案的起草工作是抓得很紧很紧的。他过去说过，抓而不紧，等于不抓。他抓宪法草案的起草，如同抓打仗、搞群众运动一样，是以日计算的。并开始了对宪法草案的讨论。在北京，组织了500多人讨论，在全国各省市组织8000多名积极分子和干部进行广泛的讨论。在讨论中，搜集了5900多条意见。大家一致认为这个宪法草案是好的。毛泽东在1954年6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作了总结性的讲话。其中讲到：

“在座的各位和广大积极分子为什么拥护这个宪法草案呢？为什么觉得它是好的呢？主要有两条：一条是总结了经验，一条是结合了原则性和灵活性。

第一，这个宪法草案，总结了历史经验，特别是最近五年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它总结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的经验，总结了最近几年来社会改革、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政府工作的经验。这个宪法草案也总结了从清朝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447页，1990年9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末年以来关于宪法问题的经验，……。

第二，我们的宪法草案，结合了原则性和灵活性。原则基本上是两个：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我们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人民民主，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的原则贯串在我们整个宪法中。另一个是社会主义原则。我国现在就有社会主义。宪法中规定，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原则性。要实行社会主义原则，是不是在全国范围内一天早晨一切都实行社会主义呢？这样形式上很革命，但是缺乏灵活性，就行不通，就会遭到反对，就会失败。因此，一时办不到的事，必须允许逐步去办……”①

搞社会主义是我们的方向，在宪法中必须写下来，但是什么时候完成这任务要从具体情况出发，毛泽东说：

“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我们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究竟需要多少时间？现在不讲死，大概是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年左右，可以打下一个基础。到那时，是不是就很伟大了呢？不一定。我看，我们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经过五十年即十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501～503页。

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就像个样子了，就同现在大不一样了。"①

经过半年多时间的努力，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项筹备工作大体就绪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由人民行使权力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了。

1954年9月15日至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的怀仁堂内隆重举行。这是中国近代以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行使人民权力的标志。从此，也开始了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制度的历史。

毛泽东主持了这次会议，并作了开幕词。他说：

"我们这次会议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这次会议是标志着我国人民从一九四九年建国以来的新胜利和新发展的里程碑，这次会议所制定的宪法将大大地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②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505－554页，1990年9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553－554页，1990年9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毛泽东的上述论断是十分正确的。由于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选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以及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从而结束了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能和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代替国家宪法的历史时期，使我国在国家制度上开辟了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最高权力的历史新时期。

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是中国人民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治组织，它不是政权机关。在1949年的历史条件下，只具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条件，而不具备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当时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迫切任务，是要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中央人民政府，宣告中国人民的独立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是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后的必然结果，也是全国各革命阶级、阶层、党派、团体和各民族的共同愿望。所以，在取得各方面同意和支持后，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代行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选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及委员会委员。讨论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从而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央人民政府的诞生。这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的做法。这做法也明显地表现了它的临时性和过渡性的特点。经过几年的努力，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日益成熟。国民经济的恢复，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各级人民政府的建立与完善，特别是从1953年起，我国的经济建设已走上了正常轨道，开始执行第一个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

划。所以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尤其是毛泽东作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以后，于1954年9月顺利地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这是在共和国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次大会。

毛泽东在大会上的开幕词中指出：

>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
>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
> 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
> 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
>
> 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①

毛泽东还指出，这次会议所制定的宪法将大大地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总章程，是一个根本大法。用宪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明确的社会主义前进轨道，沿着这轨道，迅速地朝着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道路迈进。这次会议通过的宪法是以1949年9月通过的共同纲领为基础的，又是共同纲领的发展。

在这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序言中宣告：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554页，1990年9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英勇奋斗，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1949年取得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因而结束了长时期被压迫、被奴役的历史，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还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民主制度，也就是新民主主义制度，保证我国能够通过和平的道路消灭剥削和贫困，建设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

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选举刘少奇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毛泽东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任主席，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这在毛泽东一生的历史中是一件大事。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席，而且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是国家的元首了。根据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对外代表国家，接受外国使节，批准同外国缔结条约；对内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公布法律和法令；任免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秘书长；统帅全国武装力量，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任免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委员；授予国家勋章和荣誉称号；

发布大赦令和特赦令;发布戒严令,宣布战争状态,发布动员令等。

党的权力、国家的权力、军队的权力,集于毛泽东一身了。这种政治体制的形成有它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在建国初期,毛泽东担任这三方面的最重要的职务,不仅是人民的需要,而且也是胜利的象征。对于稳定国内政治局势,提高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威望,具有重大的意义。尤其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实需要有一个革命家、思想家、理论家、战略家、军事家作为党和国家的领袖,才能将中国真正地统一和发展。

毛泽东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以后,工作比过去繁忙多了。尤其是大量的国际事务活动,必须由他参加。然而他并没有摆起国家元首的架子,他的简朴的生活依旧和过去一样。

钱根录是在1950年从南京调到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工作的一位同志。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整整6年。毛泽东的一切都给他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而最深的,是毛泽东爱睡木板床,爱吃粗粮,对群众送来的东西,或退回去,或保存起来。有时工作人员感到毛泽东年逾花甲,睡木板床过意不去,给他换上棕绷床或弹簧床,但毛主席坚决不要,换了的一定要把木板床换回来。不换回来是不罢休的。这一方面说明,毛泽东虽然有条件,但他始终保持着最简朴的生活;另一方面,也说明毛泽东的性格是矢志不变的。对群众送来的东西,那他更是严格要求,不准随便收受。尤其是每年到了12月26日前后,人民群众出于对领袖的热爱,总有不少人给毛泽东送来东西,祝贺他的生日。这件事难坏了工作人员。当时,送来的东

西很多，有的是工业品，也有的是农产品。人民群众送生日礼物，真是情深意重。那几天，中南海的各个大门的值班室内特别忙碌，要说服送礼品的同志把东西拿回去，是很不容易的。有的同志放下礼品就走了，怎么办呢？毛泽东总是要求工作人员把东西保存起来，不要损坏。但时间长了，送来的东西也多了，就只好专门抽出人去整理和保管各种礼品，开辟了陈列室，分类登记。在礼品中，有的是水果之类，毛泽东就吩咐工作人员将水果分送给机关值夜班的同志，同时也经常告诫大家要养成廉洁奉公的好品德、好作风，不许公私不分。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后，毛泽东以伟大的气魄，惊人的毅力，筹划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个最伟大的历史事变——完成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历史任务。他一定要和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一起，为谱写中国革命历史上的新篇章而奋斗。中国一定要搞社会主义，是毛泽东的决心，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是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是改变中国历史的伟大举动，所以毛泽东的决心，必然化作巨大的精神力量和人民的具体行动。

5.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

毛泽东是一位特别重视农民和农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有人说他是地地道道的农民的儿子，所以才重视中国的农村事业。其实，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他最深刻地了解了中国的国情。因为中国农业的兴衰，决定着中国的命运。

1955年前后，他为中国农村设计了一幅集体化的宏伟蓝图。毛泽东深深感到只有把农民引上了集体化的道路，才能使农民逐步摆脱贫困的处境。而中国的农民要真正地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必须经历几次伟大的社会变革，才能实现。第一次是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把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剥削制度下解放出来，成为独立的个体劳动者，真正地实现耕者有其田，自己的劳动成果真正地属自己所有。对于这点，毛泽东的理解可以说比中国共产党内任何人都要早，都要全面，都要深刻。当陈独秀作出农民难以加入革命队伍的论断的时候，毛泽东却以极其深刻的见解，树立了依靠农民阶级革命的思想，与陈独秀的错误看法尖锐地对立着。后来，当中国共产党内提出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的时候，毛泽东早已在井冈山、兴国等地轰轰烈烈地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了。毛泽东领导人民反帝反封建几十年，实际上一直在领导农民进行革命斗争。到1952年底，全国除台湾省和西藏等地区外，都完成了土地改革的任务，实现了农村的第一个历史性的社会变革运动。

在几十年的为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完成土地改革的斗争中，毛泽东倾注了半辈子的心血。毛泽东深刻地感到，土改后的农民虽然在自己的土地上辛勤耕作，日益富裕，农业生产力也有了较快的提高，但是，这种一家一户的农村经济体制和农民的小私有制，还是与手工劳动的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相联系的，要想彻底地摆脱贫穷是很难的。一家一户的生产方式极大地阻碍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土改后的农民，由于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决定了他与资本主义国家内的农民有着很大的不同。中国的个体农民也开始和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

了。尽管这样，一家一户的农民要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半机械化，大幅度地提高农业生产力，大量地提供农业和农副业产品，满足农民以及迅速发展的城市需要是十分困难的。即使能实现，也是要经过漫长的痛苦的历史进程的。尤其是农村中贫富的两极分化是很难抑制的。这必然与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城市的大发展发生尖锐的矛盾，或者说严重地阻碍着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现。毛泽东把农民引上集体化的道路看作为第二次伟大变革。这是把私有制的个体农民，通过农业合作化运动，变为集体所有制的农民，依靠集体的力量彻底摆脱贫困状态，使亿万农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毛泽东为实现农村的第二次大变革，进行了筹划，领导和组织了全国规模的农业合作化运动。

我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毛泽东一贯地主张从低级到高级，采取自愿互利的原则，通过示范试验，将农民引上社会主义道路。在合作化运动中，毛泽东创造了从互助组到初级社、高级社的形式。尤其是初级社，具有中国的特色，符合农民的要求和农村生产力的水平。初级社既保留了私有制农民的特点和要求，又发挥了集体的作用，参加初级社的社员以土地和劳力的多少参加分配，这是符合建国初期农民觉悟和农业生产力水平的农村经济模式。但是，初级社还没有巩固和发展，有的成立后不到一年就转变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并且把高级社普遍地推广起来，成为农村中主要的经济模式，这必然为农业合作化运动带来缺点。

把一家一户的个体私有制农民转变为农业合作社的社员，这对农民是一次深刻的变化，为农民走向共同富裕打下了基础，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要使农民真正地富裕起来，还必须

实现农业的机械化、专业化、商品化。这是农民实现合作化以后，面临着的又一个深刻的变化。在中国，如果农民不富裕起来，中国也就富裕不起来。毛泽东把我国几亿农民引上集体化的道路，这是他的一个巨大的功绩。他日夜操劳，完成了这个任务。在高级社内以及后来的人民公社内，实行统一领导、统一计划、统一管理、统一劳动、统一分配，是一种农村产品经济的模式。这种模式，严重地阻碍了农民的个人的积极性，阻碍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阻碍了农民向专业化发展，尤其是推行统一的平均主义分配原则，影响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名义上的按劳分配、共同富裕，实际上越搞越穷，使中国的农业问题成为缠绕全党和全国人民前进的大事，使农业长期处在缓慢的发展之中。

毛泽东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思想和态度，始终是站在农民运动的前头，积极地引导农民奋进。1953 年 10 月 26 日至 11 月 5 日，中共中央召开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在会议的准备和进行中，毛泽东于 10 月 15 日和 11 月 4 日两次同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谈话。在第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表述了对农业合作化的积极态度和思想。他主张，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促进整个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前进，以发展农村的生产力。他认为，在新解放区，无论大中小的县，在今冬明春，经过充分准备，办好一个到两个合作社，至少一个，一般一个到两个，最多三个，要分派数字，摊派下去。多了冒进，少了右倾。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那就自流了。摊派而不强迫，不是命令主义。同时，毛泽东也认为，农民可以不经过互助组，直接办合作社，但一般规律是经过互助组再到合作社。直接办合作社，走直路，跳过办互助组阶段，这可以较快

地搞起来。对于老解放区，毛泽东主张，应当多发展一些合作社。东北、华北地区的合作社可以在原有基础上翻一番，或者可以翻到一番半到两番，合理摊派，控制数字。毛泽东所以持这种态度，原因之一，他认为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作，才能迅速地提高农业生产的水平；原因之二，他认为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农村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可以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走的是一条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如果不搞社会主义，那资本主义势必要泛滥起来。在毛泽东看来，个体农民是站在十字路口，很容易走资本主义道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也很容易走社会主义道路。个体农民发展生产，是有其发展资本主义的一面；另一方面，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接受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这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个体农民是有区别的。

毛泽东的上述谈话在第三次全国农业合作会议上作了传达和讨论，并且很快地被与会者接受下来。在11月4日的谈话中，更表现了毛泽东对农业合作化的积极态度。他说，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在是既需要又可能，潜力很大，如果不去发掘，那就是稳步而不前进。脚本来是走路的，老是站着不动，那就错了。要搞社会主义，“确保私有”是资产阶级观念。有句古语，“纲举目张”，拿起纲，目才能张，纲就是主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逐步地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主题，就是纲。提起了这个纲，各项帮助农民的政治工作、经济工作，一切都有统属了。有条件成立的合作社，强迫解散，那就不对了。不管哪一年，都是错误的。“纠正急躁冒进”，总是一股风吧，吹下去了，吹倒了一些不应当吹倒的农业生产合作

社。

毛泽东的上述谈话，是针对1953年10月4日中共中央批转华北局关于纠正农业生产合作社运动中急躁冒进倾向后的情况及当前工作任务向中央的报告中的一段按语而发的。这段按语有这样两段：

> "在过渡时期内，党在农村的基本任务乃是完成对农业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任务是绝对不能放松的，否则即会产生右的自流主义错误；但在执行这一基本任务时，又必须从长期存在的小农经济这一基本情况出发，逐步地、稳步地前进，否则即会产生'左'的急躁冒进错误。只有在这运动中随时注意正确地进行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才能避免可能发生的重大偏差，以保持对广大农民的巩固的团结和农业生产的稳步提高。"
>
> "在过去四五年内，就曾经发生过一些偏差，如在土地改革结束后不久老解放区的某些地方，为了稳定中农在当时的动荡的生产情绪，曾片面地鼓励个体经济的积极性，轻视或放松了引导农民组织起来的任务，因而一度产生了自流主义的倾向；又如去冬今春不少地区在发展和提高互助合作组织方面发生了急躁冒进倾向。"

在毛泽东看来，农业生产合作社应当发展，目前不存在急躁冒进现象。他提出了合作社发展的设想。他说：

"生产合作社的发展计划提出来了，今冬明春，到明年秋收前，发展三万二千多个，一九五七年可以发展到七千万个。但是要估计到有时候可能突然发展一下，可能发展到一百万个，也许不止一百万个。总之，既要办多，又要办好，积极领导，稳步发展。"①

据1953年11月统计，全国参加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的农户约4790多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43%。其中主要是参加互助组，农业生产合作社只有14000多个，参加的农户有273000多户。1953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于是到1954年初，出现了农业生产合作社迅速发展的趋势。到1954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向党中央作了报告，全国总计农业生产合作社已有9万多个，参加的农户已达170万户。根据这个报告，中共中央认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由14000多个发展到9万多个，增加6倍以上，这是很好的，也是很快的，所以希望各地积极努力把现有的9万多个合作社切实办好，起到示范的作用，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合作社大发展的新形势作好准备工作，特别是要解决农业生产的发展赶不上工业发展需要的问题。

1954年10月10日至30日，中共中央又召开了第四次全国农业互助合作会议。此时，全国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已发展到22万个，特别是在1954年春以前建立的近10万个合作社中，有90%以上的社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增产，办合作社好、合作的优越性已被群众所承认，合作社迅速发展的形势正在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24页，1977年4月人民出版社出版。

兴起。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提出了这样的计划:在1955年春耕以前,将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60万个,使老区将有30%左右的农户入社,新区做到区区有社。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还认为,如果把这60万个合作社办好了,那就可以有把握地做到,在1957年组织50%以上的农户加入合作社,使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全国主要农业区成为主要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这就可以预计:我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发展大体步骤将是,第一步,1957年前后基本上完成初级合作化,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再先后转入高级合作化,但在这时期内,只能实施初步的农业生产技术改良和部分的农业机械耕作;第二步,约在第三、第四个五年计划内,将依靠发展起来的工业,去装备农业,实现大规模的农业机械化。现在看来,完成这个计划是有把握有希望的,但也存在着不小的困难。当时设想,我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是先完成合作化,后完成机械化,即用2个五年计划时间完成合作化,4个五年计划时间完成机械化。

先完成农业的社会主义合作化,后完成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是毛泽东在50年代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重要战略思想。他把这思想付诸实践,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起来,并获得了成功。这是符合50年代广大农村生产力状况的,农民群众实现合作化是能办到的,但要实现机械化就十分困难了。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不能等待让农民自然地富裕起来实现机械化,而要把农民组织起来,走合作化的道路,以提高农业生产水平,进而逐步实现机械化。要用4个五年计划,即20年时间完成这个根本任务。

在1954年底,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出现了新的情

况：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下子发展到48万多个。这主要是在第四次全国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前后建立的。这些新建立的合作社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无准备、或准备很不充分的条件下建立的，而建立后又没有及时地加以整顿。因而导致不少地方出现了新建的合作社垮台散伙和社员退社现象。整顿和巩固这48万个合作社已成为当时最迫切的任务。

中共中央于1955年1月10日发出了《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在通知中强调，对那些准备不足、仓促铺开的地方，在不伤害群众办社积极性，不伤害积极分子热情，而又保证新社质量的原则下，允许已有的社数和社员户数作必要的合理的减少。经过整顿，如河北、浙江等省减少了一些新建社，全国压缩了25000多个，使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速度暂时缓了下来，即使这样，也还超过了预计的发展速度。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在1955年3月2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发言，阐述了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指导思想和看法。他说，现在全国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已发展到60万个，在这几年中已获得了一些基本经验：应当肯定现阶段的合作化运动的主要形式是建立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即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是农村中贫农和中农的经济联盟，只有合作社办得好，贫农和中农就团结得好，也才能使富农更加孤立，才有利于限制和逐步消灭富农经济；既然合作社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那么在土地和其它主要生产资料保留私有的条件下，在统一使用土地和生产资料时，就应该给予应得的报酬。这种报酬多少就成为合作社内部贫农和中农之间利害关系的主要关键。也就是保证办好社、巩固社、发展社的主要关键，为了团结中农，要始终坚持自愿原则。还

指出，对于中农，如果领导者不积极领导，不进行说服教育，而采取自流主义，那中农是不会自己改造自己的。但不尊重中农利益，不听取中农意见，不坚持自愿原则，不等待中农的觉悟，而采取强迫粗暴的态度，就会犯冒险主义错误。那么，怎样能够加速农民入社的自愿要求呢？最主要的一着是办好现有的合作社。因此，合作社的发展，必须坚持"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的方针，必须发展一批，办好一批，在办好的基础上求发展。因此，今年已办的60万个合作社务必办好。发展过猛的地方，今年应停止建社，全力转入巩固的工作。遵照中央作出的关于把合作化速度放慢的指示，1955年至1956年共办社80万个，1956年至1957年共办社120万个。在这个基础上，争取1960年实现全国范围内的半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化，即实现有80%以上的农户参加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中。3月22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发出了关于巩固现有合作社的通知。3月25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又作出了对浙江省目前合作化工作的意见。4月21日至5月2日，中共中央召开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在会上，邓子恢作了开幕词和总结。他明确指出，合作化运动的成绩是主要的，但有些紧张，有些冒进。因此，今后的方针要求是：一般停止发展，立即抓生产，全力巩固；少数的省县要适当收缩；把互助组办好、整顿好，照顾全体农民，这是为了搞好生产，为了将来合作社的再发展。事实证明，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作出的上述通知以及邓子恢在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发表的意见，是符合实际的，也是很正确的。但是，毛泽东却持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上述的做法和思想是很不正确的，是落在群众后面的右倾保守思想，应当纠正和受到批评。

1955年5月17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指示刚刚下去，毛泽东召集了15个省、市书记会议。在会上，他发表了讲话。其中一段话是：

> “合作社问题，也是乱子不少，大体是好的，不强调大体好，那就会犯错误。在合作化问题上，有种消极情绪，我看必须改变。再不改变，就会犯大错误。对于合作化，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根据情况，该停者停，该缩者缩，该发者发。”

在这段话中，毛泽东已开始批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和邓子恢了。当然，他提得很轻，只说“有种消极情绪”，要改变，如坚持不改，会犯大错误。这话是劝告性的。但是，过了几个月，到1955年7月31日，情况变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在这报告中，毛泽东一方面详尽地阐明了农业合作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重申了自愿互利的办社原则，提出了加强领导、全面规划的指导方针，主张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以解决农业生产的发展问题。所以这个报告是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一个总结，是毛泽东关于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一个代表作，也是全党进一步领导和组织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一个纲领性的文件。而另一方面，毛泽东对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形势作了新的估计，认为一个全国规模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即将到来，因此，对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及邓子恢作了尖锐的批评。他在报告的一开头说：

"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

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

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主义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这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我们应当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而不是用各种办法去拉它向后退。"①

由此可见，毛泽东在报告中批评邓子恢了，并比作小脚女人，摇摇摆摆地走路。所以这样，主要在于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形势和力量的估计上，确实存在着分歧。毛泽东认为，现在，全国的合作化运动已经在大规模地进行中，其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因此，要大胆地指导运动，不要前怕狼、后怕虎。领导不应当落在群众运动的后头。而现在的情况，正是群众运动走在领导的前头，领导赶不上运动。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在农业合作社的发展问题上，毛泽东又认为，目前不是批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334页，1991年2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评冒进的问题，而是应当批评右倾保守的问题。“这里看来只有一字之差，一个要下马，一个要上马，却是表现了两条路线的分歧”。毛泽东还指出：“必须现在就要看到，农村中不久就将出现一个全国性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这是不可避免的。”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公开发表后，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普遍地检查了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存在的所谓右倾保守思想，重新制定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的计划。在1955年8月辽宁省委传达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写了一段十分生动的情况，可谓代表当时各省、市、自治区的情况。8月8日，辽宁省委召开扩大会议，一致认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涨形势，即毛泽东所指出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大风暴，在我省去年即已开始出现了。省委坚决地执行了适应高涨形势的措施，经过去年秋收前后的大规模的建社，使农业生产合作社由原来的近5000个发展到3万个，但在今年1月以后，局部地区发生了紧张情况，我们一时对全面情况了解掌握不够，同时又把紧张的原因过多地归咎于合作化运动的过粗过快的发展，所以在今年三四月间一度作出了“停止发展，全力巩固”的决定，未能很好地通过巩固工作，把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引向前进。这是违背运动发展规律和农民群众的要求的。但所幸的是“停止发展”的精神尚未传达下去，5月20日，林枫来沈阳传达毛主席指示，才使我们的错误认识开始扭转。但在6月间讨论发展合作社问题时，仍表现了小手小脚，不够大胆，缺乏应有的积极精神，以致使许多农村干部在数月来对发展合作化的热情和积极性受到了一些挫折和压抑。可见，

辽宁省委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态度是根据上级指示转的，而不是根据本省实际出发的。这在当时，像辽宁省委这样态度的在各省中是很普遍的。当毛泽东关于合作化问题的指示下达后，有些省委书记作了自我批评，同时也都调整了农业合作化发展的计划。

1955年9月，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农业合作化必须依靠党团员和贫下中农的指示。他认为，依靠贫农、巩固地团结中农的口号，在目前基本上依然是正确的，但是，新中农中间出现了富裕中农，这些人一般不愿加人合作社。所以，合作社要首先吸收贫农、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和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对于凡在目前不愿入社的富裕中农，即新老中农中间的上中农，则不要勉强拉入。目前许多地方发生强迫富裕中农入社，目的在打他们的耕畜农具的主意，这实际上是侵犯他们的利益，违反巩固地团结中农的原则。毛泽东的上述分析是很正确的。合作化运动的依靠对象是贫农和下中农，一般的中农和上中农是团结争取的对象。只有不侵犯他们的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才有可能自愿入社。要做到这点，只有把合作社办好，增加生产，才能实现。否则，他们是不会参加的。中农对合作化运动的向背，是合作化运动成败的关键。

毛泽东为把农业合作化运动推向高潮，进一步阐明他对农业合作化的思想和政策，于1955年夏在河北省的北戴河休养地开始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编辑工作。这是一部规模巨大的反映农业合作化初期办社经验的专门著作。为编辑这部书，毛泽东花费了极大的精力，目的是想通过具体生动的事实教育广大干部和农民群众，指导合作化运动

的迅速发展。他为该套书写了两篇序言，写了104个按语，详尽地说明了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方向、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论证了党是能够领导广大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他在按语中还阐述了农业合作化与文化革命、经济建设的关系等重大原则问题。他要全国各地送来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报告，从中找出最典型的材料，加工整理，逐篇写上按语。在此期间毛泽东在北戴河住地，关起门，不会客，经常通宵达旦地干。经几个月努力，才完成了全部的编辑工作。

1955年10月4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会议主要讨论即将到来的农业合作化高潮的问题。根据毛泽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讨论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

现在看来，1956年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兴起，是共和国史上一个举世瞩目的大事件。它把几亿农民一下子引上了集体化的道路，使我国农村生产关系发生了又一次深刻的变化。但在合作化运动中错误地批判了中央农村工作部及邓子恢，使农业合作化高潮出现了急躁冒进的倾向。一个伟大的社会革命运动，在推动着历史前进的时候，很难避免犯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农业合作化运动正是像历史上一切革命运动一样，在推动着中国农村发生巨大变化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种缺点。

6.赎买资产阶级

毛泽东在致力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同时，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展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他想通过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促进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以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来实现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基本消灭，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基本建立。

毛泽东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最集中反映在他在1955年11月于杭州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中。这个决议最早是由毛泽东、陈伯达、柯庆施三人讨论，陈伯达执笔写成的。写后由陈伯达带回北京，在1955年11月16日至24日中央政治局召集的有各省委、自治区党委和市委代表参加的会议上进行了讨论，并作为草案通过。在这决议中，充分地表现了毛泽东对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思想。

毛泽东认为，我们现在已有两个联盟：一个是工人阶级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与农民阶级以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结成了巩固的联盟，这是基础；另一个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结成了联盟。所以，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在结成联盟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这是在统一战线建立并巩固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

毛泽东提出，为了结成和继续这个联盟，为了借助国家资本主义达到社会主义的目的，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改造将采取

赎买的政策。他说：

> “我们就需要对资产阶级偿付出一笔很大的物质代价。这就是对于资产阶级私有的生产资料，不是采取没收的政策，而是采取赎买的政策。这是从我们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中产生出来的政策。这种政策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经认为在某种条件下采取赎买政策，是可以允许的，是对于工人阶级有利的。我们的赎买办法，就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起，在大约10年左右的时间内，工人阶级在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和国家的需要而生产的同时，也为资产阶级生产一部分利润。”①

毛泽东决定采用赎买政策，改变民族资产阶级的私有制，以达到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是根据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决定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虽然是一个剥削阶级，但在中国这个特殊的国度里，民族资产阶级可以与共产党结成革命的统一战线。但是，要对民族资产阶级实现赎买，还必须采取一系列政策。这主要是，在企业利润的分配中，资本家所得虽然不到1/4，如果以10年左右的时间计算，这笔利润的数目，就可能达到20亿左右人民币。这对民族资产阶级说，是划得来的，是合算的，并不吃多大的亏；从工人阶级和全国劳动人民说，这是逐步的赎买，不是一下子赎买，也不是由国家另外拿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439～440页，1991年2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出一笔钱来赎买，而是由工人阶级在10年左右的时间内用给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的方法进行赎买，所以，对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也是有利的。

我们对于资产阶级，第一，是用赎买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有偿地而不是无偿地，逐步地而不是突然地改造资产阶级；第二，是在改造他们的同时，给予他们必要的工作安排；第三，是不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并且对于他们中间积极拥护社会主义改造而在这个改造事业中有所贡献的代表人物给予恰当的政治安排。由于这三个条件，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可以接受赎买政策的。

毛泽东又提出，在改造资本主义企业的过程中，必须注意采取教育的方法，组织资本家学习，把企业的改造和对人的改造结合起来。如何改造呢，毛泽东说：

"逐步地改造这些资本家，将他们由剥削者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有两种教育方法。三反五反的群众斗争，是一种教育方法，但是那是一种激烈的，不和资本家协商的方法。当着人民政权和工人阶级因为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而给予他们这样一次重大的从外部强加的但是完全必要的教育之后，资产阶级的进攻和反抗已经基本上被打垮，情况已经发生变化，这就创造了一个使我们有可能采用另一种教育方法的条件，这就是采用讲演，上课，座谈会，学习班，以及在适当的时机引导资本家内部发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等等方法，加强对于资本家的教育，使他们了解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必然的不可抵

抗的历史规律，了解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联系，了解时事和国家的政策，了解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是他们唯一可能的出路。"①

同时，毛泽东也认为，在对资本家进行教育的时候，引导资本家自己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种方法，值得特别注意。这个方法应当有领导地普遍地加以推广。因为：

"根据许多地方已有的经验，由于我们国家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各种因素，再加上我们加强组织资本家本身的学习，就有可能促使资产阶级中间的进步分子的数量逐渐增加，中间分子和落后分子的数量逐步缩小，并且大大减少许多资本家的违法行为。因此，在我国的条件下，不承认资本家这个阶级的绝大多数（90%以上）有用教育方法加以改造的可能，忽视或者否认宣传教育的方法在改造资本家的问题上的重大意义，这就是不承认中国革命的特殊条件，不承认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强大力量，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强大的威信和能力，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和采取国家资本主义作为过渡形式这一根本政策的正确性，这种观点无疑是完全错误的。"②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441页，1991年2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441～442页，1991年2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毛泽东还认为，在三反五反以后，在干部中虽依然还存在着右的偏向，但是，党内在这个问题上明显的右的偏向已经不是一个主要的偏向，被腐蚀的事件是存在的，但不是很多的。在党内发生最多的是一种用“左”的形式出现的偏向。

“三反五反以后，资产阶级已被孤立，心中惶惶无主，想靠拢我们，但是许多同志不了解这种变化。他们被三反五反的斗争吓怕了，因而对于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资产阶级的改造问题存在着悲观主义，怕同资本家接触，有些人对资本家采取若即若离的态度，有些人采取‘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他们对于资产阶级的实际情况不作全面分析，以为如果要说到资产阶级除了消极的一面之外还有积极的一面似乎就要‘伤害马克思主义’，他们也没有主张没收资本主义企业，但是又不相信党、群众和国家的力量可以用和平的方法去改造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资产阶级分子，或者只是企图用‘挤垮’的简单方法去回避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实际任务，因此，放任自流，使自己陷于被动。这种倾向在表面上是‘左’的，在实质上却是右的。我们必须纠正这种错误的消极的偏向。不是放弃对于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领导，而是应该全面规划，加强领导。不是放任自流，若即若离，‘敬鬼神而远之’，而是应该采取主动的积极的认真的态度，提出一整套关于改造私营工商业的宣传教育的办法，使资本主义企业和资

产阶级分子尽可能广大地和尽可能迅速地获得改造。"①

由于毛泽东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一整套的适合中国具体特点的改造方针、政策和方法，在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到来之际，毛泽东又不失时机地因势利导，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推向了高潮。使我国的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三大改造，基本同步进行。

到1956年下半年，基本上完成了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任务。从此，作为剥削阶级的民族资产阶级已基本被消灭，"一个阶级剥削另一个阶级"的现象已基本上消灭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这是在中国城市中发生的一个巨大的社会变革运动。由于三大改造任务的基本完成，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在全国已占主导地位，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

7.不能照抄照搬苏联的模式

经过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以及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实施，毛泽东以他独特的政治敏锐和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总结了这个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革命运动的历史经验，作出了一系列的科学论断，从而使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442～443页，1991年2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阶段。这是毛泽东进入老年时期以后取得的光辉成就。

这次总结形成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思想和战略策略。其代表作有《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这些著作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是闪烁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光辉的代表作。

尤为突出的是《论十大关系》。在这篇讲话中，最有价值的是他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能照抄照搬苏联的模式。要根据中国的实际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特别是不能走苏联国家工业化的道路，不能犯他们犯过的错误。他告诫全党，要重新研究和考虑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要正确处理工农业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要重视农业的思想。重视农业，天下稳定，这是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的一条最基本的经验。

不要照抄照搬苏联的模式，这就开始了：思想方法上反对教条主义，经济建设上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新时期。1956年4月，毛泽东就提出这样的论断来武装全党和全国人民，可以说是充满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和实事求是的革命精神，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为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避免犯东欧国家的错误起了决定性作用。

从1953年起，我国开始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我们既没有经验，也缺少资金和干部。因此，除在外交上强调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外，在经济建设上实行向苏联学习，争取苏联帮助的方针。这在当时来说，是符合实际需要的，是很必要的。苏联的帮助，对中国的经济建设起了重

要的作用。但是，在向苏联学习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把苏联的经验教条化，神圣化，照抄照搬，不敢有半点违背；一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学习苏联的经验，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产生符合中国实际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毛泽东始终是反对教条主义态度，坚持实事求是态度的。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坚持实事求是的结果。如果不摒弃教条主义，中国革命是不可能胜利的。要搞好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其难度比革命更大，更需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

苏联在斯大林领导时期确立的社会主义模式，是一种高度集中统一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占绝对优势的产品经济的模式。他们强调高度的集中统一领导和管理，强调产品的调拨，靠高度的计划，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因此，尽管它在一定历史时期发挥过积极作用，但压抑了地方的积极性，忽视多种经济成份的作用，忽视商品经济的发展，忽视农业的发展。苏联的经济模式，在当时被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模式。历史证明，这种模式严重地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我国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我们还缺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又遭到帝国主义的封锁，所以，当时不能不学习苏联的模式。因而强调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建立和发展，较快地消灭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使公有制经济成为唯一的经济形式；强调全国的集中统一领导和管理，强调高度的计划经济，批判所谓的“地方主义”和“独立王国”，抑制地方的积极性；主张产品调拨，逐步削弱甚至消灭商品经济；片面地强调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作用，忽视农业的基础作用，轻视轻工业的发展；片面地强调和扩大基本建设，忽视经济效益；过分地

强调重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的发展，认为只要有了钢铁，一切都好办了。因此，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也造成了工业发展的速度大大地超过了农业。这种状况，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四年，即 1956 年时已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在中国共产党内，能及早地同时也是十分尖锐和深刻地提出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不能走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所走过的道路，不能照抄照搬苏联的模式，应当寻找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只有毛泽东。

毛泽东提出这个科学命题，对解放中国共产党的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思想起着积极的作用，它标志着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理论和指导方针上的一次巨大转变。

《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之所以具有强大的思想力量和生命力，就在于它正确地总结了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践经验，提出了科学的思想。1956 年初，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听取了中央工业、农业、运输业、财政等 34 个工作部门的工作汇报，详尽地了解了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中的实际情况，从而以大量的事实为依据，形成了干大关系的思想。如果没有这 4 年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的实践，就不可能形成这个思想。同时，这个思想的形成，也与苏联在 1953 年 3 月斯大林逝世以后推行的新的方针政策以及 1956 年 2 月苏共二干大对斯大林错误的揭发批判有密切的联系。毛泽东说：

“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

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①

主要又是在哪些方面吸取教训呢？毛泽东又指出：

"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我们没有犯原则性错误。我们比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作得好些。像苏联的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问题，像一些东欧国家由于轻重工业发展不平衡而产生的严重问题，我们这里是不存在的。他们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②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思想，既是我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总结，又是以苏联的经济教训为借鉴的。主要的精神实质还是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际出发的，从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是存在着各种矛盾的，主要有10个方面，正确地处理这10个方面的矛盾，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就能胜利发展。因此，《论十大关系》的思想，仍是从政治方面加以总结和论述的。属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的只讲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等三个方面的

①②《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67页、第268页，1977年4月人民出版社出版。

矛盾，而七个方面是讲社会主义革命方面的矛盾。同时，讲三个经济方面的矛盾，也是从政治角度出发的。

《论十大关系》是伟大政治家的杰作。在论述十大关系即十大矛盾中，讲得最精辟的是根据我国国情论述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也就是如何正确处理我国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他明确提出了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一定要重视农业的发展。这个思想虽然还没有转入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方针上，但在当时能提出这个思想是很有远见的。到1959年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时，毛泽东把它发展为我国的国民经济必须以农轻重次序安排，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到1962年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时，毛泽东又把它发展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片面地强调重工业、强调钢铁工业的思想，使我国的经济建设逐步走上了正确的发展轨道。这个问题对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的道路，确立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作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在其中提出的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原则更直接地成为党的八大政治路线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思想提出后引起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重视，在党内外展开了学习和讨论。毛泽东在后来也进一步发展了《论十大关系》的思想。1956年8月24日，他同音乐工作者的一次谈话，就是一个例子。他说：

> “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原则，各个国家都是相同的。但是在小的原则和基本原则的表现形式方面是有不

同的。”“我们要熟悉外国的东西，读外国书，但是并不等于中国人要完全照外国办法办事，并不等于中国人写东西像翻译的一样。中国人还是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要反对教条主义。在政治上我们是吃过亏的。什么都学习俄国，当成教条，结果是大失败，把白区搞掉几乎百分之百，根据地和红军搞掉百分之九十，使革命的胜利推迟了好些年。这就是因为不从实际出发，从教条出发的缘故，教条主义者没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他们说中国革命是民主革命，但是又要革一切资产阶级的命。照那样办，就搞错了，那就不是民主革命，而是社会主义革命了。这个道理他们没有搞通。革命办法没有搞对，党内关系没有搞对，使革命遭到了很大的损失。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假使不反，革命就不能胜利。”①

毛泽东在阐述《论十大关系》思想时，他的主要倾向是反对教条主义，即反对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教条主义。这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也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在1956年再一次反对教条主义的错误。

① 《人民日报》1979年9月9日。

8.不能把斯大林贬到地下九千丈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苏联共产党召开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赫鲁晓夫的主张下,他于24日深夜在没有兄弟党代表团参加的情况下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这个报告是在秘密情况下作的,并在报告的结尾中说:"我们必须极其认真地考虑个人崇拜问题,请不要把这个问题泄露到党外,尤其不要泄露给报纸。我们之所以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讨论,其理由正在于此。我们应当知道限度,不要给敌人制造武器,不要把家丑外扬到敌人面前。"所以人们称这个报告为《秘密报告》。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引起中共中央、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和讨论苏共二十大以及《秘密报告》。讨论的结果,责成《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对苏共二十大的评价、对个人迷信、对斯大林的功过、对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都作了极为精辟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论,表明了中共中央的立场和观点。这篇文章于1956年4月5日公开发表后,引起了国内外的强烈反响。文章认为,在列宁逝世之后,作为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斯大林,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保卫了列宁主义的遗产,反对了敌人;维护了列宁的关于苏维埃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路线,使社会主义制

度在苏联取得了胜利；领导苏联人民反对了希特勒的战争，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但是，当斯大林正确地运用列宁主义的路线而在国内外人民中获得很高荣誉的时候，他却错误地把自己的作用夸大到不适当的程度，把个人的权力放在和集体领导相对立的地位，结果使他的行动和他所宣传过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处于对立的地位，使他在一生的后期，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迷信，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造成了他领导工作中的重大错误。如在国内肃反中的扩大化、对法西斯发动战争缺乏必要的警惕、对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的物质福利缺乏应有的注意；又如在国际上作出了不少错误的主张和决定。因而使斯大林在工作中陷入了主观性和片面性，脱离了客观实际情况，脱离了群众，也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但是，斯大林仍然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功劳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对斯大林要采取保护的态度。这就和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态度是完全不相同的。

在国际上掀起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掀起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逆流中，以反潮流的姿态，公开起来保护斯大林，保卫社会主义制度的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把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作了深层次的分析和评论。他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有这样一段：

"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

马克思主义者，按照这个分寸，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一九五〇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①

毛泽东不仅在自己的讲话中，对斯大林作出公正的评价，而且还直接地与苏共领导人谈了自己的观点。1956 年 4 月，毛泽东同米高扬和苏联驻华大使的谈话中指出，斯大林"功大于过"，对斯大林"要具体分析"，"要有全面估价"；1956 年 10 月 23 日，毛泽东又同苏联驻华大使说："斯大林是要批判的，但是，批判的方法，我们有不同意见。还有若干问题，我们是不同意的。"同年 11 月 30 日，毛泽东接见苏联驻华大使时又说，斯大林执政期间的根本方针和路线是正确的；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自己的同志。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个人崇拜方面的错误，既没有和各国共产党代表团磋商，也没有经苏共中央全会讨论。这种做法不仅使各国共产党感到突然，而且也使苏共中央委员缺少思想准备。尤其是反对个人迷信的问题，只是在 1953 年 3 月 14 日马林科夫曾提出要实行集体领导，同年 6

①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286 页，1977 年 4 月人民出版社出版。

月10日苏联《真理报》第一次发表文章，谴责个人迷信。当苏共二十大提出这个问题，必然使各个方面感到突然。再加上在苏共二十大前两个月，即1955年12月为纪念斯大林诞生76周年，曾在《消息报》上刊登了斯大林的大幅照片。就是在苏共二十大的开幕式上，赫鲁晓夫还建议全体代表起立悼念斯大林，在赫鲁晓夫作的政治报告中还称斯大林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旗手，然而没有过几天，又在这个会议上、又是同一个赫鲁晓夫却作起《秘密报告》，一反过去，只讲斯大林的错误，不讲斯大林的功绩，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错误，都归咎于斯大林身上。

历史证明，是否正确地对待斯大林，是关系到是否正确地对待苏共历史和苏共的领导，是关系到是否正确地对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待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也就是说，全盘否定斯大林，必然是全盘否定苏联共产党。

毛泽东为了从根本上批判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错误，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毛泽东说，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第一种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在帝国主义阵营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帝国主义同全世界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之间；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等等)，这是根本的矛盾，它的基础是敌对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矛盾(在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间；共产党内这一部分同志和那一部分同志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共产党和共产党之间；等等)，这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它的发生不是由于阶级利害的根本冲突，而是由于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的矛盾，或者是由于局部性质的利害冲突。人民内部矛盾可

以而且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获得解决，从而在新的条件下达到新的团结。对待斯大林，应该以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来处理，而不应当作为敌我矛盾，更不应当全盘否定，把他一棍子打死。“总之，一个人只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就决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矛盾同敌我之间的矛盾等量齐观，或者互相混淆，更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放在敌我矛盾之上。否认阶级斗争，不分敌我的人，决不是共产主义者，决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①

毛泽东尖锐地指出，与赫鲁晓夫之间在斯大林问题上的分歧，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它关系到是否承认阶级斗争，是否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问题。

斯大林错误之所以发生，在毛泽东看来，当然不是苏联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造成的，而是由于他主观的思想原因。斯大林错误之所以发生，并长期得不到纠正，以致造成了全国性的、长期性的、严重性的错误，是由于他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群众和集体，破坏了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当然其中有复杂的历史环境，但决定的因素是人的思想状况。斯大林在后期被一连串的胜利和歌颂冲昏了头脑。他的思想方法虽部分地但却严重地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而陷入了主观主义。他开始迷信个人的智慧和权威，不肯认真地倾听同志们的意见和群众的呼声，以致使自己所决定的一些政策和措施往往违反客观实际情况。同时，他又往往在一个长时期内固执地要推行这些错误的东西，而不能及时地改正自己的错误。

① 《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9日。

尽管如此，斯大林的一生仍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斯大林在青年时代，为反对沙皇制度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斗争，在参加了苏共中央的领导工作以后，为准备1917年的十月革命而斗争，以后为保卫十月革命的成果又作了英勇的斗争，在列宁逝世以后的近30年中为建设社会主义、保卫社会主义苏联、发展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而斗争。从他的整个一生来说，斯大林始终是站在历史潮流的前面指导斗争的。在斯大林领导时期，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是大大地向前发展了。这不仅说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力量，而且也说明斯大林毕竟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对苏联的发展是有贡献的。因此，在总结斯大林的全部思想和活动的时候，必须看到他的两个方面，即他的功绩和错误的两个方面，还必须看到斯大林的错误同他的功绩相比，功绩是第一位的、主要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次要的。

毛泽东还指出，斯大林的错误是共产主义者在工作中的错误。这是共产主义队伍内部的是非问题，而不是阶级斗争的敌我问题。因此，需要用对待同志的态度而不应该用对待敌人的态度对待他。在批评他错误的同时，要保护他正确的方面，而决不应该否定他的一切。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待斯大林是采取了一分为二的、实事求是的保护态度。历史证明，这种态度是科学的，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保护斯大林，不仅是保护他个人，而是保护苏联共产党，保护社会主义，保护十月革命的成果。因为，斯大林的一生，是与苏联共产党、苏联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和不可分割的。全盘否定斯大林，实际上就是否定苏联共产党、否定社

会主义制度、否定共产主义运动。后果是极其严重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刚一出笼，毛泽东就看到了这个问题的症结所在。历史的发展逐步地证明：毛泽东的判断多么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预见，是何等的正确！

9.“中国绝不能丢掉这两把刀子”

毛泽东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后引起的世界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作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提出了许多著名的论断和思想。这些论断和思想是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

1956年7月14日，毛泽东面对着美国到处打起反共的招牌，掀起一股股反共浪潮的时候，与两位拉丁美洲人士作了谈话，发表了“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论断。他说：

> “美国到处打着反共的招牌，为着达到侵略别人的目的。”
>
> “一切受压迫的民族都要独立。”
>
> “一切会有变化。腐朽的大的力量要让位给新生的小的力量。力量小的要变成大的，因为大多数人要求变。美帝国主义力量大要变小，因为美国人民也不高兴本国的政府。”

"现在美帝国主义很强，不是真的强。它政治上很弱，因为它脱离广大人民，大家都不喜欢它，美国人民也不喜欢它。外表很强，实际上不可怕，纸老虎。外表是个老虎，但是，是纸的，经不起风吹雨打。我看美国就是个纸老虎。

整个历史证明这一点，人类阶级社会的几千年的历史证明这一点：强的要让位给弱的。美洲也是这样。

只有帝国主义被消灭了，才会有太平。总有一天，纸老虎会被消灭的。但是它不会自己消灭掉，需要风吹雨打。

我们说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是从战略上来说的。从整体上来说，要轻视它。从每一局部来说，要重视它。它有爪有牙。要解决它，就要一个一个地来。比如它有十个牙齿，第一次敲掉一个，它还有九个，再敲掉一个，它还有八个。牙齿敲完了，它还有爪子。一步一步地认真做，最后总能成功。

从战略上说，完全轻视它。从战术上说，重视它。跟它作斗争，一仗一仗的，一件一件的，要重视。现在美国强大，但从广大范围、从全体、从长远考虑，它不得人心，它的政策人家不喜欢，它压迫剥削人民。由于这一点，老虎一定要死。因此不可怕，可以轻视它。"①

帝国主义是纸老虎，这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在解放战争时期，当美国支持国民党蒋介石打内战的时候，毛泽东就提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9～292页，1977年4月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这思想，武装全党和全军，结果打败蒋介石，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帝国主义借苏共二十大大反斯大林之机，又掀起了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毛泽东在这历史的关头，提出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的论断，是深谋远虑，长人民志气的。

毛泽东反对帝国主义的战略思想，是立足于自己、立足于本国，把本国的事情搞好，把本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搞好。1956年8月30日，他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又精辟地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战略思想。他要求通过党的八大的召开，使全党更加团结。要团结党内外、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目的是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他认为：我们应该用"伟大的"这几个字：

"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党，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革命是伟大的革命，我们的建设事业是伟大的建设事业。六亿人口的国家，在地球上只有一个，就是我们。过去人家看我们不起是有理由的。因为你没有什么贡献，钢一年只有几十万吨，还拿在日本人手里。国民党蒋介石专政二十二年，一年只搞到几万吨。我们现在也还不多，但是搞起一点来了，今年是四百多万吨，明年突破五百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要超过一千万吨，第三个五年计划就可能超过两千万吨。""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

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①

为了作出更大的成绩，毛泽东在党的八大上要求全党继承党的光荣传统，发扬党的优良作风，要切实地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

在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系统地论述了国内的经济问题、国际形势问题、中苏关系问题、大民主和小民主问题，提出了中国绝不能丢“两把刀子”的论断。他说：

“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欧洲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也批评苏联，这个领袖就是陶里亚蒂。帝国主义也拿这把刀子杀人，杜勒斯就拿起来耍了一顿。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丢出去的。我们中国没有丢。我们第一条是保护斯大林，第二条也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我们不像有些人那样，丑化斯大林，毁灭斯大林，而是按照实际情况办事。

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95－296页，1997年4月人民出版社出版。

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①

丢掉了这两把刀子，那么成了什么呢？毛泽东在修改《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反对修正主义的问题。

他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指出：斯大林错误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导致教条主义的发展。各国共产党的队伍在批判斯大林错误的同时，展开了克服教条主义的斗争。这个斗争是完全必要的。由于对斯大林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并提出了反对"斯大林主义"的错误口号，从而助长了修正主义思潮的发展。这种修正主义思潮，是有利于帝国主义对于共产主义运动的进攻的。帝国主义也正是利用这种思潮向社会主义进攻。我们在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坚决反对修正主义。

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是有共同的基本规律的。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中间，又存在着千差万别的特点。每个民族都经历着阶级斗争，并且最后都将沿着在一些基本点上相同、而在具体形式上各有不同的道路，通向共产主义。对于这个基本规律，有两种人和两种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者，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基本规律；一种是修正主义者，以否定马克思主义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1～322页，1977年4月人民出版社出版。

的基本原理对待马克思主义。

只有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和本民族的特点，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才能获得成功。只有这样做，才能创造出马克思主义新经验，才能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作出贡献。一方面反对教条主义，它不可能对马克思主义作出新贡献。因此，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都必须反对和纠正教条主义。另一方面必须批判修正主义。现在，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有这样的人：他们借口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企图削弱或者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削弱或者否定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集中制，削弱或者否定共产党的领导作用。也有这样的人：他们借口反对教条主义，而实际上是修正马克思主义。他们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之间的界限，否认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界限，在他们看来用不着经过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用不着建立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国家，某些资产阶级国家就可以建立社会主义，它们的国家资本主义就已经是社会主义，甚至说，全人类社会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了。

修正主义思潮是有利于帝国主义的。帝国主义正在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军事、经济、外交、特务和"道义"的力量，向社会主义发动进攻。这个后果恰好证明了修正主义的破产。

总之，经毛泽东再三修改审定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当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必须反对修正主义的战斗任务。几十年后的历史证明，毛泽东的这些判断是伟大的、正确的。这些判断不仅在当时，即使经过了几十年后的今天，也仍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0.要接受斯大林犯个人崇拜错误的历史教训

毛泽东始终认为,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领袖,不可能不犯错误,何况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又处在一个世界急剧变化的时代,经历又那么长久,不发生错误是不可能的。苏联发生的错误,像斯大林的错误,它的性质是什么呢?是部分性质的,也是暂时性质的,虽然有的错误前后已有20年了,但还是部分的、暂时的,也是可以纠正的。苏联在主流方面,主要方面,还是正确的。俄国产生了列宁主义,经过十月革命变成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后来又建设了社会主义,打败了法西斯,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家,这些变化,大部分是在斯大林领导下进行的。斯大林的错误不是他的主流,不是他的主要部分。

中共中央、毛泽东始终坚持了这一观点,并成为世界众所周知的事实。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上,始终把斯大林的像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像并列地挂在一起。当然,也有人提出异议和建议,中共中央也作过研究讨论,还是照例挂着。这说明什么呢?它说明,对斯大林不能采取一棍子打死的办法。

斯大林的主要错误,在于晚年陷入了个人崇拜之中。从而作出了不少错误的分析估计以及决策,造成了工作中的失误。必须对个人崇拜问题作出科学的分析,得出正确的教训;必须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情况,采取必要的政策措施,以防止个人崇拜错误的再次发生,避免斯大林晚年所犯过的错误。

然而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根本没有做到这点。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有这样一段：

> “长期以来，在我们中间培育着对某个人，具体地谈也就是对斯大林的这种迷信。我这个报告的目的并不在于全面地评价斯大林的生涯及其活动，就斯大林的功绩而论，在他活着的时候已经写过无数这方面的书籍、小册子、研究性文件，就斯大林在准备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他在内战时期和我国建设时期所起的作用作了大量的宣传。这是众所周知的。我们现在关心的是一个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对党都是极为重要的问题。即对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到底是怎样慢慢滋长起来的。而这种个人崇拜又怎样在特定的阶段成了给予党的各项原则、党内民主以及革命的法制秩序的极其严重的极其深刻的危害一切事情的根源的？”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并没有对斯大林作出全面的评价，对斯大林晚年的个人崇拜也没有作出正确的分析，而只提出要清算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危害，这就很容易造成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混乱，也很容易被人所利用。

斯大林是全世界都关注的领袖人物，揭露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也必然举世瞩目。它不可能在秘密状态下作为苏共内部的事讲一下就可以解决的。不久，《秘密报告》被公开发表出来了。而且确实引起了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混乱，苏共也遭到了国际反共势力的攻击。苏共中央不得不在1956年6月

30日作出了《苏共中央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把这个问题公之于世。但这个决议，也没有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作出正确分析，只指出：

> "党坚决地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公开批评个人崇拜所产生的错误，这样就再次表明自己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朽原则，忠于人民的利益，关心创造最有利的条件来发展党内民主和苏维埃民主，以利于我国顺利建设共产主义。"

苏共二十大后，苏共中共对于个人迷信问题也没有作出新的分析，因而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从中吸取教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个人崇拜是一种国际的现象。首先，它是历史的产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了打败法西斯，需要有领袖人物的绝对权威，果断地采取对策和行动，以利战胜敌人，拯救人民。当这个历史任务完成后，人民必然给予领袖人物以崇高的荣誉，这就使个人崇拜的产生有了社会基础；其次，也是一定社会制度的产物。在苏联长期实行的是高度集权制，党和国家的主要权力，在制度上赋予了领袖人物以特权，这就很容易造成领袖人物的独断专行，缺乏民主的作风，尤其是干部终身制度，缺少批评与自我批评，缺少一种能制约个人权力膨胀的机制。这就造成了个人崇拜滋长蔓延的根本原因；其三，是个人主义思想的产物。当革命胜利后，个人的骄傲自满、主观主义、脱离人民、脱离党中央的集体领导的现象日益发展，必然出现个人崇拜。这些方面，如果不健全社会

主义的政治体制，不废除领导干部的终身制，不健全民主与法制，不实行严格的党内外监督制度，不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就很难克服个人崇拜现象。正是由于如此，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却又在他执政的11年中，搞起了对自己的个人崇拜。

毛泽东保护斯大林，并不是他不批评斯大林。相反，毛泽东对斯大林的错误批判也是很深刻的。他认为，斯大林在一生的后期，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因而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错误。对此，必须认真对待，从中吸取教训。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吸取了斯大林犯错误的历史教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主要有四项：一、会议期间，不突出领袖，不突出个人，不挂像，不照像，没有领袖接见，不进行歌功颂德；二、公开提出反对个人崇拜，强调党的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强调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三、反对党内的不正之风，决定进行全党的整风运动，克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四、党中央机构上设立中央书记处，设总书记。党的八大反对个人崇拜的气氛是很强烈的。在邓小平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有几段是集中地写反对个人崇拜的，例如：

"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另一个基本问题，是各级党组织中的集体领导问题。列宁主义要求党在一切重大的问题上，由适当的集体而不由个人作出决定。关于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意义，苏联共产党第二

十次代表大会作了有力的阐明，……。很明显，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是同共产主义政党的建党原则相违背的，是必然要犯错误的，只有联系群众的集体领导，才符合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才便于尽量减少犯错误的机会。"①

邓小平在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还论述了领袖的作用和如何防止领袖神化的问题。他说：

"马克思主义在承认历史是人民群众所创造的时候，从来没有否认杰出的个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只是指出，个人的作用归根结底是以一定的社会条件为转移的。同样，马克思主义也从来没有否认领袖人物对于政党的作用。按照列宁的著名的说法，领袖是'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的人们，毫无疑问，他们的这种威信、影响和经验乃是党、阶级和人民的宝贵财富。……。当然这种领袖是在群众斗争中自然而然地产生的，而不能是自封的。同过去剥削阶级的领袖相反，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不是在群众之上，而是在群众之中，不是在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正因为这样，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必须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模范，必须是服从党的组织、遵守党的纪律的模范。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于个人的神化。"

①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29页，1994年10月人民出版社出版。

"我们党从来认为，任何政党和任何个人在自己的活动中，都不会没有缺点和错误，这一点，现在已经写在我们的党章草案的总纲里去了。正因为这样，我们党也反弃对于个人的神化。"

"当然，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地执行。"①

党的八大认真地总结了斯大林犯错误的历史教训，采取了防止个人崇拜发生的有力措施。

毛泽东对斯大林犯个人崇拜的错误，是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的。南斯拉夫卡德尔写的《为争取承认新南斯拉夫和它的独立斗争》一书中，有一段回忆，是写毛泽东率领中共代表团和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莫斯科会议和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活动时与他谈话的情况。书中说，在庆祝活动结束时，克里姆林宫的大厅里举行午宴。毛泽东举杯向各国代表团团长祝酒。当他走到卡德尔面前时说："我们同你们的区别，只是你们有胡子，我们没有胡子。"

这句话，表示了一个意思，中南之间是没有本质不同的。卡德尔也认为，这是毛泽东以某种方式表示中南关系要正常化的愿望 。毛泽东对南斯拉夫的某些观点和做法，同时又表

① 《邓小平文选》第1卷，234～235页，1994年10月人民出版社出版。

示了不同的看法，尤其是对斯大林。毛泽东批评南斯拉夫对斯大林批评有些过分。毛泽东说：

> “你们不断地攻击斯大林，我们就不攻击他。我可以告诉你们，斯大林给我们造成的危害比给你们造成的危害大得多。但今天，他在世界上是说明一点东西的偶像。你们又何必使这样一个偶像同自己作对呢？”

事实确是如此。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犯有一系列的原则错误。只有毛泽东顶住了他的瞎指挥。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就不会很快地在1949年10月取得胜利。当然，这里说的是不听从他的错误的意见，对于他的正确的意见，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还是听从的。毛泽东对斯大林也是十分崇敬的。

毛泽东不同意大反斯大林，是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本利益着眼的。他在1957年1月18日作的《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有一段话正是这个意思：

> “去年这一年，国际上闹了几次大风潮。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大反斯大林，这以后，帝国主义搞了两次反共大风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有两次大的辩论风潮。在这几次风潮中，欧洲美洲有些党受的影响和损失相当大，

东方各国的党受的影响和损失比较小。"①

大反斯大林的后果只能给共产主义运动制造混乱，造成影响和损失。同时，毛泽东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某些人，大反斯大林，缺乏革命道德的现象作了尖锐的批评：

"苏共'二十大'一来，有些从前拥护斯大林非常积极的人，这时候也反得很积极。我看这些人不讲马克思列宁主义，对问题不作分析，也缺乏革命道德。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包括无产阶级的革命道德。你从前那么拥护，现在总要讲一点理由，才能转过这个弯来吧！理由一点不讲，忽然转这么一百八十度，好像老子从来就是不拥护斯大林的，其实从前是很拥护的。斯大林问题牵涉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各国党都牵涉到了。"②

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战略家、思想家，在帝国主义掀起反共浪潮，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掀起修正主义思潮的时候，他为了各国共产党的根本利益，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他的宏大的气魄，对国际形势分析的远见卓识，为各国共产党人所钦佩。他是真正地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上对待斯大林的一位伟人。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33～334页，1977年4月人民出版社出版。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34页，1977年4月人民出版社出版。

11. 台风年年都有

1956年国际上闹了几次大风潮后，毛泽东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台风年年都有，国内国际的思想台风、政治台风也是年年都有。"

苏共二十大后，由于国际上掀起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接着发生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毛泽东逐渐把注意力放在国内，抓政治思想中的问题了。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曾说：

> "对苏共二十大，我们党内绝大多数干部是不满意的，认为整斯大林整得太过了。这是一种正常的情绪，正常的反映。但是，也有少数人起了波动。每逢台风一来，下雨之前，蚂蚁就要出洞，它们'鼻子'很灵，懂得气象学。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他们听了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舒服得很，就摇过去，喊万岁，说赫鲁晓夫一切都对，老子从前就是这个主张。"①

毛泽东是十分重视国内政治情况的。他认为：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34页，1977年4月人民出版社出版。

"台风一刮，动摇分子挡不住，就要摇摆，这是规律。"

这就是说，国际上政治风一刮，国内必然有人呼应。所谓"动摇分子"，是有不同情况的。有的人艰苦奋斗了多少年，有所锻炼，但是，马克思主义学的不多，在思想方面，立场方面，还是跟稻子一样，风一吹就要摇。有些党员，过去各种关都过了，就是社会主义这一关难过。在他们中有的还是党的高级干部，但是动摇的人是少数。

毛泽东还说，由于我们农村政策、城市政策是正确的，所以像匈牙利事件那样的全国性大乱子是闹不起来的。在匈牙利，大民主一来，把党政军都搞垮了。在中国，这是不会发生的。

毛泽东认为：

"去年这一年是多事之秋，国际上是赫鲁晓夫、哥穆尔卡闹风潮的一年，国内是社会主义改造很激烈的一年。现在还是多事之秋，各种思想还要继续暴露出来，希望同志们注意。"①

毛泽东十分重视党内外的思想动向，并要求全党做好思想工作。他从1956年的多事之秋中总结了这样一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39页，1977年4月人民出版社出版。

条经验：

> “工、农、商、学、兵、政、党，都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现在大家搞业务，搞事务，什么经济事务，文教事务，国防事务，党的事务，不搞政治思想工作，那就很危险。”①

为了纠正不重视政治思想工作的现象，毛泽东说，党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亲自出马到清华大学作报告，做政治思想工作。毛泽东也要求各省的党委领导同志都要亲自出马做政治思想工作。毛泽东认为：

>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共产党，东欧一些国家的党，不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党与群众的联系，这些他们都不讲了，空气不浓厚了。结果出了个匈牙利事件。我们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每个省市自治区都要把理论工作搞起来，有计划地培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和评论家。”②

毛泽东向各省市委书记提出了许多具体的要求：要精简机构；要到下面去调查研究；要密切联系群众。他说：脱离群众，官僚主义，势必要挨打。匈牙利的领导人，没有调查研究，

①②《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7页。

不了解群众情况，等到大乱子出来了，还不晓得原因在什么地方。我们一定要引以为戒。中央和各部、各省的负责同志一年总要有一段时间到工厂、合作社、商店、学校等去跑一跑，进行调查研究，做到胸中有数。要依靠工人阶级，依靠贫下中农，依靠先进分子，这样才有可能避免匈牙利事件的发生。

在这里，毛泽东提出的要做好政治思想工作，要培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和评论家，要作调查研究，要联系群众等，是十分必要和正确的。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由于毛泽东对上述工作的高度重视，在中国避免了发生类似匈牙利事件的政治风波，这一切为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12.创立正确处理两类矛盾的新学说

毛泽东面对着1956年的多事之秋，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理论工作，发表了一系列著作，特别是创立了正确处理两类矛盾的新学说，把毛泽东思想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对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与斗争。它既有社会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与斗争，又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与斗争。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也充满着矛盾与斗争。它既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和斗争，又有劳动人民之间、人民同党和政府之间的矛盾与斗争。这些矛盾是些什么性质的矛盾，如何正

确处理这些矛盾，这是正在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无产阶级领袖必须也是亟待回答的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各种路线、方针、政策，就无法制定和贯彻。遇到各种矛盾与斗争，就将束手无策，不知所措。1957年前后，我国正处在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的时期，一切的矛盾与斗争使人们感到新奇，于是，迫切需要在理论上武装全党和全国人民，从而指导新社会的发展。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两类矛盾的新学说，首先是在1956年4月5日由《人民日报》编辑部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写成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提出的。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加了这样两段话：

> “发展着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党的生活，日益和个人崇拜这类精神状态互相矛盾着，互相冲突着。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展开的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正是苏联共产党人和苏联人民在前进道路上扫清思想障碍物的一个伟大的、勇敢的斗争。
>
> 有一些天真烂漫的想法，仿佛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不会再有矛盾存在了。否认矛盾存在，就是否认辩证法。各个社会的矛盾性质不同，解决矛盾的方式也不同，但是社会的发展总是在不断矛盾中进行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也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进行着的。在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中，技术革新和社

会制度革新的现象，都将是必然要继续发生的，否则，社会的发展就将停止下来，社会就不可能再前进了。人类现在还是在青年时代。人类将来要走的路，将比过去走过的路，不知道要长远得多少倍。革新和守旧，先进和落后，积极和消极这类矛盾，都将不断地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和各种不同的情况中出现。一切都还将是这样：一个矛盾将导致另一个矛盾，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产生。"①

毛泽东在这里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正是由于矛盾的存在和斗争，也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没有矛盾是一种天真烂漫的想法，是一种幼稚的想法。而且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也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当然，由于社会性质不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社会内的基本矛盾性质也不同，处理的方式也不同。但是，推动社会发展前进的动力，仍然是社会的基本矛盾与斗争。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与斗争学说的提出，从根本上否定了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存在矛盾与斗争的错误观点，科学地回答了社会主义社会不过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阶段，它依然存在着各种矛盾与斗争，并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和前进。这为中国共产党正确地认识社会主义找到了一把钥匙，使中国共产党人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有一个正确的立场和态度，以处理各种矛盾和斗争。

① 《人民日报》1956年4月5日。

也科学地解释了苏共二十大以后，国际上出现的各种矛盾与斗争。

毛泽东创立一种新的学说，从来不是为理论而理论，而是为了指导实践。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可能有革命的行动。毛泽东在1957年前后，不仅仅在于对社会主义进行科学的理论研究，而且更重要的是为了科学地剖析和解释世界上已经存在的社会主义这个客观实际，使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能正确地认识社会主义，并指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毛泽东在提出上述理论以后，必然对社会主义社会作进一步论述，从而创立一个完整的新学说。

毛泽东在1956年4月5日，几乎与《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发表的同时，又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更深入地论证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的各种矛盾与斗争。十大关系就是十大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充满着这十大矛盾与斗争的。正是由于这十大矛盾与斗争，才推动着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前进。他论述这十大关系的目的，在理论上是要说明社会主义社会也是一个充满着矛盾与斗争的社会，它决不是一个无矛盾的社会，在实践上是要正确地指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各种矛盾的性质又是怎样呢？各种矛盾在社会中的地位又如何呢？各种矛盾又如何处理呢？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毛泽东在1956年12月29日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又增加了这样一段精辟的论述：

“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第一种是敌我

之间的矛盾（在帝国主义阵营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帝国主义同全世界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之间，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等等）。这是根本的矛盾，它的基础是敌对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间，共产党内这一部分同志和那一部分同志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共产党同共产党之间，等等）。这是非根本的矛盾。它的发生不是由于阶级利害的根本冲突，而是由于正确的意见和错误的意见的矛盾，或者由于局部性质的利害矛盾。它的解决首先必须服从于对敌斗争的总的利益。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而且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获得解决，从而在新的条件下达到新的团结。"①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较完整地提出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理论，同时，也指出了由于矛盾性质不同，处理方式也不同。这理论之所以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提出，正是针对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少国家的共产党特别是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出现的不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讲阶级斗争，不讲无产阶级专政，丑化党的领导的情况，从而导致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毛泽东提出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是有着明显的针对性。这理论的提出必然引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强烈反响。

① 《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9日。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内仍然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的提出，解决了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以来几十年中没有解决的问题。但是，这个理论是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提出的，因此不可能作全面的详尽的论述。同时也没有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两类矛盾之间所处地位，没有明确两类矛盾的主次关系，以及发展趋势。在第二年，1957 年 2 月 27 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 11 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长篇报告。这个报告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创立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新学说。

毛泽东提出，在我们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不同的两类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在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

毛泽东提出，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之间的矛盾由于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解决敌我矛盾，用专政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用民主的方法。在人民内部不可由这一部分人民对另一部分人民实行专政。

毛泽东提出，人民内部矛盾不是现在才有的。在不同的各个历史时期是有着不同的内容的。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人民内部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同其他劳动人民间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一般说

来，人民内部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产生的矛盾。

毛泽东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由于社会性质不同，基本矛盾的性质也不同。社会主义社会内的基本矛盾和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性质是根本不同的。在社会主义社会内的基本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而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敌我矛盾。矛盾性质不同，处理方法也不同。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解决，而不能用专政的方法。如在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经济建设、安排人民生活等方面的矛盾时，必须贯彻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在处理文化科学发展方面的矛盾时，必须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处理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关系方面的矛盾时，必须执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是有着完整的科学体系和丰富的内容的。几十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证明，毛泽东的这一学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以阶级斗争的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指导着各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运动，引导着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东欧等一大批人民民主国家，显示了阶级斗争理论的强大战斗力和生命力。但是，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国家建立后，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剥削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先后都消灭了，阶级斗争已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如何解释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各种矛盾、斗争、冲突呢？斯

大林对这个问题作出了错误的回答。他虽然经历了相当长的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而且亲自领导和组织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但是他没有提出一个科学的理论，相反，他错误地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没有矛盾和斗争，只有团结一致。而中国虽然刚刚开始迈入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就提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完整学说。

毛泽东提出这新学说，除根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客观实际外，同时也是他在20年前写的《矛盾论》和《实践论》的继续和发展。在这里引述两段话就可以说明。

其一，在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说：

> "社会上的事情总是对立统一的。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对立统一的，有人民内部的对立统一，有敌我之间的对立统一。在我们的国家里还有少数人闹事，基本原因就在于社会上仍然有各种对立的方面——正面和反面，仍然有对立的阶级，对立的人们，对立的意见。"①

毛泽东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观点。他以这个观点，研究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研究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写出了《矛盾论》、《实践论》等著作。他又根据这个基本规律，研究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革命和建设，研究了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各种矛盾和斗争，并且严格地从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1页，1977年4月人民出版社出版。

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出发，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各种矛盾作了全面分析，最后创立了关于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新学说。

其二，毛泽东在上述讲话中又有一段话是：

> “斯大林在一个长时期里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才吞吞吐吐地谈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说如果政策不对，调节得不好，是要出问题的。但是，他还是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他还是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①

毛泽东在这里是把社会的基本矛盾作为全面性的问题加以提出和研究的。但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性质与资本主义社会不同，因此这一基本矛盾的性质也是不同的，它是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所以，毛泽东是把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全面性的问题，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研究的总题目加以考察和分析的。

毛泽东创立的关于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新学说，经过最近几十年社会主义社会的检验，充分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并日益成为当代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认识社会主义社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6页，1977年4月人民出版社出版。

会的一把总钥匙，它和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一样，代表了一个时代。

13. 1957：整风与反右

中共中央面对国际风云和中国共产党的实际，决定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以克服当时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发扬党的优良的传统和作风。这是防止党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一项重要决策，也是反对修正主义思潮对党的影响的一个重要措施。

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郑重宣布：

> “现在共产党中央作出决定，准备党内在今年开始整风。党外人士可以自由参加，不愿意的就不参加。这一次整风，主要是要批评几种错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一个是主观主义，一个是官僚主义，还有一个是宗派主义。这次整风的方法同抗日时期的整风一样，就是先研究一些文件，每个人在学习文件的基础上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揭发缺点和错误的方面，发扬优点和正确的方面。在整风中间，一方面要严肃认真，对于错误和缺点，一定要进行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且一定要纠正；另一方面又要和风细

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反对采取‘一棍子把人打死’的办法。”①

3月18日，毛泽东在济南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又一次讲到：

“我们党现在准备开展一次整风运动。整风是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党内矛盾的一种方法，也是解决党同人民之间的矛盾的一种方法。这次整风，就是整顿三风，整顿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②

“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拼命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听说去年评级的时候，就有些人闹得不像样子，痛哭流涕……评级评得跟他不对头的时候，就双泪长流。在打蒋介石的时候，抗美援朝的时候，土地改革的时候，镇压反革命的时候，他一滴眼泪也不出，搞社会主义他一滴眼泪也不出，一触动到他个人的利益，就双泪长流。听说还有三天不吃饭的事情。……总而言之，争名誉，争地位，比

①②《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0页、第419页，1977年4月人民出版社出版。

较薪水，比较吃穿，比较享受，这么一种思想出来了。"①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在指示中，对整风的目的、要求、方针、方法都作了详细的阐述和明确的规定。这次整风的目的要求是，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改进党的作风，克服最近几年来党内日益滋长的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更好地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服务。整风的方针，仍然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即采取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这是一个被党的历次整风运动实践所证明的唯一正确的方针，也是解决党内矛盾、人民内部矛盾的唯一正确的方针。这次整风的特点是，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作为主题，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为指导思想，进行开门整风。各级领导机关和干部都要总结和改进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工作，要检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情况；检查对于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和勤俭建国方针的执行情况；检查那些脱离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士兵群众、学生和知识分子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检查那些不从团结愿望出发，不从团结各民族、各党派和广大党外群众出发，不从团结全党出发的宗派主义现象；检查那些不从实际出发的主观主义现象。

1957年的整风是加强执政党建设的一项重要措施。中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9～420页，1977年4月人民出版社出版。

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进行了延安整风运动，做到了全党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和统一，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基础；在解放战争时期，又进行了解放区的基层党组织的整党运动，使整党和土地改革成为支援解放战争的重要环节。新中国成立后，从1950年到1954年又进行了整风整党运动，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经受住了执政的考验。这次整风，必将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作好充分的准备。

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能不能经得起执政的考验，能不能经得起任何非马克主义思想侵蚀的考验，关键在于党的自身建设和自身的力量，关键在于党的各级领导，尤其是党中央的领导。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整风，是为了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击修正主义思潮，反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的一场斗争。

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全文刊载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2日，又发表了《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从5月初起，一个全党的开门整风运动，在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和组织下，热烈地开展起来了。

这次整风，由于毛泽东的号召，也由于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三风”为内容的开门整风运动，极大地激发了各级干部、知识分子以及工农群众的积极性。当时，广大党外人士热情十分高涨，与党员一起踊跃地参加各种座谈会、讨论会、鸣放会，对党的缺点和错误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意见以及积极的建议，使开门整风运动生动活泼地开展起来。到8月，各省、市、县以上的机关、大专院校、新闻出版界、科学技术界、文艺界、卫生界、工商联等，都纷纷召开了整风会议，开展整风，并收到了较好的较果。

这次整风运动一直延续到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才基本结束。但是,这次整风由于极少数的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向社会主义发起进攻,也由于开展了反右派斗争运动和发动"大跃进"运动,因而不仅在内容上有所改变,而且也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和效果。

1957年5月开门整风开始后,在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的影响下,有极少数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借党开门整风的机会,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了攻击,形成了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

所谓国际大气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帝国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进一步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和平演变战略,又称解放政策。这是帝国主义在采用武装干涉、军事进攻社会主义国家遭到失败后,社会主义国家力量日益强大,使用武力不可能实现消灭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下,所采用的一种企图用和平手段,即非战争手段达到它瓦解、消灭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原则。和平演变战略产生、发展,并推上执行的轨道,是帝国主义在20世纪50年代的产物。

第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修正主义思潮。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就是这一股修正主义思潮的表现。

第三,波兰、匈牙利事件的发生,对中国的影响。

波兰、匈牙利事件发生后对中国产生了消极影响,尤其在知识分子中引起了较强的震动。其表现,在1956年内我国的闹事事件不断发生,上万人的罢工、罢课也出现了。这也必然促使资产阶级右派起来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

所谓国内的小气候，也有如下三方面原因：

第一，资产阶级并不甘心于消灭。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任务的基本完成，标志着我国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基本消灭。但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并没有完全结束，他们并没有完全放弃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愿望，一有机会，还会兴风作浪，企图走资本主义道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表明了在我国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并没有结束。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任务的完成，只在经济战线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而在政治战线上、思想战线上的革命并没有完成。资产阶级在这两方面还有一定的力量，还要和无产阶级、共产党进行较量。

第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存在。在500万左右的知识分子中，虽然经过各种政治运动，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在思想上获得了改造，改变了原有的立场，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是，也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动摇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他们在政治台风中，容易倒向资产阶级一边。他们也容易成为帝国主义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依靠力量。在国内一旦有极少数人闹事，他们也会左右呼应，摇旗呐喊。他们在政治界、文化思想界、科学技术界等各界里都有一定的力量和影响，有的甚至是头面人物。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兴风作浪，是有代表性的，有社会基础的。

第三，中共的开门整风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他们可以利用各种机会，合法地非法地发动进攻。斗争的焦点，是国家的政权问题。他们采取一切手段，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夸大党和政府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煽动群众，制造事端，以达到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夺取国家政权

的目的。

1957年右派分子发动进攻并不是偶然的。这场斗争是关系到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问题。在这形势下，毛泽东旗帜鲜明地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反击右派的进攻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但是，在这场斗争中，由于毛泽东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严重的估计，夸大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力量，发动了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派斗争运动，造成了严重的扩大化，把不少党的干部、知识分子打成了资产阶级右派。这是一个值得永远吸取的历史教训。

现在看来，在反右派斗争中，毛泽东还是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思想。其中有：

毛泽东作出了在党内、在理论思想战线上当前最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的判断。他认为，在共产党内有三部分人：第一部分是马克思主义者，占大多数；第二部分是有教条主义错误思想的人，这部分人对党和国家的工作是辛辛苦苦地干的，也是有成绩的，就是他们看问题思想方法不对，有“左”的片面性，但是克服了这种片面性，就大进了一步；第三部分是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人。这些人比较危险。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们向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否定一切。他们与社会上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构成了党内的主要危险。因此，我们必须注意这部分人，坚决地与他们的修正主义思想作斗争。现在看来，毛泽东在50年代中期提出反对修正主义思想的斗争是高瞻远瞩的，看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危险所在。

毛泽东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的思想。1957年5月25日，毛泽东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

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时的讲话中强调：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他要求全国青年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他指出，一切离开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是完全错误的。这是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判断思想、理论以及行动是非的标准。他提出这个标准，目的是为了教导青年永远地相信共产党的领导，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在国际的和国内的各种风浪中不动摇，做一个对社会主义事业有贡献的人。

毛泽东提倡要在我们的国家造成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毛泽东认为，这种政治局面应当是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就是强调民主与集中、纪律与自由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这两方面都应强调，都应有，不能只强调一方面，不是只有纪律，只有集中，把人家的嘴巴都封住，不准人家讲话，应当提倡让人家讲话，以利于形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们的现代化工业和现代化农业，党和国家也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

但是，也毋庸讳言，毛泽东在反右派斗争中，过分地强调阶级斗争。特别是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否定了党的八大作出的国内主要矛盾是搞经济建设的结论，重新提出了国内的社会主要矛盾仍然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这个论断是完全错误的。

第二章

不当画圈圈的傀儡，要作经济建设的统帅

（1957年冬—1960年春）

“马克思主义就是扯皮主义，就是讲矛盾讲斗争的”。“国民党是促退委员会，共产党应是促进委员会”。

“中国人当奴隶惯了，似乎要当下去。中国艺术家画我和斯大林的像，总比斯大林矮些”。关于个人崇拜问题，毛泽东引用了列宁的“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

林彪在庐山会议上大骂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只有毛泽东是大英雄。随后林彪主持军委工作，把现代迷信推向顶峰。

1956年，毛泽东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以后，顺利地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时期。但是，我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时间太短了，我国的社会生产力还没有获得迅速的发展，国家工业化的任务也没有完成，改变贫穷与落后仍然是摆在毛泽东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形势迫切地希望毛泽东率领人民为早日完成这个任务而奋斗。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战略家的毛泽东，一个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蓝图，从1957年起在毛泽东的胸中，逐渐酝酿、形成。然而，他的主观愿望和客观实际，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和冲突。他付出了极大的精力发动的"大跃进"运动，遭到了失败。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任何人都是不能违背的。谁违背了，必然受到惩罚。

在挫折和失败中，毛泽东认真地总结了经验教训，以极大的精力纠正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失误，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重新恢复和发展起来，走上了正确的轨道。

在这段时间内，毛泽东奔波于大江南北，以伟大的气魄指挥着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他主持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作了大量的讲话，发表了大量的著作。这是他进入老年时期以后，形成著作最多的一个阶段。在这些著作中，突出地反映了他的两方面的思想。一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思想。例如，关于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基础的思想；关于以农、轻、重次序安排国民经济的思想；关于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关于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思想；关于重视调查研究的思想；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思想；关于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关于加强党委工作的思想，等等。

这些思想都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着极大的指导意义。二是关于“大跃进”运动中的“左”倾思想。例如，阶级斗争仍然是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经济建设中的超阶段论、把党内不同意见判断为两条路线斗争，等等。因此，一方面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地发展起来，另一方面又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到挫折和失败。

毛泽东毕竟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对于党的和自己的错误，可以说他最早发现，最早起来纠正。当一种社会潮流涌来的时候，他敢于站在历史的最高处，观察着一切，思考着一切。

在这段时间内，他虽然辞去了一些重要职务，如在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不当第二任国家主席了，但是，他还是日理万机。不仅有大量国内、党内的大事要他决策，而且还有许多国际的难题要他解决。这些不是其他人可以代替的。然而，他毕竟是老年时期的毛泽东了。老年人的特征也明显地表现出来。

有人认为，从 1957 年起毛泽东进入晚年时期。其理由是他从 1957 年开始，出现了“左”的错误。这个说法是不科学的，不能以犯不犯错误作为晚年的标志。说他在这个时候，仍然是老年时期，是比较确切的。从他的思想、工作、生活以及身体健康状况说，还是老年时期的特征，而不是晚年时期。

如何正确地评价毛泽东在这个时期内的功过，是一个极为重大的问题。在有的书中，不写功只写过，或者夸大过，企图否定毛泽东、丑化毛泽东，这是十分错误的。对于毛泽东的功过，无论在哪个时期中都必须实事求是地评价。

1.在历史大转变中

1957年前后，毛泽东反复强调，我国现在正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这是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是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在全国确立的时期。对于这种转变，不同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政治代表人物等方面，都有着不同的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热烈地拥护这个社会的大变动。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他们日益富裕起来。但是，这种社会的大变动来得太快、太猛，超过了社会和人们心理上的承受力。全国人民在欢庆三大改造胜利的同时，对社会主义的到来缺少思想准备，社会的物质条件也准备不足。对于这点，毛泽东是估计到了的，也是察觉到了的。为此，他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使社会的各个方面能适应大变动的新形势。

首先，毛泽东确定了把政治工作、思想工作放在党的一切工作的首位的方针。在社会大变动中，做好各阶层人们的思想政治工作，使社会能稳定地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是具有头等作用的，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能起积极作用的。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思想领导，而不是充当一切工作的行政管理者，更不是包办者。只有这样，才能符合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实际情况，才能调动社会各阶层的积极性。

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确立，是社会的、历史的大变革时

期。它对人们的震动是极其强烈的。毛泽东说：

> “中国社会很久以来就处在大变动中间了。抗日战争时期是大变动，解放战争时期也是大变动。但是就性质来说，现在的变动比过去的变动深刻得多。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有几亿人口进入社会主义的改造运动。全国各个阶级的相互关系都在起变化。农业和手工业方面的小资产阶级和工商业资产阶级，都发生了变化。社会经济制度变化了，个体经济变为集体经济，资本主义私有制正在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样的大变动当然要反映到人们的思想上来。存在决定意识。在不同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的人们中间，对于这个社会制度的大变动，有各种不同的反映。”①

私有制变为公有制，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过的伟大变动。正是由于这种变动，使中国的社会制度大大地进步了：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制度的社会主义在中国经过几十年的阵痛之后终于降临了。从此，在中国社会中，主要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人组成了。对于这种新形势，毛泽东尖锐地指出：第一，这样的大变动，必然要反映到人们的思想上来。存在决定意识。在不同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的人们中间，对于这个社会制度的大变动，必然有各种不同的反映；第二，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即建立社会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03页，1977年4月人民出版社出版。

主义制度是一场伟大的斗争，是社会制度以及人们相互关系的大变动。但是，新的社会制度刚刚建立，还需要有一个巩固的时间和过程。不能认为新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就完全巩固了，那是不可能的，需要逐步地巩固，要使它最后巩固起来，必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即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毛泽东指出以上两点，充分说明毛泽东在这个大转变中是十分冷静的、高瞻远瞩的。他要求全党不仅仅只欢呼三大改造的伟大胜利，而且还要看到三大改造胜利后的任务。作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如果只看到前者，只和群众欢呼胜利，而看不到后者，那是十分危险的，会导致全党犯胜利冲昏头脑的错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没有犯骄傲的错误，是与毛泽东的预见以及采取的相应对策是分不开的。

社会主义制度巩固的基础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前提。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但是也不能建立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的。当时中国的社会生产力还是很低的，毛泽东在1957年下半年以后，以极大的精力，抓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上了。

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社会中党和国家的头等任务。毛泽东完全认识到了这点。他决心站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最前头，率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战斗。同时，他又认识到，建立社会主义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必须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发挥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力量，才能迅速地建设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充分发扬民主。没有民主就建设不成社会主义。毛泽东十分明确地指出了这点。他在1957年3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放”的方针，反对“收”的方针。他说：

> “领导我们的国家可以采用两种不同的办法，或者说两种不同的方针，这就是放和收。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收，就是不许人家说不同的意见，不许人家发表错误意见，发表了就‘一棍子打死’。”①

毛泽东强调“放”的方针，实际就是强调民主的方针。这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在放的过程中不可能所有的意见全是正确的，也不可能总是一个调子。对错误的东西，虽要批评，但一定要以理服人，反对一棍子把人打死。不管什么人说了什么话，天总不会塌下来，地球也照样会转着，千万不要大惊小怪，兴师动众地去讨伐。凡是正确的东西，讨伐也没有用，不径而走，力量也大得很。凡是错误的东西，虚假的现象，人们是会认识的，会反对的。

为了便于放，便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毛泽东提出了辨别正确与错误、香花与毒草是非的六条标准。即：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4～415页，1977年4月人民出版社出版。

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是毛泽东为了进一步发扬民主而提出的关于判断人们言论和行动是非的标准，也就是辨别香花和毒草的标准。当然，最重要的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

社会处于大变动中，同时毛泽东的思想也在大变动之中。但是，在他的思想中，除正确的一面外，越来越多地增加了主观主义的成份。他虽然反对那种把苏联的经验教条化的错误，但他把自己的经验教条化、神圣化了。例如，他坚持有阶级斗争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他却还要坚持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观点，那就错了。这些错误的东西，在一定的条件下却被当作“正确”的东西为全党所接受，有时还写入党的决议、指示之中，并指导着工作或运动。由此循环往复，日益严重，使这些错误的东西越来越起作用。

毛泽东在历史的大转变中，一方面站在中国人民的前头，领导和指挥着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但另一方面，他的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也在发展。对于这点，当时在党和人民中，绝大多数是人没有认识和察觉的。他们认为，毛泽东的思想、言行、指示、决策，是百分之百的正确的，我们的任务是坚决地贯彻和执行。当然，也有少数同志看到了毛泽东的一些错误和缺点，并希望这些不要发展下去。但是，历史有时不是按照人们的良好愿望发展的。作为人民的

领袖毛泽东，在各个转变关头，始终都站在潮流的前头，正确地指挥人民前进，不犯错误，这恐怕是难以办到的。毛泽东是中国近代以来站在历史前头指挥人民前进时间最长的人，要求他永远不犯错误，这实在是太难了。尤其是他到了老年时期以后，要求他仍像青年和中年时期那样去了解社会，思索问题，就难以完全做到了。他也和一般的老年人一样，具有老年人的特点和思维方式，很难深入基层，了解人民，洞悉社会。对于这点，毛泽东尽管十分清楚并总是想办法到社会中去，了解党，了解人民，了解社会，以便正确地领导和指挥。但是，这在实际上做不到。

2.在莫斯科会议上

1957年11月2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国政府代表团乘专机到达莫斯科，参加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即莫斯科会议）以及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活动。这是毛泽东一生中第二次出国访苏。

毛泽东第一次出国访苏，是在1949年12月。他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一是为了庆贺斯大林70大寿，二是为了中苏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当时斯大林以最高的礼节欢迎毛泽东的到来。毛泽东乘坐的列车抵达莫斯科的时间为中午12点，这是专门安排的，表示对毛泽东的特殊崇敬。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总理也抵达莫斯科，共同参与两国政府首脑的会议。毛泽东、周恩来等与斯大林进

行了多次会谈，讨论了双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问题，和谈是在和谐与友好、互相谅解的气氛中进行的，最后一致确定了双方愿意多方巩固和发展两国之间的友好与合作关系，确定了两国为和平与安全而合作的基础。2月14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及《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同时声明，在1945年8月14日当时中国政府与苏联缔结之相当的条约和协定，均失去其效力。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当时对保障中苏两国的安全，发展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和国家建设事业，特别是对于中国争取有一个有利于恢复国民经济的国际环境，对于维护远东和亚洲的和平起了积极的作用。该条约于同年4月11日生效，有效期为30年，1980年4月11日期满。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党和国家的权力逐渐地落到了赫鲁晓夫的手中。1956年苏共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又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到1957年11月，毛泽东率领了一个阵容强大的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当时，赫鲁晓夫推行的国内外政策，已明显地表现为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当时，赫鲁晓夫虽然热烈地欢迎毛泽东，但是中苏两党分歧已经开始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召开莫斯科会议是与赫鲁晓夫的这种错误作斗争。

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曾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对中苏关系作了这样的论述：

“我看总是要扯皮的，不要设想共产党之间就没有皮

扯。世界上哪有不扯皮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个扯皮的主义，就是讲矛盾讲斗争的。矛盾是经常有的，有矛盾就有斗争。现在中苏之间就有那么一些矛盾。”“在形势的压迫下，苏联那些顽固分子还要搞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行不通了。我们目前的方针，还是帮助他们，办法就是同他们当面直接讲。这次我们的代表团到苏联去，就给他们捅穿了一些问题。我在电话里跟恩来同志说，这些人利令智昏，对他们的办法，最好是臭骂一顿。”①

到1957年11月，赫鲁晓夫的所作所为离马克思主义越来越远了。当然，作为两国的政治家都是要保持自己的风度的。11月6日，莫斯科举行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当赫鲁晓夫讲完话后，第一个讲话的是毛泽东。他的讲话，不仅在内容上折服听众，博得阵阵掌声，而且他那放眼世界，对社会主义充满必胜信心，以及那领袖的风度和魅力，也赢得了与会者敬仰。毛泽东说：“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曾经是世界上劳动人民和进步人类千百年来的梦想。十月革命破天荒地第一次在世界上五分之一的土地上，把这个梦想变成了现实。”

毛泽东的讲话，高度评价了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同时也强调了社会主义阵营，必须以苏联为首加强团结。对于这点，赫鲁晓夫感到由衷的高兴。当毛泽东讲完话从讲台回到座位的时候，赫鲁晓夫迫不及待地要与毛泽东握手、拥抱，以表示感谢。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44页，1977年4月人民出版社出版。

11月7日，毛泽东参加了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典礼和检阅了群众游行活动。在主席台上，毛泽东站在极为显眼的位置上，左边站的是赫鲁晓夫，右边就是主持阅兵典礼的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中国代表团的宋庆龄、邓小平也在检阅台上。而其他国家的代表团只有团长一人在台上。当时，中苏两国之间的友谊还是十分亲密的。游行队伍到达中国代表团面前时都情不自禁地高呼："苏中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

11月7日晚上，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参加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苏共中央委员会、苏联部长会议联合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招待会。在会上，毛泽东是一位最受大家尊敬的领袖人物，他的言谈举止，使与会者倾倒。

11月8日，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又参加了由苏联各界劳动人民举行的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会上，宋庆龄向大会作了热情洋溢的讲演，博得了阵阵掌声。

11月14日至16日，毛泽东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保加利亚共产党代表团、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团、越南劳动党代表团、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团、朝鲜劳动党代表团、蒙古人民革命党代表团、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团、苏联共产党代表团、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代表团、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等。由于各国共产党的代表大多是党的主席或总书记，这次会议实际上是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的首脑会议，而毛泽东又是这次首脑会议中引人注目的人物。

这次会议主要通过了一个著名的《莫斯科宣言》。在这宣

言中，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提出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共同的斗争任务，肯定了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概括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规定了社会主义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关系的准则，这次会议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还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但是，围绕着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问题，中共代表团与苏共代表团之间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有的问题，经争论，取得了较一致的意见。但也有些问题，虽经争论，最后还是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如关于和平共处与和平过渡的问题。苏共代表团坚持苏共二十大的观点，认为当代国际关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三个根本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体系的和平共处问题、关于现代防止战争的可能性问题、关于不同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问题，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问题，苏共二十大把它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加以肯定，并要求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共同遵守。对于这点，中共代表团是有不同意见和看法的。中共认为，和平过渡是用议会道路代替十月革命的道路，是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基本原理。不同意苏共代表团将这些观点写进莫斯科会议宣言中，并向苏共中央提出了一个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进一步阐述了对于这个问题的立场观点。

中共在《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中提出，对于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问题，应提出和平的、非和平的两种可能性，不要单提一种可能性，这就比较灵活，使我们在理论上政治上处于主动地位。按照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际状况，从策略观点出发，提出和平过渡的愿望是有益的，但

不宜过多地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取得议会的多数，并不等于旧的国家机器被摧毁，新的国家机器就可建立；和平过渡的含义，并不应该只解释为通过议会选举得票的多数，关键是要无产阶级掌握国家的机器；社会党不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这些意见，无疑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所以，经过争辩，在宣言中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表述作了两点修改，即在指出和平过渡可能性的同时，也强调了非和平过渡的道路；在谈到取得议会中的稳定的多数的同时，也强调开展议会外的广泛的群众斗争，摧毁反动势力的反抗，为和平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准备必要的条件。当然，这样的表述也并不完全是中共的本意，所以，毛泽东说，对此我们仍然是不满意的。

在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于1957年11月18日发表了长篇讲话，赢得了与会者的支持与赞同。他在讲话中，论述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团结问题，关于对待犯错误的同志要采取一斗二帮问题、关于当前世界充满矛盾的问题、关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问题、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在主要的工业产品和产量方面赶超英国等问题。他的这些论述是针对着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修正主义思潮而讲的。他认为，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修正主义产生的国际根源。他再一次讲了对帝国主义要在战略上藐视它，在战术上重视它的思想。从战略上看，它是纸老虎，一定会被人民打倒的；但从战术上看，它是真老虎，要成千上万地吃人，必须重视它。如果不是在整体上藐视它，就要犯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如果不是在战术上重视它，就要犯“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赫鲁晓夫在1956年多事之秋中，既犯有冒险主义的错误，又犯有投降主

义的错误。毛泽东的讲话，既总结1956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经验教训，又不点名地批判赫鲁晓夫。

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讲话的前一天，即11月17日，接见了中国在苏联的留学生、实习生，并发表了国家的未来寄希望于青年的著名讲话。他说：

>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我们都老成这个样子了。但各有各的长处。我们老的有经验，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①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后来作了一些修改，就公开发表了。全国青少年读后受到了莫大的鼓舞。毛泽东对青年人寄予希望，代表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共同愿望。事实证明，社会主义事业不是一代人两代人能完成的，而是一项长期的伟大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地长期奋斗下去，才能完成。毛泽东多次讲过，真正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建设，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目前，中国只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经济上还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要使社会主义制度真正地巩固起来，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使中国富裕起来。他说，中国在政治上、人口上是个大国，但在经济上又是一个小国，还比不上比利时。我们的生产力还很低，钢的产量现在只不过有520万吨，所以还是一个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65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小国。但是从发展看，我们是大有前途的。15年后英国钢产量顶多搞到3000万吨，那么，再过三个五年计划，我们钢的产量可以超过英国。要完成这任务，还要15年或者再多一些，这个责任就落在青年们的身上了。

毛泽东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完全承认一个人的自然法则，人总是要老的。他对自己的生老病死等曾说过这样的话：我本人也有个五年计划，再活5年，如果再活15年我就心满意足了，能超额完成当然更好。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是自然辩证法。所以说："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

毛泽东在参加莫斯科会议期间提出了赶超英国的战略。为了实现这战略，后来他发动了"大跃进"运动。现在，有不少人批判"大跃进"运动，同时也批判这赶超战略。历史证明，"大跃进"运动是错误的，而赶超英国的战略思想却是正确的。这是两个问题，不能混为一谈。赶超英国是指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奋斗目标。而"大跃进"运动是实现这目标的具体步骤和方法。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建设上应当赶超资本主义国家，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战胜资本主义。如果在经济建设上永远超不过资本主义，那社会主义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战胜资本主义。毛泽东赶超英国的战略思想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总体设想，是在50年代中后期根据国际形势和国内条件所确定的一个发展战略。

我国针对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完成后，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

盾。为完成这项任务，党必须根据自己的力量制定各个历史阶段的发展战略。在制定发展战略时，必然要受到国际局势发展的影响和制约，当然更多的是受国内形势和条件的影响。毛泽东提出赶超英国的战略，确实是在50年代中后期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以及党对国际形势的判断的结果。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当时苏联提出了赶超美国，而中国提出赶超英国，如果实现了这些目标，那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就大大地增强了。

50年代中后期国际环境的基本特征，仍然是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峙与斗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与斗争，也仍然是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一对主要矛盾。这个局面在长时期内是不可能改变的。社会主义国家要战胜资本主义国家，首先要善于利用这种长期的对峙局面迅速地发展壮大自己。就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来说，也是在这两大阵营对峙与斗争不断进行的情况下实现的。我们在作出经济建设决策和发展战略时，必然要考虑到美国、苏联以及其他主要国家对我国所持的态度和政策。

美国从侵朝战争失败后，对中国推行了所谓战争边缘政策，策划对中国实行经济、军事包围和封锁。美国把中国当作它推行遏制战略的重要环节和主要对手。

中苏关系当时已开始出现裂痕。毛泽东不得不把立足点完全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础上，只有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搞好了，才能对世界历史的发展有所贡献。当时在作出国内建设的决策时，又受到了对国际形势认识的制约。具体地说，在50年代中后期我们面对的究竟是一个战争的环境还是和平的环境呢？作为伟大的军事家的毛泽东，在当时他是不

可能作出超越历史阶段的判断的。在50年代中后期，毛泽东对世界形势的分析，是持高度警惕的，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他一方面认为，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帝国主义的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和平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尤其到了60年代，毛泽东对战争可能性的估计，更持高度的警惕。但另一方面，他也认为，只要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则战争又可能制止，世界局势能够趋于和缓，和平有可能实现。而且，毛泽东对任何问题的考虑，总是从各个方面着想的，尤其是对战争问题。他在1957年11月18日莫斯科会议上的讲话中，有一段话可以说明。他说：

> "世界范围内的谁胜谁负的问题没有解决。还有严重的斗争，还有战争的危险。要防备疯子……现在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就是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他们摔，我们也摔，这就打得一塌糊涂，这就要损失人。问题要放在最坏的基点上来考虑。"①

当然，毛泽东也认为世界形势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这是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力量日益强大，以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革命斗争的兴起，对帝国主义来说也有敢不敢发动战争的问题。所以，毛泽东在1957年12月8日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中又指出：基本的情况是帝国主义不敢打，但是也要估计到有少数疯子闹乱子。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625、63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总之，在50年代、60年代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威胁始终是严重存在的。这种形势，毛泽东是十分清楚的。因此，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只能在这个战争威胁下争取和平建设的时间，这是头等重要的大事。毛泽东说，归根结底是争取15年和平建设的时间。可见，和平建设的时间是有限的、暂时的，战争终究会降临的。这就必然形成这样的一个大思路：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抢时间，争速度，力争在帝国主义发动新的战争之前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重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从而有雄厚的物质力量，以应付可能发生的战争。这就是毛泽东提出赶超英国战略的更深层的原因。

就我国经济实力来说，还远远落在帝国主义国家的后面。1957年我国工业总产值只有704亿元，人均产值为109元。人均国民收入，1957年美国为2331美元，苏联为612美元，法国为1304美元，而中国只有53美元。所以我国在经济上远远不是东风压倒西风的形势。所以毛泽东说：

"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他们想努力，他们非常热心工作，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归根到底，我们应当争取十五年的和平。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无敌于天下了，没有人敢同

我们打了，世界也就可以得到持久和平了。"①

毛泽东提出以15年或稍多一些时间在钢铁和其他工业的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的战略，目的是要争取15年内把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起来，以实现东风压倒帝国主义的西风，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在这里充分地表现了伟大战略家的胸怀和魅力。他敢于向帝国主义迎战，敢于战胜帝国主义。他不怕任何压力，依靠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力量，决心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

3.发动"大跃进"运动

1958年，为了加快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赶超英国，以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运动。但是，却不能如愿，以失败告终，使我国的经济建设遭受严重损失。毛泽东在这严酷的事实面前，不得不承认：这是交了很大一笔学费。

"大跃进"运动的发起，始于1957年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八届三中全会。10月9日，毛泽东有一个讲话。在这个讲话中，有如下几点可以说明毛泽东要大抓经济建设了。

第一，批右倾松劲情绪、右倾保守思想。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63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这样的会,恐怕是有必要一年开一次。因为我们这么一个大国,工作复杂得很。去年这一年没有开,就吃亏,来了一个右倾。前年来了一个高涨,去年就来了一个松劲。"

"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好、省我看没有那个人反对,就是一个多、一个快,人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本来,好、省是限制多、快的。好者,就是质量好;省者,就是少用钱;多者,就是多办事;快者,也是多办事。这个口号本身就限制了它自己,因为有好、省,既要质量好,又要少用钱,那个不切实际的多,不切实际的快,就不可能了。……我们讲的是实事求是的合乎实际的多、快、好、省,不是主观主义的多、快、好、省。我们总是要尽可能争取多一点,争取快一点,只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所谓多、快。去年下半年一股风,把这个口号扫掉了,我还想恢复。有没有可能?请大家研究一下。

还扫掉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个'四十条'去年以来不吃香了,现在又'复辟'了。

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我曾经谈过,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各级党委会,还有国务院,各级人民委员会,总而言之,'会'多得很,其中主要是党委会,它的性质究竟是促进委员会,还是促退委员会?应当是促进委员会。我看国民党是促退委员会,共产党是促进委员会。"①

① 《毛泽东选信集》第5卷,第466-474页,1977年4月人民出版社出版。

以上两段话，是批评党内存在的所谓松劲情绪、右倾思想的。他认为要搞“大跃进”运动，只有纠正了右倾松劲情绪，才有可能。

第二，抓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修改贯彻。

“比如‘四十条’，过几年还要修改。不可能不改。我看大概是三年一小改，五年一大改。有一个规划总比没有好。一共十二年，过去了两年，只有十年了，再不抓紧，‘四十条’中规定的三种地区分别达到亩产粮食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的计划指标，就有落空的危险。抓紧是可能完成的。

我看中国就是靠精耕细作吃饭。将来，中国要变成世界第一个高产的国家。有的县现在已经是亩产千斤了，半个世纪搞到亩产两千斤行不行呀？将来是不是黄河以北亩产八百斤，淮河以北亩产一千斤，淮河以南亩产两千斤？到二十一世纪初达到这个指标，还有几十年，也许不要那么多时间。”①

毛泽东抓紧农业的思想是非常重要和正确的。只有把农业搞好了，中国的经济才能有较快的发展。所以，他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突出地讲了农业的问题。“大跃进”运动从农业开始，是与这个讲话分不开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66～479页，1977年4月人民出版社出版。

第三，抓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问题。

“做事情，至少有两种方法，一种，达到目的比较慢一点，比较差一点；一种，达到目的比较快一点，比较好一点。一个是速度问题，一个是质量问题。不要只考虑一种方法，经常要考虑两种方法。”①

第四，抓培养科技人才。

“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庞大的技术队伍和理论队伍，社会主义是不能建成的。我们要在这十年内（科学规划也是十二年，还有十年），建立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

“应当把工作以外的剩余精力主要放在学习上，养成学习的习惯。学什么东西呢？一个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个是技术科学，一个是自然科学。”②

第五，提出工农业并举的思想。

“讲到农业与工业的关系，当然，以重工业为中心，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条毫无问题，毫不动摇。但是在这个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466～479页，1977年4月人民出版社出版。

条件下，必须实行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逐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和现代化的农业。过去我们经常讲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国，其实也包括了农业的现代化。"①

第六，抓阶级斗争，抓主要矛盾。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去年下半年，阶级斗争有所缓和，那是有意识地要缓和一下。但是你一缓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主、富农以及一部分富裕中农，就向我们进攻，这是今年的事。我们缓和一下，他进攻，那也好，我们取得主动。"

"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我们找到了这个形式，适合现在这个群众斗争的内容，适合现在阶级斗争的内容，适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抓住了这个形式，今后的事情好办得多了。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革命的问题也好，建设的问题也好，都可以用这个鸣放辩论的形式去解决，而且会解决得比较快。"②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66～479页，1977年4月人民出版社出版。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67～475页，1977年4月人民出版社出版。

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后，毛泽东为发动“大跃进”运动，进行了一系列的发动和组织工作。主要有这几件大事，标志着对“大跃进”运动的发动。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根据毛泽东意见特别是根据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讲话精神写成的《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在社论中，批判了所谓右倾保守思想，第一次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社论中指出：“1956年公布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以后，曾经鼓舞起广大农民的生产热情，造成了全国农业生产的高潮。”但是，“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这是符合客观规律的。1956年的成绩充分反映了这种跃进式发展的正确性。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因为不懂得这个道理，不了解合作化以后农民群众的伟大的创造性，所以他们认为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是‘冒进’了。他们把正确的跃进看成了‘冒进’。他们不了解所谓‘冒进’是没有实际条件，因而是没有成功可能的盲目行动。而我们在1956年的跃进却完全不是这样，是有很多可以实现的条件，因而取得了巨大的成绩。”①

这个社论是掀起“大跃进”运动的第一个信号。这个社论充分地估计和肯定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是正确的，但社论中批判的所谓右倾保守是不符合事实的。1957年下半年，由于全党开展了整风运动，党群关系有所改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命令主义也有所克服，所以人民群众政治热情十分高

①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

涨，全国出现了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局面。到1957年底，全国农民群众掀起了大搞农田水利、农田基本建设和积肥运动的高潮。在农业战线上首先开始了“大跃进”。

1957年12月2日至12日，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出席了开幕式。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致词。他说：

> “我国工人阶级和我国人民在今后十年到十五年内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实行工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把我国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
> “在十五年后，苏联的工业在最重要的产品的产量方面可能赶上或超过美国，我们应当争取在同一期间，在钢铁和其它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

刘少奇的致词代表了中共中央，也代表了毛泽东。尤其是根据毛泽东在参加莫斯科会议期间提出在15年左右我国工业的产品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的口号，在全国工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宣布。从此，15年赶超英国的口号响彻大江南北，全国工人阶级热烈地拥护这个口号，表现了高度的政治热情。工业战线上的“大跃进”运动随着工会八大精神的传达贯彻，也逐步地掀起了。

1957年12月9日至24日，中共中央又召开了全国农业工作会议。会议主要任务是贯彻执行《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和党的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会议要求从全国各个省到区、

乡、合作社都要作出贯彻农业纲要四十条的规划，批判了所谓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的一股右倾风，提出了“苦干10年，实现四十条”的口号，要在1958年掀起农业“大跃进”。

1958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社论《乘风破浪》，号召全国人民掀起“大跃进”运动。这篇社论总结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指出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任务，尤其对1958年的任务作了详尽的论述。同时，也批判了右倾保守思想。社论最后说：

> “事在人为。在1957年以前，人们何尝预料到，在世界和中国，会如此迅速地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如果我们善于接受教训，那末，我们首先就必须彻底纠正那种落后于客观实际的思想状态，就必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充分发挥革命的积极性创造性，扫除消极、怀疑、保守的暮气。1955年底1956年初的干劲，曾经造成1956年的我国经济事业中的大跃进。目前，这种干劲又在活跃起来，显出威力来了。”①

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如滔滔江水，奔腾而来，各条战线上都开始动起来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浪潮冲击着神州大地。这既有人民的共同要求，也有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社会主义革命任务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建设已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要求，而加快建设又是共同的心愿。所以，

① 1958年1月1日《人民日报》。

"大跃进"运动的兴起，有符合客观实际、符合人民要求的一面。但是，把"大跃进"运动搞成一个主观主义的、完全人为的群众运动，则必然造成挫折和失败。

1958年1月3日、4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了有中央部分领导人和华东5省1市第一书记参加的讨论中央工作性质的会议。会议讨论反右派斗争以后，从1958年起，在继续完成思想政治革命的同时，应着重进行技术革命和解决党委领导生产建设方法的问题。在这两天会上，毛泽东都作了讲话，先后共提出了17个问题，并发表了意见。这些意见后来成为他写《工作方法六十条》的重要内容。他提出，整风反右斗争以后，一定要把工业、手工业、农业、副业、林业、渔业、牧业、交通运输业、商业、科学、文教、卫生等行业都抓起来，并且还要反对严重的浪费现象。他十分强调要开展技术革命。他说，这是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要革地球的命，现在我们只能革地球表面的命。在整风以后，要准备把注意力逐渐地引到搞技术革命上。

杭州会议后，毛泽东到达广西南宁。1月11日至22日，他在南宁主持召开了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和部分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23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性质的会议。在会上，毛泽东于11日、12日、14日、16日作了长篇讲话，在听取汇报时又作了不少插话，21日又作了总结。会议主要讨论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和预算问题。但是，这次会议有着严重的错误，主要是毛泽东在讲话中错误地批评了1956年经济工作中的反冒进的正确决策，指责1956年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错误，是政治问题。6亿人民一泄了气不得了，这一点被右派抓住了，来了一

个全面反“冒进”。右派一攻，把我们一些同志抛到距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毛泽东还认为1956年的反冒进是矛头对准他的。所以，毛泽东在会上说，1955年12月我写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序言，对全国发生了很大影响，是个人崇拜也好，偶像崇拜也好，不管是什么原因，全国各地报纸，大小刊物都登了，发生了很大影响，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他又一次指责，反冒进扫掉了三个东西，一是多快好省，二是农业四十条纲要，三是促进委员会。这些都是属于政治问题，而不属于业务问题。会议印发了周恩来在1956年11月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报告的记录稿、李先念在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报告的有关反冒进的部分、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等，作为有错误的材料供大家批判。会议还印发了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借以批判反冒进。南宁会议的气氛是极不正常的。毛泽东已比较公开地点名批评主持1956年反冒进的周恩来、陈云、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了。他把1956年反冒进作为右倾批判，必然促使党内“左”倾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南宁会议后，毛泽东主持完成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的起草工作。1月31日，他为这草案的讨论写了一段前言性的话，以说明为什么要起草工作方法问题。他说：

> “党是更加团结了，人民的精神状态是更加奋发了。党群关系大为改善。我们现在看见了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人民群众在生产战线上这样高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全国人民为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内在钢铁及其他主要工业生产品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这个口号所鼓舞。

一个新的生产高潮已经和正在形成。为了适应这种情况，中央和地方党委的工作方法，有作某些改变的需要。这里所说的几十条，并不都是新的。有一些是多年积累下来的，有一些是新提出的。这是中央和地方同志1958年1月先后在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上共同商量的结果。这几十条，大部分是会议上同志们的发言启发了我，由我想了一想写成的；一部分是直接记录同志们的意见；有一个重要的条文(关于规章制度)是由刘少奇同志和地方同志商定而由他起草的；由我直接提出的只占一部分。这里讲的也不完全是工作方法，有一些是工作任务，有一些是理论原则，但是工作方法占了主要地位。我们现在的主要目的，是想在工作方法方面求得一个进步，以适应已经改变了的政治情况的需要。这几十条现在只是建议，还待征求意见。条文或者要减少，或者要增加，都还未定。请同志们加以研究，提出意见，以便修改，然后提交政治局批准，方能成为一个正式的内部文件。"①

《工作方法六十条》是毛泽东在1958年1月完成的一个重要文件。他所以要形成这个文件，认为目前的工作方法不能适应"大跃进"的形势，有不少缺点，不能适应已经改变了的国内政治形势。《工作方法六十条》中的内容有一部分反映了"大跃进"形势的，但也有不少内容是讲如何做好党委工作的。

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详细地列举了关于工业、农业、基本建设等各项工作，规定开展检查评比的方法；强调了各级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第39～40页，1995年1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党委必须树立“不断革命”的思想，要有三本帐的计划，要立足于十年计划决定于头三年，争取三年内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要研究积累和消费的比例问题；要搞试验田，要抓两头带中间，组织参观、学习先进等。在草案中特别强调关于开展技术革命的问题。

“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要鼓一把劲。再过五年，就可以比较主动一些了；十年后将会更加主动一些；十五年后，粮食多了，钢铁多了，我们的主动就更多了。我们的革命和打仗一样，在打了一个胜仗之后，马上就要提出新任务。这样就可以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减少骄傲情绪，想骄傲也没有骄傲的时间。新任务压来了，大家的心思都用在如何完成新任务的问题上面去了。提出技术革命，就是要大家学技术，学科学。”①

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明确地提出了：

“从今年起，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第45页，1995年11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的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这个问题必须引起全党注意。各级党委可以在党内事先酝酿，向干部讲清楚，但是暂时不要在报上宣传，到7月1日以后我们再大讲特讲，因为那时候基层整风已经差不多了，可以把全党的主要注意力移到技术革命上面去了。注意力移到技术方面，又可能忽略政治，因此必须注意把技术和政治结合起来。"①

毛泽东在这里提出的技术革命无疑是正确的，特别是把技术革命作为党的工作重点更为必要。搞技术革命，就是发展生产力，创造新的生产技术，使工农业生产更快地发展起来。这首先要求全国的领导干部学科学、学技术。不然，就无法领导人民群众。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毛泽东曾提出过外行可以领导内行的问题。这是从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上讲的，而不是从具体的科学和技术上讲的。从具体上说，必须懂得科学技术，才能真正地做好领导的工作。所以，毛泽东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学科学技术，不然不能当领导的问题，是十分正确的。

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还讲了政治与业务关系的问题、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和生产力的发展、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等问题。毛泽东提出，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不注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第46页，1995年11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险。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实践证明，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是完全正确的。

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的最后一条中，毛泽东提出了不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问题。他说：

> "今年9月以前，要酝酿一下我不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问题。先在各级干部中间，然后在工厂和合作社中间，组织一次鸣放辩论，征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取得多数人的同意。这是因为去掉共和国主席这个职务，专做党中央主席，可以节省许多时间做一些党所要求我做的事情。这样，对于我的身体状况也较为适宜。如果在辩论中群众发生抵触情绪，不赞成这个建议，可以向他们说明，在将来国家有紧急需要的时候，只要党有决定，我还是可以出任这种国家领导职务的。现在和平时期，以去掉一个主席职务较为有利。关于这个请求，已经得到中央政治局以及中央和地方许多同志的同意，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所有这些，请向干部和群众解释清楚，免除误会。"①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第58页，1995年1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毛泽东不担任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职务，这在全国人民中必然引起极大的震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过程中，毛泽东作出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毛泽东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而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他的威望是最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职务由他担任，是全国人民共同的心愿。但是，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他的名字和智慧虽然是力量和胜利的象征，但也难以摆脱自然规律的支配。他的身体状况同工作有着日益突出的矛盾。他已是一个老年时期的人了，日理万机的工作任务，对他的健康长寿是十分不利的。他不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职务，减少各种国务和外交活动，专做党中央的工作，同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工作方法六十条》是一个草案，无论在内容上和文字的表述上都反映了这个性质，还没有形成一个十分规范的条文。有的列了题目，没有内容。有不少条文是建议性质的，供讨论征求意见用的。从60条的条文说，有的条文的内容应当充实、发展，有的要修改，有的也可以推翻后重写，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正式的文件。毛泽东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问题，没有向全党传达，更没有放到群众中辩论。

2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审定的《反浪费反保守是当前整风运动的中心任务》的社论。这个社论的发表，一方面改变了整风运动的内容，明确地提出了反浪费反保守即双反为整风运动的中心任务；另一方面，社论号召全党全民实现“大跃进”运动。社论说：

"整风运动在全国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里，目前出现了一个新的洪峰。这就是以反浪费反保守为中心，掀起了一个新的鸣放高潮和整改高潮。在反浪费反保守的大鸣大放中，中央各国家机关贴出了25万张大字报；北京市31个企业20天的统计，职工们就贴出了20万张大字报，提出43万条意见。运动声势浩大，锋芒集中在一个方向：贯彻多快好省勤俭建国的方针，促进生产和工作的大跃进。"①

所谓的反浪费反保守，实际上是反对思想上、政治上、生产上的落后保守的现象，形成一个比先进，比贯彻多快好省方针的高潮，冲破束缚群众积极性和生产力发展的陈规。反浪费反保守是一个纲，带动了各方面的工作。社论又说：

"在十五年赶上英国和苦战三年改变面貌的伟大号召的鼓舞下，群众不能不要求生产和工作的大跃进，不能不反浪费反保守。灿烂的思想政治之花，必然结成丰满的经济之果。这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发展。"②

社论还认为，有些单位对形势认识不足，不认真开展群众性的辩论，不彻底转变工作方法和领导作风，这样他们也就不能从根本上杜绝浪费现象，克服保守主义，引导生产的大跃进。因此，目前这一场斗争，既是经济斗争，又是政治斗争，既

①② 《人民日报》1958年2月18日。

要算经济帐，又要算政治帐和思想帐。通过斗争，不仅反掉浪费和保守，还要反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彻底改进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打破妨碍生产力发展的陈规，精简机构，改善生产管理和劳动组织，改进生产技术，降低生产费用，以贯彻多快好省的方针，促进生产的大跃进。

这篇社论号召全党全民实现"大跃进"。这篇社论是在毛泽东主持下起草发表的。它充分地体现了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和思想。就起草这篇社论来说，其速度之快也是少见的。文中不少提法党中央还没有经过讨论，就急急地发表了。半个月以后，中共中央在3月3日才作出了《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其实，在这个时候，"双反"运动已广泛地开展起来了。在指示的一开头就说："现在反浪费、反保守的群众运动，已经在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商业、文教卫生、政法等部门、国家机关，党群机关和军队等方面开展起来。这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生产大跃进和文化大跃进的运动，是在全民整风运动中改进整个国家工作和促进全民大干劲的一个带有决定性的运动。"但是，中央又指出：这个运动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有很多地方、很多单位已经形成了很大规模的群众运动高潮，然而另有很多单位还没有开始发动或者还没有充分把群众发动起来。大量事实证明，只要我们抓紧反浪费、反保守运动这个纲，领导得好，安排得好，群众发动得好，完全可以把现阶段的整风运动和生产等工作统一地抓起来，而且，只要发动起群众性的反浪费、反保守运动，就可以有力地揭露出一些干部思想作风上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危害性，就可以迅速地打掉官气、暮气、阔气、骄气和娇气，就可以进一步密切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提高群众的觉悟和积极性，使干部和群众

真正打成一片，就可以用同样的人数和同样的财力、物力，办出比原定计划多百分之几十以至数以倍计的事业。

中共中央决定以两个月到三个月的时间，在全国进一步普遍地开展反浪费、反保守、比先进、比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运动。

对于这个群众运动，中央提出了一系列的原则加以指导。其中有：领导上要心中有数，放手发动群众揭露缺点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要防止"见物不见人"的偏向，只看到物质条件，而看不到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在运动中会不断地出现惊人的奇迹，出现各种平日难以达到先进的速度和先进的指标，树立起各种先进的典型的旗帜，原来一些不利于生产的规章制度，会在运动中不断地为群众的创举所打破。

毛泽东领导发动"大跃进"运动，迅即在全国开展起来，人民群众决心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为早日改变我国贫穷落后面貌，投入这个运动。他们相信，通过"大跃进"是能够改变一切的。毛泽东也相信，只要把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动起来，团结起来，是能够迅速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是能够赶上或超过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能办到的，社会主义也能办到，资本主义办不到的，社会主义也要办到。对于这点，毛泽东是确信无疑的。

4.召开成都会议

如何把"大跃进"运动推上党和国家的工作轨道，使之成

为现实，这是毛泽东日夜所思的问题。1958年3月8日至26日召开的成都会议，对于把“大跃进”运动推上轨道作了重要部署。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大部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书记处的个别书记，大部分省、市、自治区的第一书记，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共39人。这次会议从性质上说，仍属中央工作会议，但规模更大了，参加的人中由于中央政治局常委大多数到会，决策作用也更大了。毛泽东不仅主持了会议，而且在3月9日、10日、20日、22日、25日、26日的会议上都作了讲话，提出了25个问题，让大家讨论。在会上，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都作了发言。会议主要讨论：1958年经济发展计划、发展地方工业、实现农业发展纲要等问题。会议讨论制定了37个文件，准备提交给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主要有《关于1958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帐的意见》、《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等。

毛泽东在会上作的6次讲话，以及在别人发言时又作了多次插话，系统地阐述了他在当时的思想和对工作的意见，其中有不少论点对后来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3月9日，毛泽东在讲话中共提出了25个问题，对会议要讨论的内容作了全面的介绍。这25个问题，可以说从政治到经济，从理论原则到工作方法，都谈到了。但他讲的重点，放在对1956年反冒进的批判上，这就使会议一开始就比较紧张，不少人在发言中作了自我批评，承认了错误，也有人大讲如何进行“大跃进”。因此，这次会议被称为整风会议，解决党内一部分高级干部中的所谓右倾保守、精神不振的问题，主张

冲破党内沉闷气氛，振作精神，搞出一种新气氛。这样的会对“大跃进”运动的全面兴起，对党的方针政策的转变起着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说，现在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在南宁会议上批判了反冒进的错误。究竟采用哪一种？我看应采取“冒进”，也就是采用1958年的“大跃进”方法好。执行计划，一种方法是十年计划二十年搞完，一种方法是十年计划两三年搞完，哪种方法好？是1956年的“马克思主义”好，还是1958年的“冒进”好？毛泽东的这个说法，就把1956年的反冒进和1958年的“大跃进”，区别为一个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他讲的虽然说是两种方法，实际上把它说成是两条不同的路线。这样的批判，不仅不符合实际情况，而且使“左”的错误更迅速更严重地滋长。有的人大讲所谓的“大跃进”，实际上是空喊，毛泽东对此早有察觉。他在成都会议前，已发现有空喊跃进、虚报指标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又发现了这个情况。但他认为，这不是主要问题，没有作严厉的批评。他说，要跃进，但不要空喊，指标很高，实现不了，通县原来亩产150斤，1956年提出要在一年内跃为800斤，没有实现，是主观主义，这也无大害处，屁股不要打那样重。现在跃进，有无虚报，不切实际的毛病？现在不要去泼冷水，而是要提倡实报、喊实，要有具体措施，保证口号的实现。可见，毛泽东对“大跃进”发动后的情况，还是比较清楚的。但是，他有倾向性，对空喊跃进这种现象批评不严，而对1956年的“反冒进”的批评则很严，调子也很高。

3月10日，毛泽东在讲话中着重讲了坚持原则和独创精

神问题、个人崇拜问题。毛泽东认为，要实现“大跃进”，必须发挥独创精神，没有独创精神，也就没有什么“大跃进”了。他在讲话中列举了许多例子，说明上述观点。其中说到，学习苏联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模仿，一种是独创。学习应和独创相结合。在党的历史上，犯过教条主义错误，解放后，即1950年到1957年，在经济工作和文教工作中又产生了教条主义。军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条，基本原则坚持了，还不能说是教条主义。经济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主要表现在发展重工业和计划工作上。这些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到1958年时也得到了彻底的纠正。但是，他当时讲这个问题的目的，是为了发动“大跃进”运动。而“大跃进”运动在思想方法上，是又一种主观主义，即批判了教条主义，又出现了主观主义。

关于个人崇拜问题。毛泽东讲了一段令人深思的话，他说：

1956年斯大林受批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揭掉盖子，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菩萨比人大好几倍，是为了吓人，戏台上的英雄豪杰出来，与众不同，斯大林就是那样的人。中国人当奴隶当惯了，似乎还要当下去，中国艺术家画我和斯大林的像，总比斯大林矮一些，盲目地屈服于苏联的精神压力，马列主义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应该平等待人。但是赫鲁晓夫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我们不赞成，他们不挂像，我们挂像。批判斯大林后，使那些迷信的人清醒了一些。要使我们的同志认识到，老祖宗也有缺点。要加以分析，不要那样

迷信。对苏联的经验，一切好的应接受，不好的应拒绝。现在我们已学会了一些本领，对苏联有了些了解，对自己也了解了。要打倒个人崇拜。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是很感兴趣的。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成。我们党在历史上就是强调个人作用和集体领导相结合的。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有人反对列宁，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

对毛泽东的这段话，经过几十年后如何评述呢？可能有两种看法：或者说它是对的，或者说它是错的。说它是对的，主要认为在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一个党、一个军队中，如果没有一定的权威，如果对真理不服从，那必然造成各种混乱和错误。说它是错的，主要认为这是毛泽东欣赏个人崇拜的起点，从此，毛泽东陷入了日益严重的个人崇拜之中。个人崇拜是一个历史范畴，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逐渐地产生和形成的一种国际现象。它不仅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流行，而且也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盛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主要的是崇

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以及毛泽东本人。主要是崇拜他们的思想、理论、学说，以及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的精神，当然也崇拜他们的品格、作风等。这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必然现象。但如果把这种个人崇拜变成对偶像的崇拜，对神的崇拜，对主观想像和依托的崇拜，那就过分了，走向个人迷信了。毛泽东在讲话中，并不是一般地反对个人崇拜的。相反，强调了对真理的崇拜，对权威的崇拜。而他反对的，是打着打倒个人崇拜的旗号，建立自己个人崇拜的人。这种人确实是存在的。赫鲁晓夫打倒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建立了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赫鲁晓夫在执政的11年中，一直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然而他以自己的言行筑起了对他个人崇拜的偶像。事实上，赫鲁晓夫无法与斯大林相比。他在苏共历史上并不是一个举足轻重、功勋卓著的领袖人物，因此，他的个人崇拜就没有稳固的基础。他提倡党内用完全民主不要集中的办法选举党的领导人，选不上的下来。他的诺言被自己的结局兑现了。1964年10月苏共中央用民主的方法把他赶下台了。他的个人崇拜没有起多大作用。他也很快地结束了担任苏共领导人的政治生涯。死后，没有人为他树立起一个什么丰碑，只不过给他刻了一个像，而像的一半是白色的，一半是黑色的，可以说对他的个人崇拜和政治生涯作了一个黑白分明的总结。在1958年前后，毛泽东就揭露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野心和目的，是为了建立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是十分有远见的。赫鲁晓夫确实是这样的一个人。凡是搞阴谋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在中国共产党内，也有这样的人，那就是林彪。林彪的手法和赫鲁晓夫不同，而目的相同。林彪大肆宣扬个人崇拜，搞起造神运动，目的要树立他

的个人崇拜。结果,他被历史打得粉碎。

3月20日,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作了全面的论述。他认为,只要路线正确,贯彻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就一定能把事情办好。建设速度是客观的,凡是能办到的要争取,办不到的不要勉强,要波浪式地前进,急与缓是对立的统一。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基本点已经有了,但还在创造中,尚待完备,尚待证实,不可以说已经最后完成。这个讲话为中共中央制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打下了基础。

3月20日,毛泽东在讲话中又着重批评了1956年的所谓一股风——吹掉三个东西,即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促进委员会、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同时他鼓励大家要有创造精神,去掉各种怕的现象,要办刊物,要敢于到中央来工作,要不怕教授。自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的人,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我们的错误是有的,主观主义也是有的,但是有人说我们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这说法是不正确的。

3月25日,毛泽东在讲话中从方法问题谈起,再一次批判了1956年的反冒进。他说,主持反冒进的同志是把个别的、特殊的东西,误认为一般的、全面的东西。只听少数人的意见,而不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把特殊当作一般来反冒进。同时也是未抓住主流和本质,把次要的矛盾当作主要的矛盾解决,把支流当主流,没有抓到本质问题。国务院、中央政治局开会时对个别问题解决得多,没有抓住本质问题。这次会议把过去许多问题提出商量解决了。也就是说,这次会议抓住了本质和主流,克服了国务院、中央政治局工作中的缺

点。

3月26日，毛泽东在讲话中专门讲了阶级分析问题。他提出了目前在国内还存在着两个劳动阶级和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两个剥削阶级是：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右派；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这个判断是不符合当时我国实际的，也是违背党的八大一次会议作出的结论的。党的八大一次会议的结论是：

“除台湾还被美国侵略者侵占以外，近百年来骑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外国帝国主义势力已经被赶走了。中国已经成为伟大的独立自主的国家。

外国帝国主义的工具——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已经在中国大陆上消灭了。

封建地主阶级除个别地区以外，也已经消灭了。富农阶级也正在消灭中。原来剥削农民的地主和富农，正在被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

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正处在由剥削者变为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

广大的农民和其他个体劳动者，已经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劳动者。

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他的队伍扩大了，他的觉悟程度和文化技术水平大大提高了。

知识界已经改变了原来的面貌，组成了一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队伍。

国内各民族已经组成为一个团结友好的民族大家庭。

以共产党为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更加扩大和巩固了。"①

党的八大一次会议对我国阶级状况的分析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也是非常正确的。但是，毛泽东关于两个劳动阶级和两个剥削阶级的论断是不符合实际的。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在建国初已基本消灭了；民族资产阶级随着三大改造的胜利也已基本消灭了；我国的知识分子已属于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不是剥削阶级的一部分。在1958年时还强调有两个剥削阶级的观点，必然出现夸大估计剥削阶级的力量和状况，以此指导阶级斗争必然造成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

在半个多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作了6次讲话和许多插话，可以说把各方面的问题都讲到了。他所讲的思想、意见，大多反映到了起草的37个文件之中。他对成都会议是十分满意的，他的总结是，统一了思想，解决了不少问题，起草了大量的文件，为召开政治局会议作了充分的准备。从实际情况看，成都会议是发动"大跃进"运动的一次重要会议。但在这个时候，还不能说"左"的错误已占主要地位了，从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的目的，还是想探索一条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加快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道路。他把社会主义建设比作打仗一样，企图通过组织几个战役，就拿下来。因此，他主张大搞群众运动，把全国人民都组织动员起来，齐心协力，举国上下，苦

①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202～203页，1985年1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

战3年，改变面貌。可见他的主观愿望是十分美好的。

毛泽东在会议上提出了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问题。这对全党和全国都有深刻的影响。他认为，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会长期地处在竞争的状态。在竞争中，中国应当作出巨大的贡献。这主要是夺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和胜利。中国也应当赶上苏联，他们在几十年中办到的，我们可以用较短的时间去办到。他以伟大战略家的气魄，在中国大地上组织一场空前规模的向自然界开战的大战役。他认为，中国目前仍然很穷，可谓"一穷二白"，但他又认为，这也有好处，在一张白纸上可画最新最美的画图；穷则思变，人民要求革命，最好组织，民主革命是如此，社会主义革命也是如此。他凭藉丰富的实践经验，充满信心，把工作日程排得满满的。他忘却了自己是老年人了，还像当年指挥革命战争那样，日以继夜，夜以继日地干。他挥笔疾书，一个又一个的批示，一篇又一篇的讲话，一个又一个的电话，传出了一道又一道的命令，他指挥着全国大事，关心着国内外的一切。他是党和国家的首脑、中心。他联系着全国各个方面，影响着海外。

5.制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把自己的决心变为全党的行动，这是毛泽东的领导艺术，也是他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现在，他要把"大跃进"运动变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行动。1958年5月5日至23日，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八

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为“大跃进”运动打下了基础。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虽然带有明显的“大跃进”痕迹，但是它的基本点是正确的。即：“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①这条总路线的基本要求是调动人民群众的力量，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因而采取了一系列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这是符合中国实际的。

但是，这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判断，通过决议正式改变了党的八大一次会议作出的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结论。认为：

> “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经验再一次表明，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在某些范

国内表现为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② ①

从此，我国开始了长期的、全面的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把社会主义建设纳入到以阶级斗争为主的轨道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放在次要的地位上。会议根据毛泽东的观点，正式提出了我国目前还存在着两个劳动阶级和两个剥削阶级的论断，这就夸大了剥削阶级的力量，把已经消灭的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以及正在转变为劳动者的民族资产阶级仍然看作为剥削阶级存在，把知识分子作为资产阶级一部分看待，则必然造成对剥削阶级状况的严重估计，为阶级斗争扩大化提供理论根据。

会议重申了毛泽东提出的在十五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内，在钢铁和主要的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从而在全党和全国范围内开始了赶超英国的战略，并在全党中树立了这样的思想：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出发点和最终的结果，都要从赶超英美出发。认为：从社会制度上说，我们已经是社会主义了，比英美先进和优越，但从经济发展上说，我们落后于英美，如果在经济上也超过了英美，那中国就无敌于天下，即所谓把英美帝国主义远远地抛在后面了。

这些充分说明了毛泽东自1957年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以后所提出的一系列观点，已被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所接受，并写入了决议，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贯彻执行的纲领。这是毛泽东经过一年时间的努力所形成的结果。

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在5月8日、17日、20

①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第303～304、288页、1995年1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日、23日的大会上作了4次讲话，在5月18日代表团团长会议上又作了一次讲话。在这些讲话中，十分清楚地反映了毛泽东的注意力和思想。在第一次讲话中，主要讲解放思想，破除迷信问题；第二次讲话中，主要讲国内外形势和当前的任务问题；第三次讲话中，主要讲如何领导"大跃进"的方法问题；第四次讲话中，主要讲全党必须坚定地贯彻八大二次会议的路线和精神的问题。

为什么要讲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呢？毛泽东认为，我们现在正在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创造出比前人更伟大的成绩，后来者居上，后一代人比前一代人强，就必须冲破各种束缚，只有思想解放了，无论遇到国际问题或国内问题、政治问题或经济问题，都会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有了这种态度，才能克服自卑感，解放思想，才能敢想敢干，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在他的讲话中，列举了很多事实，反复地论证这个道理。其目的，显然是要为"大跃进"运动大喊大叫，作思想舆论准备。

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是毛泽东在发动"大跃进"运动中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这思想在成都会议上讲过。开完成都会议后毛泽东于1958年4月1日至6日在汉口主持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也讲过。汉口中央工作会议后毛泽东到了广州，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作为《红旗》创刊号上的重头文章)中也讲过。到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时已多次地讲过了。

毛泽东在汉口中央工作会议上听取河南省关于一年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规划汇报，以及安徽省大搞水利突击的情况汇报。毛泽东从他们的汇报中已看出了不切实际的做法和浮夸现象。所以他提出：生产要务实，不要搞得不实在；报纸宣传应实际、深入、细致、踏实，不要光宣传指标；华而不

实不好，整风挂帅，生产是当前的中心工作，以此带动其他工作；对科学家要破除迷信。他号召各省搞民歌，大中小学的学生要写，军队也要写。总之，他认为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群众，搞群众运动。人间的奇迹是群众创造出来的。尤其是他在4月15日于广州写的《介绍一个合作社》中更有了充分的表述：

"《一个苦战二年改变了面貌的合作社》，这篇文章值得一读。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群众中的落后阶层奋发起来努力赶上先进阶层，这个事实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生产关系方面尚未完成改造的部分）、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正在向前奋进。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过去的剥削阶级完全陷落在劳动群众的汪洋大海中，他们不想变也得变。……除了别的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我现在向全国七十几万个合作社的同志们，以及城市里的同志们推荐一个合作社。这个合作社位于河南省封丘县，叫做应举社，很有些发人深省的东西。中国劳动人民

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①

毛泽东反复地号召人们敢想敢干，去掉奴隶相，成为主人。在他看来要"大跃进"，要创造出人间奇迹，必须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才能前进，否则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要讲国际和国内形势呢？一个国家总是世界的一部分，一个国家的发展，也总是受到世界形势的影响。尤其是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处在对立的状态下，世界形势对各国的发展都有重大的影响。主要反映在各国党和政府对世界形势的分析估计上，以及作出相应的决策上。毛泽东在会上说，国际上乱子很多，帝国主义内部吵架，世界不太平，似乎形势不好，天上有乌云，但我们要有远见，不要被暂时的黑暗所迷惑。中国是国际形势的重要部分。中国形势好，是一片光明，过去思想不统一，现在统一了，过去对多快好省没有信心，现在转变了。只有把中国的形势搞好了，国际形势才会好。但是，也要准备有最大的灾难。赤地千里，大旱大涝，还要准备打大仗，帝国主义的存在，就有战争的可能性，当然现在和平的可能性大于战争。但要准备，要打就打，把帝国主义扫光，然后再来建设，从此就不会有世界大战了。作了准备，打起来也就不会大惊小怪，打仗无非是死人，这我们见过，人口消灭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对于战争与和平的态度问题，毛泽东的上述论断影响是很深远的。毛泽东始终认为，帝国主

① 《红旗》1958年第1期。

义的存在,就有战争的可能性。但同时又认为,只要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就可以制止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虽然新的世界大战没有爆发,但局部性的战争,或卷人较多国家参加的局部战争还是发生了多次。新的世界大战所以没有爆发,是由各方面因素决定的。其中全世界人民爱好和平、反对战争力量的增长,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日益强大,使帝国主义者不敢贸然采取战争决策。

毛泽东在大会上的第三次讲话中专门论述了领导者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的问题、外行领导内行问题、插红旗问题。他认为,现在党内有一些人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别人,不是平等待人,靠老资格吃饭,特别是做了大官的,靠做大官吃饭,不是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毛泽东的这段话,击中党内存在的弊端。不仅在当时是很正确的,而且对后来也有重要的意义。但是,毛泽东在会上讲的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的说法,就不够全面了。外行领导内行,从大的原则、方针政策上说是正确的。但从具体的行业说,就不正确了。毛泽东认为,世界上有一万个行业,每人只精通一行,所以人人是内行,也人人是外行,都要内行去领导是不可能的。这是从大的范围上说的。但从具体上说,党的领导,一是政治领导,二是具体业务的领导。但是,要实现这两方面的领导,都必须有熟悉政治和业务两方面人去担任,如果没有这两方面的内行,就无法完成领导工作。就某个人来说,要成为某一方面的领导,也必须变为内行。如果叫一个人去领导一个根本不懂的行业,肯定是完不成任务的。只有变为这个行业的内行,才有可能充当领导,完成领导任务。所以,应该说,内行领导外行、内行领导内行,才是一般规律。一个人只懂一行,所以一个人不

可能充当行行的领导。毛泽东为了驳斥1957年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提出了外行领导内行的观点,并加以宣传,这对后来起了不好的作用。

关于插旗子的问题,毛泽东认为,插什么旗子?插红旗还是插白旗?世界上任何地方都要插旗子的,从地球的南极到北极都是要插旗子的。凡是有人的地方,都要插旗子,不是插红旗子就是插白旗子,或者还有插灰旗子,不是无产阶级旗子,就是资产阶级旗子。不要怕插红旗,凡应该插红旗的地方赶快去插,每一个山头、村落,都要把红旗插起来。每个党委、机关、部队、工厂、合作社,都应该把红旗插起来,哪里没有红旗,哪里就要插。毛泽东讲这段话主要是指在政治思想上要占领各个领域。可是这段话讲后在实际中产生了重大的偏差问题。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后在不少地方掀起了插红旗、拔白旗运动。凡是所谓有白旗的地方,都受到了严厉的批判。然而什么情况下插红旗呢?没有统一的标准和说法,所以群众就无所适从,搞得十分紧张。从领导到群众都为本单位、本地区争红旗。争不到红旗,就成了白旗的地方了。当然,也有不少地方没有推行的,这里的领导顶住,这是好事,凡是推行的地方,都给群众造成了紧张的情绪。

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后,在全国范围内宣传和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做到了家喻户晓,深人人心。"大跃进"的新高潮也正在形成中,各地报刊上陆续地刊登出"大跃进"的事迹。在这形势下,毛泽东和中央的不少领导同志与下面省委领导人有着不同的态度。毛泽东采取了比较慎重的态度。他发现了1958年上半年以来党的工作中有不少浮夸现象。为进一步掌握和解决这个问题,他开始深人实际做调查研究工作。

1958年6月，在地方和中央的一些领导部门中已出现了严重的浮夸现象。略举两例，以见一斑：

6月19日，华东地区召开农业协作会议，提出今明两年粮食的产量达到每人平均1000斤～1500斤，3年至5年内，达到人均2000斤以上。这个指标，在当时的条件下，即使华东地区也是难以达到的。然而，各地以华东为榜样，开起农业协作会议，制定指标了。华北、西北、西南地区先后召开农业协作会议，在会议上不断地提出农业生产的高指标。西北地区提出到1962年粮食产量每人平均突破3000斤。这种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当时都作为"大跃进"、敢想敢干的先进事例，出现在报刊、广播、会议、文件上。从而造成了一种"大跃进"的形势和气氛。于是，有不少人头脑发胀，信以为真。后来在农业战线上不断地传来了放卫星的捷报，说河南有一个合作社的小麦，亩产7000多斤。同时还提出了许多惊人的口号。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此时，平均亩产千斤的社已是右倾保守落后的了，只有几万斤的才认为差不多。当时，农业生产的浮夸风，十分普遍，从南到北，刮得很凶。对此，毛泽东开始是不相信的，后来半信半疑，到最后才部分相信。

6月中旬，召开全国钢铁生产协作会议。22日，毛泽东批转了中央冶金部党组关于产钢计划的报告。其中讲到华东地区1958年产钢400万吨，1959年为800万吨。于是，其他大区也相继召开会议，研究产钢计划。从各地区上报的数字，1959年钢的产量可以超过3000万吨，到1962年钢的产量可以达到8000～9000万吨以上。对此，毛泽东开始时也是不相信的。到后来才部分相信了。

以上两例,说明工农业生产方面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后高指标、浮夸风已十分严重了。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十分危险的。毛泽东后来说,这种情况的危险在于这些数字被中央、省、地的三级领导相信了,并以此为根据,制定各种方针政策,作出各种计划、措施,甚至作出重大的决策。毛泽东开始是比较清醒的,对粮食的高产量他有怀疑,到后来,有的数字他相信了,有的指标他也同意了。这样高指标、浮夸风越刮越盛。

6月25日,北京郊区十三陵水库工程进入紧张施工阶段。毛泽东首先来到工地,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参加劳动。当日,十三陵水库指挥部还不知道毛泽东要来劳动,可以说没有任何准备,在一个十分简易的竹棚指挥所内接待了这位伟大的领袖,并在匆忙中请毛泽东为水库题词。毛泽东欣然命笔写下了"十三陵水库"5个大字。这消息使整个工地沸腾了起来,大家都来看望他。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以及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以及全体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等都来到工地,参加劳动。这一举动,不仅给十三陵水库工地10万劳动者以鼓舞,而且对全国人民的劳动热情是个极大的激发。

6.搞联合舰队我们不干

1958年7月31日至8月3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来中国访问。毛泽东以及中共中央的其他领导人会见了他,并进行了会谈,主要讨论了国际形势和中苏两党两国关系

的问题。在会谈中，毛泽东和中国领导人拒绝了苏联不久前提出的关于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的建议。赫鲁晓夫对此大为不满。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参加莫斯科会议和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毛泽东对赫鲁晓夫作了一定斗争后有不少让步，目的是要改善中苏两党两国关系。但是，在这一年时间内，赫鲁晓夫却背弃《莫斯科宣言》的原则，把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分歧扩大到中苏两国关系方面。这只能说明，赫鲁晓夫的大国沙文主义、霸权主义日益发展和严重。

1958年4月，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向中国提出，在中国共同建设一座长波电台，价值1亿卢布，苏方承担7000万，中方承担3000万，并签定"有关共同建设和使用上述无线电中心的相应的协定草案"。中国政府答复苏联政府：同意在我国建设长波电台，但费用应当由中国方面全部承担，建成后两国共同使用。到7月，苏联再次提出：由双方共同建设电台，在使用问题上，双方在时间和器材上各占一半。对此，中国再次申明：同意在中国建设，费用全部由中国负担，所有权是中国的，使用权一半对一半。7月21日，苏联政府通过驻华大使尤金，向中国政府提出在中国建立所谓共同舰队，理由是苏联的黑海会被敌人封锁，波罗的海就不用提了，北面更不宽阔，东面的海面也不能算安全，而中国的海岸线很长，条件很好，所以提出建立所谓的联合舰队。

在会谈中，毛泽东和中国其他的领导人拒绝了苏联的这个无理要求。苏联提出的所谓"联合"，实际是侵犯中国主权的，企图以此控制中国。毛泽东决不会接受。中国的理由是，

中苏之间已有条约，打起仗来，苏联军队可以到中国来，中国军队可以到苏联去，苏军可以使用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但是，搞共同舰队，我们坚决不干。毛泽东的这一理由是十分充足的，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规定，中苏任何一方受第三者侵略的时候，可以互为后方。所以根本不需要组建联合舰队。

赫鲁晓夫对自己的建议遭到拒绝是没有估计到的，他认为苏联提出的建议要求是不能违背的。对中国的上述回答，他认为这是不能容忍的。赫鲁晓夫自 1956 年苏共二十大以来反对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已建立起他的个人崇拜。他开始了独断专行，老子天下第一，利用苏共和苏联的地位称王称霸，为所欲为。他想在国际舞台上，特别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指挥一切，操纵一切，主宰世界，各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应该服从他的指挥。

然而毛泽东他不信这一套。他和党中央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坚持原则，坚决地反对赫鲁晓夫企图在军事上控制中国的做法。当然，这会触怒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在一定时候是会报复的。对于这点，毛泽东早料到了。但是，他是决不会屈服。

这件事是赫鲁晓夫提出的主意。在 7 月 23 日，中苏正在协商建立长波电台一事过程中，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又向中国提出建立联合舰队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坚持，必须先弄清楚这是什么意思，然后再谈。毛泽东对尤金大使说，请你转告赫鲁晓夫，让他自己来讲。没有过几天，赫鲁晓夫果然来了。当时，中苏关系还算不错。中国对赫鲁晓夫的接待仍然十分热情。然而在会谈中气氛却十分紧张。当赫鲁晓夫陈述他的意思时，毛泽东突然提出：什么叫联合舰队？赫鲁晓夫

没有马上回答,仍然讲长波电台的问题。此时,毛泽东有点恼火,不耐烦地站了起来,以严厉的口气说,什么叫联合舰队?赫鲁晓夫一看也明白毛泽东不同意,于是退了下来说,我们只不过跟你们共同商量。毛泽东说,什么叫共同商量,我们还有没有主权?你们是不是想把我国的沿海地区都拿去?赫鲁晓夫立即说,我们没有这个意思,不要误解,我们是与你们商量,如何共同加强防御力量。毛泽东又说,打起仗来,苏联军队可以到中国来,中国军队可以到苏联去,苏军可以使用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说完毛泽东又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赫鲁晓夫只好退了一步说,我们能不能达成某种协仪,让我们的潜水艇在你们的国家有个基地,以便加油、修理、短期停留?对于这点,毛泽东做了一个手势,表示断然拒绝,并说不行,并不想再听到这件事。赫鲁晓夫听后也恼怒了,说: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还在互相合作,可是我们这里连这样的一件事还达不成协议。还说,你们的潜艇也可以使用我们的摩尔曼斯克基地。毛泽东又断然地拒绝,说:我们不要,也不想去那里搞什么名堂,也不希望你们来我们这儿搞什么名堂。英国人、日本人,还有许多别的外国人已经在我们国土上呆了很久了,现在已被我们赶走了,我们再也不想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

此时,赫鲁晓夫已看到在中国搞联合舰队、长波电台是不可能的。只好马上回国。回国后,赫鲁晓夫开始骂毛泽东了,并且部署起一系列的行动,把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逐步地扩大到中苏两国关系上。

毛泽东称铁托是一块铁。其实,毛泽东更是一块比铁还要坚硬的钢。在中国的国家主权问题上,毛泽东决不会与别

人做交易，更不会达成什么协议。他曾和美国人、日本人打过各种交道，最后统统地把他们赶走了。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谁能够与毛泽东相比呢？中国在民主革命时，斯大林出过不少错误的主张，使中国革命受到了严重的损失。解放战争时，斯大林害怕中国打内战的结果，美国要插手，会爆发大规模的世界战争；但是，毛泽东作出了另一个判断，把解放战争进行到底，中国的革命获得胜利。朝鲜战争爆发时，斯大林又害怕起来，以为会引起新的世界大战；但毛泽东不怕，也作出了另一个判断，派志愿军出兵朝鲜，"顶了他一下"，亚洲的太平终于实现了。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说，新中国是打出来的，毛泽东的一生大部分时间在从事打仗。革命战争把毛泽东锤炼成一块比铁更坚硬多少倍的钢！在毛泽东看来，赫鲁晓夫算得了什么，他指挥过什么战役？如果真的发生新的世界大战，中苏之间早在1950年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就够用了，并以它为根据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对于这点，赫鲁晓夫是认识不到的，毛泽东拒绝他的建议，他也是没有预先估计到的。从此，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开始急转直下地进入紧张阶段。

7.还是人民公社好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会谈结束后，于1958年8月4日到河北省徐水县视察，进一步调查了解中国农村的"大跃进"运动。

徐水县是当年"大跃进"的一个所谓先进典型。据报上报导，这个县的粮食产量在全国遥遥领先，不少调查团都到徐水

调查取经。有的调查小组到徐水后问农民的粮食产量和家庭收入时，老乡十分有趣地回答："我们家的粮食不在屋内，而在会计的帐上。"其实没有那么多的粮食，但不敢说真话，也不说假话，而只好说粮食在会计帐上了。对此，毛泽东也十分感兴趣，所以出访的第一站就到了徐水。当他听了县委汇报后，作了不少重要谈话，最后，意味深长地对大家说：

> "你们有这么多的粮食吃不完，怎么办啊！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的活儿，另外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你们看吗？世界上的事情是不办就不办，一办就办得很多！"①

毛泽东的这段谈话充分表现了对"大跃进"后中国社会的设想，带有很大的浪漫色彩。然而，这个设想真的有人当作最高指示执行。北京市在"大跃进"的规划中，曾提出了三分之一的地种粮食、三分之一的地种菜、三分之一的地种花的计划，怕粮食、蔬菜种多了吃不完。

毛泽东视察河北后，乘车到了河南。这是"大跃进"的又一个所谓先进地区。到河南主要是了解他们成立的人民公社。因为，自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提出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后，河南、辽宁等省出现了并社运动。所以，毛泽东到河南时，一个人民公社化运动正在悄悄地兴起。

---

① 《人民日报》1958年8月10日。

《中共中央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是1958年3月20日在成都会议上通过、4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的，所以这两个省开始了并社运动。这个文件虽然指明小社并大社的好处，但不是普遍情况，要合并必须具备条件。然而在"大跃进"的年代，条件是可以"创造"的。作为文件有它正确的地方。如：

"(一)我国农业正在迅速地实现农田水利化，并将在几年内逐步实现耕作机械化，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生产合作社如果规模过小，在生产的组织和发展方面将发生许多不便。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

(二)小社合并为大社，应具备以下条件：

1.在发展生产上有需要；

2.绝大多数社员确实赞成；

3.地理条件适合大社的经营；

4.合作社的干部有能力办好大社。

(三)为了便于加强对合作社的领导，为了在乡的范围内发展各种小型工业和文化教育事业，在小社合并为大社以后，每一个乡领导几个农业合作社是适宜的。如果乡的区划较小，可以适当地合并成大乡。

(四)农业合作社的合并必须有准备有计划地进行。需要合并而不合并是不适当的，不需要合并而合并，或者合并得过早过大，也是不适当的。因此，各地农业社是否合并，合并的规模多大，以及进行并社工作的时间和步骤，应当完全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本地区的情况自行考虑和规定。"

中央的精神是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合并，但是在"大跃

进”的年代所根据的不是实际情况，而是潮流，什么是“先进”，就以“先进”的办，大社比小社先进，则就办大社。并社运动很快兴起。

8月6日，毛泽东头戴草帽，身着白衬衣，来到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视察。在听取汇报和视察中，毛泽东不断地称赞人民公社。他说：“有希望啊！你们河南都像这样就好了。”“有了这样一个社就会有好多社。”这几句话有千斤重。他在河南树立了榜样，即七里营人民公社。

毛泽东在视察河南的过程中，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可以说，他找到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向前发展的模式。他在成都会议时，认为小社并大社，是发展方向。但现在不这样想了，小社并大社不是一种理想的组织，而人民公社才是一种比农业社集体化程度更高、社会主义性质更大的组织形式。他的上述言论也充分肯定了成都会议以来河南、辽宁等省的并社运动。七里营人民公社就是在第一批并社中，将27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而成的，共有9639户。辽宁省是在5月进行并社的，将全省9600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为1461个大社，平均每社有2000户左右，其中有1万户以上的9个，最大的社为18000户。在并社中还调整了乡规模，将全省2854个乡合并成1226个乡，其中83%是一乡一社。毛泽东到河南视察时，辽宁省的并社工作已基本完成。当他们得到毛泽东肯定七里营人民公社的做法的消息后，这些大社就改成“人民公社”了。

8月9日，毛泽东驱车到山东视察。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作了汇报。当他谈到历城县北园乡扩大合作社规模，究竟叫合作社好，还是叫大农场好时，毛泽东根据河南的经验作了

一番谈话。他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毛泽东称赞谭启龙,说你这个人不干就不干,一干就大干。当时,有记者跟着他视察。他和谭启龙的这番话,在8月13日的《人民日报》上,以头版头条消息,并加了套红,报道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

从此,这个口号传遍大江南北。毛泽东的指示,就是行动的命令。因而在全国农村出现了由小社直接转办起人民公社的热潮。对于这点,毛泽东是没有料到的。后来,在纠正公社化运动中问题时,毛泽东深有感慨:以后再也不让新闻记者跟着了。

8月13日,毛泽东来到天津视察。听取了天津市委及天津大学负责人的汇报。毛泽东听后说:

> “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个东西,就什么都好办了。”

他还说,地方应该想办法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首先是协作区,然后是省,只要有条件,都应建立比较独立的但又是情况不同的工业体系。

毛泽东发表上述言论,是视察河北、河南、山东以及天津后作的一个总结。他深感在中国粮食和钢铁的重要。也是以钢为纲、以粮为纲思想最早的提出和反映。这思想应该说来自于实际,反映了实际。天津市委汇报了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后工业发展的情况,使毛泽东加深了抓粮食和钢铁的重要

意义。在当时,党内有两种思想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一种是不了解抓粮食和钢铁的重要性;二是只抓钢铁,看不到抓粮食的重要性,认为只要有了钢铁,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了。然而,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吃饭问题十分严重,客观实际不允许你只重视钢铁,不重视粮食,解决吃饭问题只能依靠自己解决,别的国家和地区是无法满足中国粮食要求的。也就是哪一个国家都解决不了对中国粮食供应问题,因为中国的人口太多了。对此,毛泽东早有认识,他一直重视农业,抓粮食的生产。这是他对中国国情深刻了解的结果,也是他领导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一个成功的战略。有人说,他重视农业,因为他是地地道道的农民的儿子的缘故。他了解农村,熟悉农民,深知抓粮食的重要与他农民家庭出身有关。但是这不等于所有农民家庭出身的的领导人都有这个战略思想。

天津大学校长张国藩向毛泽东汇报了有98%的学生参加了勤工俭学的活动。这是根据刘少奇在5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的我国应该有两种主要的教育制度,以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开展的。毛泽东听汇报后感到很满意。他在河南视察时,听到河南长葛县有的中学开展了勤工俭学,并搞得很好,升学率也很高,学生不仅学到了书本知识,而且通过劳动实践,加深了对书本知识的理解。他问王亢之:天津的中学是否也搞勤工俭学?王亢之说,天津,有近百所中学搞勤工俭学,有60多所中学办起工厂或车间,毛泽东听后说,学校是工厂,工厂也是学校,农业合作社也是学校,要好好地办。对于高等学校,毛泽东说,应抓住三个东西:一是党委领导;二是群众路

线；三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些意见和看法，从原则上说是正确的，在当时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在贯彻中，往往强调了一个方面，而忽略了另一个方面。如强调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而忽略了教育本身的特点与客观规律；强调了学校也是工厂，而忽略了学校的特点；强调了实践知识的重要性，而又忽略了书本知识。如果在实践中，克服了这些偏差，全面地、准确地理解和贯彻，就必然会收到良好的效果。

在两个月的视察中，毛泽东发现了不少新的东西。特别是找到了人民公社这个经济模式，使他有把握地改变农村的生产关系，扩大农村集体经济的公有化程度，使我国农村进一步向社会主义迈进。这实际上为即将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作了必要的准备。

在这时毛泽东还没有预见到人民公社成立后会带来问题。当时他相信，只要人民群众自己创造的，就一定有基础；只要符合社会主义方向的，就一定会胜利。他把人民公社看作为巩固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一个好形式。他支持河南省创办人民公社，也建议山东叫人民公社，也同意《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还是人民公社好"的特大新闻。

8.主持北戴河会议

1958年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河北省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外，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和政府部门党组的

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了当前的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问题、商业工作问题、教育方针问题、加强民兵工作问题、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最后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钢而奋斗》、《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等一系列文件。这些文件，明显地表现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指导思想上存在着严重的"左"倾错误，脱离了实事求是的科学轨道。

首先，会议夸大地估计了1958年农村经济形势。会议指出：1958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将使粮食作物的总产量达到六千亿斤至七千亿斤，比1957年增产60%至90%，全国每人占有粮食的平均数将达到一千斤左右；棉花将达到七千万担左右，比1957年增产一倍以上，农业战线的伟大胜利要求工业战线迅速地赶上去，而且也使得省一级党委有可能把注意的重心转移到工业方面来。会议决定，全国的省和自治区党委的第一书记，从现在起，就必须首先注意工业的领导，同时不应当放松农业的领导。

会议认为，经过1958年的"大跃进"，农业问题已基本解决了，粮食的产量不仅能满足全国人民吃饭的需要，而且还有剩余，要求各省委重点抓工业了。

其次，作出了生产1070万吨钢的高指标。

会议指出：工业的生产和建设必须首先保证重点。工业的中心问题是钢铁的生产和机械的生产，而机械生产的发展又决定于钢铁生产的发展。根据当前全国人民对于钢铁的巨大需要和对于钢铁生产的巨大努力，根据钢铁冶炼设备正在逐月增加和迅速投入生产的情况，钢铁生产的飞跃发展是必

要的和可能的。按照1958年2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所通过的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1958年钢产量是620万吨，比1957年增产85万吨，这个数字早已显得不够了，1958年5月底，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建议把1958年的钢产量增加到800万吨至850万吨，现在看来，这个数字仍然嫌低。会议通过讨论，决定比1957年的产量535万吨增加一倍。

在1958年8月作出决议生产1070万吨钢，到年底只有4个月时间，而当时只完成了450万吨，还有600多万吨的任务。对于这个高指标，毛泽东开始时是半信半疑的，到后来虽然同意通过决议，但还是认为"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为时晚了一点，担心完不成任务。

其三，过分地估计了成立人民公社的必然趋势。

会议指出：把规模较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和改变成为规模较大的、工农商学兵合一的、乡社合一的、集体化程度更高的人民公社，是目前农村生产飞跃发展、农民觉悟迅速提高的必然趋势。人民公社是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和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种最好的组织形式，并将发展成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①

在《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已估计到：

"大型的综合性的人民公社不仅已经出现，而且已经在若干地方普遍发展起来，有的地方发展得很快，很可能不久就会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一个发展人民公社的高潮，且有不可阻挡之势。"

① 《人民日报》1958年9月1日。

其四，会议对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作了夸大的预测。

会议指出，1959年是全国人民苦战三年有决定意义的一年。在1959年，要求我国的工业和农业继续用1958年的速度或者比1958年更高的速度前进，这样就可以保证在最短时间内彻底解决我国粮食、棉花、油料的生产和供应问题，并且从根本改变我国的工业落后状态。

经过讨论，内部确定1959年的钢产量要达到2700万吨至3000万吨，要求在1958年农业过关的基础上，实现1959年工业过关，要求有若干项基本工业指标在1959年内赶超英国。

从上述四方面可以作出结论，中共中央在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以北戴河会议为标志出现了“左”倾错误，并且是全局性的。这个错误论责任，当然毛泽东应负主要的责任，但当时的中共中央集体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例如，毛泽东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开始是半信半疑的，或者说不相信的，但到后来大家都说可以达到，他才同意了。1958年钢产量定为1070万吨，是经过很长时间酝酿的。开始他不十分相信。经过6月份的钢铁生产协作会议，华东地区提出1958年生产钢400万吨的指标，后来，东北、华北、华中各地区都提出了指标，看来1070万吨钢的任务是能够完成的。但是，毛泽东还不放心，总感到有问题。所以，在北戴河会议期间，他又主持召开了钢铁生产基地的市委书记和钢铁公司党委书记座谈会，在会上，大家都保证能完成这任务。到这个时候，毛泽东才通知胡乔木把1070万吨钢的高指标写进决议中。而毛泽东对成立人民公社是充满着成功和胜利的信心的。因为，他在会前作了调查研究，认为人民公社比高级社要优越，也合乎

理想。所以，会议通过成立人民公社决议时，他没有估计到人民公社的成立会刮起“共产风”，会使农业生产遭受严重影响。

9、在“大跃进”运动中

北戴河会议决议公布后，一个“大跃进”运动席卷全国各地。作为“大跃进”运动发起者、组织者、领导者的毛泽东，也被“大跃进”运动所震撼。

所谓“大跃进”运动，就是全面地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全民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个运动规模之大、速度之快，都超过了人们的预料，也超出了毛泽东的设想。

9月1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北戴河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钢而奋斗》的决议后，一个全民炼钢运动在全国波澜壮阔地开展起来。在决议中，强调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实行大中小并举、土洋结合，开展全民炼钢运动。截至8月底，全国钢产量已完成450万吨。离1070万吨还有620万吨。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要完成这任务，只有动员全党全民立即行动起来，奋战4个月才能完成。

《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立即行动起来完成把钢产量翻一番的伟大任务》一文，明确指出：这是全党全民当前最重要的政治任务，1070万吨钢的任务必须完成，一吨也不能少，任务是繁重的，任务是紧迫的，到年底只有122天的时间，1小时也不能浪费，全党全民必须同时间赛跑，从现在起立即行动起

来，鼓足干劲，苦战4个月。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必须把领导钢铁生产当作首要任务。从9月1日起，全党全民的主要力量逐渐地转移到大炼钢铁上来了。

为完成这任务，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中央提出了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土法冶炼和现代化冶炼同时并举的方针。对现代化的大型的钢铁企业，必须增加任务。同时必须实行全民炼钢运动，组织大兵团作战，广泛开展土法炼钢，兴建土高炉。从农业战线上动员抽调大批劳动力，上山找矿，兴建土高炉。据统计，在7月的时候，从农业战线上抽调的劳动力只有几十万人，小高炉也只有3万多座；8月的时候，已抽调几百万人，小高炉已增加到17万座；但到9月的时候就不同了，抽调的农村劳动力已达5000万人，小高炉已猛增到60多万座；10月，抽调农村劳动力已达6000万人，11月和12月增加到9000万人，小高炉从10月以后达到100万座以上。全国各机关、学校、工厂、企业、事业等单位都在炼钢，可谓遍地开花，全民上阵，声势之大是前所未有的，真正地出现了全民炼钢运动。

为实现钢铁生产翻一番的任务，在宣传鼓动中，特别强调炼钢的政治意义。认为有了钢，一切事情就好办了。工业、农业、交通的现代化可以实现了，帝国主义者也不敢欺侮我们了。特别是在9月4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授权之下发表声明，公然威胁要在台湾海峡地区扩大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略范围，进行战争挑衅，从而加剧了美国在这个地区造成的紧张局势，使远东和亚洲的和平受到严重威胁，在此情况下，更强调炼钢要算政治帐，不要算经济帐。

9月8日，毛泽东在第15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一方面

谴责美帝国主义侵占我国领土台湾以及扩大侵略范围的罪行;另一方面强调我们的领导工作的重心需要适时地从农业和农村工作方面转移到工业建设方面来,中央和省一级的领导机关,必须一手抓工业,一手抓农业,而从现在开始,要把重点放在工业方面。在工业方面,首先要抓钢铁工业和机械工业,因为这是实现我国工业化、农业机械化和加强国防力量的基础。于是,全党全民很快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发展工业上,投入到大炼钢铁的运动中。

在炼钢生产中,采用不断地批判右倾保守思想,批判神秘观点,号召大干苦干,日夜鏖战,大搞群众运动,大搞技术革新,召开钢铁生产现场会、评比会,组织钢铁生产的放卫星运动,搞钢铁生产周,提出"人家能办到的,我们也能办到;人家办不到的,我们也能办到"的口号。为保证钢铁生产要什么有什么,提出了"停车让路"的原则,要求树立为钢铁生产的所谓全局观点。各部门、各地方都要把钢铁生产放在首要的地位。当钢铁工业的发展生产与其它工业在设备、材料、动力、人力等方面发生矛盾时,其它工业应该主动放弃或降低自己的要求,保证钢铁工业先行。不管是哪一个地方,哪一个部门,有材料、设备、交通运输工具的必须首先让路给钢铁工业,有制造能力的必须首先为钢铁工业而生产。电力首先满足钢铁工业的需要,有劳动力和技术力量的,必须首先给钢铁工业。总之,要做到"钢铁工业需要什么,我们就应该支援什么",保证钢铁元帅升帐,保证钢铁生产快马加鞭,迅速发展。

在全国掀起一切为了钢铁生产的全民炼钢运动的结果,却只能造成钢铁生产一马当先的局面,而不可能出现各项工业共同发展的万马奔腾的形势。因而导致了工农业之间、重

工业与轻工业之间、钢铁工业与其他重工业之间的严重比例失调，这个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但是，这在当时被“大跃进”形势和气氛所淹没，看不到这个后果。

在举国上下、千军万马奔赴钢铁战线的时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其他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大批地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他们到河北、河南、安徽、湖南等省视察。毛泽东巡视了长江流域的几个省，被群众运动所感动。他来到各地发表了不少鼓舞群众大干快上的指示、谈话，使“大跃进”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地向前推进。

9月10日，毛泽东到了武汉。他听取了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关于全省钢铁生产情况的汇报，并视察了武汉地区。12日，毛泽东来到武汉大学，看望全校师生，视察了化学系办的工厂。在视察中说：

> “青年人，就是要有志气。”
>
> “学生自觉地要求实行半工半读，这是好事情，是学校大办工厂的必然趋势。对这种要求可以批准，并应给他们以积极的支持和鼓励，在教学改革中应注意发挥广大师生的积极性，多方面的集中群众的智慧。”

9月13日，武汉钢铁公司第一号高炉投入生产。这个日产生铁2000吨的高炉的投产，给1958年的全民炼钢运动带来了极大的鼓舞，也是武汉钢铁公司几万职工奋战的成果。从此，我国开始形成了以武汉钢铁公司为中心的华中钢铁基地。13日下午，毛泽东观看了第一炉铁水奔腾而出的情景，后又视察了厂区，发表了这样的意见：

"像武钢这样大的企业，可以逐步地办成为综合性的联合企业，除生产多种钢铁产品外，还要办点机械工业、化学工业和建筑工业等。这样的大型企业，除工业外，农、商、学、兵都要有。"

在这段话中，表现了毛泽东对工业企业特别是大型工业企业发展的憧憬。在当时虽然不可能完全做到。但是经过几十年后，像 这样的大型企业，确实需要办多种行业，不仅有钢铁生产的行业，而且还要有机械工业、精密仪器工业、运输业、建筑业等多种行业；不仅有工业，而且还要有农业、商业，办大中小学，办文化事业，只有这样，才能使大企业全面地发展和提高。

在武汉地区，毛泽东还视察了大冶炼铁矿区、大冶钢厂、武昌第一纱厂、武汉重型机床厂等，与 4 万多名职工见了面，所到之处，群众热情高涨。9 月 15 日，毛泽东从武汉动身，经鄂城、大冶，到了黄石港，沿途看到了农业丰收的景象。在视察大冶铁山、黄石港特殊钢厂时同工人见了面，谈了话，工人们以高涨的劳动热情欢迎这位伟大领袖的到来。9 月 16 日，毛泽东到了安庆，视察了当地的一所中学以及机关干部办的小高炉群，会见了安庆的人民群众，然后驱车到了合肥。在经过桐城、舒城、肥西等县时，他沿途看到了不少人群，有的推着小车，有的背着行李，走几十里或几百里路到山上去找矿，为钢铁而战。此时此刻，毛泽东很有感慨，似乎看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人民群众支前的情景。人民，只有人民，才能改变一切，

创造一切，人民真正地行动起来了。作为年过六旬的老人，看到这种场面也是十分高兴的。毛泽东的车也经常被人群挡住。当然，成群结队的农民群众不知道在这吉普车内坐的是毛泽东，一旦知道，他们会爆发出震天的高呼声，把车挡住，把人围在中间，要看个够，问个够的。所以，司机尽量地把车开得快一些，不让群众围住。到合肥后，毛泽东十分高兴。他说：

"沿途一望，生气勃勃，肯定是有希望的，有大希望的。"

他在合肥视察了两个中型钢厂，看了农业展览馆、工业产品和发明展览馆，会见了不少干部和群众。特别是在会见女干部时说了一段意义深远的话。他说：

"如果每年每人没有一千斤、二千斤粮食，没有公共食堂，没有幸福院、托儿所，没有扫除文盲，没有进小学、中学、大学，妇女还不可能彻底解放。"

在1958年的时候要做到上述这些是有不少困难的。所以他把希望寄托在办人民公社上，他认为办好人民公社，才是妇女彻底解放的道路。应该说，毛泽东盼望妇女彻底解放的思想和心情是伟大的、正确的。但是，妇女彻底解放的任务太艰巨了。人民公社办了几十年并没有完成。现在看来，即使

粮食产量达到了每人每年一二千斤后，妇女的彻底解放的任务也还远远地没有完成。

9月20日，毛泽东到了马鞍山，头戴柳条帽视察了钢铁厂。在会见马鞍山的市民和干部群众时说：

"马鞍山条件很好，可以发展成为中型的钢铁联合企业。发展中型的钢铁联合企业比较快。"

30年以后，一个中型的马鞍山钢铁基地建设起来了。毛泽东还强调发展钢铁工业一定要搞群众运动。他说，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这句话就不确切了。依靠群众，贯彻群众路线，没有这个是不行的。但是它和搞群众运动不同，有不少工作是不能搞群众运动的。

毛泽东视察完马鞍山的当日，驱车赶到了南京城。也许他会想起写于1949年4月而还没有公开发表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诗篇：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①

① 此诗最早发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12月版《毛主席诗词》上。

现在，彻底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的历史契机已经到了。毛泽东十分高兴地会见了江苏省的干部和人民群众。然后又赶到了上海，会见了不少干部。9月29日，毛泽东回到北京。他对新华社记者发表了内容广泛的谈话。他认为：此次旅行，看到了人民群众很大的干劲，各项任务都是可以完成的。

——首先，应完成钢铁战线上的任务。在钢铁战线上，广大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但是就全国来说，有一些地方，有一些企业，对于发动群众的工作还没有做好，没有开群众大会，没有将任务、理由和方法，向群众讲得清清楚楚，并在群众中开展辩论。到现在，我们还有一些同志不愿意在工业方面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他们把在工业战线上搞群众运动说成是不正规，贬之为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显然是不对的。

——在大干钢铁的同时，不要把农业丢掉了。人民公社一定要把小麦种好，把油菜种好，把土地深翻好。1959年农业方面的任务应当比1958年有一个更大的跃进。为此，应当把工业方面和农业方面的劳动力好好组织起来。

——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还要大办民兵师。民兵师组织很好，应当推广。这既是军事组织，又是劳动组织，又是教育组织，又是体育组织。帝国主义者如敢欺侮我们，是需要认真对付的。我们有了正规军，有了民兵师，在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时候，就会使他们寸步难行。

——帝国主义者的寿命不会很长了。因为他们尽做坏事，专门扶植各国反人民的反动派，霸占大量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军事基地，以原子战争威胁和平。这样，他们就迫使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正在或者将要对他们群起而攻之。

但是帝国主义者目前还在活着。他们依然在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横行霸道。他们在西方世界也依然在压迫他们本国的人民群众。这种局面必须改变。结束帝国主义主要是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是全世界人民的任务。

毛泽东对这次大江南北的视察是十分满意的。视察前,他对1958年钢铁指标翻一番任务能否完成,是打一个问号的。但视察后,看到群众真正地发动起来了,他对"大跃进"运动充满着必胜的信心和希望,完全打消了疑虑。同时他坚信,搞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工业,发展钢铁,如同战争年代一样必须大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一切事情都是办不成的。

毛泽东一向重视调查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这次视察也是调查研究。他有了第一手材料,也得到了不少感性认识,所以他回到北京后对新华社记者发表了谈话,作为此次视察的总结,以推动"大跃进"运动的深入开展,完成1958年的各项计划指标。

国庆前后,全国的"大跃进"运动进入了最紧张、也是最关键的时刻。10月,是决定钢铁生产能不能完成1070万吨任务的关键一个月。经过9月份的准备,省市委各级领导的工作重点都转移到钢铁生产上来了。举国上下,热气腾腾,都在为钢铁而战。特别是毛泽东视察后的谈话公开发表后,钢铁战线上的战斗更是越打越响了。

9月29日,为迎接共和国第9个国庆节,创造了一个全国钢铁生产的高产日。10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卫星齐上天,跃进再跃进》的社论,提出要求全国日产钢6万吨。这样才能保证完成1070万吨的任务。当时,全国农业劳动力投入炼钢的已达5000万以上,土高炉已建100万座。中央认

为,钢铁生产能不能飞跃,关键在于"小土群",即兴建小转炉、小平炉,进行土法冶炼,大搞群众运动。10月7日至9日,冶金工业部在天津召开全国地方炼钢现场促进会。在会上,介绍了天津新兴钢厂土法炼钢的基本措施和操作经验,研究解决了转炉炼钢的若干技术关键问题和操作方法。在会上,也提出了保证钢铁生产翻一番必须一手抓铁、一手抓钢的口号。10月11日至16日,冶金工业部在河南商城县召开全国土法炼钢现场会。会议着重介绍河南商城地区和郑州地区的土法炼钢经验。10月15日至21日,全国各地开展钢铁生产周,把钢铁生产的群众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钢的日产量达到10万多吨,生铁的日产量达到37万多吨。10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大企业必须大搞群众运动》的社论,提出了我国钢铁生产展翅高飞,有两个翅膀,一个是大洋群,一个是小土群。所谓大洋群,就是指大中型企业,进行现代化方法冶炼,大搞群众运动;所谓小土群,就是指小高炉,采用土法冶炼,全民动手。现在小土群已飞起来了,而大洋群还没有发动起来,这主要是指全国18个大型钢铁企业还没有飞起来。现在必须反对唯条件论,在大企业中,也必须开展群众运动,必须推行两参(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一改(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三结合(在党委的领导下,实行行政人员、技术人员和工人群众的密切结合)的经验。

经过九十两个月的全民炼钢运动,到10月底,全国钢产量从8月底的450万吨上升到820万吨,即两个月内完成370万吨,离1070万吨的任务,只有250万吨了,而时间还有两个月,中央认为1070万吨钢的任务是可以完成的,并再次发出号召:一定要完成钢产量翻一番的任务,不能打任何折扣。又

奋斗了两个月，到12月底，共完成1100万吨任务。

这样的全民炼钢运动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对于这一点，在1958年还没有暴露出来，作为领导这场运动的毛泽东是没有估计到的。其后果，首先是由于全民炼钢，把农村中的大批青壮年抽去找矿炼钢，使农业战线上的劳动力严重不足，没有使1958年的丰产年变为丰收年，不少粮食、棉花、油菜、花生等烂在地里，没有收回来；其次，是由于钢铁生产的大幅度上升，使工农业之间、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重工业内部之间，以及整个国民经济处于比例失调之中，因而钢铁工业虽上去了，而其他各行各业却跌下来了；其三是由于全民炼钢，打乱了原有的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使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其四是钢铁的质量太差，尤其是小土群冶炼的钢，几乎不能用，有的地方和单位为了追求数字，放卫星，把不少钢材制品、农具，甚至是老百姓的铁锅都拿出来炼钢，这在经济上是得不偿失的，在作风上滋长了浮夸风、虚假现象十分严重，强迫命令盛行，也给农民造成了巨大损失；其五是为钢铁生产国家在财政上补贴了20多个亿。对此，在党和国家的干部中是有不同看法和不少意见的。然而当时把他们作为“秋后算帐派”“观潮派”等加以批判和打击，这就更助长了“左”倾错误的滋长。

“大跃进”运动中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全国掀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北戴河会议后，人民公社化运动更是超过人们的预料。9月10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脱离了我国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忽视了农业生产合作社需要巩固和发展的客观实际，急于改变农村生产关系，建立以“一大二公”为特征的人民公社。这是企图在农村生产力还处在落后的状况

下建立一个便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农村经济模式。北戴河会议讨论这个决议时，虽然非常热烈，但没有人提出反对建立人民公社的意见。到1958年8月下旬时，全国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北戴河会议认为，把规模较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改变为规模较大的、工农商学兵合一的、政社合一的、集体化程度更高的人民公社，是目前农村生产飞跃发展，农民觉悟迅速提高的必然趋势。人民公社是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和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种最好的组织形式，并将发展成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组织。这些分析和估计是缺乏根据的。但是，在"大跃进"的浪潮中，谁也不敢反对这面红旗。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北戴河会议以后很快一哄而起。在8月底和9月初的时候，河南和辽宁两省已基本上实现了全省的公社化。河北、黑龙江、安徽等省的公社化运动也正处在高潮中。8月底，河南全省农村在原有的48473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平均每社260户的基础上，合并成1378个人民公社，平均每社7000多户，其中5000户以下的有362个，5000～10000户的有709个，10000户以上的有307个，平原地区的人民公社一般都在10000户左右，山区的人民公社一般在2000～3000户，加入人民公社的农户已占全省农户的99.98%，所以，建立人民公社的工作在河南省于8月底就基本完成了。

在河南省大办人民公社的影响下，全国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到10月底基本上完成了。仅有两个月的时间，农村的合作社都发展为人民公社。全国共建立人民公社26578个，参加人民公社的农户达12325万户，占全国总农户的99.1%，平均每个社为4637户，所以，当时总结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或叫大公社。所谓大，就是规模大，人多地多，力量大，便

于进行大规模的综合性的生产建设。一个公社内不仅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而且工农商学兵相结合。一个公社就是一个乡。公社委员会就是乡人民委员会。所谓公，就是人民公社比农业生产合作社公有化程度更高，更加集体化。

由于人民公社规模大，要求劳动组织有更高的效率和更便于调动，也要求妇女劳动力全部参加生产劳动，因而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一类的组织日益普及。原来合作社中还保留的生产资料个体私有制的某些最后的残余，如自留地、自养牲口、自营的成片的果树、一部分较大型的生产工具等，许多地方在公社化过程中已转化为社有。在分配制度上，采取了供给制和工资制相结合的制度。由于公社实行了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制度，使公社超出了单一的经济组织的范畴，成为一个地区的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的统一体。因而提出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口号。所有这些，当时普遍地认为这是"共产主义"因素，是"大跃进"的产物，是农村经济的一个大飞跃，并在人民公社组织条例中规定下来。

1958年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河南省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这个公社是由嵖岈山附近的27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在4月间合并而成的。全社共有9369户。8月7日，拟定了公社章程。这个章程虽然是草稿，但当时是被作为办社的一个样板加以推荐的。章程规定公社的宗旨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并且积极地创造条件，准备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其中有这样的规定："各个农业合作社合并为公社，根据共产主义大协作的精神，应该将一切公有财产交给公社，多者不退，少则不补。原来的债务，除了用于当年度生产周转的应当各自清理外，其余都转归为公社负责偿还。"

"在已经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基础上，社员转入公社，应该交出全部的自留地，并且将私有的房屋、牲畜、林木等生产资料转归全社公有；单干户加入公社，应该将全部的土地、牲畜、林木、大农具等生产资料转归公社所有。"

"公社实行集体领导，分级管理，全社划分为若干生产大队。生产大队是管理生产，进行经济核算的单位，盈亏由社统一负责。公社在收入稳定，社员能够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的情况下，实行工资制。按照每个劳动力所参加的工作的繁重和复杂程度，以及本人的体力强弱，技术高低和劳动态度好坏，由群众评定工资级别，按月发给工资。在粮食生产高度发展，全体社员一致同意的条件下，实行粮食供给制。全体社员，不论家中劳动力多少，都可以得到免费的粮食供应。因此公社要组织公共食堂、托儿所和缝纫组织，使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①

这个公社简章明显地表现了脱离农村社会生产力实际的"左"倾错误。生产资料上的"共产风"、分配制度上的平均主义等是十分严重的。把这个公社简章作为样板，公开发表后全国都照抄照搬了，也就是说以它为模式建立起人民公社。当时建立的人民公社一般为万户的大社。这必然使生产大队之间、生产小队之间，以及社员之间的"共产风"的发生。随着公社化运动的发展，"共产风"越刮越盛。尤其是把人民公社的建立与共产主义的到来联系起来，认为人民公社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最好的组织形式。有了这个形式，可以加快地进入共产主义。陈伯达在山东范县蹲点，制定了一个两年

① 《人民日报》1958年9月4日。

进入共产主义的规划，鼓吹取消商品生产，实行无偿调拨物资。

随着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实现，以及农村生产上的瞎指挥、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用粮等，大批青壮年劳力都抽调到大炼钢铁上，使农村的秋收秋种不能认真进行。没有几个月的时间，农村生产形势急剧恶化，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有不少粮食、棉花、红薯等因缺少劳力收割，致使丰产年反而成不了丰收年。这个形势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急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应当整顿农村人民公社，刹住"共产风"，纠正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这个问题能否及时解决，关系到人民公社的巩固、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农民的经济收入和思想情绪的稳定。

10. 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

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是极其严重的。全民炼钢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虽然还处于方兴未艾之势，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察觉到了这个错误。从1958年11月起开始纠正"左"倾错误。

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是一股社会思潮。它不是马克思主义思想，而是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思想；它不是社会主义思想，而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主义。这思想是打着建设社会主义的旗号，是在合法的条件下蔓延滋长的。人们对它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

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在河南郑州召开了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地方负责人参加的第一次郑州会议。这次会议虽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也不是中央全会，而是中央工作会议性质的，但就其讨论的问题来说，是极其重要的。这次会议标志着毛泽东亲自起来纠正党在指导思想上"左"倾错误的开始。毛泽东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纠正当时已发现了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在所有制和分配方面的"左"倾错误。主要是人民公社成立后，分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也分不清什么是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似乎是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越快越好，大有共产主义到来之势。这种情况在当时是十分严重的，也会造成对生产力的大破坏，是一次在条件不具备即生产力还没有高度发展的情况下，提早进行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这种穷过渡虽然打着革命的旗号，但是危害是很严重的。针对这情况，毛泽东提出要大家首先讨论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是否划一条界限的问题。

讨论这问题的目的，是为了刹住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左"的冒险倾向。党内外人士中普遍以为中国很快就要进入共产主义了，而且有的人公开提出，进人共产主义不是主要依据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是靠人的思想觉悟，更有甚者，有人认为先进入共产主义后再搞建设。

毛泽东看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在会上作了多次讲话，并领导大家展开了讨论，使与会者逐渐地认识到：建成社会主义应当有个标准。这就是全民所有制的全面实现，或者说在全国范围内全民所有制成份占绝对优势，才能说社会主

义建成了。所以只有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后，才能说建成社会主义。也只有社会主义建成后，才能向共产主义过渡。他在会上明确地提出了两个过渡的问题。即一是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二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与会者还认为，目前的人民公社是集体所有制性质的，而且是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不是共产主义性质的。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有一个历史过程，不是一下子能实现的。毛泽东说，在没有实现农村的全民所有制以前，农民总还是农民，他们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总还有一定的两面性。也就是农民既是一个集体所有者，也是一个个体私有者。这就是目前农民的两面性。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脱离较小的集体所有制，通过较大的集体所有制走向全民所有制，而不能要求一下子完成这个过程。这正如我们以前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脱离个体所有制走向集体所有制一样。

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的这些见解，对纠正“左”的错误起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刹住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共产风”起了决定性作用。

在会上，毛泽东带领大家读了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毛泽东说，这本书省委、地委的同志都要好好地读，都要研究，过去大家看了印象不深，现在应当结合中国的实际加以研究。根据书中的章节，毛泽东发表了不少评论。这些评论，不仅对当时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还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例如，在书中说生产资料不是商品。这是斯大林的一个重要观点。在苏联，主要是指斯大林时期，生产资料是不作商

品的。我国建国后,也采取了这个原则。但毛泽东说,这观点是值得研究的。在中国农业生产上有很多生产资料还应是商品。只要有两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存在,生产资料不可能不作为商品。我们当时采用了一个变通的办法:生产资料实行计划调拨,但用商品流通的原则进行结算。这在实践上否定了苏联的做法。现在,毛泽东又在理论上否定了这个原则。在当时能提出与斯大林完全不同的观点,这是很了不起的。社会主义各国的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仍然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阶段。而不是取消商品经济的阶段。其根本原因,是由于不同性质所有制的存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可能一下子变为单一的全民所有制的社会。特别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或社会主义制度刚刚确立以后的历史阶段中,不可能取消商品经济。

又例如,毛泽东认为,商品交换、价值法则,在我们生产中不起调节作用,起调节作用的是计划,但商品这形式还要保留下来。这个观点,应当作两方面评论:一方面这个观点体现了毛泽东还没有看到和估计到在社会主义时期还有一个商品经济大发展的历史阶段,商品交换、价值规律仍然起到调节生产、市场、消费的作用。还没有从根本上否定斯大林的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观点;但另一方面,毛泽东在当时社会上全面取消商品经济,并成为社会思潮,付诸实施的条件下,他公开提出保留商品经济是有极大的理论勇气的,对刹住"共产风"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人们的心目中,商品和资本主义是划等号的,保留商品经济就等于保留资本主义,这与大搞"共产主义"是背道而驰的。尽管这观点还不彻底,但在当时起了重大的作用。

又例如，毛泽东认为，资产阶级法权要破除一部分，但还有不少不能破除。当时，张春桥发表文章，公开鼓吹取消一切资产阶级法权。而毛泽东的观点不同。他是一个实事求是地对待问题的人。中国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资产阶级法权只能取消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必须在生产力发展后才能消除。他说还有不少不能破除。

毛泽东的以上论述，是针对当时在党内以陈伯达为代表主张取消商品、商品经济，取消价值规律，以及以张春桥为代表主张破除一切资产阶级法权等错误思想的。他们在提倡"共产主义"的幌子下，鼓吹极"左"思潮，主张穷过渡，提早进入共产主义。这种极"左"思潮不仅搞乱人们的思想，而且导致对生产力的极大破坏，因而必然引起毛泽东的重视。

毛泽东还说，现在有一种风气，觉得共产主义来得越早越好，有的提出3年5年就过渡到共产主义，山东范县提出4年过渡到共产主义。我看还是慢一点好。当时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一股社会风，刮得很凶，一般的人是不敢去刹的。可以说，如果不是由于毛泽东的反对，恐怕从1958年下半年起我国就要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我们也应指出，毛泽东的上述观点仍然属于传统社会主义观点。他主张的还是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的模式，而不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的模式。因此，他提倡商品和商品生产，提倡价值法则的应用，目的是为了利用商品经济，以发展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因此，他并不把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等同看待，或者是一个为主一个为辅看待的。他认为，进入共产主义要有步骤，不能一步登天；他反对急于过渡，反对太快，但他并不反对从当时就开始过渡。他在会上提出了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其

实，在当时把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与社会主义的建成混淆了起来。在1958年时，我国只是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提出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有极大的针对性。毛泽东认为：(一)社会主义建成的集中表现是实行社会主义的全面的全民所有制；(二)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只有达到了这两条，才标志着社会主义建成。这就告诉全党，目前我国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更不能立即向共产主义过渡。毛泽东说，目前有两种所有制，一种是鞍钢式的全民所有制，一种是公社式的集体所有制。这两者之间是有界限的。

毛泽东的上述意见，很显然是从生产关系，即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化上讲的，还没有从生产力，科学技术水平，劳动人民的文化素质上讲。之所以着重讲所有制，因为当时所有制正处在大变化过程中。因此毛泽东的这个讲法对制止所有制的急剧变化起了重要作用。

毛泽东的上述评论是面对社会的急于过渡的"左"倾思潮，在力排众议、独树一帜的情况下发表的。毛泽东的上述评论使与会者和党内外干部大吃一惊和耳目一新。他为了使全党都了解这个问题，认识这个问题，刹住"左"倾"共产风"，在11月9日写了《关于读书的建议》一文。这是他致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委、县委四级党委委员的公开信。这封信名义上是叫大家读书，但实际上是通过读书，纠正"左"的错误。他在信中说：

"不为别的，单为一件事：向同志们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斯大林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马恩

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确的（我以为这是主要的）；哪些说得不正确，或者不大正确；……读时，三人五人为一组，逐章逐节加以讨论，有两至三个月，也就可能读通了。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予澄清。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在最近几个月内，就是如此。他们在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者，一临到目前经济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了。现在需要读书和辩论，以期对一切同志有益。

为此目的，我建议你们读这两本书。……乡级同志如有兴趣，也可以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读这类书最有兴趣，同志们觉得如何呢？"①

毛泽东的这封信是针对着党内四级干部中存在的"左"倾思潮而写的。他带领大家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发表了一系列的谈话。这对于克服取消商品和商品经济、取消价值规律等思想起着重要的作用。

但是，毛泽东在会上对人民公社的评述仍然表现了"左"的观点。他认为，人民公社的性质是我国社会结构中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基层单位，既是基层的行政组织，又是经济组织，公社是实行两个过渡的最好形式，一是集体所有制向全面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第64～65页，1995年1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的全民所有制过渡，二是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将来过渡完了，公社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机构。实践证明，这些想法不但考虑得太早了，而且对公社的性质作了不切合实际的估计，是一种美化。人民公社与高级社比较，只有两点不同：一是规模大；二是政社合一。其它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毛泽东把它说成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中的基层组织，是一种横跨两个社会历史阶段的最好组织形式。所以他十分欣赏人民公社。他说人民公社好，必然使人民公社内部的"共产风"越刮越烈。对于这点，毛泽东在开第一次郑州会议时是没有察觉到的。

当然，第一次郑州会议的作用必须充分估计和肯定。这次会议是毛泽东自觉地起来纠正"左"倾错误的一个重要标志，同时也表明正当党内大批干部热衷于搞"大跃进"运动，头脑发热的时候毛泽东却冷静下来，看到了问题，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以力挽狂澜的勇气，站在山巅之上大喝一声：不能这样干！从而惊醒了在神州大地上盲目地向"共产主义"狂奔的人群。尤其是对党内的大批高级干部是一个极为深刻的教育。

诚然，在此时此刻，毛泽东的思想和认识与客观实际还有很大的距离。他还在肯定"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并把它树立为旗帜。然而，历史在前进，社会的各种矛盾不断地在暴露，毛泽东的思想认识也在变化和前进中。当时他虽然是一位老人了，但在认识社会问题时并不固执己见，而是不断地认识社会，以他自己的话说："不断地作检讨了。"

11.处理台湾海峡危机

解放台湾,统一祖国,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解放战争后期确定的一个基本方针,并视为人民解放战争和完成民主革命任务的最后一战。早在1949年3月15日,新华社奉命发表时评,宣布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绝不容许国民党反动派把台湾作为最后挣扎的根据地。按照毛泽东的设想,首先,组建海军、空军,掌握制海、制空权;其次,解放东南沿海诸岛,建立攻台的前沿基地;最后,实施渡海作战,武力解放台湾。1949年10月人民解放军三野的三个团登陆金门岛时,与国民党的三个军激战两昼夜,因后援不继,全部壮烈牺牲。因而,解放金门、台湾,"必须充分准备,周密部署,须有绝对的把握,再行发起攻击"。1950年5月,人民解放军三野成立了以粟裕为总指挥的前线指挥部,投入了3个兵团、12个军,共50万人的兵力作全面准备。同时,海军、空军也全面地投入了准备工作,计划在1951年春夏实施渡海作战。然而,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7月31日,远东美军司令麦克阿瑟抵台,与蒋介石达成"共同防卫协定"。这就成为解放台湾的最大障碍,从而使解放台湾的任务被搁置了下来,成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以及毛泽东等一项未完成的任务。

到1957年前后,根据国内的形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利用各种场合,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的建议和构想。1958年

夏，由于国际局势骤然变化，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利用当时的形势，以金门马祖为基地，企图“反攻大陆”，对大陆进行骚扰和破坏。对此，毛泽东认为，如果不予坚决的斗争，将会挫伤中国人民的志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为了反对美国侵略台湾、加剧远东紧张局势的阴谋、打击蒋介石的反攻政策，实施炮击金门。7月27日，毛泽东给彭德怀、黄克诚的一封信中说：

> 打金门停止若干天似较适宜。目前不打，看一看形势。……等彼方无理进攻，再行反攻。中东解决，要有时间，我们是有时间的，何必急呢？暂时不打，总有打之一日。彼方如攻漳、汕、福州、杭州，那就最妙了。这个主意，你看如何？找几个同志议一议如何？政治挂帅，反复推敲，极为有益。一鼓作气，往往想得不周，我就往往如此，有时难免失算。你意如何？如彼来攻，等几天，考虑明白，再作攻击。以上种种，是不是算得运筹帷幄之中，制敌千里之外，我战则克，较有把握呢？不打无把握之仗这个原则，必须坚持。”①

炮击金门的时间推迟了下来。8月18日，毛泽东决定发动打击。他在一个报告上给彭德怀作了这样批示：

“准备打金门，直接对蒋，间接对美，因此不要在广东深圳方面进行演习了，不要去惊动英国人。”

“请叫空司注意：台湾方面可能出动大编队空军向我反

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326页，1992年8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击，夺回金、马制空权。因此，我应迅即准备以大编队击败之。追击不要越过金、马线。”

8月23日开始炮击金、马。前后持续达两个多月的炮战、空战，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注意，成为瞩目的焦点。在这激烈复杂的斗争中，美国一方面支持蒋介石、承担台湾防空任务，为蒋军向金、马运补提供护航等；另一方面开始策划蒋介石采取撤退金、马，放弃金、马的策略。以进一步分裂中国的领土。对此，毛泽东十分敏锐地看出了这个阴谋企图，认为，台湾当局放弃金、马，势必造成台湾与大陆相隔更远，扩大台湾与祖国分离状态，不利于统一祖国，解放台湾。随即及时地调整对台湾政策。

10月5日，毛泽东写信告彭德怀、黄克诚暂停炮击金门。

“不管有无美机美舰护航，10月6、7两日，我军一炮不发；敌方向我炮击，我也一炮不还，偃旗息鼓，观察两天，再作道理。”

10月6日，由毛泽东撰写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其中最重要的有这几段：

“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金门战斗，属于惩罚性质。”

“台、澎、金、马是中国领土，这一点你们是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确实不是美国人的领土。台、澎、金、马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是另一个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也是你们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你们领导人与美国人订立军事协定，是片面的，我们不承认，应予废除。美国人总有一天肯定要抛弃你们的。你们不

信吗？历史巨人会要出来作证明的。……归根结底，美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共同敌人。”

“为了人道主义，我已命令福建前线，从10月6日起，暂以7天为期，停止炮击，你们可以充分地自由地输送供应品，但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如有护航，不在此例。你们与我们之间的战争，三十年了，尚未结束。这是不好的。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①

在《告台湾同胞书》中，明显地表现了毛泽东的一定要解放台湾、金门、马祖等岛屿的原则和灵活的斗争策略，及时地提出结束军事对峙，举行和平谈判，实施和平统一台湾的方针。这目的都是为了打击美国的侵略和战争的政策，并作出了暂不收复金、马，以达到联蒋抗美的目的。

10月13日，毛泽东再次以彭德怀的名义发表了《再告台湾同胞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其中有这样一段：

“自从美帝国主义占据台湾以来，形势已经改变了，美帝国主义成了我们的共同敌人。”

“我们建议：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全体军民同胞团结起来，采取坚定而又灵活的政策，减少你们的内部磨擦，一致对付民族敌人，你们的一位军事发言人说，停火七天太短，没有码头，全靠手搬，供应不了许多东西。这是实情。为此，我们决定，再停七十天，从本日算起。”②

① 《人民日报》1958年10月6日。
② 《人民日报》1958年10月13日。

10月25日，毛泽东又以彭德怀名义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再告台湾同胞书》。再次强调：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我们是一致的。美国人强迫制造两个中国的伎俩，全中国人民，包括你们和海外侨胞在内，是绝对不容许其实现的。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一切爱国者都有出路，不要怕什么帝国主义。当然，我们并不劝你们马上同美国人决裂，这样想，是不现实的。我们只是希望你们不要屈服于美国人的压力，随人俯仰，丧失主权，最后走到存身无地，被人丢到大海里去。我们这些话是好心的，非恶意，将来你们会慢慢理解的。"①

随后，福建前线部队对金门、马祖的炮击，出现了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单日炮击，双日停打；美国护航即打等局面。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也开始缓和下来。

对金门、马祖的炮击，除惩罚国民党反动残余势力，更重要的打击了美国的以台湾海峡划线，制造"两个中国"的企图，也表现了毛泽东卓越的政治远见和高超的斗争艺术，既有强硬的原则立场，又有机动灵活的斗争策略；既没有引起大规模的战争，又没有给自己造成被动。

这场斗争，很快成了世界瞩目的焦点。可以说，也超出了毛泽东的预料。尤其是对美国和苏联，反响十分强烈。当8月23日福建前线部队以19000发炮弹揭开炮击金门、马祖的

① 《人民日报》1958年10月26日。

序幕后，美国立即作出反映。从中东地区调来两艘航空母舰支援第七舰队。27日，艾森豪威尔 公开声明，行使《福摩萨决议案》，命令部队协防金、马，9月4日，美国宣布为台湾军舰护航；9月中，美国声称在台湾海峡地区已集结了战后以来美国在海外最大的原子打击力量。可见，美国把这次的台湾海峡紧张局势当作头等大事对待。

解放军炮击金门、马祖引起了前苏联赫鲁晓夫等的担心和害怕。在他看来，这次炮击金、马，会闯下大祸。赫鲁晓夫急派外长葛罗米柯等到中国，转告苏联对台湾海峡局势的估计，并商谈他对艾森豪威尔的信的问题。9月6日，葛罗米柯到达北京。周恩来与他进行了会谈。在会谈中，周恩来详细地介绍了我国对台湾海峡局势的分析和估计，阐述了我国的立场、原则和斗争策略。葛罗米柯表示赞同中国的立场、策略和做法。9月7日、19日赫鲁晓夫两次致信美国总统，呼吁美国政府采取明智态度，不要采取可能招致不可挽回的后果的步骤，也表示如果美国对中国实施核攻击，那么，将立即遭到应有的同类的武器的反击。

美苏如此看待台湾海峡局势，引起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和冷静分析。9月初，毛泽东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台湾海峡局势以及中美关系和对美政策的问题。作出了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决策。9月5日，周恩来发表了《关于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的声明》，表示中国政府准备恢复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9月8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讲话。同时对中美之间会不会爆发战争作了新的判断。毛泽东认为，目前世界形势是“东风压倒西风”，美国力量有限，对社会主义阵营取守势，所以中美之间“战争是打不起来

的”。事实正是如此,美国不仅没有部署打仗的计划,而且连许诺协防金、马的计划也遭到反对。就是美国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防部都向总统建议从金、马撤军。从而也促使了美蒋之间矛盾的发展和变化。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并没有演成中美之间的战争。这是毛泽东指挥若定,正确分析形势和实施措施得当的结果。实现统一祖国,台湾回到祖国怀抱,一直是毛泽东所要实现的一项重大任务。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的缓和,并不意味着台湾问题很快能解决,这在毛泽东看来,还要等待时机,创造条件,才能实现这个艰巨的任务。

作为伟大战略家的毛泽东,总是在不断地思考如何解决台湾的问题。1959 年 2 月毛泽东又提出许多重要的思想。他提出,在台湾还是蒋介石当总统好。在国际场合,只要有蒋介石集团参加,我们就不去。台湾问题,等他 10 年、20 年会起变化的,给他饭吃,可以给他一点兵,让他搞三民主义。历史上的应当否定的,都要作恰当的估计,不能否定一切。否定一切的结果,都是毁了自己;台湾如果回归祖国,照他们自己的方式生活。蒋可以到大陆来,来了就是大贡献,就是美国的失败;关于军队,可以保存,我不压他裁兵,不要他简政,让他搞三民主义。① 在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到毛泽东解决台湾的问题,已开始作多方面准备了。2 月 27 日,毛泽东会见摩洛哥共产党代表团时曾谈到:现在我们又讲跟蒋介石合作,他说不干,我们说要合作共同反美,他不干,我们说总有一天美国要整他,总有一天美国要承认我们,丢掉他。蒋介石不懂得这一点。我们搞第三次合作,他通过秘密的间接的方法跟我们联

① 《党的文献》1994 年第 1 期。

系，分开不敢，怕美国，而我们不怕。[1] 为实现国共再次合作，毛泽东又采取了一系列重要决策。其中有：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这是有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使他们感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改恶从善，都有自己的前途。9月17日，二届人大常委会第9次会议通过了《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决定特赦33名战犯，于12月4日执行。在这批战犯中，原属于蒋介石集团的有30名。12月14日，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了刚被特赦的杜聿明等11人。在这11人中，除溥仪、陈长捷、卢俊泉外，其余都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周恩来在接见时发表了重要谈话，要他们站稳民族立场，热爱新中国。在谈到台湾问题时，周恩来说：

"民族立场很重要，我们对蒋介石还留有余地，就是因为他在民族问题上对美帝国主义还闹点别扭，他也反对托管，反对搞两个中国。今天美帝国主义要把侵占台湾合法化，想把金门、马祖给我们，把台湾、澎湖留给自己，把蒋介石搞掉。我们认为台、澎留给蒋介石比留给美帝国主义好，将来这些地方总有一天会回到祖国怀抱。两害相权取其轻，我们不给美帝国主义以机会。在这里我们实际上支持了蒋介石。正如章行志所说'现在真正支持蒋介石的是北京'。我们希望蒋介石、陈诚、蒋经国

[1] 《军事历史》1994年第2期。

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总之，要坚持民族立场。祖国的领土是完整的，不容许帝国主义分割，损害我们的一根毫毛也不行。与台湾有联系的，可以做点工作。但写信也不要太急，不要挖苦，要以民族利益为重。工作要从长计议。"①

从1959年到1966年的8年中，共特赦了6批战犯，其中属于国民党战犯有263名，使昔日战场的敌人，成为推动祖国统一的重要力量。

进入60年代，毛泽东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1960年5月2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和制定了关于台湾问题和对台工作的总方针：台湾宁可放在蒋氏父子手里，不能落到美国人手里。对蒋介石我们可以等待。解放台湾的任务不一定要我们这一代完成，可以留交下一代去做；现在要蒋过来也有困难，问题总要有这个想法，逐步到创造条件，一旦时机成熟就好办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出的上述思想，后由周恩来归纳为"一纲四目"方针。一纲是：只要台湾回归祖国，其他一切问题悉尊重台湾当局意见妥善处理。四目是：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由蒋决定；所有军政及建设经费不定之数，由中央拨付；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协商解决；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不久，周恩来又请有关人士转告陈诚，台湾回归祖国后，可行使更大的自治权利，除外交以外，军队、人事均可由台湾朋友自己来管。同时

①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397－399页，1984年1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

还一再表示：台湾当局只要一天住台湾，不使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大陆就不改变目前对台湾的关系。

从1958年实施金门炮战以来，毛泽东以及中共中央对台湾问题的解决和实现祖国的统一方针已有了极大的发展。由于历史原因毛泽东，周恩来等第一代中共领导人确实没有也不可能完成统一祖国的任务。尤其是后来“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爆发，出现了对台工作的停滞与曲折的状况，更不可能在毛泽东手中解决台湾的问题。但是，他们在50年代到60年代期间提出的和平统一台湾的思想和方针，是十分正确的。历史的契机一定会到来，台湾回归祖国是历史的必然，尤其是邓小平提出了“一国两制”思想后，为和平统一台湾创造了更现实的条件。海峡两岸人民一定会沿着邓小平指出的方向发展前进，实现祖国统一的历史任务。

12.提出不当国家主席候选人

要刹住1958年中国急于奔向“共产主义”的历史巨轮是很不容易的。摆在毛泽东面前的任务是广泛而艰巨的。他不仅要召开一个又一个的会议，使全党的行动重新纳入科学社会主义的轨道，而且还要提出正确的思想理论，武装全党和全国人民，统一思想，才能克服“大跃进”运动中的“左”倾思潮，使中国的社会稳定下来。

毛泽东在开完第一次郑州会议后，急匆匆地到了武昌。于11月21日至27日，接着第一次郑州会议的内容，召开武

昌会议，为继续刹住“共产风”而努力。

这次会议除部分中央领导人参加外，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都参加了会议。

在会上，毛泽东讲了许多重要问题。

其一，不能把科学当作迷信破除掉。毛泽东在会上说：

“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作迷信破除掉。凡是迷信一定要破除，凡是真理一定要保护。必须老老实实，不要弄虚作假。现在的严重问题，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者相信，这就危险。北戴河会议关于公社化的文件有缺点。这就是关于过渡的年限规定得快了一点。这是受河南的影响。我以为北方少则3年、4年，南方多则5年、6年，可以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但实际上是办不到的。因此这个文件要改一下。现在的问题就是太快，看来过渡的时间还是长一点好。又说，现在要压缩空气。北戴河会议对明年钢产量定为2700万吨到3000万吨，这是办不到的，要压下来。1800万吨是有把握的。”

其二，要发展商品生产。毛泽东在读书时说：

“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有几十万人想不要商业了。我

们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表现得更“左”，主张现在就消灭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违反客观规律的。他们没有区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差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利用商品生产的重要性，不懂得社会主义的现阶段，价值、价格和货币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的积极作用。这些表明，他们根本不认识无产阶级对五亿农民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直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前，我们利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来团结几亿农民；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还要利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来团结五亿农民。有了人民公社，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有计划地发展。例如，畜产品、大豆、黄麻、肠衣、皮毛等等，都要发展。如果不实行商品交换，把陕西的核桃拿来吃，一个钱不给，陕西的农民干吗？把七里营的棉花无代价地调出来行吗？你如果这样做，马上就要打破脑袋。

现在，我们的国家只占有了一部分生产资料，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就想立刻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制，想废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实行物资调拨，这样做，就是剥夺农民。”

这段话虽然是毛泽东在1958年讲的，但经过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证明，不仅是很正确的，而且有相当的科学预见性。

其三，不能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毛泽东指出：

"书(《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里面提到两种基本形式,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这个界限必须分情,不能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又是一个界限,也必须分清,不能混淆。"

"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要不要划一条线?有的同志不赞成,说不能划一条线,说划了线就会损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大线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小线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秀才不赞成划这两条线,是不是秀才要造反?"

毛泽东在历史关键时刻明确地指明了上述理论和实践的问题,为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召开作了充分准备,也制止了急于过渡的"共产风"。这是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到武昌会议期间所作的贡献和努力。

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昌召开了八届六中全会。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人民公社问题、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以及由毛泽东提出的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问题。

毛泽东主持了这次中央全会,并作了两次讲话。一次是讲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由此讲到一个人的头脑要冷又要热。这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他说:

"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意做分析，只爱热。同志们，这种态度是不利于做领导工作的，他们可能跌筋斗，这些人应当注意提醒一下自己的头脑。另有一些人爱冷不爱热，他们对一些事，看不惯，跟不上。对这些人，应当使他们的头脑慢慢热起来。"①

毛泽东对党内两种人都作了批评，一种是头脑发热的人，一种是头脑太冷的人。当时，党内的主要倾向是头脑发热，只有冷下来，才能使领导工作逐步地纳入正确的轨道。但是，毛泽东对所谓"观潮派"、"秋后算帐派"，所谓"头脑太冷"的人的批评就不正确了。当时这部分人基本上是实事求是派，他们讲真话，不讲假话；办实事，不搞浮夸，这些人不是头脑太冷，而是正确地对待"大跃进"运动的人。

在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对人民公社化运动作了充分的肯定。他说：

"人民公社的出现，在成都会议和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是没有料到的。其实，4月的时候在河南已经出现，5、6、7月中，我们不知道，到8月才发现。北戴河会议作了决议。这是一件大事。因为找到了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式，便于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也便于由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便

① 《人民日报》1977年9月11日

于工农商学兵相结合，规模大，人多，便于办很多事。”

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上还为找到人民公社这个形式而十分高兴。在这时，他还没察觉到人民公社的制度已远远地脱离了中国农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农民群众的政治觉悟程度，不适当地强调“一大二公”的特点。他在会上着重批评的是浮夸风和高指标，而没有批评人民公社内部还存在着“共产风”的问题。他说，犯错误的干部，主要是强迫命令，讲假话，以少报多，这是很危险的。他严厉地批评了干部中的强迫命令作风。他说，对一部分违法乱纪的干部，经过辩论，区分情节，给予轻重不同的处分。如果不这样做，会挫伤群众的热情。有的情节很恶劣，如打人、骂人、押人、捆人，要给予处分。湖北已撤了一个县委第一书记的职务。此人在旱情严重时，没有抗旱，而谎报抗旱。这样处理，保护了干部和群众的热情。

在会上，毛泽东对“苦战3年基本改变全国面貌”的口号作了评述。他首先提出，这个口号提得是否适当，3年办得到还是办不到？在他看来，是很难办到的。他说，这个口号首先是河南的同志提出来的，后来在南宁会议上接受了这个口号，那时指的是农村，后来推广为苦战3年改变全国面貌。农村也许能办到，至于全国，到底提几年，要好好考虑。

在会上，讨论制定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把毛泽东自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提出的思想写了进去。在决议中有这几段话，充分地表达了毛泽东的意见：

“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相当复杂的发展过程，而在这整个过程中，社会的性质仍然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是经济上发展程度不同的两个阶段。社会主义的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共产主义的原则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企图过早地否定按劳分配的原则而代之以按需分配的原则，也就是说，企图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勉强进入共产主义，无疑是一个不可能成功的空想。”

“无论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因此，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首先用大力实现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而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的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等等。那样作，不仅是一种轻率的表现，而且将大大降低共产主义在人民心目中的标准，使共产主义伟大的理想受到歪曲和庸俗化，助长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倾向，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

“在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在社会主义阶段上停止不前，但是也不能陷入超越社会主义阶段而跳入共产主义阶段的空想。”①

① 《人民日报》1958年12月19日。

上述决议的制定和贯彻，在人民公社成立后刮起的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共产风”基本上刹住了，并明确地提出了这两个过渡是一个很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的。对于这点，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得到了基本的统一。

在会上，毛泽东再一次讲了他不当下一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问题。他提出，这次全会要做个正式决议，并希望同志们赞成。他要求在三天之内，省里开一次电话会议，通知到地、县和人民公社，三天之后发表公报。以免下边感到突如其来。他又说，世界上的事就这么怪，能上不能下。估计到有一部分人赞成，一部分人不赞成。群众不了解，说大家干劲冲天，你临阵退却。要讲清楚，不是这样，我不是退却，要争取超英后才去见马克思嘛！

1958 年 12 月 10 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六中全会作出决议，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18 日，《人民日报》公布了这个决定。引起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强烈的议论。决定中写着：

“几年以来，毛泽东同志曾经多次向中央提出，希望不再继续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职务。中央全会在经过了充分的、多方面的考虑以后，决定同意毛泽东同志这个提议，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不再提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候选人。中央全会认为，这完全是一个积极的建议。因为毛泽东同志不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专做党中央的主席，可以使他更能够集

中精力来处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路线的问题，也有可能使他腾出较多的时间，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工作，而并不妨碍他对于国家工作继续发挥领导作用。这样，对于全党和全国人民都更为有利。毛泽东同志是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的久经考验的领袖，在他不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以后，他仍然是全国各族人民的领袖。在将来，如果出现某种特殊情况需要他再担任这种工作的时候，仍然可以根据人民的意见和党的决定，再提他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各级党委应当根据这些理由，在党的适当会议上，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在工矿企业工人的集会上，在人民公社的集会上，在机关、学校、部队的集会上，向党内党外的干部和群众进行充分的解释，以便大家了解这件事的理由，而不致有所误解。"①

上述决定公布后，党内外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大家逐步地认识到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决定是正确的。在决定中，一方面表述了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是很合适的，但另一方面也并没有把他看作为全党和全国只有他才能担当国家主席。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也只能是一个历史时期。对于这点，经过讨论，广大干部和群众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在中国人民中，也有不少群众，仍然希望毛泽东继续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职务。在党中央作出决定后，也一致地同意和服从了。

1959年4月18日至27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会上，选举了刘少奇担任中华人

① 《人民日报》1958年12月18日。

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只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等职务了。而且一直到毛泽东去世，也没有再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

毛泽东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这在人民群众的观念上是一次突破。因为，在历史上，无论哪一位领袖人物，他只能代表一个历史阶段，或一个时代，而不可能永远地代表下去。如果没有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那就不可能造就一代又一代的领袖人物。再者，一个领袖人物担任党和国家职务中实行的是终身制，那么，到一定时候，会暴露出来严重的弊端。特别是在接班人问题上，更表现得突出。这个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党的八届六中全会除作出上述决定外，在毛泽东的主持下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把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讨论人民公社问题的一些重要思想和观点，都写了进去。这是有重大意义的。

例如，在决议中提出了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标准问题。这些标准经历史考验，显然是不确切或不全面的，只有将来的社会实践作回答。但是，提出这些标准对当时来说是有重大意义的。当时提了这些内容作为社会主义建成的标准：实现社会主义的全面的全民所有制；实现国家工业化、公社工业化、农业电气化、机械化，钢的年产量至少在1亿吨以上，彻底地解决人民群众的衣、食、住问题，达到郑州会议上所设想的基本生活资料消费水平，建立居民点，解决住宅问题；实现6小时工作制；普及中等教育，使有条件的人都能受到高等教育；基本上消灭了阶级；人民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和道德品质的大大提高。这些条件提得是否正确，由实践去回答，这里姑

且不论。但当时提出这些条件起到的作用是：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目前离建成社会主义还有极大的距离，绝不能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过早地宣布社会主义的建成。

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发表了《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的谈话。这是他在新形势下再次精辟论述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战略战术思想问题。

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中有不少精采文字。例如："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只有生产力发展到某种状况才会引起生产关系的某种变革，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同志们要记着，我国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毕竟还是很低的。苦战3年，加上再努力若干年，全国的经济面貌可以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但是那时离开全国高度工业化、全国农业机械化电气化的目标，还将有一段不小的距离；至于离开社会产品大大丰富、劳动强度大大减轻、劳动时间大大缩短这些目标，就还有一段更长的距离。而没有这些，当然就谈不到进入人类社会的更高发展阶段——共产主义。"

以上所述充分说明，无论毛泽东或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经过两个月的学习思考，对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以来在"大跃进"运动中提出的问题，已有了较深刻的认识。全党一致认识到：生产力的发展及其水平，是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唯一条件和基础，而现在我国社会生产力还是很低的，没有这个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条件是不可能完成过渡的。因而刹住了急于进行这两个过渡的"共产风"。这是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所取得的成绩，也是毛泽东在这历史性时刻所作出的贡献。至于人民公社内部的"共产风"，当时毛泽东还没察觉到。

13.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

1959年春,有两件事使毛泽东感到震惊。第一件是,1958年农业生产大丰收,各省市上报的粮食数字都很大,然而有不少省市粮食收购任务完不成,还说没有粮食,这是什么原因呢?第二件是,从中央到地方都在批判地方主义、本位主义思想,其声势之大,在历史上是少有的,然而在生产队中瞒产私分现象十分普遍,生产队长把粮食藏在地窖内,派民兵站岗放哨,不让公社、县里拿走,这又是什么原因呢?为弄清这两个问题,毛泽东深入调查研究,终于发现了真正的原因。毛泽东认为主要是人民公社内部还存在着严重的"共产风"。这是在1958年11月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时是没有认识到的。

为纠正人民公社内部的"共产风",毛泽东于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主持召开了第二次郑州会议。这是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中央的20人,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27人。会议讨论的虽然仍是人民公社的问题。但主要是解决公社成立后发生的生产队之间、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即公社内部的"共产风"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不仅人民公社不能巩固,而且农村还会出现许多乱子。

毛泽东在河北、山东、河南等省的调查中,发现公社成立后在公社内部把生产队之间的穷富拉平了。他与河南的新乡、洛阳、许昌、信阳等4个地委的负责干部座谈时指出,目前人民公社究竟是社所有制还是队所有制?毛泽东认为,各地

生产力水平不同，有穷队和富队之别，现在采取拉平办法，这实际上是一种掠夺，是一部分人无代价地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成果。

毛泽东发现了这个问题后，所以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中大声疾呼地警告大家：

> “现在我来说一点人民公社的问题。我认为人民公社现在有一个矛盾，一个可以说相当严重的矛盾。这矛盾还没有被许多同志所认识，它的性质还没有被揭露，因而还没有被解决。而这个矛盾我认为必须迅速地加以解决，才有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更高的积极性，才有利于改善我们和基层干部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矛盾呢？大家看到，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突出的现象是在1958年农业大丰收以后，粮食、棉花、油料等农产品的收购任务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再则全国（除少数灾区外）几乎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1953年和1955年两次粮食风潮都有过之无不及。同志们，请你们想一想，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认为，我们应当透过这种现象看出问题的本质，即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这里面有几方面原因。但是我以为主要地就应当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寻找答案。”①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第125～126页，1996年5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毛泽东的这段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人民公社内部“共产风”的原因。一是公社内部的所有制，强调公社所有或大队所有，但这规模太大，一个公社有几百个大队，一个大队有几十个小队，统一以公社或大队核算，必然把几百个队或几十个队之间穷富拉平了。而在实际中，有穷队和富队、穷村和富村之别，统一核算，等于穷队穷村无偿地占有富队富村的劳动成果，这样必然造成矛盾，使富队富村在经济上受到损害，影响富队富村社员的积极性；二是在公社内部实行的分配政策，名义上是按劳分配，实际上搞平均主义，刮“共产风”，劳动好的收入并不多。从这两方面看，人民公社目前在管理体制上仍然有着严重的问题。毛泽东对人民公社的认识，比第一次郑州会议时要深刻和全面得多了。他看到了问题所在及其严重性，不是像第一次郑州会议时那样完全肯定它。他要对人民公社内部的管理体制，加以调整、缩小，使之适合于农村生产力水平及农民要求。

毛泽东认为，从公社的体制上说，现在有许多人还不认识公社所有制必须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公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要有几年时间才能完成。有些人误认为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误认为按劳分配就是按需分配，误认为集体所有制就是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穷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

款”，引起了广大农民很大的恐慌。这是目前我们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毛泽东认为，党的八届六中全会所通过的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虽然写明了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经过的发展阶段，但是，没有写明公社的集体所有制的建立也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不是一下子就建立起公社全民所有制。这是一个缺点。因为那时我们还不认识这个问题。这样，下面的同志也就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模糊了，实际上否认了目前还存在于公社中并且具有极大重要性的生产队的所有制，而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广大农民的坚决抵抗。从1958年秋收以后，全国性的粮食、油料、猪肉、蔬菜短缺风潮，就是这种反抗的集中表现。所以，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一方面是，中央、省、地、县、社五级党委大批生产队、生产小队的本位主义、瞒产私分；另一方面是，生产队、生产小队都几乎普遍地瞒产私分，甚至把粮食藏密窖，站岗放哨，以保卫他们的劳动成果。因此，我们要批评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倾向，批评否认生产队和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的倾向。否认这种差别，就是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否认生产队的所有制，任意把生产队的财产上调到公社来，这就不能不引起各生产队和社员的不满。

毛泽东主张坚决地纠正平均主义和权力、财力、人力过分地集中于公社一级的状态。要承认队与队、社员与社员之间的收入要有合理的差别；公社应当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并且以队的核算为基础；在公社与生产队、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要实行等价交换；公社的积累应当适合具体情

况，不要太高，必须坚决克服公社管理中的浪费现象。公社中的“共产风”主要内容为：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了各种产。这样就在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人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这是不许可的。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我们没有采取无偿剥夺的办法，而是实行赎买政策。那么，我们对于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又怎么可以无偿占有呢？

毛泽东的上述主张是正确的。他看到了公社内部“共产风”的本质。公社内部的“共产风”是在共产主义旗帜下的掠夺现象。对农村生产力是一种破坏。但是，当时毛泽东还不主张算旧帐，即对以前的一些帐目认为过去的就算了，也就是拉平的就拉平了。所以他说，我们指出这点，是为了说明勉强把穷富拉平，任意抽调生产队的财产是不对的，而不是要在群众中提倡算旧帐。相反，我们认为旧帐一般地不应算。这个意见是不正确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使一部分富队富村的财产被另一部分穷队穷村平均去了，这就使一部分富队富村的社员不满。

毛泽东认为，采取上述方针和办法，我们目前同农民和基层干部的关系一定会很快地改善。他认为，农民在公社化运动中和“大跃进”中得到了巨大的利益，所以农民一定要求继续“大跃进”和巩固人民公社制度。他再次批判了“观潮派”和“秋后算帐派”。他认为，“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成绩是主要的，推翻不了的，群众是亲眼看到的。缺点也是有的，但只是10个指头中的1个指头的问题。这缺点在公社化中是难以避免的。现在克服了缺点，主动权在我们手中了，群众一定会同我们站在一起的。当然，也有地、富、反、坏起来破

坏，这个不可怕，各级领导应该沉得住气，在一段时间内不声不响，硬着头皮顶住，让他们充分暴露出来，广大群众是一定能分清是非、分清敌我的。

毛泽东对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前景是十分乐观的。他认为，经过对人民公社的整顿和巩固的过程，党同群众和基层干部的团结更为紧密，5亿农民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一定更加心情舒畅，充满干劲。我们一定能够在1959年实现更大的跃进，人民公社的事业一定能够在巩固的基础上蒸蒸日上，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毛泽东对人民公社内部的"共产风"是十分重视和急于纠正的，因为这关系到1959年农业的发展能否继续跃进。所以，他十分重视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的贯彻。为此，他连续写了好几个党内通讯，为促进农村形势好转而努力。3月9日，毛泽东写了第一个党内通讯和对河南省委关于执行郑州会议的指示的简报作了批示。他认为，贯彻郑州会议指示在省里要召开六级干部会议，在县里召开四级干部会议，省的六级干部会议以10天左右为宜。3月11日前后开会是适当的，开迟了，不利，时间太短，对问题的分析、揭露和讨论，势必不充分，解决得不深透。各省、市、自治区的第一书记要作总[illegible]

方针即刻放下去，三几天内就会将大小矛盾轰开，就会获得多数人的拥护。我们取得主动，观潮派算帐派无话可说，当然会有一部分人想不通，骂我们开倒车。这些人会有几天睡不好觉，吃不好饭，但也不过几天而已。三几天后，就会想通的。总之，慢了不好，要快。

为什么要快呢？因为矛盾已经找到了，方针政策已经有了。不必再从头去做调查了。大会一开，把方针一放，立即轰开，情况暴露，这就是最好的调查。很多同志做了几个月的调查，开过不少的大会小会，结果对大量存在的事物，却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原因是方法不对，找不到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大家都读过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办起事来却在长时间内不认识公社集体所有制要有一个由小到大，由量到质的变化过程，几乎普遍否认价值、价格和等价交换的经济法则，这不是很奇怪吗？但却是事实。在公社内部否认了等价交换，则必然乱起来。对于这点，不少干部是没有认识到的，也就找不到解决公社问题的办法。

毛泽东常说，情况明，决心大。毛泽东的上述讲话充分表现了他对公社问题的看法，以及所下的决心。他要求大张旗鼓地召开干部会，以最快的速度解决公社内部的“共产风”。

3月10日，毛泽东又到了武昌。到15日，他看了湖北召开六级干部会议的材料以及一些省、市、自治区的报告，又写了第二个党内通讯，主要讲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这可以说，他已抓到了公社中最重要的问题了。他在第二个党内通讯中说：

"我……觉得有一个问题需要同你们商量一下。河南……主张以生产大队为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和分配单位，在湖北……主张坚决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广东……以原来的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湖南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究竟哪一种主张好呢？湖北正在辩论，两派意见争论激烈，大体上是县委和公社党委、大队的同志主张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的支书绝大多数或者全体主张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我感觉这个问题关系重大，关系到3000多万生产队长等基层干部和几亿农民的直接利益问题。采取河南、湖南的办法，一定要得到基层干部的真正同意，如果他们觉得勉强，则宁可采用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不至使我们脱离群众，而在目前这个时期脱离群众，是很危险的。今年的生产将不能达到目的。河南虽然已经作了决定，但仍请省委同志在目前正在召开的县的四级干部会议上征求基层干部意见。如果他们同意省的决定，就照那样办，否则不妨改一改。《郑州会议纪录》上所谓队为基础，指的是生产队，即原高级社，而不是生产大队。总之，要按照群众意见办事。无论什么办法，只有适合群众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则终究是行不通的。"①

在这个通讯中，毛泽东主张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这是符合基层干部要求的。在这里他看到了所有制变化太快、变得太大，会脱离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的严重性，所以他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第148～150页，1996年5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主张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要求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退下来，明显地表现了他的群众观点和实事求是的精神。

3月17日，毛泽东又写了第三个党内通讯。对县召开四级干部大会和人民公社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发表了意见。

3月29日，毛泽东又写了第四个党内通讯，明确指出凡属大政方针的制定和贯彻一定要征求基层干部的意见。

毛泽东连续写了四个党内通讯，才使郑州会议精神迅速得到贯彻，才使农村形势基本稳定下来。

在贯彻郑州会议纪要中，毛泽东又发现了不少问题，使他的看法有所改变。例如关于旧帐算不算的问题。在第二次郑州会议时，毛泽东主张不算旧帐，认为过去高级社旧帐在成立公社后，统统归在公社的大帐上了。这样穷的大队共了富队的产。到3月30日，毛泽东对《陶鲁笳同志关于山西省各县人民公社问题五级干部会议情况的报告》的批语和4月3日对《麻城县万人大会第二次报告》的批语，以及4月3日对谭震林的信的批语，已改变了他的看法，主张要算旧帐。他认为，算帐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算帐才能团结，算帐才能帮助干部从贪污浪费的海洋中拔出来，一身干净。算帐才能教育干部学会经营管理方法。算帐才会教育5亿农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公社，监督公社的各级干部只许办好事，不许办坏事，实现群众的监督，实现真正的民主集中制。5月可以召开社队代表大会，彻底解决3月会议没有解决的权力下放，算清帐目、包产指标三个

问题。就算帐这个问题来说，3月的省、县大会我们缺乏精神准备，郑州会议说的是一般不算，应翻过来，一般要算。有些省已经翻过来了。

他的认识为什么有这个转变呢？从不算到算帐首先是由于认识的变化。毛泽东说，这是最近才提出来的，才进入我们认识领域的。也就是说，过去没有认识到。所谓算帐，主要是算两方面的帐：一方面是，县和社两级向生产队算清过去几个月大抓大调的帐，解决大集体与小集体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是，生产队干部和生产小队干部与全体社员群众之间的帐，这是解决小集体与社员之间的矛盾。麻城县召开万人大会，解决干部贪污的问题，这是无偿地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问题。这个问题当时是很普遍的，也是一个历史问题。只有通过算帐，才能彻底解决。

到1959年4月初，毛泽东对人民公社的认识，可以说比过去更具体，更深刻了，发生了一次大的飞跃，过去完全肯定的劲头没有了，凡事作具体分析了。当然，在总的方面，他还认为人民公社是一个创造，是一面红旗，是"大跃进"的产物，不能否定。但是，人民公社成立只有几个月的时间，最早的也不过一年，人民公社作为乡村的政治、经济的模式，是否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是否适合中国的国情等问题，还没有经过较长时间的实践检验，毛泽东也没有考虑和论述这个问题。他虽然费尽心机，付出最大的努力，想把人民公社巩固下来，然而人民公社并不适合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最后的结果还是要改变的。事实不是这样吗？凡是不适合的，尽管经过了几十年，还是要被实践纠正的。特别是人民公社成立后，始终没有克服分配中的平均主义，没有能使农民的积极性充分地

调动起来，人民公社的体制日益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使农业生产长期处于缓慢发展中，这就决定了人民公社终会有一天退出历史舞台。

14. 要多谋善断

1959年3月25日至4月1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形成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的会议纪要，准备提交给党的八届七中全会讨论。在纪要中，把第二次郑州会议以来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若干原则作了规定。接着，于4月2日至5日，党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八届七中全会。会议对"大跃进"以来的"左"倾错误继续进行了纠正。

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讲了9条意见。这9条意见，有的是工作方法问题，但不少是党的工作原则。第一条是讲多谋善断。他认为，多谋善断，重点在谋字上。要多谋，少谋不行。要与多方面商量。要反对少谋武断。多谋，过去往往与相同意见谋得多，与相反意见谋得少；与干部谋得多，与生产人员谋得少。商量又少，又武断，那事情就办不好。谋是基础，只有多谋，才能善断。多谋的方法很多，如开调查会、座谈会。谋的目的是为了断。

毛泽东为什么强调多谋善断呢？主要是针对党内严重存在的主观主义，特别是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有不少人主观武断而言的。有的人对继续纠正"左"的错误表示反对。他们

不愿意压低1959年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认为纠"左"已有半年多了，再纠下去会给群众泼冷水，会给"大跃进"运动抹黑，而且右倾大有抬头之势。对这部分人，在毛泽东看来，他们是缺乏谋断的。纠"左"是为了更好地"大跃进"。如果3月把人民公社问题解决，那4月以后就可以"大跃进"了。毛泽东决定在4月上旬召开党的八届七中全会，讨论通过关于人民公社内部政策问题的文件，以便使公社早日走上正轨，早日继续"大跃进"。在会上，这部分人的意见与毛泽东的看法不同。对于压低1959年的工农业生产的指标，那更有不同的意见了。

毛泽东又讲了留有余地的问题。他认为，这不仅是个工作方法问题，而且也是个政策问题。在安排工作计划时，要留有余地，给下面有点积极性。不给下面留有余地，也就是不给自己留有余地。留有余地上下都有好处。如农村包产，指标定为2000斤，这就没有余地了。过去打仗留预备队，现在搞生产忘掉了。计划工作一定要留有余地，不能满打满算。保证重点是重要的，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我们要按政策办事情。

在这次会议上，不少人仍然主张高指标。不愿意把指标压下来，而且持这种意见的人还占了上风。最后在公报中仍然这样说："全体会议经过充分的讨论，通过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这个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是根据八届六中全会提出的钢产量1800万吨、煤产量3亿8千万吨，粮食产量为10500亿斤，棉花产量1亿担这四大指标和今年第一季度生产和建设情况编制的。这个计划草案的编制，对于我国物质技术条件的客观可能性和人民群众的革命干劲的主观能动性都

作了认真的考虑。这是一个能够实现国民经济继续大跃进的宏伟计划。"①

对于这个计划,在八届七中全会的公报中还说中央委员会深信,这个计划是能够完成和超额完成的。但是,这个"宏伟计划"仍属于高指标的。特别是粮食和棉花的产量不仅在1959年实现不了,而且即使经过30年以后的现在,还达不到这个指标。

在这点上,毛泽东是有不同看法的,但他也没有坚决地阻止这个"宏伟计划"的通过。以他的话说,搞大计划的人占多数。所以,他作了让步,只讲工作方法的问题。现在看来,当时能制止高指标的只能是毛泽东,然而他没有这样做。

他在会上的讲话中,要求大家善于观察形势,要当机立断,要与人通气,要集中,要写让人看得懂的文件。他还特别讲了多数与少数人 的关系问题。他强调有时候一个人胜过多数,因为真理往往在他一个人手里。如马克思,真理就是在他一个人手里。列宁讲,要有反潮流精神。各级党委要考虑多方面的意见。要听多数人的意见,也要听少数人的意见或个别人的意见。因为真理往往不在多数人手里,而在少数人手里。毛泽东的这段话,显然是在保护和支持少数人的意见。尽管如此,党的八届七中全会没有把高指标压下来。从这意义上说,这次会议没有达到毛泽东的预期目的。当然,毛泽东所以没有坚决地阻止高指标,从他的思想上说,他还是主张搞"大跃进"运动的。

党的八届七中全会虽然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

① 《人民日报》1959年4月5日。

问题》的会议纪要，但是公社内部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尤其是通过了1959年农业生产的高指标后，各地又开始了组织农业的“大跃进”运动。然而1959年4、5月的情况与1958年不同，在粮食、农副产品，以及市场供应情况上开始了全面紧张。对于这点，毛泽东是感觉到了的。

4月29日，毛泽东又写了第五个党内通讯。这是就农业问题写给全国省委级、地委级、县委级、公社级、大队级、生产队级干部们的一封公开信。信中详述了包产问题、密植问题、节约粮食问题、增加播种面积问题、机械化问题、讲真话问题等6个问题，或叫6件大事。他说，我这封信：

>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①

毛泽东的信确实是低调的。也许在一些人看来是在泼冷水。

> “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300斤的，今年能增产100斤、200斤，也就很好了。

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第283～286页，1996年5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吹上800斤、1000斤、1200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

1958年“大跃进”中的高指标，浮夸风，使国家、集体、个人都吃了亏。所以，毛泽东坚决地反对浮夸风。他提倡大家讲真话，不要讲假话。他说：

“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①

毛泽东的上述评述击中了当时党内干部中存在的要害问题。1958年“大跃进”以来，所谓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浮夸风，实际就是从上至下或从下至上讲假话的结果。也是层层压出来的，省压县，县压公社，公社压生产大队，结果假话成风。实际上讲假话，首先把国家害苦了，损害了党的威信，丢掉了实事求是的作风，其次人民也害苦了，吃了浮夸风的亏，弄得粮食不够吃。毛泽东对此很不满意，因此他提倡反潮流精神，反掉这种恶劣的作风，提倡听取少数人的意见。

1959年上半年，我国粮食供应已显紧张。其原因是多方

面的。1958年公社化运动后提倡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连续吃了几个月，把粮食吃掉了；1958年的粮食丰产，但由于缺乏劳动力，不少粮食没有收回来，粮食的实际产量远没有估计的那么多；又提倡密植，留足种子粮，到1959年时把种子粮也用了。所以粮食供应出现紧张情况。针对这情况，毛泽东在这封信中说：

> "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蕃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6亿5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② ①

从上述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当时还是比较冷静地看待社会问题的。尤其是对粮食的估计还是比较正确的。这些话一方面说明毛泽东对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提倡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的现象给予了彻底的否定，这类事不仅在1958、1959年时办不到，即使几十年以后也办不到。人民公社化后提倡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是干了件蠢事。另一方

①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第284～286页，1996年5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面，毛泽东虽然讲了上述一番恳切的话，但当时还没有否定办食堂的问题，粮食到食堂，有的食堂办得好，有的办得不好，浪费很大，多吃多占很严重节约粮食还很难真正做到。

到1959年5月，国内经济情况更为严重。主要表现在农村养猪头数大幅度减少、夏季作物面积比1958年减少1亿1千多万亩，即减少20%。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于5月7日作出了《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鹅鸭问题的指示》。中央决定，各级党委第一书记必须在5、6两个月内，以抓农业生产为中心，县委第一书记必须以全力抓农业生产，地委第一书记必须以三分之二的时间抓农业生产，省委第一书记必须以二分之一以上的时间抓农业生产；加强对小麦的田间管理，保证增产；扩大春播和夏种的面积，是完成今年粮、棉、油等主要作物的生产计划的决定性条件；养 猪头数大量减少的局面必须扭转；迅速掀起生产高潮，以克服农业生产的紧张状况。中央还决定，社员要有一定数量的自留地。自留地多少，应当按照原高级社章程的规定，按人口计算，不超过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的5%。发还社员自留地，这是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的错误的又一个表现。这个举动必然受到农民的欢迎和拥护。6月11日，中共中央又作出了《关于社员私养家禽、家畜、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在指示中规定，允许社员私人喂养家禽家畜，包括猪、羊、鸡、鸭、鹅、兔等在内，所有收入归社员个人所得；鼓励社员利用零星空闲时间，把房屋旁、村旁、树旁、水旁、路旁的零星闲散土地充分利用起来，谁种谁收，不征公粮，不派统购任务，愿吃、愿存、愿卖，完全由社员个人自由支配；屋前屋后的零星树木仍然归还社员所有，收益也归社员。这些规定，就

是允许社员搞家庭副业，经营自留地等。这些决定是符合中国农民实际的。在中国的农村，农民习惯于一家一户生产和生活，劳力又有强弱不同，只有允许搞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才能充分发挥一家一户作用，才能充分地利用劳动力，才能充分地利用闲散土地等，增加产量，增加收入。

此时，全国工业形势也十分严峻。据统计，1959年1月至5月工业生产比1958年的同期有较大的增长，但是仍然完不成上海会议制定的指标。预计钢的产量为900万吨。上海会议没有把工业生产的高指标压下来，是一个失误。它必然造成1959年的工农业生产全面紧张的情况。这些不得不促使毛泽东下决心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从统一认识入手，以实现压低工农业的各项高指标，以继续纠正"左"的错误，缓和国内经济形势，争取1959年有一个正常的发展。

15.在庐山会议上

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回到了阔别32年的故居韶山，视察了人民公社，会见了当地的群众和干部，整整住了3天，写下了《七律·到韶山》的壮丽诗篇：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在诗中可以看到诗人的心情是十分激动的，也是非常愉快的。32年弹指一挥间，但中国的历史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想起了举红旗闹革命的年代，诗中对革命对战友满怀激情。

28日，毛泽东又到了武汉，随即乘船到九江。29日上庐山。7月1日，他写下了《七律·登庐山》：

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
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这首诗写于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诞生38周年纪念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挥毫走笔作诗时，38年的风雨烟云自然会涌向胸怀。他登上山巅，可看到的不仅仅是庐山，而是整个世界。这诗之所以写得深沉、有力，意味无穷，一是因为党目前犯严重的"左"的错误，急需纠正；二是在上山前的一个月，即1959年6月苏联政府单方面宣布与中国签定的核协议无效，将中苏两党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发展到国家关系上，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就成为这首诗的重要历史背景。

毛泽东此行庐山，是为了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7月2日，会议正式开始。毛泽东在会议召开前，提出了一大堆问题，最后归纳成19个，让与会者讨论。他想经过大家讨论，统一对进一步压低1959年工农业生产指标，进一

步纠正“左”的错误的认识。而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毛泽东首先发表了意见，他的意见带有启发性，没有压服别人的意思。

关于形势问题。毛泽东认为，“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国内形势总的说是这12个字。国内形势中虽有不好的一面，但还不到“报告老爷，大势不好”的程度。去年一年存在的基本问题有：一是综合平衡；二是群众路线；三是统一领导；四是注意质量。在上述问题中最主要的是综合平衡和群众践线的问题。去年以来没有贯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今后宁可少些，但要好些、全些，各种各样的都要有。农业中粮、棉、油、麻、丝、茶等样样要有；工业中，重工业、轻工业等样样要有。去年集中力量搞小高炉，其它都丢掉，这种搞法不行。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是没有综合平衡。说要有两条腿走路，要有几个并举，实际上没有兼顾。整个经济中综合平衡是个根本问题。只有综合平衡，才有群众路线。在综合平衡中，主要是农业内部的平衡、工业内部的平衡、工业与农业的平衡。做到了这三个平衡，才可能正确处理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

毛泽东对1958年“大跃进”以来经济形势的分析，虽然看到了不少问题，如破坏了综合平衡，只抓钢铁工业等，但是对存在的问题估计不足，还没有看到“大跃进”运动对国民经济发展所起的破坏作用。这既有主观原因：即对“大跃进”始终是肯定的；但又有客观原因：即经济中存在的问题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毛泽东指出的问题都是在肯定“大跃进”的前提下讲的。

关于读书问题。毛泽东认为，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和

县社干部对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的规律；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该好好地读书。关于中央、省、地、县的各级委员，都要读《政治经济学》下卷第三版。计划读1个月。对县社干部要编3本书让他们读。第一本是关于好人好事的书，收集去年大跃进中，敢于坚持真理，不随风倒，工作做得好，不谎报，不浮夸，实事求是的例子；第二本是关于坏人坏事的书，专门收集说假话，违法乱纪，或者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的例子；第三本是中央从去年到现在的各种指示文件。这样各级干部都要读书，也都有书读。读后还要考试，不能马虎随便。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大家冷一下，不要做热锅上的蚂蚁。

毛泽东想通过读书让党内各级干部冷下来，克服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是有极大好处的。但是，能否冷下来的关键还在于1959年的"宏伟计划"、高指标上。如果计划指标不高，不层层加码，再加上读书，就能起到速冷的作用。

关于任务问题。毛泽东说，有今年的任务、明年的任务、今后几年的任务问题。今年钢为1300万吨，不能超过也算了。粮食去年增产有无三成？今后每年增产1000亿斤则到1964年可达到1万亿斤了。钢在明后年只能增加400万吨，但要确保质量。15年超英要坚持。去年做了件蠢事，好几年的指标一年完成。现在是否提农、轻、重？这几年农业第一，还要成立农机部。过去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次序是：重、轻、农、商、交，今后恐怕要倒过来，改成农、轻、重、商、交。这样提法并不违背马克思主义。他说，过去陈云提过先安排市场，再安排基建。黄敬不赞成。现在看来，陈云的意见是对的。要先把衣、食、住、用、行等5个字安排好，使大家过得舒服，就不

会有人骂我们,就不会造反,也有利于建设,国家也可以多积累一些。

毛泽东把重、轻、农关系倒过来为农、轻、重,以此次序安排国民经济,可以说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从中国实际出发的一个杰出的贡献。也是又一次打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一个成果。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在中国是十分正确的。

关于食堂问题。毛泽东认为,在食堂吃饭的应自愿参加。节约粮食归自己,积极办好,不要一哄而散,保持30%也好,但形式要多种多样。

毛泽东是主张办好食堂的。然而在农村中办食堂农民就不喜欢。这和城市、学校、工厂不一样。农民的时间观念又不强,又有孩子老人,在食堂吃饭,带来许多困难。一家一户开火做饭,干稀搭配,又节约又方便。所以,公社办食堂得不到社员支持。

关于成绩和错误的关系问题。毛泽东认为,有很大的成绩,也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缺点是1、2、3个指头的问题。但许多问题要比较长时间才能看得出来。

毛泽东总是把成绩看成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成绩是9个指头,缺点是1个指头。成绩和缺点的关系是9个指头与1个指头的关系问题。这在一般情况下,或党的指导思想、路线、方针、政策正确的情况下,是这样;反之,那就不会是这样了。

7月3日起,参加会议的同志分为东北、华北、西北、华东、西南、中南等6个小组按毛泽东摆的问题展开讨论。发言者十分热烈。摆情况,谈意见。会议开得非常活跃。特别是毛泽东把《到韶山》、《登庐山》两首七律抄给周小舟、胡乔木订

正后，有不少人也上山赋诗。可以说，白天开会讨论，晚上跳舞或看戏，会议开得轻松愉快，称之神仙会。同时，会议也不准备形成文件，开到差不多就结束，各奔各地，抓各项工作就是了。

王任重、刘少奇、朱德、彭德怀等在头几天的小组会议上都作了精采的发言。这里略举一些，以见一斑。王任重说：

> 1958年以来湖北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目前的困难比1954年闹水灾更为严重。全省有500万人一天只能吃到几两的粮食，原因是，追求密植，夺高产，放卫星，其实很多是说假话，这样吃了大亏，使大家吃稀饭了。

刘少奇在小组会上说：

> 去年大跃进，吃了前年的库存，又预支了今年的财政，但得出一条经验，凡事不要轻信。要有一个办法，不使人说假话。原因是现在有一股风，一直在批右倾，批保守思想，而且又提了拔白旗的口号，所以总是在右倾帽子的威胁之下，说老实话的反而挨批，日子不好过。领导上总是看好的多，估计又往往偏高。去年二类苗的产量比一类的好。红旗队低产，白旗队高产。去年11、12两个月大吃大喝时，老农就提出警告。所以今年不可以再乐观了。不然大家要挨饿。去年的错误，对经济建设，人民生活都有很大的影响，决不可小视。只有粮食好转，才能解决副食品问题。手工业要恢复。工厂中的财务也十分

混乱。有的纺纱厂办了炼钢厂，把流动资金用掉了。1958年的工作教训是十分深刻的。今年4月上海会议的报告，还有点发热，不合实际。往往在脑子发热的时候，很少看到不利；在困难的时候，很少看到有利。……聪明人是碰了钉子，知道转弯，不犯长期性的全国性的错误；暂时性的错误，非犯不可。碰钉子转弯，就是马克思主义，就是正确的领导。

在各组的讨论中，还有另一种意见。他们认为纠"左"已差不多了，右倾情绪已十分严重了。三面红旗必须肯定，对群众不能泼冷水，气可鼓而不可泄。持这种意见的人，各组中都有。尤其是省委的同志，他们不敢向群众交待，不敢承认错误，怕否定自己，否定工作。

毛泽东对这两种意见的分歧是有思想准备的。他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已看出来了。在讨论之前，先发表了意见，定了一个调子。但是，现在在讨论中分歧越来越大，相互间几乎发生争论和攻击了。在7月10日下午召开的全体会议上再次发表意见，以统一认识。他说：

对形势认识要一致，如不一致，就不能团结。党内要团结，首先要把问题搞清楚，要思想统一；有些同志对形势缺乏全面分析，要帮助他们认识，得的是什么失的是什么，有人从根本上否定大跃进和总路线。所谓总路线，无非是多快好省。多快好省根本不会错。去年有4件事：钢翻一番、基建1900多项、粮食翻一番、办公社。缺乏综

合平衡，引起各方面的不满。这些缺点都承认。但有这么一些中国人，认为美国一切都好，月亮也好。通过合作社、公社，农业增产了，苏联则没有。无将军不打败仗，打三仗其中二胜一败，仍有威信。要把道理讲清楚，把问题摆开，总可以有70%的人站到总路线下的。要承认缺点和错误，从一个局部来讲，从一个问题来讲，可能缺点错误是10个指头、9个指头、7个指头，但从全局来讲，只是1个指头的问题。

毛泽东的这些话，是针对会上两方面意见的人说的，但主要的是对第一种意见的人，而他倾向于第二种意见。对于路线问题，毛泽东还说：

我总是同外国的同志说，请他们隔10年时间再来看看我们是否正确。路线的正确与否，是实践的问题，要有时间，从实践的结果来证明。我们对建设是没有经验的，至少还要10年才有经验。这一年来我们开了不少会议，总是把问题加以分析，加以解决，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党内有些同志不了解整个形势，要向他们说明，从某些具体事实说来，确实有得不偿失的，但总的说，不能说得不偿失。取得经验总是要付学费的。去年北戴河会议以来，有些事情搞得不好，但总是抓工业了，自己负了责任，可能主观主义，但总比不搞好。一年实践，取得了这么多经验，不像过去只听别人讲，走过场，签字。经验是从成功、失败两方面来的。打仗先从打胜仗，后从打败仗中取

得经验，搞建设也是如此。我们想快一点，想找一条正确的道路。

毛泽东的这段话说明他已承担了1958年“大跃进”运动以来失误的责任，以此统一大家的思想。会议安排到7月15日结束，并指定了胡乔木、田家英等整理一个会议纪要，后来取名为《关于形势问题——庐山会议诸问题议定记录》。这个记录的总的部分由胡乔木整理，形势问题后来由李富春整理，粮食问题由李先念整理。

7月10日以后，各小组讨论的内容围绕着起草文件的问题了。由于彭德怀的发言以及给毛泽东的信，使各小组的讨论转到彭的信上了。彭德怀原不准备参加这次会议。因他刚从欧洲各国访问回来。后由于毛泽东打了电话，要他参加会议，彭总只好上山参加了会议。他分配在西北小组。在小组讨论中，他前后有7次发言，讲了许多意见。他认为，庐山会议是大跃进以来纠“左”的一次重要会议，应该好好地总结一下经验教训。但在会议的简报上没有看到这方面的发言。他还认为，有的同志不便于多讲话，自己应当多讲一些意见，供主席参考。但又感到有些话，在小组会上不便于讲，也不容易讲全，最好是找毛泽东当面谈。彭总决定在7月12日找毛泽东谈，因毛泽东已睡觉未谈成；7月13日找毛泽东谈，也未谈成，只好用写信方式了。彭总在7月13日晚上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第二天叫警卫员抄后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收到后，于7月16日以彭德怀的《意见书》为名，批给与会同志讨论。

彭德怀的信一开头说：

"这次庐山会议是重要的。我在西北小组有几次发言，在小组会上没有讲完的一些意见，特写给你作参考。但我这个人简单，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因此，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不妥之处，烦请指示。"①

彭德怀将自己的意见分甲乙两部分作了陈述。在甲部分中，陈述了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说这是肯定无疑的。主要是工农业生产发展了，解决了失业的问题等，同时又指出了缺点，说基本建设规模太大，人民公社化中有混乱，全民炼钢中浪费较大，应当很好地总结经验教训。在乙部分中，是陈述如何总结经验教训的问题。彭德怀认为，1958年大跃进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有一些是难以避免的，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从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讲，暴露出不少问题。主要是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这些问题有了这次深刻的教训，使我们较易觉醒和体会了。但要彻底克服，还要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

彭德怀的这封信代表了不少同志的意见，即如何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寻找犯错误的原因，从根本上克服"左"的错误。这封信在当时，对1958年"大跃进"运动以来党在指导思想上的错误的认识是非常深刻和有远见的，也足以使一部分头脑发热的人暴跳起来。因而这封信的基本调子是在肯定大跃进的基础上，对存在的问题作了较深刻的剖析。当时能做到这点是很不容易的。

① 《彭德怀自述》第281页，1981年1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

毛泽东收到彭德怀的这封信后，于7月16日批给与会者讨论参考。在讨论中，毛泽东听取了各种意见，也找了一些人谈话。他也了解到在讨论中有不少人同意或基本上同意彭德怀信中的意见。黄克诚、周小舟较早地发言，同意彭德怀信中的意见。后张闻天又作了长篇讲话，以表示同意彭德怀信中的意见。当然，会议上也有人表示不同意或基本上不同意的。各组的讨论情况各不一样。有的小组同意的人多，有的小组反对的人多。同意的人中，或反对的人中，观点也不尽一样，程度也各异。毛泽东于7月23日上午召开全体会议，作了讲话，明确表示反对意见。主要内容有三点，第一，现在党内外的右派正在夹击我们，形势已经变了；第二，我们犯的错误，已作了多次检查，从去年郑州会议以来，大作特作，错误已经改正，问题已经解决，但右派、右倾机会主义者抓住不放；第三，如何分析1958年大跃进运动以来的问题，如办公共食堂、大炼钢铁、工业计划指标等，并在这些问题上发表了意见。

毛泽东讲上述问题时，基本调子还是比较缓和的，同时也注意到党内两种意见的情况，对这两方面的人都作了一定的批评。他认为，现在党内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触不得，听不进不同意见，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一种是感到有压力，不让讲坏话，只让讲好话。现在党内外在夹击我们，他们是右派，有的在党外，也有的在党内。也有的是动摇分子，也有的人历史上有问题，挨过批评。他们认为，现在一蹋糊涂。可惜，庐山地方太小，不能把他们都请来。好话坏话都要听。对于坏话，我和同志们讲过，要顶住，硬着头皮顶住。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我们做了些好事，腰杆子硬。为什么不硬呢？无非是一个时期蔬菜太少，头发卡子太少，没有肥皂，比例失调，

市场紧张，以致搞得人心紧张。我看没有什么可紧张的。

毛泽东的讲话，对彭德怀的信作了逐一批判。他说，信中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其实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困难是暂时的，就是3个月的时间。我看群众和我们结合得很好。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有那么一点，但是并不那么多。河北人、河南人创造了经验，搞共产主义，这股热情，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吗？我看不能那么说。对于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只能劝说。广大贫下中农，积极分子，他们要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非常积极，他们愿意搞，这能说他们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吗？这不是小资产阶级，是贫农、下中农、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3亿5千万人。

毛泽东在讲话中，结合党的历史说，历史上有四条路线：陈独秀路线、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又是一条路线。现在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在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上都讲过，不戴高帽子，讲成思想方法问题。如果说1958年的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那么反过来讲，1956年的反冒进，就是资产阶级的冷冷清清、凄凄惨惨。

关于食堂的问题，毛泽东认为，这是好东西，无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己。全国的食堂能保持三分之一，我就满意了。这样讲，吴芝圃① 就很紧张，不要怕，河南还有50%的食堂还存在。食堂并不是我们发明，而是群众创造的。曾希圣② 说，办食堂省劳动力，我看还有一条即省物资。我赞成总司令的话，但又有区别。食堂

① 吴芝圃，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
② 曾希圣，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不可不散，不可都散。我是个中间派，河南、四川、湖北是左派，可是有个右派杀出来了，是科学院的昌黎调查组，说食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对1958年“大跃进”的错误，毛泽东说，我有两条罪状，一条叫1070万吨钢，大炼钢铁，是我建议的，下决心的，结果是9千万人上阵，赔了20亿人民币，得不偿失，你们赞成，也可以给我分担一点，但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的，主要责任是我；另一条是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建议之权，北戴河会议决议是我建议写的。但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

毛泽东讲话后，党内对1958年“大跃进”以来指导思想上存在的“左”倾错误缺乏正确的认识，绝大多数并没有认识这个错误；也由于1957年整风反右派斗争以来党内缺乏民主空气；也由于毛泽东在全党的崇高威望，以及党内个人崇拜现象的滋长；加之极少数人从个人利害出发，推波助澜，会议的气氛骤然紧张，逐步地形成了在对彭德怀信的讨论评价上一边倒的思想，而使会议由纠“左”转向反右。

毛泽东的讲话对彭德怀和其他少数同志来说是很难接受的。彭德怀当时的心情和思想是：

> “反复思索主席的讲话，再衡量自己的主观愿望与动机，怎么也是想不通。”

毛泽东的讲话无论对会议、或对彭德怀等本人都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彭德怀在后来写的回忆中，说当时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有不少问题想不通。如：

"我的信是给主席作参考的，为什么成了意见书呢？为什么能成为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呢？为什么说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的呢？"

"我虽然认识主席时间比较晚，可是也有30余年了。我这信有如此严重的错误，为什么不可以找我谈一谈呢？"①

难以接受毛泽东讲话精神的，当然不仅仅彭德怀一个人，还有其他同志。这些同志可以说忧心忡忡，也确有"四面江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的复杂感情，不知道下一步会议怎么开，对问题怎么看，会上的话怎么说，等等，于是几个人凑在一起议论一下的情况是很容易发生的。23日晚，周小舟、田家英等先到了黄克诚的住处，后彭德怀也去了。这事被人看见后报告了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于是中央找这些同志了解情况，发现他们议论的话性质十分严重，其中特别严重的是对毛泽东的不满情绪的话。他们认为：毛泽东犯了错误，已到了斯大林的晚年；毛泽东独断专行，没有民主，一手遮天；毛泽东不应当在第一线指挥经济建设，应退到第二线等等。这些话，在当时是认为对毛泽东的攻击和诋毁，再加上彭德怀的信以及小组会上的发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的发言，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

7月26日，会议决定，对彭德怀等人的问题，不仅对事，

① 《彭德怀自述》第276～277页，1981年1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

也要对人，要划清界限，也要清算旧帐，提出了这是一个反党集团，组织军事俱乐部，并由来已久。这个决定，是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后集体作出的，决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意见，更不是毛泽东泄自己的私愤。但作为中共中央主席的毛泽东应负重要的责任。

7月26日，毛泽东对李云仲意见书写了评论。这个评论对7月23日上午的讲话作了补充和阐述，但调子已高多了。他说：

> "现在党内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表现在此次会议印发各同志的许多材料上。这种情况还没有达到1957年党内外右派猖狂进攻那种程度，但是苗头和趋势已经很显著，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性质的。"①

毛泽东认为，在右派进攻面前并不可怕，而怕的是中间派的动摇。他说：

> "他们的情绪有些不正常，他们把党犯的错误估计得过大了一些，而对几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所创造出来的伟大成绩则估计得过小了一些，他们作出了不适当的结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379页～380页，1993年1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论。他们对于克服当前的困难信心不很足。他们把他们的位置不自觉地摆得不恰当。摆在左派与右派的中间。他们是典型的中间派。他们是得失相当论者。他们在紧要关头不坚定,摇摇摆摆,我们不怕右派猖狂的进攻,却怕这些同志的摇摆。"

"我们党三十八年的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性。时然而言,现在是讲这一点的时候了。不讲于团结不利,于党于个人都不利。现在这一次争论,可能会被证明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争论。如同我们在革命时期各次重大争论一样,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可能是没有争论,风平浪静的。庐山会议可能被证明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会议。"①

毛泽东的上述评论是对当时所谓右倾机会主义批判的第一篇文章。这评论发给与会者后,使大家感到问题严重,心情沉重。一场党内斗争降临了。

7月28日、29日开了两天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初步批判了彭德怀等人的错误,决定召开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毛泽东对有关的3个文件作了批示,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看我们的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如果要垮的话,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台的话,又是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380页,1993年1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因为什么?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请同志们看一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近来攻击人民公社的人们就是拾出马克思这一科学原则当作法宝,祭起来打我们,你们难道不害怕这个法宝吗?"①

毛泽东已转入全力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了。他认为这是一场两条路线的斗争,不取得斗争的胜利,一切都谈不上。

在会议上,对彭德怀的批判火力是很强的。特别是有的人把对彭德怀的批判与对赫鲁晓夫的批判联系起来。还给彭德怀扣上了里通外国之类的帽子。不仅上纲上线,而且加了莫须有的罪名。当然,"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彭总,总是从大局出发,从好处着想,听取各种"批评"。

8月1日,毛泽东给王稼祥写了短信,其中说:

"我写了几句话,其意是驳赫鲁晓夫的。将来我拟写文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

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390~391页,1993年1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疑派。"①

8月2日，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在紧张的气氛下按时召开了。有的中央委员一时赶不到，命部队用飞机送上山来。在开幕式上，毛泽东作了讲话。他认为：

"现在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的问题。刮'共产风'的问题没有了，'一平二调三抽款'没有了，浮夸风没有了，实在不是反'左'而是反右，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向6亿人民、向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运动猖狂进攻的问题。现在要指标越落实越好，反了几个月的'左'倾，右倾必然出来，缺点确实是存在的，但已经改了，他们还要求改，他们抓住这些东西攻击总路线，把总路线引导到错误的方面去。"

同日，毛泽东又给张闻天写了一封信，其信的语调尚属缓和，最后是劝洛甫痛改旧病。信中开头说：

"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认为你是旧病复发，你的老而又老的疟疾原虫远未去掉，现在又发寒热症了。""你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统统忘记了，如是乎跑进军事俱乐部，真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390－391页，1993年1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是武文合璧，相得益彰。①

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开幕后，分小组开会。各小组的任务，首先是揭发批判彭、黄、张、周等人的问题。这是立场、大方向的问题。被批判的人分插在各个小组中，所以批判是面对面进行的，可谓激烈。

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开始后，毛泽东又批了不少文件，写下了对这场斗争的看法，作了全面的斗争部署。8月5日，他对《湖南省平江县谈冷公社稻竹大队几十个食堂散伙又恢复的情况》一文作了批示：

"一个大队的几十个食堂，一下子都散了；过了一会，又都恢复了。教训是：不应当在困难面前低头。像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这一类的事情，是有深厚的社会经济根源的，一风吹是不应当，也不可能的。某些食堂可以一风吹掉，但是总有一部分人，乃至大部分人，又要办起来。或者在几天之后，或者在几十天后，或者在几个月之后，或者在更长时间之后，总之又要吹回来的。孙中山说：'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这句话是正确的。我们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属于这一类。困难是有的，错误也一定要犯的，但是可以克服和改正。悲观主义的思潮，是腐蚀党、腐蚀人民的一种极坏的思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399～400页，1933年1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潮，是与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意志相违反的，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违反的。"①

毛泽东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充分肯定的。8月7日，毛泽东又批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右倾的指示。随后各省、市、自治区在八中全会还未结束的时候，就立即行动起来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了。

8月10日，毛泽东对《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恺帆下令解散无为县食堂的报告》作了批示。他说：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那些同志们；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我怀疑这些人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他们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党。"②

这段批语是十分尖锐的；也是非常过分的，与党内的情况不相符合。这个批示在会议期间传出后，等于作出了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右倾机会主义的结论。这只能助长党内过火斗争的现象日益蔓延。

8月12日，毛泽东对辽宁省委执行中央关于反右倾指示

①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410页、第431页，1993年1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的报告作了批示，使各省狠抓反右倾斗争了。这里首先指出的，辽宁省委给中央的上述报告写得也太快了。因为8月7日毛泽东才批发中央关于反右倾的指示，而10日，辽宁省委的报告不但作出来了，而且又送到了庐山。毛泽东才有可能在8月12日作批示；其实，这样的报告有多少真实性呢？然而，毛泽东作了这样的批示：

> "各省、市、自治区的情况如何？辽宁那样的反右倾、鼓干劲的部署，是否已经做了，效果如何？看来各地都有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存在着，增长着。有各种不同程度的情况。有些地方存在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形势，必须按照具体情况，加以分析，把这歪风、邪气打下去。辽宁做得很快，步骤也好，成效显著。他们取得了主动权，迫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处于被动。这个经验，值得各地注意。"①

辽宁省委写的报告，仅仅是一个计划。说成绩显著，取得主动权，这从何谈起呢？运动还未开展，谁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还没有定，怎么可以说已迫使他们处于被动地位呢？

8月13日至16日，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召开全体会议。一是由彭、黄、张、周作检讨；二是通过决议。彭、黄、张、周的检讨是违心的，他们从全党团结出发，从维护党的威信出发，从当时的形势出发，一句话从所谓的大局出发，作了这样那样的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438页，1993年1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检讨。至于通过的决议，不仅调子高，而且把彭、黄、张、周打成了反党集团，还说是由来已久。从历史看，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是根本不符合事实的，当然也经不起历史的考验。

为批判彭德怀，毛泽东重用了林彪，专门把他调上庐山。他也不愧为是反彭的一个好打手。略举一例可以说明。8月1日党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批判彭、黄、张、周。毛泽东主持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等。毛泽东首先讲话，说彭德怀在历史上几次路线斗争中一直站在错误的方面，几十年和毛泽东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举了历史上不少事例。接着发言的是朱德，他的发言比较温和。毛泽东认为没有击中要害，做了一个手势，朱德也就不讲了。然而林彪的发言不同，大骂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等。毛泽东认为林彪的发言击中要害，大加赞赏。

8月15日，毛泽东写了两个批示。一个是对《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革命的群众运动》的言论摘录作了批示；一个是写了一封要大家学哲学的信。在前一个批示中，毛泽东对一部分同志在7月23日晚于黄克诚住处议论的内容作了批判，从中我们看到他们议论的问题确实是存在的。毛泽东批示中说：

"一个文件摆在我的桌子上，拿起来一看，是我的几段话和列宁的几段话，题目叫做《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不知是哪一位秀才同志办的，他算是找到了几挺机关枪，几尊迫击炮，向着庐山

会议中的右派朋友们，乒乒乓乓地发射了一大堆连珠炮弹。共产党内的分裂派，右得无可再右的那些朋友们，你们听见炮声了吗？打中了你们的要害没有呢？你们是不愿意听我的话的。我已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专横独断'，不给你们'自由'和'民主'，又是'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又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又是'错误一定要错到底才知道转弯'，'一转弯就是一百八十度'，'骗'了你们，把你们'当作大鱼钓出来'，而且有些像铁托，所有的人在我面前都不能讲话了，只有你们的领袖才有讲话的资格，简直黑暗极了，似乎只有你们出来才能收拾时局似的，如此等等，这是你们的连珠炮，把个庐山几乎轰掉了一半。好家伙，你们哪里肯听我的那些昏话呢？但是据说你们都是头号的马列主义者，善于总结经验，多讲缺点，少讲成绩，总路线是要修改的，大跃进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搞糟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那么，好吧，请你们看看马克思和列宁怎样评论巴黎公社，列宁又怎样评论俄国革命的情况吧！""既然分裂派和站在右边的朋友们，都爱好马列主义，那么，我建议：将这个集纳文件提供全党讨论一次。我想，他们大概不会反对吧？"①

在这个批示中，毛泽东把彭、黄、张、周等已称作右派，而且右得不能再右。由于他们的矛头已对准了毛泽东，说毛泽东已到了"斯大林的晚年"，犯了一系列的错误。毛泽东的这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447～448页，1993年1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个批示写得很尖刻。从中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知道，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为什么会作出彭、黄、张、周是“反党集团”，并“由来已久”的判断。也可以知道八届八中全会通过决议，全体中央委员一致举手同意的根本原因。

8月15日毛泽东写的另一个批示是，要同志们学哲学的一封简信。信是这样写的：

“各位同志：

建议读两本书。一本，哲学小词典（第三版）。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为了从理论上批判经验主义，我们必须读哲学。理论上，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在这里印出了《哲学小辞典》中的一部分，题为《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期引起大家读哲学的兴趣。……我们现在必须作战。从三个方面打败反党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思想方面、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思想方面，即理论方面。建议从哲学、经济学两门入手，连类而及其他部门。”①

在这封信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这场斗争视为一场长期的斗争。主要的还在于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中。所以他要大家重视理论的学习。从思想方面打败这些“右派朋友们”。

8月16日，党的八届八中全会闭幕。会议主要通过4个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446页，1993年1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文件：《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在会上，毛泽东作了讲话。同日，他还写了两个批语，以作这次会议的总结。一个是关于印发枚乘《七发》的批语，一个是《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的短文。其中有这样一段带有理论性的总结，并对后来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说：

> "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
>
> "就现在说，社会经济制度变了，旧时代遗留下来残存于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们头脑里的反动思想，亦即资产阶级思想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思想，一下子变不过来。要变需要时间，并且需要很长的时间。这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是毫不足怪的。没有这种斗争，才是不可思议。"①

这两段话，是毛泽东对庐山会议这一场斗争的总结。他明确地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存在的长期性和必然性；也提出了阶级斗争必然反映到党内，党内斗争也是阶级斗

①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451～452页，1993年1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争，也具有长期性的特点。

毛泽东在写完阶级斗争长期性的论述后，又写一段话以说明阶级斗争、党内斗争的曲折性、复杂性：

> "人们对于社会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理解，是要通过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才会逐步深入的。特别是有一些党内斗争，例如高饶、彭黄这一类斗争，具有复杂和曲折的性质。昨日还是功臣，今天变成祸首。'怎么搞的，是不是弄错了'？人们不知道他们历史的变化，不知道他们的历史复杂和曲折。这不是很自然的吗？应当逐步地、正确地向同志们讲清楚这种复杂和曲折的性质。"②

毛泽东又指出，处理这类事件，不可以用简单的方法，不可以把它当作敌我矛盾去处理，而必须把它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去处理，必须采取"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一曰看，二曰帮"的政策。

庐山会议的这一场斗争，是中共中央，包括毛泽东在内，在作出错误的判断以后发动的一场斗争。真理在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的手中。所谓错误判断：一是把他们判断为右派；二是把他们判断为形成了一个反党集团，八届八中全会并开展了这场斗争；三是把这场斗争又判断为一场路线斗争。之所以判断错误，应该说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帝国主义正在进攻我们；二是赫鲁晓夫正在搞背叛，给我们施加压力；三是党内理论上、思想上、政治路线上"左"倾错误的出现。

这场错误斗争的主要责任在于中共中央。当然,毛泽东有主要的责任。这场斗争的错误发动,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极大的危害。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对于这点,毛泽东和其他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在后来都作了实事求是的总结。特别是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更作了全面正确的结论,为彭、黄、张、周等恢复了名誉。

16.给"反右倾"运动加码

1959年的庐山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重要的转变,也是毛泽东个人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

自1958年11月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经过8个月的纠"左",认为"左"的错误早已纠正,而右倾是党内主要危险,所以全党又转人反右了。而"大跃进"运动自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后全面发动以来,经过8个月的纠偏,现在又开始"大跃进"了。1959年下半年开始,我国国民经济出现全面困难了。

9月1日,毛泽东给《诗刊》编辑部负责人写了一封信,并寄上《到韶山》、《登庐山》两首七律。毛泽东在信中说:

"近日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说人民事业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全世界反华反共分子以及我国无产阶级

内部、党的内部，过去混进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投机分子，他们里应外合，一起猖狂进攻。好家伙，简直要把个昆仑山脉推下去了。同志，且慢。国内挂着'共产主义'招牌的一小撮机会主义分子，不过捡起几片鸡毛蒜皮，当作旗帜，向着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举行攻击，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全世界反动派从去年起，咒骂我们，狗血喷头。照我看，好得很。6亿5千万伟大人民的伟大事业，而不被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大骂而特骂，那就是不可理解的了。他们越骂得凶，我就越高兴。让他们骂上半个世纪吧！那时再看，究竟谁败谁胜？我这两首诗，也是答复那些王八蛋的。"①

在这封信中，毛泽东把庐山会议这场党内斗争与国际上同帝、修、反的斗争联系起来，从信中还可以看到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那股怒气还未完全消除而平静下来，骂人的口气还很重。此时此刻，要与毛泽东心平气和地探讨"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是不可能的。尤其是毛泽东这样年龄的人，作出了判断后一般是不易改变的，只有客观的实践证明后才有可能改变自己的观点和看法。然而在党内，无论是中央还是省一级的领导人中，确实有一些人出自害怕被批评，打成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所以在庐山会议上或庐山会议后说了不少违心的话，干了一些违心的事。其中也有这样的人，他们借机讨好，到处钻营，甚至不惜采取卑鄙手段，达到个人目的。庐山会议后，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运动，不仅按中央指示开展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488—489页，1993年1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起来，而且在很多地方大加发展，定了不少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作为敌我矛盾批判处理。尤其是在基层也开展了这场斗争，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

9月9日，彭德怀为顾全大局，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从人民利益出发，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不是为自己作辩解，而是一如既往，刚正耿直。请看他的信：

请求中央考虑，在军委扩大会议结束后，请允许我学习或者离开北京到人民公社中去，一边学习，一边参加部分劳动，以便在劳动人民集体生活中得到锻炼和思想改造，是否妥当，请考虑示覆。

毛泽东对彭德怀的信很快写了回信，并对他的卸甲归田做一个平民百姓的想法与要求，发表了意见：

"我热烈地欢迎彭德怀同志的这封信。"

"德怀同志对于他自己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工作分配的建议，我以为基本上是适当的。读几年书极好。年纪大了，不宜参加体力劳动，每年有一段时间到工厂和农村去作观察和调查、研究工作，则是很好的。此事中央将同德怀同志商量，作出适当的决定。"①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520～521页，1993年1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彭德怀写这封信要求学习或到人民公社集体中劳动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何对待彭、黄、张、周等人，不仅仅是他们几个人的问题，而且还关系到如何处理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问题。彭德怀的手中没有任何权了，肩上也没有任何职了，但他影响着庐山会议后被划的几十万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如果对彭德怀作这样处理，那么对其他的人处理更严重。后来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处理，一般都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劳动改造，长期下放。总之，当时的处理是十分过分的。然而这批党员干部，仍然坚持共产党的立场，相信共产党会把事情搞清楚，历史会给他们作结论的。庐山会议这场错误斗争会纠正的。他们在困难的条件下，开始了新的工作、学习、劳动、生活。

庐山会议后，毛泽东日夜所思的虽然还是这场斗争的问题，但是，他的注意力又逐渐地集中到继续“大跃进”了。此时，他虽然不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专做中共中央主席的工作，并提出了要加强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研究，然而事实上并没有如此。他仍在关心管理党和国家的大小事务。这一方面说明他为人民负责的精神很强很强；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不放心，手中的权力还在执掌，不愿放权，这对培养党和国家的接班人是很不利的。

10月31日，毛泽东为河北省吴桥县王谦寺人民公社发展养猪事业写了党内通讯。他不仅号召人民公社养猪，做到一人一猪，一亩田一猪，养猪既有肥料又有肉吃，何乐而不为？同时也明确地提出用机械化装备农业的问题。他认为，用机械化装备农业是农林牧三者结合大发展的条件，后又成立了农业机械部。他还认为，农业机械化的实现，看来为期不远

了。

当毛泽东正在憧憬未来的时候，各种不利因素，重重的困难，正向他涌来。中苏关系紧张，赫鲁晓夫疯狂地向中共发起进攻；中印边境紧张，印方借机挑起事端，打破了中印边境地区的平静；自然灾害严重，农民群众抗灾能力骤然下降。……

当时，在与帝、修、反坚决斗争的口号下全国展开了巨大的群众运动，尤其是党内的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更是如火如荼。走在前面的当然是中央军委、外交部、湖南省委等彭、黄、张、周工作的单位。11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划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标准和处理办法》。

中共中央在批示中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部委、党组参考这个文件执行。因而这个文件起到了典型榜样的作用。更为严重的是，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学习提纲，认为“此件很好”，要求县级以上的干部阅读。

这个提纲把庐山会议的这场斗争，不仅说成是保卫党的总路线、拥护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以及怎样对待革命群众运动的斗争，而且还说成是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严重斗争。提纲中系统地阐述了所谓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阐述了所谓阶级、政党与领袖的关系、领袖的作用和意义等问题。并过分地突出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和作用。这个提纲的批转一方面加剧了反右倾运动，另一方面则助长了个人崇拜、个人迷信风气的蔓延。于是，到60年代出现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狂热地崇拜领袖的时期，为林彪这一类野心家、阴谋家的篡党夺权创造了条件，使他们有机会制造现代迷信，结

党营私，在党内外夺取各种权力，蒙骗人民，欺骗党。这个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庐山会议后到1960年上半年在全党范围展开的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其后果是极为严重的。它不仅把大批正直的共产党员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开除了党籍，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而且更为严重的，使一批野心家、阴谋家、投机分子钻进了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班子中。在农村中，不少有能力、有威信与群众密切联系的干部被打了下去，而接替他们的是所谓反右倾运动中的"积极分子"、"立场坚定的人"。可是，他们没有威信，缺乏群众工作的经验，群众也不拥护他们。这样，虽然在"大跃进"的口号下，一而再地动员群众奋斗，但农村中自然灾害严重，干部缺乏组织能力，农民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已到了最低限度，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农业的产量大幅度下降，市场供应紧张，很快出现了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经济困难时期。

经济困难时期，前后持续了3年。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到来，直接的主要原因是：继续搞"大跃进"和反右倾运动；农村自然灾害；赫鲁晓夫背信弃义，撕毁中苏之间的各种合同，撤走在中国建设的专家。这三方面结合起来，天灾人祸，必然出现这个历史的悲剧。

全国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市场供应紧张，商品严重缺乏。

挫折和失败教育了全党，也教育了毛泽东。中国共产党毕竟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挫折和失败面前并没有低头，而是面对现实，率领全国人民为克服困难，重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而奋斗。

毛泽东日夜所思，回过头来，作了《十年总结》。他承认：1958年“乱子出的不少”，成立人民公社是一个，大办钢铁又是一个。他在寻找问题的原因。但毛泽东对现实并不悲观，他总是充满信心：

> “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公开改正。”①

也必须指出，在当时，毛泽东仍然认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正确的，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是必要的。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他不得不承认犯了错误，然而他又强调犯错误是难免的，因为对真理的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哪里有不犯错误而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圣人呢？在我们面前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今后必须继续调查它、研究它，从而找出它固有的规律。

毛泽东对前十年的教训开始进行总结，这是很必要和正确的。没有这个认识，没有失败的教训，也就不可能产生1960年以后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方面的正确的认识和政策。所以错误和教训同样是宝贵的财富。

此时此刻，我们应该说，即使是毛泽东这样的伟大人物，他的认识和言行，也都要受到客观的限制。无疑也应包括毛泽东在内，在一个时期内，不可能尽是正确的，也不可能尽是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第215页，1993年1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错误的。而关键在于哪一个方面占主要地位。正确与错误又往往联系在一起，又互相转化着。毛泽东对前10年的总结不正是深刻地说明了这点吗？

共和国成立后已过了整整10年。195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纪念。仅就这10年，也可以说明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何等艰难曲折。对于这点，毛泽东是既料到又没有料到。他必须从重新认识中国国情出发，重视调查研究，为克服和度过经济困难时期而奋斗。

第三章

七十古来稀，仍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伟人

（1960年夏—1965年春）

1961年8月，毛泽东说，他有三大志愿：一是下去搞一年工业、搞一年农业、搞半年商业，以便多作调查研究，了解实情，不作官僚主义者；二是骑马到黄河、长江两岸进行实地考察，还请一位历史学家，一位地质学家，一位文学家一起去；三是最后写一部书，把自己的一生写进去，把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

我们也有资产阶级把握政权的，有的生产队、县委、地委、省委都有他们的人。有的公安厅副厅长也是他们的人。文化部“基本上不执党的政策”、卫生部应改为“城市老爷卫生部”。1965年6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工

作会议上说，把他的话传达下去，传达到县，如果中国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各省委要顶住修正主义中央。

60年代，毛泽东已是一位70岁的老人了。但是，他的思想仍在发展。他在国际国内的斗争中，逐步地形成了一个反修防修，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战略思想。他对帝国主义展开了最坚决的斗争；他对修正主义进行了公开的论战；他对反动派的挑衅给予了回击。这一切虽然给自己带来了暂时的麻烦和困境，然而历史越来越证明，这一场斗争是必要的，有深远意义的，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起了重要的巩固作用。

毛泽东在领导全党与帝修反进行斗争的同时，又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了三年经济困难，完成了国民经济的调整与恢复的任务。正当我国经济开始走上正轨的时候，毛泽东采取了重要的步骤和措施，以巩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的这一战略部署，一方面确实起到了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作用，提出了不少具有深远影响的理论观点，但另一方面，由于严重地估计了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造成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尽管如此，在这个时期，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独立与主权的完整、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然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1.在困难的年代

1960年，我国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但是三年困难时期很快过去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全党上下团结一致，齐心合力，战胜了困难。

1960年是毛泽东讲话、写文章最少的一年。其所以如

此，挫折和失败教育了每一个人，也教育了毛泽东。他深刻地认识到要很好地总结经验教训，要学习新东西，研究新问题。有人说他1958年“大跃进”以后就陷入了他自己深恶痛绝的主观主义，抛弃了战争年代形成的谦虚谨慎的作风等等，这是不完全符合事实的。

从1959年冬起，毛泽东又开始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边读边议，发表了不少重要的见解。从国内问题到国际关系，从人的世界观、方法论到人口的问题，无所不包，都议论到了。但是，这仅仅是议论，对实际工作没有起到直接的指导作用。

1960年3月4日，毛泽东对贵州省《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作了批示。他认为贵州省委的这个报告是一个科学的结论，写了这样一段赞扬的话：

> “可以使我们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事业中，在5年至10年内，跃进一大步。因此，应当在全国仿行，不要例外。仿行时要有步骤，要有坚强领导，要提高干部和群众觉悟，要走群众路线。在1960年一年内，全国食堂达到贵州现时的那种水平，也就很好了。在领导不强的地方可能一年达不到，那就在1961年达到也可以。即使更长一点时间达到，也可以。总之一定要达到。并且还要提高。”①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第44～45页，1996年1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在这个批示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还是主张在农村办公共食堂。他认为办公共食堂大有好处。这也许从机关、工厂、学校的食堂出发论办食堂的好处。但是，从农民看来，办食堂或搞食堂化是一大祸害。首先，本应分到各家各户的粮食，现在不分到家了，而放在食堂内了。对于这点，农民是最有意见的。其次，吃干、吃稀、吃多、吃少、早吃、晚吃都要受到限制，一家一户，吃住在一起的制度被破坏了，不仅不习惯，而且无法安排过日子。其三，无法照顾老人和小孩。这在农村中，几乎家家有老人和小孩。办食堂后，绝大部分农民反对，尤其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农户，更是怨气很大。因为办了食堂后，各家各户还要起火做饭，实在不方便。其四，办食堂浪费很大，管理也很混乱，干部多吃多占的现象十分严重。所以，不少调查组下去调查后都认为农村中不宜办食堂。中国科学院组织了一个小组到河北省昌黎调查，认为不应当办食堂，办食堂没有好处。这件事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说是"右派杀出来了"，作了严厉批评。庐山会议后，贵州省委关于办食堂的报告才有可能产生，得到毛泽东的赞赏，称它是一条重要的经验，要全国推行。对于这点，我们应当这样评论：一是作为地方各级组织，不应当根据上级领导的需要作出不切合实际的，或者说不真实的报告，像贵州这样的地方，在农村中普遍建立食堂，一是做不到，二是不方便农民，平原地区做不到，山区反而能做到？这是不可能的；二是作为上级领导对下面的报告要进行调查、核实，不能犯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仅仅根据书面"报告"作出决策指导工作是很危险的。毛泽东要求全国仿行，不能例外，但实际上根本做不到。因为全国农村处在困难中。不是办食堂放在第一位，而是生产度荒放在第一位。由于毛

泽东积极地主张办食堂，人民公社中的食堂制度还在坚持着。

1960年3月22日，毛泽东作了关于鞍钢宪法的批示。他认为：

> "鞍钢是全国第一个最大的企业，职工十多万，过去他们认为这个企业是现代化的了，用不着再有所谓技术革命，更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针，反对政治挂帅，只信任少数人冷冷清清的去干，许多人主张一长制，反对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他们认为'马钢宪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现在已"不是马钢宪法那一套，而是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①

毛泽东积极推崇鞍钢宪法，固然有其正确的一面，即使像鞍钢这样的企业，也要开展技术革命，不断地提高生产力；要走群众路线，充分地发挥领导、技术人员、工人的作用，才能把这种大企业办好。毛泽东在批示中，主张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用战争年代的办法去搞经济建设就不正确了。他虽然吃了1958年"大跃进"运动的亏，但鞍钢宪法基本上还是"大跃进"运动那一套做法，因而毛泽东对它大加赞扬，以欢呼的口气，写了这样一段激动人心的话：

> "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②

①②《人民日报》1977年3月22日

"现在把这个报告转发你们，并请你们转发所属大企业和中等企业，转发一切大中城市的市委，当然也可以转发地委和小城市，并且当作一个学习文件，让干部学习一遍，启发他们的脑筋，想一想自己的事情，在1960年一个整年内，有领导地、一环接一环、一浪接一浪地实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城乡经济技术革命运动。"

现实是无情的。鞍钢宪法在1960年的情况下也不起作用了。对于这点，毛泽东是没有估计到的。1960年的工农业生产急剧下降，人民生活日益困难，吃、穿、用的东西严重缺乏，城市用粮严重告急，经济困难状况压倒了一切。在这种形势下，再搞1959年式的继续大跃进已不可能，大搞群众运动也不可能了。严重的经济困难，使中共中央、毛泽东不得不面对现实，重新考虑一切问题了。而最重要的是，与人民同甘共苦，节衣缩食，发扬革命战争年代的优良作风，为度过经济困难时期而斗争。

在毛泽东看来，经济困难是暂时的。他相信中国共产党、相信中国人民，也相信自己，能克服和战胜这种困难。他是以积极的姿态对待困难。

1960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农村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力图以这"三反"运动来扭转形势。但是，这只能在一部分地区或一定程度上开展，而要在更多的地区或更全面地开展是不可能的。广大农村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吃、穿、用的问题，广大党员干部的心思不在搞这"三反"运动，而在于率领群众克服经济困难。到8月10日，毛泽东批阅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

食的指示。中共中央指出：

> “当前的中心任务是：鼓足革命干劲，掀起一个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的高潮，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保证生产，保粮，保钢。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粮食生产是比工业生产还要费力的事情，粮食问题的解决，不仅直接关系到人民的生活，而且直接影响到工业的发展。因此，加强农业战线是全党的长期的首要任务。”①

为此，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保证农业生产。其中有：坚决从各方面挤出一切可能挤出的劳动力，充实农业战线，首先是加强粮食的生产；坚决地压缩水利等农村基本建设，把劳动力集中到粮食生产上；鼓足干劲，搞好秧田管理，力争秋季丰收，特别是粮食的丰收；在大力增加粮食生产的同时，棉花、油料等作物也必须重视；保证粮食生产，不仅是农业部门的责任，而且是全党全民的共同责任；在搞好粮食生产的基础上，必须把粮食管好，用好，安排好人民生活；认真抓紧粮食调运工作，保证城市和工矿区粮食的供应；必须坚决地肃清干部中的官僚主义。首先是要克服领导机关中的官僚主义。民以食为天，吃饭第一，必须全党动手，全民动手，大办粮食。这些措施对当时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及时的。但是，要真正地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还有更重要的是农村人民公社的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第516页，1996年5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管理体制以及政策上的问题。“大跃进”以来形成的“左”的错误还没有肃清，还在起作用。人民公社内部的不少规章制度严重地束缚着农民大办粮食的积极性。对于这点，当时的认识是落在后面的，包括毛泽东在内。他还没有认识到公社内部还有“左”的东西在束缚农民。无论是中共中央或毛泽东，虽然作出了有关的指示，企图扭转经济困难的形势，但还没有提出根本性的措施，在方针政策上还未作出大的改变。

1960年8月14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8月20日，中共中央又作出了关于坚决地认真地清理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的紧急指示；9月7日，中共中央又作出了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的口粮标准的指示。

到1960年9月下旬，党内外广大干部盼望中共中央拿出新的政策，以扭转目前的困难局面。

正值此时，《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公开出版发行。中共中央同意中央宣传部关于《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宣传和学习问题的报告。在全党全国干部和群众中广泛学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是一项重大政治任务。中宣部的报告中说：

>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国人民革命斗争的伟大记录，是我国人民革命胜利经验的结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是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最好的教科书。”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公开出版后，全体党员干部在各级

组织的安排下，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开始研读这部伟大的著作，以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党和全国人民。

中共中央局成立。为加强对地方的领导，中共中央于9月决定成立6个中央局。这又是一项重要措施。随后，中共中央决定，陶铸任中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任东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任西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任西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任华北局第一书记；柯庆施任华东局第一书记。中央局的成立，标志着党中央领导体制上的一大变化。

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1960年9月14日至10月24日中央军委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根据林彪的意见，主要研究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问题。自庐山会议后林彪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以来表面上很是突出毛泽东思想，突出政治思想工作的。其实，他是别有用心的。历史证明，他是一位野心家、阴谋家。他大力制造个人迷信，歪曲政治思想工作，为取得毛泽东的称赞和信赖，施展了一切伎俩。他在这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说："现在的马列主义就是我们毛主席的思想。他今天在世界上站在最高峰，站在时代的思想顶峰。"他歪曲毛泽东思想，说"毛主席的思想就是阶级斗争的思想。"他歪曲政治思想工作，说"思想工作，主要是抓活的思想"，并提出了"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工作第一"等四个第一的口号。于是从部队开始，后波及到党政系统，开始抓活思想，抓活学活用，把政治思想工作简单化、庸俗化。这一切不但没有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反而得到了他的赞赏，在全国各条战线上推广起来。

1960年下半年，工农业生产仍继续下降。特别是粮食和钢煤的产量很难完成全年度计划任务。毛泽东、中共中央不

得不采取紧急措施。

发出12条紧急指示信。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共12条。这12条紧急指示，总的是为纠正"左"的错误，调动农民群众积极性而作出的。12条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加强生产大队的基本所有制；坚持生产队的小部分所有制；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少扣多分，尽力做到百分之九十的社员增加收入；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三七开；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安排好粮食，办好公共食堂；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活跃农村经济；认真实行劳逸结合；放手发动群众，整风整社。这12条中，还明显地表现了"左"的错误。如基本核算单位放在生产大队上，所谓"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队是生产大队，而不是生产队，生产队只是小部分所有制；如人民公社内部按劳分配上，仍然实行供给制和工资制相结合的制度；如还提出办好公共食堂等。这些都严重脱离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是过高地估计农村生产力水平的结果。12条紧急指示信的制定标志着党中央、毛泽东自庐山会议开展反右倾以来，又转向纠"左"错误了。这是扭转农村经济困难局势带有根本性的措施，方向是正确的，必然受到广大农民和农村干部的欢迎和支持。

中共中央是在发现了自11月21日开始，钢、铁、煤、运出现逐日下降的严重情况后，于1960年12月3日，作出了《关于保钢问题的紧急指示》。目的是要完成1800万吨钢的任务。

1960年是我国国民经济出现暂时困难的一年，也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筹划如何战胜经济困难的一年。这在毛泽东生平史上以及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都是第一次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经过几十年以后回头看看这段历史，最重要最宝贵的是，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发扬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艰苦奋斗的精神，这是产生巨大力量、战胜一切困难的关键所在。人们并没有一味指责工作中的失误，而是团结一致，奋勇向前，度过了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困难时期。

2.搞一个实事求是的调查年

1960年，是中苏两党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分歧更为严重并扩大到中苏两国关系上的一年。是年4月，中国共产党为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3篇理论文章，以阐明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批判现代修正主义对列宁主义的背叛。文章发表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赫鲁晓夫对此十分恼怒，在1960年6月召开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中共代表团发起了突然袭击。以后，中苏分歧继续发展。7月，苏方突然撤退在中国的苏联专家，撕毁一系列经济、技术合同。9月10日，中共中央在答复苏共中央6月21日通知书时对苏共的错误观点，进行了必要的驳斥，并提出解决中苏分歧达到团结的5项建议。随后，中共中央又派出代表团到莫斯科与苏共会谈。10月，中共中央又派出代表团参加了为第二次莫斯科会议作准备的文件起草委员

会。对苏共中央的错误观点提出修改意见。在11月上旬至12月1日第二次莫斯科会议上，中共中央派出了以刘少奇、邓小平为正副团长的代表团，对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观点和错误做法作了坚决的斗争。会议最后通过了《莫斯科声明》、《告世界人民书》。会议体现了各国共产党之间既联合又独立平等的原则，通过了协商一致的原则，使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有所缓和。但是，这种缓和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国内经济问题，毛泽东、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八届九中全会。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这是为党的八届九中全会的召开作准备的会议。会议主要讨论1961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总结最近两个月各地整风整社的经验，作出了《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会议确定1961年所有的社队必须以中央的十二条紧急指示信为纲，开展各方面的工作。特别是进行整风整社，彻底检查和纠正“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强迫命令风；彻底反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彻底清算平调账，坚决退赔等方面一定要抓紧，保证完成任务。会议又确定了农村工作的具体政策。主要有：为减少货币投放和市场压力，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和退赔平调账，要分做两步走，即在两年内完成任务。1961年拿出10亿元提高粮食收购价格；1962年提高棉花和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国家拿出25亿元作为退赔补贴；允许适当发展社员的家庭副业和手工业，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在大集体下要有小自由。社员的自留地占当地每人平均占有耕地的比例，由“十二条紧急指示信”规定的5%提高到7%；对农村集市贸易要采取活而不乱、管而不

死的方针，目前应放开农村集市贸易，不要过多地加以限制。

在中央工作会议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中央于1961年1月14日至18日召开了八届九中全会。毛泽东主持了这次全会。会议在听取了李富春所作《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和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报告》的基础上，讨论制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以调整为重点，实现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全面恢复与发展；以农、轻、重为次序，提出先安排吃饭问题，后搞基本建设的思想，经济建设速度不能过高，要求不能过急，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会议强调把农业生产放在第一位，大办粮食，争取农业丰收。会议还强调坚决贯彻十二条紧急指示信，开展整风整社，纠正“五风”，坚决地退赔；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规定社员增加自留地的比例，并20年不变；确定以私养猪为主的政策，鼓励社员发展家庭副业。所有这些无疑是正确的，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和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提出的1961年的国民经济发展指标，虽然有了很大的压缩，但仍然偏高。如预算基本建设投资额为167亿元，比1960年减少38%，也放慢了重工业发展速度，但钢产量定为1900万吨，煤为4.36亿吨，都比1960年有所增长。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一方面已认识到经济困难的形势，对经济发展指标作了一定的压缩；但另一方面，对1961年经济困难形势仍然估计不足。所以，不可能做到彻底地解决问题。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在指导方针上有了重大的变化，即从“大跃进”和“继续跃进”的指导思想转向了“调整”国民经济的思想，从反对右倾错误转向了纠正“左”的错误，从经济建设中的主观主义转向了调查研究。

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以及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作了多次讲话。他总结了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认为去年秋季，中央对情况不明，不了解，纠正得不彻底，这次会议如果在去年春天开就好了。去年虽开了几次会，但反映的问题不那么集中，情况不那么明了，决心不那么大，方法也不大对头。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急，要搞它半个世纪，要搞几年慢吞吞，不要务虚名而遭实祸。要承认错误，有多少错误就说多少，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什么反什么，必须从实际出发。要调查研究。1961年要搞一个实事求是年。我们是有实事求是的传统的。大概是官做大了，就不愿意去摸情况了。不摸典型，工作就不好做。今后大家都去作调查研究，不要尽讲人家的坏话。我们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时期，提倡调查研究。在全党内调查研究作风好。解放10多年，这种作风比较差。什么原因呢？要进行分析。在民主革命时期，犯了几次路线错误。"左"的右的都不搞调查研究，当时中国是什么情况，应用什么路线、策略、方针，长期没有解决，这必然要犯错误。解放战争时期，同蒋介石作战，比较注意搞调查，情况比较清楚。搞革命那一套我们比较熟悉，问题也比较单纯。解放后情况比较复杂，虽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但不够，对情况不甚了解。庐山会议后，"共产风"又刮起来了，急于过渡，搞了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工业，大办社有企业，大办铁路，但怎么能大办？而这次会议上情况逐步明了，决心逐步大了。当然也有参差不齐。有的同志说搞"共产风"要破产还债。听起来这句话不好听，实际上就是要破产还债。我们是马列主义者，用平调的办法，建立社有、公有经济，这是剥夺农民，国营经济用不等价或降价收购农民的东西，也就是剥削了农民。

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的思想认识又回到了庐山会议以前的状态了。他在挫折和失败中看到了问题，不断地检查错误，总结经验教训，重新制定党的方针政策，特别是想解决农民的问题。他主张在1961年搞一个调查研究年，从根本上做起，以便作出符合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的决策。这是毛泽东在经济困难的年代引导中国共产党继续前进的一个重大步骤，也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真知灼见。

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后，中央的不少领导开始到基层作调查去了。在中央领导人的带头下，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人也纷纷到基层作调查。不久，县委的同志也下去调查了。毛泽东也派身边的秘书和工作人员下去作调查，调查之风兴起来了。1961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同时印发了毛泽东在1930年写的《关于调查工作》一文。中央认为，最近工作中所以有缺点和错误："根本上是由于许多领导人员放松了在抗日战争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进行得很有成效的调查研究工作，满足于看纸上的报告，听口头的汇报，下去的时候也是走马看花，不求甚解，并且在一段时间内，根据一些不符合实际的或者片面性的材料作出一些判断和决定。在这段时间内，夸夸其谈，以感想代替政策的恶劣作风，又有了抬头。这是一个主要的教训，全党各级领导同志，决不可忽略和忘记这个付出了代价的教训。"

"中央要求从现在起，县级以上党委的领导人员，首先是第一书记，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把深入基层(包括农村和城市)，蹲下来，亲身进行有系统的典型调查，每年一定要有几次，当作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并且定出

制度，造成风气。”

调查必须实事求是，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践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从中央到地方，调查之风盛行。

1961年3月13日，毛泽东为调查研究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以及正在北京召开的华北、东北、西北三个地区、大区和省市委负责人会议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中，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公社内部的平均主义问题。他信中说：

> “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希望在北京会议上讨论一下，以便各人回去后，自己并指导各级第一书记认真切实调查一下。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别的重大问题也一样），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我看你们对于上述两个平均主义问题，至今还是不甚了了，不是吗？我说错了吗？省、地、县、社的第一书记大都也是如此，总之是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其原因是忙于事务工作，不作亲身的典型调查，满足于在会议上听地、县两级的报告，满足于看地、县的书面报告，或者满足于走马看花的调查。……”①

这封信反映了毛泽东对人民公社内部的平均主义有了深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第440～441页，1996年1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刻的了解。他看到了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这就为从根本上解决公社的"共产风"奠定了基础。在1961年内,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逐渐地向正确方向转变。主要表现为:强调以农业为基础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强调大办粮食,大办农业,压缩基本建设战线,降低重工业发展速度,坚决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在调查研究基础上,毛泽东主持召开了3月和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制定和修改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对人民公社的性质、规模等都作了规定,纠正了社队规模偏大,公社对大队和生产队管得太多太死的现象,取消了公共食堂制度和社员分配的供给制度。这些规定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还不够彻底。到1961年9月,毛泽东提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要求各级党委调查研究,提出意见,以便中央作出决定。1962年2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决定人民公社一般以生产队(即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并缩小了生产队的规模,这就比较好地解决了生产队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这样才使农村的形势稳定下来,才使农民群众安下心来,发展农业生产。

在切实解决农村人民公社内部平均主义问题的同时,也着手解决工业中的问题。中央先后派出十几个工作组到上海、天津、太原、北京等城市进行调查。8月,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工业、粮食、财贸、教育等问题。会议发现,自八字方针提出以来,由于情况不明,认识不足,经验不够,对八字方针贯彻不力,没有按实际情况降低指标。会议认为,这个情况已造成了严重损失,丧失了一年多的时间,现在

再不能犹豫了，再不能丧失时机了，必须当机立断，该退的要坚决地退下来，该压的要坚决地压下来，并且必须退够、压够。会议讨论制定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等文件。这些文件是1958年以来工作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是大兴调查研究的成果。因此，这些文件的制定和贯彻，是党自庐山会议以来重新系统地纠正"左"的错误，实事求是地指导工农业生产和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标志。不久，中央批准了这些文件，并在各个系统中先后试行，收到了较好的效果。特别是在扭转困难局面、稳定干部和群众的情绪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到1961年底，调查研究的成果十分显著，国内的经济情况也开始好转。这一切，充分说明毛泽东提出的搞一个调查年的决策是干分正确的。同时，也使各级领导在调查中真正地掌握了第一手材料，了解了不少真实的情况，看到了群众的困难。促使领导与群众一起，同甘共苦，努力奋斗，克服困难。也使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在人民中发扬了优良的传统和作风，给人民群众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

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以及掌舵人的毛泽东，在复杂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尽管主观愿望是良好的，但是如果脱离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轨道，就必然会出现指导思想上的偏差。它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受严重的损失。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人民群众并不埋怨，也并不丧失信心，更没有出现与党离心离德的现象，党群关系仍很密切。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自己所犯的错误，并认真改正，总结经验教训，以郑重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姿态出现在全国人民面前，使

人民为之折服、钦佩；二是中国共产党从毛泽东开始到各级领导人，表现了与人民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人民吃苦，各级领导也吃苦，人民前进，各级领导在带头。优良的党风，产生了无穷的力量，使人民相信，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利益奋斗到底的党。正是由于这两方面，党才能形成正确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才能团结全国人民，克服前进中的困难。

1961年是调查研究的一年。由于调查研究的深入，1961年也是中共中央制定文件最多，政策上改变最大的一年。这种局面，是毛泽东开创的。历史证明，他不愧是一位在历史性的关键时刻，给人民指明方向、叱咤风云的领袖。

广泛的调查研究，对迅速地纠正错误，缩短经济困难的时间，减轻人民承受的痛苦，起了巨大的作用。调查研究的结果，做到了情况明，方向正，决心大，决策快。同时这也是毛泽东对调查研究抓得很紧、很细的结果。

这从1961年1月20日，毛泽东给田家英的信中可以得到说明：

"(一)《调查工作》这篇文章，请你分送陈伯达、胡乔木各一份，注上我请他们修改的话(文字上、内容上)。

(二)已告陈、胡，和你一样，各带一个调查组，共三个组，每组组员六人，连组长共七人，组长为陈、胡、田。在今、明、后三天组成。每个人都要是高级水平的，低级的不要。每人发《调查工作》(1930年春季的)一份，讨论一下。

(三)你去浙江，胡去湖南，陈去广东。去搞农村。六

个组员分成两个小组，一人为组长，二人为组员。陈、胡、田为大组长。一个小组（三人）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另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中间队不要搞。时间十天至十五天。然后去广东，三组同去，与我会合，向我作报告。然后，转入广州市作调查，调查工业又要有一个月，连前共两个月。都到广东过春节。”①

毛泽东对调查工作是抓得很紧的，指导也很具体。并且采用抓两头带中间的办法，目的是要通过调查，了解实情，然后制定正确的政策。到1961年3月，他已十分明确地掌握了生产队之间与社员之间平均主义的做法和材料。因而他有发言权了。他批评省、地、县、社的干部对这个平均主义“不甚了了”，不知道、不懂得，只听汇报，切中了工作中的要害。他在3月写的信中大声疾呼：

“我的那篇《关于调查工作》的文章也请同志们研究一下，那里提出的问题是作系统的亲自出马的调查，而不是老爷式的调查，因此建议同志们研究一下。可以提出反对意见，但不要置之不理。”②

毛泽东希望各级领导对调查研究工作从基本方面做起，真正地学会这项本领。1961年5月6日，毛泽东给李井泉井陈正人写了这样一封信：

"陈正人同志五月一日给我的信收到，很高兴。再去简阳做一星期，最好是两星期的调查，极为有益。井泉同志，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呢？我渴望你的信。你去调查了没有？中央列举了一批调查题目，是四月二十五日通知你们的。五月四日又发了一个通知，将会期推迟到五月二十号，以便有充分调查研究的时间，将那批问题搞深搞透，到北京会议时，比起广州会议来，能够大进一步。我在这里还有一个要求，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请你们在这半个月内，下苦功去农村认真做一回调查研究工作，并和我随时通信。信随便写，不拘形迹。这半个月希望得到你们一封信。如果你们发善心，给我写信，我准给你们写回信。"③

5月14日，毛泽东又给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写了一封信，内容是：

"你的这封信可发湖南全省各地、市、县、社党委研究，仿照办理。都要坚决走群众路线，一切问题都要和群众商量，然后共同决定，作为政策贯彻执行。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④ ①

①②③④《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第421、441、484、494页，1996年1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在上述信中，可以知道毛泽东想用调查研究的方法去了解社会、了解国情，以便更好地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问题。1958年搞“大跃进”运动，也就是吃了没有作调查研究的亏。他当时可以说是心急如焚地要求全党大抓调查研究，切实改正主观主义的错误。由于毛泽东的提倡和督促，1961年全党的调查之风很盛，广大干部掌握了第一手的材料。不少干部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悟出了许多道理。广大干部，尤其是地委以上干部，普遍要求对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各项工作作一个系统的总结，特别是对党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作总结，以便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纠正“左”的错误。

1961年8月，毛泽东在江西庐山与有关工作人员的谈话中，也充分表达了这种心情。他说，他有三大志愿：一是下去搞一年工业、搞一年农业、搞半年商业，以便多作调查研究，了解实情，不作官僚主义者；二是骑马到黄河、长江两岸进行实地考察，还请一位历史学家，一位地质学家，一位文学家一起去；三是最后写一部书，把自己的一生写进去，把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人民去评论。他认为自己的好处占70%，坏处占30%。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不是圣人。

上述三条，是毛泽东在1961年下半年时的一种感慨。这三条，对毛泽东说，一条也没有完成，也不可能完成。作为领导、组织“大跃进”运动的毛泽东，在此时此刻有如此感慨可以说是非常深刻的。他把“大跃进”运动造成的损失，出现的问题看得是十分严重的。他公开提出自己不是圣人，自己的功过为七三开，并主张统统地写到书中，让人民、让后代评说。千秋功罪，谁予评说，他相信人民，交给人民评说。这是一个

多么了不起的思想啊！在中国的历史上，不一定所有的领袖人物都愿这样做，都让人去评说。然而，毛泽东不同，他坚信人民能对他作出最公正的最科学的功过评说。

几十年以后的事实，不正是这样吗？

3.发扬民主，让人讲话

“发扬民主，让人讲话”，这是毛泽东在1962年1月30日至2月7日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讲的一句名言。他说：

> “要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就必须发扬民主，让人讲话。在党内是这样，在党外也是这样，省委的同志、地委的同志、县委的同志，你们回去，一定要让人讲话。在座的同志们要这样做，不在座的同志们也要这样做。一切党的领导人员都要发扬党内民主，让人讲话。”①

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提出这个问题是有极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自从1959年庐山会议以来，由于不适当地开展了反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把党内不少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干部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因而党的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34页，1986年8月人民出版社出版。

民主作风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不让人讲话和不敢讲话的现象十分严重。为了总结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纠正错误，充分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毛泽东决定召开一次规模最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克服庐山会议以来存在的严重问题。在会上毛泽东以身作则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解除了与会者的顾虑。他在会上说：

> “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帐，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第二笔帐，是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三笔帐，是地委一级的；第四笔帐，是县委一级的；第五笔帐，就算到企业党委，公社党委了，总之，各有各的帐。”①

在这里毛泽东要求大家承担责任，不要不敢承认。他还要求各级领导要真正地发扬民主，要启发人家批评，要听取人家的意见，接受正确的批评。各人有各人的帐，应当争取主动，首先要作自我批评。有什么错误就检查什么，要争取主动，过去不民主，现在陷于被动，那也不要紧，就请大家批评吧！白天出气，晚上看戏，白天晚上都请你们批评。在这个时候，我们坐下来，冷静地想一想，两三天晚上睡不着觉，想好了，想通了，然后诚诚恳恳地做一篇检讨，这不就好了吗？总之，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家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36页，1986年8月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就是说作为一位领导如果不发扬民主迟早是会要垮台的。人民不拥护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你贯彻不了，那岂能领导大家建设社会主义呢？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搞好社会主义建设，也就没有社会主义。

“七千人大会”真正地发扬了一次党内民主。会议做到了“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欢喜”。会议原计划在1962年春节前结束，回去过春节，然后抓工作，但大家感到会开得不过瘾，话没有说完，要求延长会议时间，不回去过春节，继续开会。前后开了27天，可谓长矣。

毛泽东在会上还专门论述了民主集中制的问题。他批评党内有不少同志不懂得这个问题。害怕群众讲话，害怕批评。他说，这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我们工作中的是和非的问题、正确与错误的问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

为了使与会者有更多的说话机会，使会议开得更民主，毛泽东提议改变了过去中央先作报告后讨论的开会方法。这次会议让到会的7000位同志，首先讨论由刘少奇代表中央在会上作的书面报告，让大家评论，提意见，然后组织起草委员会写出报告的第二稿，而刘少奇在会上只作个说明。这样的开会方法，使会议民主气氛更浓，使报告写得更好，使与会者更感到作用大。

“七千人大会”是开得很成功的一次会议。但是也有两点不尽如人意：

其一，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对1959年庐山会议以及后来开展的“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所造成的错误基本上都纠正了，但唯独彭德怀等人的问题没有解决。不但如此，刘少奇在会上作的口头报告中又重申了庐山会议上的观点和决议，强调了庐山会议所以开展这场斗争，是由于党内形成了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并由来已久，并不得不进行这场斗争，而并不是彭德怀在会议上写了一封信。这件事使与会者不满。

刘少奇在口头报告中作了这样的解释：

这里要附带说明一个问题。彭德怀同志在1959年庐山会议中间，写过一封信给毛主席。我们在庐山会议上进行了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斗争。书面报告中说到，这场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展开这场斗争是不是只是因为彭德怀同志写了这封信呢？不是的，仅仅从彭德怀同志那封信的表面上来看，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问题不是彭德怀同志这封信写错了，问题不在这里。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开展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在反对高饶集团的时候，没有把他提出来，他是高饶集团的余孽，是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所以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说，到底是高饶联盟呢，还是彭高联盟呢？恐怕应该是

彭高联盟，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两个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彭德怀同志除了在庐山写了那封信以外，还有很多其它的背后活动。他在党内背着党中央进行派别活动，他阴谋篡党。

有些同志也讲过一些同彭德怀同志讲过的差不多的话，例如什么大炼钢铁'得不偿失'啦，什么食堂不好，供给制不好啦，人民公社办早了啦，等等，但是这些同志和彭德怀同志不一样，他们可以讲这些话，因为他们没有组织反党集团，没有要篡党。彭德怀同志带领军事代表团在国外走了几个月，回来以后就急急忙忙写了那封信，是有阴谋的。当然不了解情况的同志也看不清楚，那不能怪他们。

刘少奇的上述解释，基本上仍是1959年庐山会议作的结论。也就是按照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讲话的内容讲的。但事实是，彭德怀没有组织反党集团，也没有参加高饶的反党活动，与前苏联的赫鲁晓夫也没有任何联系，只是根据一些现象，如高岗找过彭德怀，彭德怀访问欧洲回国时见过赫鲁晓夫，回国后上山开会、写信等一系列表面现象作出了上述严重问题的结论，这对与会者来说，是令他们很不满意的。彭德怀知道后也非常气愤，花了很多工夫，向党中央写信，陈述自己的意见。不少人认为纠"左"不彻底，即使为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不少同志都平了反，然而还没有给彭德怀等人平反。这不能说庐山会议以及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错误已经纠正了。

其二，与会者不满意林彪的讲话。

庐山会议后，林彪受到毛泽东的重用，主持了中央军委的工作，代替了彭德怀。他在“七千人大会”上作了讲话。

林彪的讲话，颠倒了事实。1958年以来党在指导思想上所以犯错误，当然中共中央有责任，但无一不是与毛泽东有关的。在会上毛泽东也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他强调自己有错误，不是圣人，对他作七三开的评价就很满意了。然而林彪的讲话，却把责任推卸给下面各级领导，把毛泽东说成是圣人。林彪所以这样说，目的是打着高举的旗帜，讨好毛泽东。果然，他的讲话，毛泽东很欣赏，很快地批给全党学习了。

七千人大会存在上述两个问题，但从总的来说令人是满意的。这对全党发扬民主，开展批评，纠正错误，起了积极的作用。“七千人大会”后，党的工作全面地转移到了实事求是的正确轨道，尤其是经济工作，大踏步地前进了。

1962年是国民经济调整恢复实现决定性转变的一年。

4.重提阶级斗争

经过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进行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对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的认识，比1957年刚刚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要深刻得多了，这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大进步。此时毛泽东重新开始思考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步骤和国际的重大斗争问题。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在重视恢复国民经济的同时，作出了反修防修的战略部署，以解决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蜕变问题。他认为，不解决这个问题，社会主义国家迟早要变成修正主义，社会主义建设是不可能成功的。他在1962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问题，就是一个明显的标志。他主张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大会讲、中央全会也讲，使全党保持清醒的头脑，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以扭转前一阶段不提阶级斗争的现象。他认为，不讲阶级斗争，不开展反修防修，社会主义建设即使搞了几十年，也总有一天要变成修正主义，变成资本主义。他决心以自己的理论和实践，完成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从未有人完成过的伟大事业。到1966年春，他形成了一套反修防修，以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想与战略，并决心付诸实施，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毛泽东的思想为何有如此深刻的变化呢？时至今日，又如何评论呢？

自1962年春"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的思想和注意力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果说从1958年起，毛泽东的思想和注意力主要是集中在搞社会主义经济，从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话，那么，从1962年春以后，他的思想和注意力就逐渐地转移到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上，抓阶级斗争，抓反修防修，抓社会主义革命，以巩固社会主义制度。

毛泽东的思想和注意力所以发生深刻变化，基本原因有两个：一是国内原因；二是国际原因。他总认为，在最近的几年内，国内的和国际的阶级斗争都非常激烈。帝、修、反的反共、反华浪潮一个接着一个，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各方面的压力和困难。但经过坚决的斗争，终于度过了这个困难时期。并且由于做到了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中国各条

战线上的工作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过去对苏共是批评不得的。在列宁、斯大林时代，苏共是处在领导的地位上，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起着核心的作用。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仍然利用这个特殊地位，企图称王称霸，控制各国共产党。现在，苏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由他说了算的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了，逐渐地出现了平等协商的新局面。这个局面的形成是由于中共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政党斗争的结果。毛泽东很早就认为，赫鲁晓夫的上台，就是修正主义的上台。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是一场原则斗争。国际上的阶级斗争主要地是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并且这场斗争将会长期地斗下去。苏联出现修正主义，必然葬送社会主义的前途，把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这就促使了毛泽东思想的变化和工作重点的转移。

在国内，毛泽东认为阶级斗争也是很激烈的。前几年有意地松一下，他们就借机攻一下。而且国内的阶级斗争与国际的阶级斗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在毛泽东看来，庐山会议这一场斗争是阶级斗争，并且还要长期地继续下去的观点是正确的。同时他又在大量的实际材料中，逐渐地形成了这样的看法：由于三年经济困难，社会上的地主阶级乘机起来与共产党斗争，富农、资产阶级也起来与共产党斗争，农村中的封建势力、资本主义势力日益发展，表现了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激烈的斗争。毛泽东认为这些斗争，必然反映到共产党内。他认为不进行一场阶级斗争，不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能巩固的。

历史证明，当时毛泽东坚持反对帝、修、反的斗争的立场

是正确的，但是，他仍然认为中国还存在着地主阶级、富农阶级、资产阶级，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对国内剥削阶级作了夸大的估计。到60年代，应该说地主阶级、富农阶级、资产阶级作为剥削阶级已经消灭了。当然剥削阶级的残余、痕迹或思想还是存在的。这种阶级斗争，是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后的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历史条件下存在的阶级斗争，也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的阶级斗争。其特点是：它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而是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大量的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少量的是敌我矛盾；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也会时起时伏，甚至有时很激烈，如果处理不当还会激化，在一定条件下也有可能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但根据中国的国情，总的趋势是处在社会次要矛盾的地位上，并向着缓和的方向发展。

在60年代抓国内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必要的，但是不能把它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把它作为社会主要矛盾来抓，就必然造成阶级斗争扩大化。

毛泽东还作出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反映到共产党内的判断。这个判断从理论上说是正确的。共产党与社会的各个方面是相通的，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反映到党内也是不奇怪的，然而毛泽东作了夸大的估计。他认为，在最近几年中，党内不少干部已被地主、资产阶级所拉拢和腐蚀，当了他们的俘虏，蜕化变质，成了他们的代理人。党面临着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这一切都在利用我们当前的经济困难，兴风作浪，大有猖狂进攻之势。他作了这样的估计后，就确立了一个新的战略步骤：在抓经济建设的同时，必须抓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不抓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建设是不会成功的。他决心把

这个思想提交给即将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讨论，让全党接受。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根据国内外形势和阶级斗争状况，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强调阶级斗争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是阶级斗争客观的反映。不抓阶级斗争，必然犯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右倾错误。但是，如果把阶级斗争强调到与过去存在着地主阶级、富农阶级、资产阶级时期的阶级斗争一样严重，一样激烈，那就夸大了剥削阶级被消灭后的阶级斗争的地位和作用了，也就是夸大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状况，就必然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历史证明，在抓阶级斗争的问题上，不论犯右的还是"左"的错误，对社会主义建设都有极大的损害。

总之，在1962年春，毛泽东的思想和他的工作重点的转移，是与国际和国内形势分不开的。这种变化和转移虽有其正确的一面，但也存在着错误的一面。其结果，虽有积极的效果，却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一位伟大的领袖，当他的思想、决策是正确时，对国家人民就会作出历史性的贡献；反之，如果他的思想、决策不正确时，那么，是会造成严重损失的。

"七千人大会"后，从全党多数领导人来看，是在不断地纠正"左"的错误，竭尽全力地做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恢复工作，以克服经济困难的形势。这里略举数例可以说明：

例1，1962年2月20日，在刘少奇的主持下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即"西楼会议"。毛泽东因在外地，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会议主要讨论1962年国家经济预算和经济形势，对当时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市场供应紧张、物价上涨、国家财政赤字增多的情况，提出了我国经济仍然处在

困难时期的看法，所以必须要有一个全面的调整时期。必须以农业为基础，对我国经济进行全面的调整和恢复。在会上，陈云作了《目前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重要讲话。他指出，近几年农业有很大的减产，1961 年的粮食产量比 1957 年减少 800 亿斤；基本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家财力的可能性，同现在的工农业生产水平不相适应；钞票发得太多，通货膨胀；城市的钞票大量地转向农村，国家没有足够的工业品回笼货币；城市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实际工资减少很多。针对这些情况，陈云提出了调整恢复国民经济的措施和思想：把 10 年的经济规划分为两个阶段，即 1961 年至 1970 年的 10 年，前一段为恢复阶段，后一段为发展阶段；减少城市人口，精兵简政，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水平，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应该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陈云的讲话，是非常有见地的，充分地表现了他的经济思想。他的讲话对统一党内的认识，特别是对经济困难的程度和调整的速度步骤等认识，起了重要的作用。他把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恢复看作一个阶段、一个时期，而不是一两年的任务。实践证明，他的思想是符合实际，他提出的措施非常有效。他把 60 年代分为两个阶段，是一个高瞻远瞩的战略部署。西楼会议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专程到武昌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同意把今后 10 年的经济规划分为两个阶段的思想，并商定成立中央财经小组，陈云为组长，李富春为副组长。

这次会议后，国民经济的调整恢复进入了全面调整的阶段，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完成这个调整任务。

例2，1962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决定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大队改为生产队，实行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这制度至少30年不变。生产队的规模一般以20、30户为宜。这是经过多年调查研究的结果。尤其是1961年的10、11月全国各地根据中央10月7日指示普遍地进行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工作。其结果表明，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意见，是完全符合广大农民和基层干部要求的，得到他们的拥护和欢迎。一些试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地方，继贯彻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之后，又一次地出现了生产热潮，气象一新，令人兴奋。其根本原因是，解决了人民公社成立后严重存在的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并把生产和分配单位一致起来了。生产队既是组织生产的单位，又是进行经济独立核算的单位。这样做好处是很多的，它必然调动农民及干部的生产积极性。当然，这样做以后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公有化程度没有大队高了，但它符合当时农村的生产力水平，适应农民的觉悟程度，也适合于农村干部的管理才能，受到农民的欢迎。毛泽东曾指出，采取生产大队还是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是关系到党是否脱离亿万农民的重要问题，对农民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导前进，而不能够大步地或跳跃式地前进。中央在指示中对生产队的规模、干部、土地、耕畜、农具、企业、林木、水利、债务等方面的政策都作了明确的规定。

这个指示的下达贯彻，使公社成立以来存在的“左”倾错误，基本上纠正了。

例3,1962年3月2日,周恩来向出席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和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的代表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这是他在继1956年作过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报告后的又一次同一题目的报告。他指出,建国12年来,我国的知识界有了根本的改变和极大的进步;就一般范畴说,应把知识分子放在劳动者之中,重申了他在1956年提出的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观点。随后,他向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说:

> "我国知识分子的状况,已经同解放初期有了很大的不同,新社会培养出来了大量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正沿着又红又专的道路成长。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经过12年的锻炼,一般地说,已经起了根本变化。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

这些论述是完全符合我国当时实际情况的。也是对当时知识分子问题上"左"倾错误的一个深刻的批判。他的讲话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

例4,压低1962年的工农生产计划指标。1962年3月7日,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就计划工作的指导思想发表了意见。他提出,首先要安排好农业和市场。这是关系到当

时5亿农民和1亿多城市人口生活的大问题，是民生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是一项重要的国策。今年的计划首先要满足农业和市场的需要，对于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要痛痛快快地调下来，不要“拒绝伤筋动骨”。4月2日，周恩来在中央财经小组讨论1962年计划会议上说，对1962年的计划要作大幅度的调整，要采取断然处置的办法；减少城市人口要同“拆庙”、“拆架子”结合起来；每个部对企业要进行排队，下决心关一批，并一批，转一批，缩一批；要控制各种购买力，要进行节约，以弥补市场差额；要控制货币投放，控制外汇；要紧缩文教、卫生部门。4月23日，中央开会讨论了1962年的计划。刘少奇针对前一段对困难估计不足的情况作了分析。他提出，对困难要估计多一点，危险就少一点，估计不够就有危险。现在国民经济全面失调，要全面调整，要有秩序地撤退，现在调整计划是否退够，可能明年还要退，关一批工厂才能保一批工厂，现在做得越彻底，情况会好得快一些。现在怕拆摊子，以后就会大拆摊子。于是，到1962年5月国家计委向中央提出的1962年的计划就作了较大的调整：尽可能地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尽可能地安排较多的原料、材料和燃料，增加日用品生产；降低重工业生产指标，钢降到1000万吨，煤降到2.3亿吨；缩小基本建设规模，基建投资减为46亿元，基建项目减少18000多个；1～8月，精减职工850万人，减少城市人口1000万人；对部分商品实行高价销售，以回笼货币。实践证明，这些措施的采取，使国民经济的调整与恢复在1962年内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例5，1962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中央指出，目前还有一些地区

和部门对甄别平反工作贯彻不力，进度很慢。因此要加强领导，加速进行。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迅速地加以平反。于是，各级领导为最近几年来，主要是为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被错误批判和处分的绝大多数人进行了甄别平反工作，也为一部分右派分子摘掉了帽子。

自从1962年春"七千人大会"以后，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和步骤，为争取国民经济的好转而斗争。仅几个月的时间，我国的经济开始好转，首先是农村经济有了明显的好转。

中共中央、毛泽东决定召开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为开好这次全会，在1962年的7、8月间召开了1个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接着又在8、9月间召开了近1个月的预备会议。9月24日至27日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中全会。这3个会议对国际、国内的形势问题、农业问题、商业问题等进行了讨论，并开展了对所谓的"翻案风"、"单干风"的批判。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议》等文件。这次全会一方面对国民经济的调整与恢复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由于毛泽东的讲话，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以及错误地开展了批判"翻案风"、"单干风"等，使这次会议在指导思想上发生了重要的逆转。

毛泽东主持了上述3个会议，并在3个会议上都作了讲话。他的《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严重地估计了当时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形势，把社会主义社会中

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作了绝对化和扩大化的估计，把不属于阶级斗争而对经济工作、对1958年以来党的政策上的意见，对“左”倾错误作的批判，都视作为阶级斗争，把彭德怀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写的申述意见打成“翻案风”，把一部分地区推广的生产责任制打成“单干风”，把李建彤写的《刘志丹》小说打成反党大毒草，因而使党在指导思想上又开始了新的“左”倾错误。

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对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作了这样的论述：

> 社会主义国家有没有阶级存在？有没有阶级斗争？现在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国家有阶级存在，阶级斗争也是肯定存在的。列宁曾经说，革命胜利后，本国被推翻的阶级，因为国际上有资产阶级存在，国内还有资产阶级残余，小资产阶级的存在，不断产生资产阶级，因此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还是长期存在的，甚至要复辟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曾几次反复。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出现这种反复。我们这个国家要好好掌握，好好认识，好好研究这个问题，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中层和基层干部，老干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所以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毛泽东的这个论断，对社会主义国家一定范围存在的阶

级斗争作了扩大化和绝对化的估计。他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内还有剥削阶级、阶级斗争是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论断，是不符合实际的。

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被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接受了。十中全会的公报写道：

"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1959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的重大历史意

义，在于它胜利地粉碎了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进攻，维护了党的路线和党的团结。无论在现在和将来，我们党都必须提高警惕，正确地进行两条路线上的斗争，既要反对修正主义，也要反对教条主义，只有这样，才能永远保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不断地加强党的团结，不断地提高党的战斗力。"①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接受了毛泽东提出的关于阶级斗争的分析和论断，并且写入了决议和公报中，成为全党的一个指导思想和方针。但是，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中写的是讲阶级斗争，而毛泽东讲的不仅存在着阶级斗争，还存在着剥削阶级。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在中国自三大改造任务完成后，剥削阶级已基本上被消灭了。所谓一定范围内存在阶级斗争的含义，主要是认为剥削阶级已被消灭了，但阶级斗争还存在，然而只是在一定范围内。毛泽东强调剥削阶级的存在，是对我国剥削阶级状况的一种过分严重的估计，是造成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前提。当然他的用意是要全党重视阶级斗争。他批评大区一级同志，说他们中有人听说国内还有阶级的存在就大吃一惊。他说，只有资产阶级右派才不承认有阶级的存在，认为没有阶级了，不要改造了。承认不承认阶级斗争，这是个基本问题。

关于形势问题，毛泽东作了这样的论述：有国际的国内的形势。在国际形势中，帝修反到底情况如何？要找几个同志研究准备后再讲。国内形势如何？过去有些同志认为是一片

① 1962年9月29日《人民日报》。

光明，现在又认为是一片黑暗，是不是这样？有没有第三种看法？我看不是一片黑暗，也不是一片光明，而是基本上是光明的，有问题而且还不少。两年调整，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但做得不那么好。以农业为基础，从1959年到1962年，已有4个年头，实际上没有实行。中央的东西有些没有贯彻下去。有些人思想混乱，对前途丧失信心，这是不对的。

毛泽东对国内形势的估计和分析是光明面是基本的，看不到这基本方面，必然丧失信心。但他又指出了问题。贯彻八字方针不力，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也不力，这就影响了国内经济的迅速好转。

关于矛盾问题。毛泽东又作了这样的论述：有两类矛盾，一类是敌我矛盾，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在敌我矛盾中，关于捕人、杀人的问题需要正确处理。现在虽然是“不可不捕，不可不杀”，但不可多捕，多杀。凡是可捕可不捕的，可杀可不杀的，都要坚决不捕、不杀。有个潘汉年，没有杀他。有个王实味，后来杀了。这是保安机关在行军中把他杀的，不是中央的决定。对于这件事，中央总是提出批评，认为不应当杀。人要少捕少杀，动不动就捕人、杀人，会弄得人人自危，不敢讲话。但也要看到还有反革命，看不到不好，看得太严重也不合乎事实。

以上是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关于阶级斗争，关于国内形势，关于敌我矛盾的论述。这些论述，有的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有的则是错误的。比如，他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着阶级斗争，存在着敌我矛盾。由于国际上资产阶级的存在，修正主义的存在，是国内

阶级斗争存在的客观环境；由于国内地主阶级、富农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残余的存在，剥削阶级思想意识的存在，是国内阶级斗争存在的社会基础。在当今世界中，要想在一个国家内消灭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的。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相互间必然有影响和渗透。社会主义国家中，虽然剥削阶级已消灭了，但阶级斗争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国家确实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因素和可能性。毛泽东在60年代指出这个问题是有远见的。毛泽东强调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目的是要全党防止犯右的错误，犯阶级斗争熄灭论的错误，以保持清醒的头脑，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他强调要正确处理敌我矛盾的思想也是正确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敌我矛盾虽然不多了，但确实还存在。他强调贯彻八字方针，贯彻农业为基础的思想也是正确的。

但是毛泽东认为，我国还存在着剥削阶级，也过分地夸大了阶级斗争的严重性，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不是阶级斗争的问题混淆为阶级斗争，或者把正确的当作错误的批判，并上纲上线。这是完全错误的。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把邓子恢提倡的生产责任制，把安徽省推行的生产责任制，当作搞单干，刮单干风加以批判；把彭德怀写给党中央的申诉信，说明他没有反党更没有组织反党集团等问题，说成是搞翻案，刮翻案风，加以批判；听从了康生的诬告，把李建彤写的传记小说《刘志丹》，说成是利用小说反党，并组织专案组，审查支持写《刘志丹》小说的习仲勋等人。这对全党和全国产生深刻的影响，使全党接受了剥削阶级还存在的思想、阶级斗争十分严重的思想，并以此为指导，开展阶级斗争。这势必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

总之，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剥削阶级的存在和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反映了他的思想和注意力在转变，从此以后，他越来越认为，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必须抓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工作。从而也使党中央的指导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偏移。开始了一方面抓国民经济的调整恢复的工作，另一方面也开始抓阶级和阶级斗争了。当然，对于抓阶级斗争的问题，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中在认识上也不是完全一致的。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毛泽东接受了刘少奇等人的建议，指出：不要因强调阶级斗争放松了经济工作，要把经济工作放在第一位。毛泽东的这句话是很重要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在一段时间内党中央仍把经济工作放在了第一位，这是关系到十中全会后全党工作方向的问题。但是从理论、思想上说，全党已接受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到一定时候，抓阶级斗争将成为全党第一位的工作。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标志着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又一次被全党接受，并逐渐成为党的主导思想。

5.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毛泽东写于1963年的一篇著名的哲学著作。他以通俗的语言，深刻地论述了人的认识问题。

毛泽东认为，在党内有不少干部不懂得这个道理，不能正确地认识客观现实，回答不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为此他在1963年写下了这篇名著。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虽然是一个大题目，但他的文章写得很短。

这篇著作被当作在四清运动的指导文件《前十条》之中。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问题的讲话没有很快得到贯彻。从全国和各省市情况看，主要任务是抓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恢复工作，争取经济的全面好转。同时，对于抓阶级斗争的问题，也确实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毛泽东走了11个省了解情况，其中只有两个省抓了阶级斗争，9个省没有抓。向毛泽东作汇报时，只有两个省滔滔不绝地讲述他们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其他的省没有开展，讲不出来。宋任穷、刘建勋等两人在报告中都作了检查，说十中全会后他们没有抓阶级斗争。就中共中央说，主要力量也是放在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恢复上。当然也抓了一些。例如，1962年11月9日，中共中央作出了撤销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决定，其业务工作合并于国务院农村工作办公室，由谭震林兼任主任。这决定的作出，不是说中央不抓农村工作了，而是针对着邓子恢的。因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批判了以邓子恢为代表的所谓刮"单干风"的问题。

毛泽东十分重视农村工作。他对11个省的考察，除重视抓阶级斗争问题外，还十分重视抓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贯彻。

为贯彻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精神，毛泽东于1963年2月11日至28日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务院各部党组等负责人131位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制定了《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

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关于严格管理大中城市集市贸易和坚决打击投机倒把的指示》、《关于全面完成和力争超额完成精简任务的决定》等文件。会议讨论了1963年国民经济计划。会议印发了《湖南省委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报告》和《河北省委关于在农村贯彻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决议,开展整风运动情况的报告》。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讲话。他肯定了湖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河北保定地区开展清账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务的做法和经验。对此,毛泽东作出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论断。他要求各省市的领导要认真抓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教育干部和群众;强调要抓好阶级斗争,要把那些牛鬼蛇神打下去。这次会议,为在全国部分农村开展"四清"运动、部分城市开展"五反"运动作了准备。同时也使党内有更多的人转过来重视抓阶级斗争。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是毛泽东在十中全会后抓阶级斗争工作中做的第一件事。

这时,国际和国内出现了许多复杂的形势,明显地表现了严重的阶级斗争事实,这使更多的人开始认识到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是深谋远虑的,是非常正确的,不抓阶级斗争,要犯原则性的错误,促使党内不少人很快地转向抓阶级斗争了。

其一,蒋介石集团策划窜犯大陆。他们在美国的支持下,于1962年春起成立了以蒋介石、陈诚为首的5人"反攻行动委员会",作为窜犯大陆的最高领导和决策机构,经过半年的准备,他们于1962年10月至12月组织了第一次大规模窜犯大陆的行动,到1965年春,先后5次窜犯大陆。对于这件事,中共中央不得不作必要的准备,也不得不动员全国人民提高警惕,防止大陆上阶级敌人的乘机捣乱和破坏,并要求东南沿

海军民作好一切准备，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把它消灭掉。无疑，这场斗争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是全国人民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长期斗争的继续。这场斗争也给全党和全国人民以较大的震动和影响，同时也增加了抓阶级斗争的气氛，使党内不少人把放松了的阶级斗争的弦又绷紧起来。

其二，发生了中印边界冲突。这是印度方面一部分人策划挑起的。中印边界虽然有不少历史问题没有解决。但是中印边界一直是安宁的。然而到1962年10月20日，印度调集了十几个旅的兵力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中国边防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不得不奉命自卫还击。中印边境冲突，到12月1日中国边防部队主动从中印边界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才缓和下来。中印边境冲突，也增强了抓阶级斗争的气氛。

其三，中苏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苏联政府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不是站在公正的立场上，谴责印度政府中一部分人的错误做法，而是不顾事实，颠倒是非，公开地站在袒护印度政府的立场上，指责中国政府不应该进行自卫反击，这就公开地把中苏两党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又一次扩大到中苏两国的关系上，使中苏关系趋于恶化。不但如此，苏共中央多次地利用其他国家共产党召开党代表大会的机会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先后利用保加利亚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攻击中国共产党，以及利用匈牙利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攻击中国共产党，利用意大利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等攻击中国共产党，从而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中苏两党两国的论战和分裂愈演愈烈。特别

是在我国新疆伊犁地区进行颠覆活动，制造事端，干涉我国内政，使中苏关系更加恶化、更加紧张。

其四，在城乡干部中存在着严重的政治经济问题。在传达和贯彻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精神中，各省市自治区开始抓阶级斗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发现城乡干部中存在着严重的政治和经济问题。如湖南、河北省在试点中，发现了公社的帐目十分混乱，县、区、社的干部中有严重的政治、经济问题；有的省也查出了大量的投机倒把、贪污盗窃、地富反攻倒算的案件，封建迷信、反动会道门以及反革命事件也不断发生。

以上四个方面，使人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国际上帝修反正在向中国进攻，挑起了一件又一件事端；在国内，不仅蒋介石企图反攻大陆，而且地富反坏分子也在蠢蠢欲动，磨刀霍霍，干部中有不少人蜕化变质，被敌人拉了出去。阶级斗争不但是存在的，而且是严重、激烈的。在这样的形势下，抓阶级斗争的问题越来越提到了全党工作的第一位。

此时，中共中央也作出了能影响全党抓阶级斗争的决定。

1962 年 12 月 11 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安徽省委《关于第一批改正“责任田”的总结及今后的工作部署的报告》。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安徽省委有计划地对实施责任田做法进行了改正，并认为责任田推行不到两年中已明显地暴露出许多严重的恶果：生产资料的支配权已逐渐转移到个人手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生产上不能统一计划，不能统一使用劳动力；统一分配受到破坏，集体和国家利益受到损害；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农民中个人主义、自私观念日益发展，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逐渐削弱。在农村中，有少数富裕农民，由于劳力多，劳力强，分田多，资金足日益富

裕起来；一部分思想不好的干部利用职权包好田，包近田，包产低，优先使用耕畜、大农具等，这些农户超产多，收入大，有的成了暴发户。但有些农户，由于劳力少，劳力弱，分的田又不好，资金不足，赔产的很多，这些户成了贫困户。在农村中富裕户越来越富，困难户越来越穷，雇工、放债、出租土地、投机倒把等剥削行为随之发生。为此，安徽省委作出了改正实行责任田的做法。由于中央对安徽省委改正责任田的情况报告的批转，其他省也很快地取消了责任田。在当时都把责任田当作"单干风"加以纠正的。在中国农村中适合农民要求的责任田运动又一次在中国一部分大地上兴起的时候，又被当作刮"单干风"被打下去了。这个教训是十分深刻的。什么是单干、什么是责任田，不少领导人不是从实际出发作出判断，而是以八届十中全会精神作根据。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所以作出这个错误的判断，主要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作风和思想方法造成的。而安徽省委作出的错误判断，主要是唯上主义造成的。他们怕被批判，怕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怕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刮单干风的帽子，不惜牺牲农民的利益，写出了这样错误的报告。

1963年1月21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组织工作会议纪要》，并写了一个很长的批示。在批示中，明显地表现了中央对党内状况的分析和估计的"左"的观点。其中指出：党要管党。现在党的队伍中有一些不合格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中央认为，有必要在重新教育党员的基础上，对党员进行一次重新登记。在进行重新登记党员试点的地方，可以结合进行建立共产主义小组的试点。必须把党的基层工作的正常秩序建立起来。管理党员和管理干部是党的建

设中的两项主要工作。当时中央认为，在党内出现了“蜕化变质分子”，要通过党员的重新登记把他们清除出去。

1963年1月22日，中共中央又批转了中宣部、中组部《关于一年来轮训干部工作的情况和今后意见向中央的报告》。报告说，到1962年10月止，全党参加轮训的干部共11.4万人，其中县委书记一级以上的干部为9.7万人，占计划轮训干部的57%。针对这情况，今后意见是：今后轮训干部，主要是学习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文件，以提高全党干部的思想觉悟，正确认识当前的阶级斗争、当前的形势和矛盾问题，加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

以上所举，说明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中央和各省市开始抓阶级斗争了，对党内状况的分析估计也开始有所变化。这一切在毛泽东看来，还是很不够的。是不可能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的，也是没有抓住根本的。他在1963年2月11日至28日，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阶级斗争问题，作出开展阶级斗争的新部署。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推动全党抓阶级斗争。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湖南、河北省委作了经验介绍。特别是湖南省委在介绍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中说，他们在运动中发现，在县级干部中，有6%至8%的干部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在区、社两级干部中，有问题的人更多。毛泽东根据他的调查和会议提供的材料，提出了要求各地区都要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工作，要抓紧阶级斗争的意见。最后会议作出决定：在最近几年内，城乡都要进行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3年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由中央工作会议制定的《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

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这个指示是继1959年庐山会议作出的关于反右倾指示后又一个开展新“五反”运动的指示。开展这个运动的目的，在指示中明确指出：

“目前国内政治、经济和其他各方面的情况，都是好的。为了保证1963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财政预算的完满实现，争取经济情况进一步的全面好转，使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国民经济得到更好的发展，为了健全制度，改进思想作风，克服和防止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腐蚀，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中央认为，有必要在全国范围内，有领导、有步骤地开展一次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简称五反）的运动。”

新“五反”运动是在抓阶级斗争、反修防修的口号下进行的。在指示中，中央对基层干部中存在的问题作了这样的概括：

“最近几年，在我们一部分干部中，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确实有所滋长。突出的表现是：损大公、肥‘小公’，打埋伏、耍手段，只顾局部、不顾大局的损害国家利益的分散主义、特别是本位主义滋长起来了；贪图个人享受、讲排场、铺张浪费、假公济私、走‘后门’、破坏制度、损人利

己、多吃多占、滥用国家资财、挥霍人民血汗的现象，也滋长起来了。尤其严重的是，贪污盗窃国家资财、投机倒把、长途贩运、私设地下工厂、牟取暴利等破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资本主义的活动猖狂起来了，并且新生长起来一批资产阶级分子和一股资本主义势力。这些，已经严重地障碍着我们事业的前进。一切同社会主义利益不相容的现象和作风，必须坚决纠正。一切损害社会主义事业的行为，必须坚决地反对。一切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破坏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必须坚决打击。"

"在最近几年滋长起来的许多损害社会主义的现象，都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队伍中间的反映。一切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活动，实际上都是资本主义势力的复辟罪行，是激烈的两条道路的斗争。目前我们要开展的'五反'运动，是又一次大规模地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这次运动的胜利，必将大大促进我国经济情况的好转，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大大地推进一步。"

党中央作出了这样的判断：在中国的城乡中有一股资本主义势力在形成，一批资产阶级分子在不断地出现，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最危险的因素。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必须铲除这些毒害。无疑，这是毛泽东的分析和判断。这个判断实践证明是夸大的，是不切合实际的。

中央工作会议后，各省市自治区的工作都有一定的转变：抓阶级斗争、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抓新"五反"运动了。到1963年5月，毛泽东收到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大区书记们

写的报告，共有20件。在毛泽东看来，对农村的形势和存在的问题已基本摸清了。于是，他在浙江杭州主持召开了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讨论会。会议从5月2日开始到12日结束。会议主要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多次讲话。在5月7日、8日、11日的讲话中反复地讲了形势问题、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认识问题、社会主义教育的要点问题、四清问题、开展运动的方法问题。这些思想后来都写入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中。

《前十条》是开展农村四清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的文件。毛泽东十分重视这个文件。在文件的一开头有这样一段话：

> "目前农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除了中央已经作出决定或指示的以外，还有若干问题需要作出决定；有些则是在过去指示中提出来了。但是不明确，不系统，尚未引起人们注意，需要重新加以明确的系统的说明。这些问题共有十个，都是互相联系的。我们对于这些问题是经过了建国以来的十三年的实践，才能写出一个比较完整的文件，特别是在近三年中，即1960年中央发布农村整社工作十二条起，直到今天，才能写出现在这个决定。"

可见，这《前十条》是作为纲领性文件制定的。毛泽东写下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放在文件的前言部分。毛泽东说：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①

毛泽东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用通俗简明的语言向全党干部讲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基本观点，以此武装全党和全国干部，要求他们不要犯认识上的主观主义、作风上的官僚主义错误。

毛泽东把这篇短文放在《前干条》中是有针对性的。当时在党内有不少干部对阶级斗争的现实熟视无睹、麻木不仁，他要讲人的认识论、人的思想、物质与精神的关系等问题，不失为一篇著名的哲学著作。

在会议期间，毛泽东还作了好几个批示。5月8日，毛泽东对宋任穷、刘建勋的报告作了批示；5月10日，以中共中央名义作出了关于抓紧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批示。毛泽东称赞他们的报告，认为他们的做法可供各地参考。社会主义教育是一件大事，请大家检查一下自己在这方面的认识和工作，检查一下是不是抓住了要点和采取的方法是否适当，查一查是否还有很多的地、县、社没有抓住这方面的工作。如果有的话(看来一定是有的)，应当在农忙间隙，在不误生产的条件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39页，1986年8月，人民出版社出版。

下，抓住进行。上半年做不完，可以在下半年做。今年做不完，可以在明年做。特别要注意分步骤的方法、试点的方法和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的政策。

5月9日，毛泽东对浙江省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等问题的7份材料作了批示。他十分赞扬浙江省的干部以及山西省的干部参加劳动的举动。他的批语是：

> "我们希望争取在三年内能使全国全体农村支部书记认真参加生产劳动，而在第一年，能争取有三分之一的支部书记参加劳动，那就是一个大胜利。"①

对于干部参加劳动，毛泽东看得特别重要。在这个批语中他还写了这么一段：

>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的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292～293页，1996年8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①

毛泽东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看成是一场反修防修、使中国不改变颜色的斗争。他认为，现在有的国家已变了，苏联也正在改变，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在改变中，中国也有可能改变。要使中国不改变颜色，只有把这场斗争进行下去。广大干部只要看到问题的严重性，经过调查研究，收集了可靠的材料，加强了政治领导，那么一个公社有几个星期就够了，一个县有几个月也就够了，一个省分期分批地搞深搞透，大约需要一两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

他把这场斗争看成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与命运的斗争。他警告全党，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的运动。由于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使我们的党进一步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的党，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的干部。毛泽东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看作是教育和挽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292～293页，1996年8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救干部的运动，是制止党内干部腐化变质的运动。他认为，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关键，是百年大计。他说，这一次教育运动完成以后，全国将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他充满豪情地说，差不多占地球四分之一的人类出现了这样的气象，我们的国际主义贡献也就会更大了。他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抱有极大的希望。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抓得很紧。

历史是公正的。严酷的政治斗争、阶级斗争的现实证明，毛泽东抓反修防修的斗争，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目的是使国不变色、党不变修。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另一个方面是，毛泽东把阶级斗争的存在和剥削阶级的存在混淆了起来。他在1963年前后强调阶级斗争可以说是必要的、正确的。但是强调剥削阶级的存在就不符合事实了。当时在中国并不存在着剥削阶级。同时他强调阶级斗争也有过分的地方。1963年前后，阶级斗争表现得尖锐激烈，这是时起时伏中尖锐时期的状况。毛泽东以此为根据作出了一系列的判断，并写进了《前十条》中。例如：

“在1962年8月北戴河会议和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反复地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这段论述的错误之处是，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剥削阶级。当时把这错误作为正确的加以肯定，则必然导致阶级斗争理论和实践的错误。

毛泽东还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特点和规律作了阐述。有的观点是正确的。他指出，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具

有长期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因此，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领导和团结全党、领导和团结全体人民群众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确实是长期存在的。在一般情况下，它虽然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但它时起时伏，有时甚至激化，或者上升为主要矛盾。因此，必须正确地处理阶级斗争问题。同时实践也证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混杂在一起的，是很难区分和处理的，表现了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如果把敌我矛盾误认为人民内部矛盾，则要犯右的错误；如果把人民内部矛盾误认为敌我矛盾，则要犯“左”的错误。要求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然后正确地加以处理。

到1963年5月，毛泽东主持起草《前十条》的时候，他的思想和注意力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62年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虽然要求全党重视阶级斗争，但又同时提醒全党不要放松经济工作，要把经济工作放在第一位。可是，到1963年5月起草《前十条》时，毛泽东不仅把自己的思想和注意力转移到如何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使中国不改变颜色上了，而且还要求全党特别是县以上的干部必须全力抓阶级斗争。他认为，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社会主义建设才会成功。他从理论到实践，提出一整套反修防修的路线、方针、政策、措施。他认为，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由于毛泽东把抓阶级斗争、抓反修防修放在一切工作的第一位，必然促使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各级领导不得不抓阶

级斗争、抓反修防修的工作，也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展工作了。

6.在中苏论战中

在中苏论战中，毛泽东担当了总司令的职务。这场论战，虽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或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但是，它的最基本方面是正确的。这是一场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是独立自主、平等协商、和平共处等处理共产党之间、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准则与赫鲁晓夫推行的霸权主义、民族主义、一切由他说了算的家长式统治之间的斗争；是按照本国实际情况建设社会主义与一切听从他的指挥，推行教条主义之间的斗争。通过这场论战，出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之间关系上的新局面。

毛泽东不仅指挥中国共产党进行这场斗争，而且还提出了一系列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思想和理论。

1960年4月，为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红旗》杂志社编辑部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了《沿着伟大的列宁道路前进》、陆定一发表了《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等3篇文章，详尽阐述了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争论的焦点：关于当代帝国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这些观点坚持了列宁主义思想，明确回答了当代的问题。为了顾全大局，坚持团结，文章没有公开点名批评苏共领导人的错误。此时，中苏论战

的全面爆发已不可避免。当然，这场论战推迟到1960年公开爆发，还在于中共的一再忍让。中共考虑到中苏两党和两国的团结，对世界局势的稳定是起着重要作用的。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作了最大的忍耐，作了不少的退让，到1960年下半年，中苏论战由于赫鲁晓夫的背信弃义已扩大到中苏两国关系上，并公诸世界了。

中苏论战全面爆发的标志，是1960年6月召开的布加勒斯特会议。6月初，苏共提出，利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机会，举行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交换对国际局势认识的意见。对此，中共提出，不应当匆忙地召开这次会议，也不应当只召开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主张作充分的准备，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苏共赞同中共的上述意见。两党商定，在布加勒斯特会议期间可以就这个国际会议召开的日期和地点，交换意见，但不作任何决定。中共并派出了以彭真为首的代表团出席了会议。

但是，赫鲁晓夫背弃诺言，在会上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攻击中共。6月21日，苏共代表团向参加会议的各国党的代表团散布了给中共的通知书。这是苏共挑起全面论战的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对此，中共代表团发表声明："中共中央将在仔细研究后进行详细答复，阐明两党之间的原则分歧和有关事实真相，并且将同各兄弟党进行严肃的认真的同志式的讨论。"6月24日至26日，又举行了各兄弟党参加的代表会议，约定对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会议的日期和地点交换意见。然而，会议在赫鲁晓夫的挑动下对中共代表团进行了围攻，骂中共是"疯子"、"要发动战争"、"把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的旗

帜拿起来”、“中共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是纯粹的民族主义”等等。不仅如此，还迫使会议一定要通过会谈公报。至此，中苏论战全面爆发了。

赫鲁晓夫的这个做法，“完全破坏了历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兄弟党之间协商解决共同问题的原则”，“这是滥用苏联共产党从列宁以来长期形成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威信，极端粗暴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这种态度同列宁的作风毫无共同之处，这种做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了一个极端恶劣的先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取决于各国共产党和各国人民的要求和斗争，取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而绝不是取决于任何个人的指挥棒。而赫鲁晓夫采取的是家长式的、武断的、专横的态度。他并不把两党之间的关系看成兄弟党关系，而是看成父子党关系，企图用压服的办法，使中共听从他的指挥。中共代表团不能接受苏共提出的会谈公报草案，并提出了自己的修改草案，建议予以讨论。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最后通过了一个各国党都同意的公报。

但是，赫鲁晓夫对此十分恼火和不甘心。会后，他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把两党的分歧完全扩大到两国关系上。1960年7月，苏联政府突然片面决定，在一个月内撤走全部在中国的1390名专家，撕毁343个专项合同和合同补充书，使中国正在建设中的大批项目无法继续进行。这种做法，在国际关系中是绝无先例的。至此，中苏关系完全破裂了，把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颠倒了过来，放在敌对的位置上了。

中共为寻求解决分歧、达到团结的途径和办法，1960年9月10日对苏共6月21日给中共的通知书，作了全面的答复，并提出了五项建议，同时派出代表团前往莫斯科会谈，但都没

有获得积极的结果。相反，苏共利用1960年11月召开的81国兄弟党参加的莫斯科会议又发动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对中共的攻击。苏共在会议上公布了一份长达6万字的信攻击中共，表现了苏共要控制一切、指挥一切的态度和目的。但是，苏共的做法受到不少与会者的批评。这就打破了长期以来形成的批评不得苏共，一切由苏共说了算的局面。

1961年10月，苏共召开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中共中央仍然派出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参加会议。赫鲁晓夫却在会议上再一次批判斯大林，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公开号召推翻该党的领导人，这种做法是极其恶劣的。对此，周恩来用提前回国来表示对这种做法的愤慨。周恩来乘飞机回到北京的时候，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到机场迎接，以表示对赫鲁晓夫错误做法的指责。

苏共二十二大后，在苏联报刊上每年都要发表几百篇文章攻击中共，这种做法，在国际关系中是十分罕见的。不仅如此，还制造事端，加剧两国紧张关系。到1962年，在苏共领导人的指挥下，已有5个兄弟党的代表大会攻击中共，已有40多个兄弟党发表决议、声明攻击中共。对此，中共从1962年12月15日到1963年3月8日，发表7篇文章予以答辩。但在这些文章中，仍然留有余地，没有对苏共领导进行公开指名批评，并同意派代表团前往莫斯科举行会谈。在1963年6月14日中共答复苏共的信中，又提出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

这个建议的基本思想和观点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有不少地方是毛泽东的观点或原话。

首先，它概括了一条现阶段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

线："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

其次，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关于世界基本矛盾的理论："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者向来认为，这些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垄断资本集团同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

其三，它坚持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在帝国主义国家中，在资本主义国家中，要彻底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必须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政党对待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必须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从革命的观点出发，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为依据。"

它还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观点，正确地解释了列宁关于和平共处的原则，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坚持了列宁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相互关系的完整学说，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间、共产党之间关系的准则，特别是提出了关于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和开展反对机会主义斗争的理论。

在这篇文章中还阐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条重要的经验：革命能不能得到发展和胜利，取决于有没有一个无产阶

级的革命党。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是一篇极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的论著。然而苏共赫鲁晓夫根本听不进去，不予接受。在中苏两党会谈前夕，苏共采取发表声明、通过决议等方式，指名攻击中共，并驱逐中国驻苏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和在苏联学习的研究生。在会谈期间，1963 年 7 月 14 日，苏共发表了致苏共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又一次挑起了中苏论战的高潮。随后，在苏联报刊上发表了近 300 篇文章攻击中国，规模之大已超过了过去任何一次。对此，《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从 1963 年 9 月 6 日起到 1964 年 7 月 14 日止发表了 9 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全面地论述了中苏两党、两国关系中的重大问题，深刻地反映了中共在原则问题上的立场。

毛泽东对这 9 篇文章的发表，可以说是作为头等大事来抓的。在这 9 篇文章中，有的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证明是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但也有的是属于“左”倾观点的文章，或者在文章中反映了“左”倾观点。

赫鲁晓夫执政期间在处理中苏两党和两国关系上确实犯了严重的错误，中苏论战所以全面爆发，他是有主要责任的，他一再地挑起事端，使分歧愈演愈烈，论战的规模越搞越大。1964 年 10 月 12 日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通过决议，撤销了他的一切职务，并在决议中指责了赫鲁晓夫加剧中苏分裂的罪责。中共的文章只发表到九评，就没有再发了。其目的是为了改善中苏关系。对此，中共曾抱很大希望。

赫鲁晓夫下台后中苏关系仍然没有多大的改善，但中苏论战逐渐地缓和下来了。

中苏论战从分歧的出现到论战的全面爆发，前后长达9年时间，这对中苏两党两国关系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这场论战，反映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的关系，不管各自的历史长短，人数多少，贡献大小，应当在马克思主义原则下一律平等、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的问题，反对包办一切，操纵一切，干预一切，对于不同的意见只能采取协商讨论的办法，绝不能采取强制压服的办法，更不能容忍以“老子党”自居的蛮横态度。经过这场斗争，各国党在相互关系上逐渐地形成了以独立自主、平等协商的原则处理各种问题的正常局面，摆脱别国党的操纵和控制已成为历史发展的潮流。一个党说了算，其他党绝对服从的时代已成为历史。各国党迫切地要求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领导本国人民开展革命斗争和经济建设，反对一个中心、一种模式、一条道路的局面已经出现。这点不能不说是这场论战所带来的一个积极的成果。也就是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国关系的正常局面开始形成了。

这场论战，反映了社会主义各国在革命和建设上，必须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和条件进行，必须将马克思主义与本国的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反对教条主义，绝不能只搞一种模式，其他国家照抄照搬就行了。在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上，必须是独立自主、相互平等、相互尊重、共同协商，绝不能采取大国沙文主义，以强欺弱，占据别国的领土，损害别国的利益。从60年代以后，社会主义各国开始走上根据本国国情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独立地处理本国的问题，这也是这场论战所带来的又一个成果。

这场论战，反映了赫鲁晓夫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

者。他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在对外政策上，他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在处理兄弟党和国家关系上，他滥用了苏联共产党的权威，想指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也不适当地利用苏联国家的权力，企图干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事务，干预世界的一切事务，并采取了一系列损害别国利益的措施。他甚至采取军事手段，占领别国的领土。这场论战，对赫鲁晓夫推行的大国沙文主义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使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败。赫鲁晓夫反对了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却建立了他自己的个人迷信，发展了专断作风。但他已不是处在过去的时代，他也没有像斯大林那样有如此巨大的贡献，反对赫鲁晓夫个人迷信和专断作风的斗争在他执政的时期就开始了，这必然导致他的下台。

这场论战，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开展这场斗争对修正主义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兄弟党之间恢复正常关系作出了贡献，也使自己摆脱了修正主义、教条主义的束缚和影响，在斗争中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提高了自己的地位，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在斗争中，中共坚持原则，不怕压力，不屈不挠。但是，也必须指出，在论战中也反映了中共在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在反修防修的口号下，提出了不少过“左”的理论和观点，特别是把党内斗争和国内斗争中形成的一些“左”倾观点，带到了这场论战中不适当地批评了一些兄弟党和兄弟国家；同时又把论战中形成的一些不正确的观点，注入到党内、国内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开展了一些过分的批判斗争运动，把不是修正主义的东西当作修正主义来批判。这是在一种“左”的观点、思想指导下发生的，

是过分的、错误的，应当纠正。我们也要记取这个教训。

中苏论战虽然已经过去几十年了，已成为历史。几十年后的事实，充分地证明这场论战的积极意义和后果，苏联的解体、苏联共产党的被取消，东欧各国的演变，充分证明在论战中，毛泽东提出的反修防修的重要性和正确性。也再一次表现了毛泽东在修正主义刚刚泛滥的时候，已看到了它的后果，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不愧是一位顶天立地的伟大领袖，他的高瞻远瞩，深谋远虑，是永远值得世人钦佩的。他把中国共产党锤炼成一块真正的好钢，为迎接伟大的斗争奠定了基础。

7. 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

1963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后，国际上的反共反华出现了新浪潮。给中国极大的压力。但在毛泽东看来，这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现象，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把压力转化为动力，举起了反帝反修的大旗，开始了“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战斗。

他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1963年8月8日，毛泽东发表声明和谈话。他说：

“我呼吁，全世界白色、黑色、黄色、棕色等各色人种中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开明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其他开明人士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种族歧

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在美国压迫黑人的，只是白色人种中的反动统治集团。他们绝不能代表白色人种中占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其他开明人士。目前，压迫、侵略和威胁全世界绝大多数民族和人民的，是以美国为首的一小撮帝国主义者和支持他们的各国反动派。他们是少数，我们是多数。全世界30亿人口中，他们最多也不到百分之十。我深信，在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的支持下，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是一定要胜利的。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也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①

毛泽东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是一个深谋远虑的思想。他看到了全世界人民有色人种的多数状况总有一天会起来彻底埋葬殖民制度的。他在发表上述声明时，与非洲的朋友作了重要的谈话。其中说到：

"在非洲、亚洲和全世界各地都有种族歧视的现象。种族问题实质上是阶级问题。我们的团结不是种族的团结，而是同志、朋友的团结。我们要加强团结，共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他们的走狗，为争取完全彻底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而斗争。"

① 《新华月报》1963年9月号。

"可以证明，人民的革命是能够胜利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是能够打败的。整个非洲现在都处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殖民主义的浪潮中。不管已经获得独立的国家，或者还没有获得独立的国家，总有一天是要获得完全彻底的独立和解放的。整个中国人民都是支持你们的。非洲人民正在一天天觉悟起来，全世界人民都在一天天觉悟起来，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以及其他所有革命的人民，都能够团结起来，争取革命的胜利。"

"被压迫人民争取彻底的解放，首先是依靠自己的斗争，其次才是国际的援助。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的义务。"

毛泽东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是全力支持的。他不仅在道义上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而且在物质上也给予大力的支援，即使是在中国人民经济最困难的时候，毛泽东也是极力支持的。这对非洲国家的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解放斗争是一个莫大的鼓舞，使他们真正地认识到中国人民是他们的朋友。毛泽东一贯地认为，被压迫人民的彻底解放，首先是依靠自己的斗争，没有这点是不可能的；其次才是国际的援助。这个思想是非常正确的。这就是毛泽东一贯强调的必须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原则。作为中国人民，虽然自己获得了独立和解放，但必须看到全世界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和民族没有获得解放，必须支持他们的正义斗争，为争取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而斗争。毛泽东一贯强调要发扬国际主义

的精神。

1963年8月29日，毛泽东又发表了《反对美国——吴庭艳集团侵略和屠杀越南南方人民的声明》，以支持越南南方人民的正义斗争。他在声明中说：

"最近，南越吴庭艳反动集团加紧对越南南方的佛教徒、大中学校的学生、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进行血腥镇压，中国人民表示极大愤慨，并且强烈谴责吴庭艳集团的这一滔天罪行。"

"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决不能把自己的解放寄托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明智'上面，而只有通过加强团结，坚持斗争，才能取得胜利。越南南方人民就是这样做的。"

"越南南方人民反对美国——吴庭艳集团的爱国正义斗争，不论在政治上或者军事上，都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我们中国人民是坚决支持越南南方人民的正义斗争的。"

"我深信，越南南方人民一定能够通过斗争实现解放越南南方的目标，并且为祖国的和平统一作出贡献。"

"我希望，全世界工人阶级，革命人民和进步人士，都站到越南南方人民的正义斗争一边，……反对美、吴反革命集团的侵略和压迫，使越南南方人民免于被屠杀，并且获得彻底的解放。"①

① 《人民日报》1963年8月30日

中国人民对越南人民的支持和援助，是全世界人民所瞩目的事实。中国人民不仅支持越南南方人民的斗争，而且长期地支持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反帝爱国斗争。中越两国人民一直是友好相处的，相互支援的。中国人民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得到了越南人民的支援，同时，中国人民也不断地支援越南人民的反帝斗争。中越两国人民之间是有着深厚的友谊的，即使在中国很困难的时候，中国人民也尽力支援，中国人民是尽了国际主义义务的。假若没有中国人民的支援，越南人民要长期坚持反帝斗争并取得最后的胜利，是很困难的。特别是毛泽东对越南人民的支援，是一贯的，也是十分慷慨的。从武器到粮食，大批地、长期地运往越南，支持越南人民的反帝斗争。这是有目共睹的。毛泽东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坚持一条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争取反帝斗争的全面胜利。

毛泽东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有着一个极其重要的战略思想和目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对这战略思想和目标曾作了科学的阐述：

>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是当代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是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地区，是目前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
>
> 这些地区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同国际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是当代的两大历史潮流。

这些地区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是当代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严重地打击着和削弱着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统治基础，是当代保卫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

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来，整个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终究要以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这些地区的人民革命斗争为转移。

因此，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绝不是一个区域性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国际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事业的全局性的问题。"①

毛泽东重视和支援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根本思想是出于国际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是作为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同时，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还提出了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采取什么态度，是区别革命和不革命的重要标志，是区别谁是真正保卫世界和平，谁是助长侵略势力和战争势力的重要标志。毛泽东在60年代以极大的精力注视着全世界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并把它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有重大的国际意义的。

① 《人民日报》1963年6月17日。

8.文化部应改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

在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运动的同时，毛泽东仍然把反修防修作为自己的工作重点。一方面跟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另一方面在国内开展防修的斗争。

毛泽东抓反修的斗争，但也十分重视防修的斗争，以解决国内和党内的问题。在国际修正主义思潮泛滥中，毛泽东认为国内的阶级斗争是十分明显和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潮对我国也是有影响的。因此，国内的阶级斗争才有这样的状况。他更坚定地要求县以上干部必须全力抓阶级斗争。他的根据是：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地主富农，总是企图复辟，伺机反攻倒算，进行阶级报复，打击贫下中农；被推翻的地主富农分子千方百计地腐蚀干部，篡夺领导权，有些社队的领导权实际上已落在他们手里，其它机关的有些环节，也有他们的代理人；有些地方，地主富农分子利用宗教和反动会道门，欺骗群众，进行罪恶活动；反动分子的各种破坏活动，例如破坏公共财产，盗窃情报，甚至杀人放火；在经济领域内，投机倒把的活动很严重，有些地方更为猖狂；雇工剥削，放高利贷，买卖土地的现象也发生了；在社会上除了那些继续搞投机倒把的旧的资产阶级分子外，还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靠投机、剥削大发其财；在机关中和集体经济中出现了一批贪污盗窃国家资财的干部。根据这些情况，毛泽东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新的判断。他认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正在产生，必须开展反修防

修的斗争。

1963年5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前十条》，并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发了通知，要求立即按照决定中的规定，定出计划，经过试点，有领导地分期分批地有步骤地去推行，争取在两三年内全部办到，并且力求办好。以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城市新"五反"运动为内容的抓阶级斗争的工作全面地开始了。其结果，一方面是，使党内在阶级斗争的问题上清醒了起来，阶级斗争熄灭论，或不重视阶级斗争的现象没有了。但是，当时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是严重失实的，有夸大的一面。《前十条》发出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虽有所开展，但并没有全面进行。凡是开展的地方，也提出了不少问题。在当时，谁也不敢说这《前十条》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是夸大的，脱离中国实际的。尤其是对地主富农分子的估计更是严重失实。到1963年，农村中的地主分子已经经过十几年的劳动改造，已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了，地主分子的帽子也应该摘掉。即使富农分子也已经变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了。至于干部中的问题，有的是阶级斗争性质的，但大部分不是阶级斗争性质的，而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不能都认为是阶级斗争问题。他根据的材料主要是毛泽东根据从各省市送来的20个报告和大量的汇报材料，而这些材料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是夸大地估计了城乡阶级斗争的形势，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必然得出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估计。《前十条》试行后，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各地提出了不少问题，要求中央给予解决。例如，如何估计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基层干部，如何对待地主富农及其子女，如何对待所谓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等。同时也需要总结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经验。中共中央于

1963年9月5日至27日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在会上再一次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问题，并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共有10条，即称为《后十条》。在这个规定中，除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基本方针和主要内容、领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必须注意的几个问题外，还强调了团结95%以上的农民群众，依靠贫下中农组织等问题。同时，中共中央还批准了王光美在河北省桃园大队搞四清试点的经验报告，详细地反映了农村搞四清的必要性以及存在的问题。此时，毛泽东也认为，农村的问题十分严重，尤其是建国十几年来干部中存在的问题很多。他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抓紧机会搞好四清，把农村政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在农村、城市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后，毛泽东又开始了新的思考。他根据现有的材料，开始抓文化界、艺术界、思想界的阶级斗争问题了。他认为，在这些领域中存在的问题更多、更深、更严重，如不抓紧解决，也会影响到整个政治思想领域。从1957年以后，就逐渐地感到阶级斗争主要是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中了。他作出了一系列的批示，力图在这些领域开展反修防修的斗争，以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这些批示，明显地反映了毛泽东思想上的变化。

毛泽东认为，在我国经济基础已经变化了，而上层建筑也应当变化，才能巩固经济基础。但现在作为上层建筑一部分的文化艺术部门没有变化。如果这些部门不革命，那就会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1963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曾作出指示：

"戏剧要推陈出新，不应推陈出陈，光唱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他的丫头保镖之类。"

1963年11月，毛泽东对《戏剧报》作了两次重要指示，而且对《戏剧报》批评得十分厉害。他说：《戏剧报》尽是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很多，文化部不管。《戏剧报》尽是牛鬼蛇神，听说最近有些改进。文化方面特别是戏剧，大量是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很少，在舞台上无非是帝王将相。文化部是管文化的，应当注意这方面的问题，为之检查，认真改正。如果不改变，就改名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或外国人、死人部。如果改了，可以不改名字。对这些牛鬼蛇神，把他们统统赶下去，不下去，不给他们发工资。在这个批示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已注意上层建筑的问题了。这个批示虽然只是对《戏剧报》的，但已指向文化部，指向整个文化艺术领域了。毛泽东历来对历史和历史剧是非常喜欢的，然而现在不同了，要把它们统统赶下去。这是毛泽东对文艺问题的第一个批示，还有第二个批示，把文艺方面的问题说得更严重。1963年12月，毛泽东作了一段更为尖锐的批示：

"此件可以一看。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

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①

毛泽东的这两个关于文艺的批示是相当尖锐的，某些方面虽有正确的地方，如主张推陈出新、提倡社会主义文艺，在文化艺术领域内除一部分传统的节目外，确实存在着宣扬封建的、资本主义的东西，这些确实是应当批判的。然而，他对文艺领域中存在的问题估计得太严重，而且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毛泽东认为，推陈出新的方针提出好几年了，仍是推陈出陈，没有产生社会主义的新文艺，他严厉地批评文艺领域中的问题。他在批评中，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关系，把不少人指责为牛鬼蛇神，同时也混淆了政治和艺术的关系，把内容上反映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戏剧、电影等都视作为错误的东西，视作为封建的、资本主义的文化艺术。他虽然曾提出过评价文艺作品的标准，一是政治标准，二是艺术标准。但在这里却丢掉了艺术标准，只强调政治标准。而政治标准中，又从形式上去划分，凡是反映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那统统是封建的资本主义的艺术，而且上纲上线，把剧目打成封建的资本主义的艺术，把演员、导演等打成牛鬼蛇神。

毛泽东在作出这两个文艺批示的同时，还认为上层建筑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436～437页，1996年8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中最重要的部分——党政机关中存在的问题也很严重，及时地解决党政机关干部中的各种问题更为迫切。这是反修防修的根本大事。只有抓住这部分才能全面地解决当前的问题。

1963年12月13日，毛泽东对湖南省委李瑞山、华国锋于1963年11月6日写的一个参观农业生产情况的报告以及附在上面的湖南省委在12月7日的指示作了关于加强相互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的批示。他说：

"现将湖南省委李瑞山、华国锋同志1963年11月6日写的一个参观广东农业生产情况的报告以及附在上面的湖南省委1963年12月7日写的一个指示，发给你们研究。中央认为，这种虚心学习外省、外市、外区优良经验的态度和办法，是很好的，是发展我国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党务的重要方法之一。固步自封，骄傲自满，对于自己所管区域的工作，不采取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办法（一分为二，既有成绩，也有缺点错误），只研究成绩一方面，不研究缺点错误一方面。只爱听赞扬的话，不爱听批评的话。对于外省、外市、外区、别的单位的工作，很少有兴趣组织得力高级中级干部去虚心地认真地加以考察，以便和本省、本市、本区、本单位的情况结合起来，加以改进，永远限于本地区本单位这个狭隘世界，不能打开自己的眼界，不知还有别的新天地，这叫做夜郎自大。对外国人、外地人以及中央派下去的人，只让看好的，不让看坏的。只向他们谈成绩，不向他们谈缺点和错误。要谈也谈得不深刻，敷衍几句了事。中央多次对同

志们提出这个问题，认为一个共产党人必须具备对于成绩与缺点、真理与错误这个两分法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思想。事物(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党务等等)总是作为过程而向前发展的。而任何一个过程，都是由矛盾着的两个侧面互相联系又互相斗争而得到发展的。这应当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普通常识。但是，中央和各地同志中，有许多人却很少认真地用这种观点去思索去工作。他们的头脑，长期存在着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而不能解脱。所谓形而上学，就是否认事物的对立统一、对立与斗争(两分法)、矛盾着对立着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走向他们的反面，这样一个真理。就是人们固步自封、骄傲自满，只见成绩，不见缺点，只愿听好话，不愿听批评话。自己不愿意批评(对自己的两分法)，更怕别人批评。中央有几十个部，明明有几个工作成绩工作作风较好的部，例如石油部，别的部却视若无睹，永远不去那里考察研究请教一番。一个部所管企业事业，明明有许多厂矿、企业、事业、科学研究处所及其人员，工作做得较好，上面却不知道，因而也不能提倡人们向那些单位学习。同志们，中央在这里所说的犯有形而上学错误的同志是指一部分同志，不是指全部同志。但是，应当指出，有大量的好同志却被那些高官厚禄、养尊处优、骄傲自满、固步自封、爱好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同志们，亦即官僚主义者，所压住了，现在必须加以改革。凡不虚心地认真地对本地本单位本人作分析，对别地单位、别人作分析，拒绝马克思主义辩证分析方法的同志，要进行同志式的劝告和批评，以便把不良情况改变过来。把别部、别

省、别市、别区、别单位的好经验、好作风、好方法学过来这样一种方法，定为制度。这个问题是一个大问题，请你们加以讨论。以后还要在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央全会上加以讨论。湖南省委过去在一个时期内，不作调查研究，主观主义地下达许多指示，往下灌的东西多，由下面反映上来的真实情况少，因而脱离群众，产生很大困难。从1961年起，他们开始改变了，以致情况大好起来。但是他们认为还是远不如广东和上海，所以他们派遣大批省、地、县三级干部，还有省和市的干部，组成两个考察团，分别到广东上海去学习。这一点，请你们注意研究，是否也可以这样办。中央认为，不但可以而且应当这样办。如有不同意见，请你们提出。"①

毛泽东在这个批示中，既有表扬也有批评，既讲成绩也指出缺点，既从理论上分析又作思想方法的工作，并把它作为一个重大的问题，要提交给中央工作会议、中央全会讨论。在60年代，党政机关中主要的问题是官僚主义。毛泽东抓住这点，大加分析批评，在党内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在毛泽东看来，党政干部中的官僚主义是十分严重的，并且越来越厉害。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441～443页，1996年8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9.“向解放军学习”

60年代，由于毛泽东的提倡，全国掀起了向解放军学习的运动。这是很有成绩、很有意义的一件大事。

毛泽东把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为一件大事来抓的。他不仅要求在农村中推行，而且也要求在军队中加以宣传贯彻。因为，军队中绝大部分人都与农村有关，有的就是贫下中农的子弟，他们关心农村的四清运动。四清试点的地方，有的问题也涉及到军队的同志。毛泽东在1963年12月14日，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你的来信早收到了。身体有起色，甚为高兴。开春以后，宜到户外散步。你对两个文件的看法是正确的。国内外形势均已向好，均已走上正确的轨道。可以预计，更大的发展是会到来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两个文件，11月中旬就发出去了，本月上旬各省已有反应，有一些地方的生产大队全体队员及五类分子(有的多到七百多人听讲)开会时向他们宣读，分组讨论，效果很好。军队如能照此办理，那也一定会好的。由团营两级理解力强的军政干部向连队一切人员分几次宣读、讲解，讨论，由群众提出意见，讲解员解答疑难问题，是会成为一个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军、师二级也可派

一部分强的干部下去，杂在团营干部中，向连队宣读、讲解，作为军官当兵的一种形式。至于高级首长，例如瑞卿、肖华、杨勇、廖汉生、许世友、黄永胜、刘亚楼等等同志也应该选择一二个连队去作一二次讲解。讲解要联系环境，先要对准备去讲解的连队的情况作一些大略的调查。不知已按你的意见作了布置没有？据我从北京几个军事基层单位的少数同志接触，他们尚不知道此事，没有看过文件，也没有听过宣读。此事其实不难，只要由总政下一通知，叫各军区各兵种印发文件，每一个支部一本，传下去，由团营合组宣讲队伍，分头下到连队，照本宣讲，以排或班为单位进行讨论，自由发言，容许讲不同的意见，甚或反对意见，就可以在一个短时间内（例如几个星期……）出现一个高潮，提高政策水平。一次宣讲之后，过几个月再作一次宣讲，使人们得到更深理解。军队一动起来，还可抽出一些干部帮助地方，向工厂、农村作宣讲工作。这样又可以使军民联合起来，人民了解和拥护军队，军队了解和帮助人民，更是一大好事。是否可以如此做，请你和罗、肖诸同志商酌处理。"①

毛泽东不仅要求在军队中宣讲四清文件，而且还要求军队干部帮助地方开展四清运动。

1963年12月16日，毛泽东又写了一封信。当然这封信并不只是写给林彪一个人的，而是包括军委聂荣臻等诸同志在内的。这封信提出了全国向解放军学习的问题。这是毛泽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449～450页，1996年8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东考虑很久的一个重要问题。信中说：

“国家工业各个部门现在有人提议从上至下(即从部到厂矿)都学解放军，都设政治部、政治处和政治指导员，实行四个第一和三八作风。我并建议从解放军调几批好的干部去工业部门那里去做政治工作(分几年完成，一年调一批人)，如同石油部那样。据薄一波同志说：现在已有水利电力部、冶金工业部、化学工业部正在学习石油部学解放军的办法在做。我已收到冶金部学解放军的详细报告，他们主张从上到下设政治部、处和指导员。看来不这样做是不行的，是不能振起整个工业部门(还有商业部门，还有农业部门)成百万成千万的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的。要这样做，政治干部的来源，我想有四个办法解决：一是从解放军调出一部分强的而又可能调出的政治干部和懂政治的军事干部送到工、商、农部门中去(先着重工业部门)；二是由工业及其他部门派得力同志到解放军的军师团去学习几个月；三是由他们派人到现在莫文骅管的政治学院去当学生，按期毕业，回去工作；四是他们自己抓起来做，将解放军一套思想政治工作条例、办法，拿去略加改变(必须适合各个不同部门的情况)，作为自己的东西去实行，现在已有四个部这样做了。看来这第四项办法是主要的，因为解放军不可能调出很多的干部。但解放军要给他们以帮助，是肯定的。请你们考虑一下是否可行，然后我和中央常委同志同你们谈一下(有个别管工业的同志参加。林有病可不出席)，把方针确定

下来。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几年了，现在因为工业部门主动提出学解放军，并有石油部的伟大成绩可以说服人，这就到了普遍实行的时候了。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因而更便于工业部门采用和学习了。"①

在这封信中，我们知道工业部门学习解放军，以及后来各行各业都学习解放军，是毛泽东经过多年考虑的结果。从此，在全国范围内学习解放军的群众运动迅速地开展起来。在向解放军学习运动中，解放军在人民中的地位和影响，也日益增强。解放军的政治思想工作，确实是比其他单位做得好。解放军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是十分突出的。毛泽东提倡各行各业学习解放军是十分正确和必要的。

当然，林彪主张的四个第一等做法在地方推行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是林彪把解放军的政治思想工作作了不科学的概括，而这个概括又得到毛泽东的赞赏，出现了到处提四个第一的现象。用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一阵风来时，似乎很正确、很一致，其实不然。在推行所谓四个第一中，干部群众中已提出了不少意见。但是，学习解放军的群众运动主导方面是正确的，所取得的成绩也是应当充分肯定的。

到1963年底，全国的政治形势风起云涌，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效，这是全国人民所盼望的。但是，抓阶级斗争，抓社会主义革命可以说"日益深入"了。农村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454－455页，1996年8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的四清运动，城市的新“五反”运动，工业学解放军，文艺界又开始了批判运动。江青伙同上海的柯庆施发起了对孟超新编昆曲《李慧娘》的批判，后又组织批判廖沫沙写的《有鬼无害论》一文。在批判中，把文艺问题和阶级斗争挂上了钩，说李慧娘反对贾似道，而贾是共产党的总理，所以说借《李慧娘》攻击共产党。把对《李慧娘》的批判达到了上纲上线的程度。阶级斗争的空气笼罩着全国文艺思想界。全国的政治形势已逐步地转入到阶级斗争的轨道上来。毛泽东希望把各方面的斗争抓起来，从而形成了各种群众运动。他反对冷冷清清地搞社会主义，也反对按所谓各种清规戒律办事。当上述群众运动开展以后，他抱有极大的希望。毛泽东深信，通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可以解决问题的。

10.教育要改革，学制要缩短

毛泽东对教育事业是十分重视的。没有教育，就没有中华民族文化的延续。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是一项又迫切又繁重的任务。列宁早就说过，社会主义制度不可能建立在大量文盲的基础上。但是，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教育总是被一部分统治阶级所掌握、享受，而广大劳动人民总是被排斥在外。新中国成立前也是如此。只有到新中国成立后，才把这个情况翻了过来。60年代，毛泽东把社会主义革命推向深入的时候，必然把教育提到重要的地位。当时，对教育影响最大的，一是他写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一封信；

二是他在春节座谈会上的谈话。

1961年7月30日，毛泽东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中，毛泽东的教育思想有着充分的表述。他的信是这样写的：

"同志们：

你们的事业，我是完全赞成的。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国家一分钱，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分散在全省各个山头，少数在平地。这样的学校确是很好的。在校的青年居多，也有一部分中年干部。我希望不但在江西有这样的学校，各省也应有这样的学校。各省应派有能力有见识的负责同志到江西来考察，吸取经验，回去试办。初时学生宜少，逐渐增多，至江西这样有五万人之多。

再则，党、政、民（工、青、妇）机关，也要办学校，半工半学。不过同江西这类的半工半学不同。江西的工，是农业、林业、牧业这一类的工，学是农、林、牧这一类的学。而党、政、民机关的工，则是党、政、民机关的工，学是文化科学、时事、马列主义理论这样一些的学。所以两者是不同的。中央机关已办的两个学校，一个是中央警卫团的，办了六七年了，战士、干部们从初识文字进小学，然后进中学，然后进大学，一九六〇年，他们已进大学部门了。他们很高兴，写了一封信给我，这封信，可以印给你们看一看。另一个，是去年（一九六〇年）办起的，是中南海党的各种机关办的，同样是半工半读。工是机关的工，无非

是机要人员，生活服务人员，招待人员，医务人员，保卫人员，及其他人员。警卫团是军队，他们有警卫职务，即是站岗放哨，这是他们的工。他们还有严格的军事训练。这些，与文职机关的学校，是不同的。一九六一年八月，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三周年纪念，主持者要我写几个字。这是一件大事，因此为他们写了如上的一些话。"①

毛泽东的这封信，对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无疑是一个支持和鼓励。这个学校创办于1958年8月，可以说是"大跃进"年代的产物，连学校的名字都冠以"共产主义"。像中国这样一个原是文化落后的国家，文盲或半文盲在农村大量存在；同时又是经济不发达，不可能办起如此多的正规学校，使每个人都上学。在这种条件下，类似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学校，受到各方面的欢迎和支持。在中国只能推行两种教育制度。一种是正规的，一种是非正规的，即半工半读的学校。可以说，这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会这样。毛泽东的信在当时有极大的指导意义。

中国两种教育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是中国教育事业兴旺发达的一条新路子。不采取两种教育制度，不进行多种形式的办学，要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科学水平是不可能的。

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在春节座谈会上的谈话影响很大。带有那个年代的特点，即过分地强调某一方面，但其中有不少精神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其内容如下：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9册，第535～536页，1996年1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学制可以缩短。

学制缩短以后，中学毕业生只有十五六岁，不够当兵年龄，也可以过军队生活。不仅男生，女生也可以办红色娘子军，让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去过半年到一年的军队生活。

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

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活动。

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出二十个题，学生能答出十题，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创见，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题都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见的，给五十分、六十分。考试可以交头接耳，无非自己不懂，问了别人懂了。懂了就有收获，为什么要死记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可以试试点。

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

孔夫子出身没落奴隶主贵族，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开始的职业是替人办丧事，大约是个吹鼓手。人家死了人，他去吹吹打打。他会弹琴、射箭、驾车子，也了解一些群众情况。开头做过小官，管理粮草和管理牛羊畜牧。后来他在鲁国当了大官，群众的事就听不到了。他后来办私塾，反对学生从事劳动。

明朝李时珍长期自己上山采药，才写了《本草纲目》。更早些的，有所发明的祖冲之，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

美国的富兰克林是印刷所学徒，也卖过报。他是电的大发明家。英国的瓦特是工人，是蒸汽机的大发明家。

高尔基的学问完全是自学的，据说他只上过两年小学。

现在一是课多，一是书多，压得太重。有些课程不一定要考。如中学学一点逻辑、语法，不要考，知道什么是语法，什么是逻辑就可以了，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去慢慢体会。

课程讲得太多，是烦琐哲学。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如经学，搞那么多注解，现在没有用了。我看这种方法，无论中国的也好，其他国家的也好，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面，都要灭亡的。书不一定读得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①

毛泽东的谈话，涉及到教学的各个方面，有教学内容问题，也有教学方法问题。他的讲话总的精神是教学要改革，学制要缩短。但是，他把教学中的问题估计得太严重了，提出的办法也太绝对化了。这个讲话，在一定程度上是对1962年教学秩序整顿的一次重大否定。1958年在"大跃进"中，正常的教学秩序被突破了，到1961年和1962年经过调查研究，认为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22－23页，1996年8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正常的教学秩序必须恢复，混乱的局面对教学是十分不利的。随后制订的高教工作六十条，对教学秩序进行了必要的整顿，使学校的教学工作走上了正轨。如果这个春节谈话贯彻下去，又有可能冲垮好不容易在1962年整顿恢复起来的教学秩序。当时不敢把他的谈话内容原原本本地向教师和学生传达。这个谈话，主要是针对学制、课程、考试方法、读书等问题，还没有针对广大教师。后来，他又提出教改问题主要是教师问题后，把矛头对准教师了。

1958年以来，制定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教学改革就是要贯彻这个方针，这个方向是明确的，也是正确的。但问题是在于如何改革。否定了原有的教学制度，应当建立更好更完善的制度。如果否定了原有的教学制度，建立不起新的教学制度，其后果必然是造成新的混乱。学制要缩短、课程要减少，这要根据具体的专业而定，不能一概而论，不能一刀切。1958年"大跃进"中对教学改革进行了一刀切，造成了混乱。考试制度必须坚持，对付敌人的考试方法应当改变。有的课可以这样考，有的课可以那样考。但不能没有考试制度。关于读书，应当提倡少而精，要读懂，要掌握书本知识，要理论联系实际，反对死读书。有的人读书方法不对，出现了不少问题。毛泽东说，书读得越多，是害死人，越读越蠢，甚至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但这是少数，而多数不是这样。当时把少数人的问题估计得太严重了，说得太绝对化了。就其书本知识和实践的关系上说，在小学、中学、大学生中，必须既要强调书本知识的重要，要学生好好地读书，但又要强调实践的重要，以克服轻视实践、轻视劳动、轻视工农的倾向。毛泽东

的春节谈话在一部分教师中传达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1964年春节期间，毛泽东又和当时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上学的侄子毛远新作了谈话。其中，毛远新谈到在寒假期间他到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感到对四清的两个文件的理解不如农民深时，毛泽东说，你回去告诉你的政委，就说是我说的，今后你们每年都应该到农村去一次，这样很有好处。在毛泽东看来，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反修防修的重大步骤和措施。让大学生利用寒暑假，参加社会实践，到工厂、农村，接触工农群众，进行一定的劳动，是有很多好处的，能增长才干，增加知识，转变思想感情，应当提倡。

1964年3月10日，毛泽东对北京一个中学校长提出的减轻中学生负担问题的意见又作了批示：

> "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①

毛泽东的这个批示下达后，有一些地方开始教学改革的试点工作了。

1964年3月28日，毛泽东在河北邯郸召开四清工作座谈会。在会上，有人说到教授下乡四清，他们说自己什么也不懂时，毛泽东作了这样一段插话：知识分子其实是最没有知识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34页，1996年8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的，现在他们认输了。教授不如学生，学生不如农民。毛泽东这段话虽然是针对搞四清而言的，但是推而广之，必然起否定知识分子的作用。

6月，毛泽东利用王海容回到他身边的机会，用很长的时间与她谈话，了解学校的情况，思考教学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在毛泽东看来，教学所以要改革，目的是为了培养革命接班人。而目前的教学方法、教学制度有不少是旧的一套东西，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他提出了一系列的教改措施，并把它放在阶级斗争的高度加以考察和贯彻。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合格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11. 反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政策

1964年1月12日，毛泽东发表了支持巴拿马人民反美爱国正义斗争的谈话，再一次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政策。他说：

> "目前巴拿马人民正在英勇地进行的反对美国侵略、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是伟大的爱国斗争。中国人民坚决站在巴拿马人民的一边，完全支持他们反对美国侵略者，要求收回巴拿马运河区的正义斗争。"
>
> "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也严重地威胁着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它还力图对社会主

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瓦解社会主义阵营。"

"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要联合起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要联合起来，全世界各大洲的人民要联合起来，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要联合起来，所有受到美国侵略、控制、干涉和欺侮的国家要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

"美帝国主义到处横行霸道，把它自己放在同全世界人民为敌的地位，使它自己越来越陷于孤立。美帝国主义手里的原子弹、氢弹，是吓不倒一切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的。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国侵略者的怒潮是不可阻挡的。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一定会取得更伟大的胜利。"①

毛泽东的谈话，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帝国主义几十年来一贯推行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企图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制度。因此，美帝国主义成了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要打败美国推行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毛泽东一贯主张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联合起来，结成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争取独立和解放的国家，更加团结联合起来，是能够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

① 《人民日报》1960年1月13日

毛泽东的谈话，不仅对巴拿马人民是一个极大的支持，而且也使中国人民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提高警惕，防止和平演变战略，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胜利。

毛泽东在60年代始终坚持了反帝反修、反修防修的思想与战略，把国际的和国内的各种斗争统一思考，统一部署。

1964年1月27日，毛泽东又发表了支持日本人民反美爱国正义斗争的谈话。这是因为在1月26日日本人民举行反美大示威。在第二天，毛泽东发表谈话，认为：

> "日本人民在一月二十六日举行的反美大示威，是一次伟大的爱国运动。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向英勇的日本人民，致以崇高的敬意。"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一直遭受美帝国主义的压迫。美国不仅压迫日本的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城市小资产阶级、宗教界人士、中小企业家，而且还控制了日本的许多大企业家，干预日本的对外政策，把日本当作它的附庸国。美帝国主义已是日本民族的最凶恶的敌人。毛泽东相信，日本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日本人民要求独立、民主、和平和中立的愿望，一定能够实现。毛泽东号召：

① 《人民日报》1964年1月28日

"中日两国人民要联合起来，亚洲各国人民要联合起来，全世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要联合起来，一切爱好和平国家要联合起来，一切受美帝国主义侵略、控制、干涉和欺侮的国家和人民要联合起来，结成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广泛的统一战线，挫败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和战争计划，保卫世界和平。"①

1964年1月28日，毛泽东又接见了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和阿尔及利亚法律工作者代表团，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毛泽东向他们详细地论述中国革命的历史和斗争经验。过了几个月，即4月15日，毛泽东又接见了阿尔及利亚文化代表团，并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到5月15日，又接见了阿尔巴尼亚的妇女代表团和电影工作者，又作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毛泽东接见他们，除国际性的礼节外，他想建立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以粉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打败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

1964年春夏，毛泽东把国际上的反帝反修的斗争与国内问题的思考联系了起来。这种做法，一方面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和看法，另一方面也混淆了矛盾的性质。

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在十三陵召开的关于讨论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会议上的谈话中，提出了如何反修防修、反对和平演变的战略问题。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他已经叛变了，现在世界上有两种共产党，一种是真的，一种是假的。在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赫鲁晓夫是好人

① 《人民日报》1964年1月28日。

还是坏人的问题，并提出：要把这个话传下去，传达到县，如果中国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中央怎么办？县委要顶住修正主义的中央。

毛泽东提出，要有第三线，要搞西南后方，要搞得快些，但不要毛糙。钱就那么多，这就不要把摊子铺得那么大，铁路两头铺就快些。

6月16日下午，毛泽东向与会者们讲了两个问题：一是地方党委抓军事问题，一是关于接班人问题。关于军事问题，是要全党作好备战准备。毛泽东提出，要准备打仗，打起仗来不要慌张，打原子弹也不要慌张；对帝国主义不要怕，越怕越被动，有了准备，就不怕；我们要有准备，打起仗来靠中国顶住，靠修正主义是不行的；敌人打进来，我们就可以打出去；要抓民兵工作，只靠解放军不够；不但爱搞文，还要搞武，要制造枪；各级地方组织也要抓军事。关于接班人问题，毛泽东讲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提出了培养接班人的5个条件。培养了接班人，才能挫败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也才能反修防修。他说：帝国主义说我们的第一代没有问题，第二代也变不了，第三代、第四代就有希望了。帝国主义这个希望能不能实现？帝国主义这个讲话灵不灵？我们希望他讲得不灵，但也可能灵。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可能出修正主义。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我看有五条：

第一条，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说，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

第二条，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不是为少数人，不是为剥削阶

级，不是为资产阶级，不是为地、富、反、坏、右。没有这一条，不能当支部书记，更不能当中央委员。赫鲁晓夫是为少数人的利益，我们是为大多数人的利益。

第三条，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所谓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不管他是哪个山头的，不要记仇，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我们的经验证明，如果不是"七大"的正确的团结方针，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胜利。对于搞阴谋诡计的人要注意，如中央就出了高、饶等人。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有的人就是要搞阴谋，他要搞，有什么办法，现在还有要搞的嘛！搞阴谋的人，是客观存在，不是我们喜欢不喜欢的问题。

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五个指头，四个指头向一边，大拇指向另一边，这才捏得拢。

完全的纯是没有的，这个道理许多人没有想通，不纯才成其为自然界，成其为社会。完全的纯就不成其为自然界，不成其为社会，不合乎辩证规律。不纯是绝对的，纯是相对的，这就是对立的统一。扫地，一天到晚扫二十四个钟头，还是有尘土。你们看，我们党的历史上哪年纯过吗？但是却没有把我们搞垮。帝国主义也好，我们党里冒出来的修正主义也好，都没有把我们搞垮。解放以后高岗、饶漱石，搞垮了我们没有？没有。搞垮我们是不容易的，这是历史经验。

人是可以改变的。有少数人变不了，吃了饭就骂人，各省都有一点，是极少数，不变也可以，让他们去骂。对那些犯错误的人，要劝他们改好。要帮助人家改正。只要他认真改正了，就不要老是批评没完。

要团结广大群众，团结广大干部，团结这两个百分之九十

五。

第四条，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充分酝酿，要听各种意见，反对的意见也可以让他们讲出来。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一开会就自己讲几个钟头，不让人家讲话。不要开会时赞成，会后又翻案，又说不赞成。共产党人要搞民主作风，不能搞家长作风。

第五条，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一个指挥员指挥打仗，三个仗，胜二个，败一个，就可以当下去。打主意，对的多，错的少一点，就行了。不要总是以为自己对，好像真理都在自己手里。不要总是认为只有自己才行，别人什么都不行，好像世界上没有自己，地球就不转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按照自己的规律前进的。无产阶级的大人物，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不是都逝世了吗？世界革命还是在前进。

但是，接班人的问题还是要部署一下。要准备好接班人。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日夜思索的问题，一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二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这是帝国主义进攻社会主义的两手，而我们也必须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它，一是作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二是作好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工作，保证中央和各级领导班子不出修正主义。这是两个重大的战略部署。毛泽东为解决这两个问题，作了极大的努力。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

12. 为国家安危而斗争

共和国建立后，毛泽东始终把国家的安危放在极为重要的地位上考虑。一方面，他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担任了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统帅全国武装力量。加强现代化的陆军建设，并建立强大的空军和海军，以巩固国防是他的重要任务；另一方面，他戎马生涯几十年，深知国家的安危，在于国防建设，有了强大的国防力量，才能捍卫共和国的独立与解放。所以，从50年代起，毛泽东十分重视军队的正规化和现代化建设。

1953年12月至1954年1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全军党的高级干部会议。这次会议对新中国的国防建设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会议确定了军队建设的总方针和总任务是：人民解放军在现有的基础上，积极地有步骤地将我军建设成为一支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为统一祖国，防御侵略，保卫国家安全和社会主义建设，保卫亚洲与世界和平而奋斗。会议确定紧缩军队编制，军队的总员额为350万，减少军费开支，支持国家经济建设；军队建设的长期的经常的中心工作是训练部队，尤其是要训练干部，办好军事学校；要以条令为准则把全军统一起来，实行正规化；要减少国外订货，选择重点建设，依靠我国的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实现武器装备的现代化；要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实行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会议对学习苏军经验、军队编制体制、司令部机关建设、后勤

组织与建设、政治工作以及国防基础建设等都作出了规定。会议还提出了建立义务兵役制、军官薪金制和军衔制等一系列的根本制度。这次会议的召开，统一了全军思想，加快了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促使了军队建设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转变。

从此，我国的国防和军队建设走上了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道路。首先，根据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确立了积极防御的国防战略方针；其次，调整国防体制，1954 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统帅全国武装力量，并决定设立国防委员会和国防部，属国务院，国防委员会主席由国家主席担任。1954 年 9 月 28 日，中共中央重新成立军事委员会，领导整个军事工作，毛泽东任中央军委主席；其三，全面开展军队建设，再次精简整编部队，紧缩编制，实行定额、定型、定员，实行义务兵统制、军官薪金制、军衔制。1955 年 9 月 23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授予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 10 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授予一批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上将、中将、少将等军衔。同时对军事院校作了调整和增进。其四，加强国防物质基础建设。从第一个五年计划起，陆续批准开工建设的大中型国防科技项目达 100 多个，为国防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基础。

1956 年毛泽东作出了向科学进军的战略决策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向现代化科学技术进军的热潮。特别是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在陈毅、李富春、聂荣臻等主持下制定了《1956－1967 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修正草案）》。这纲要

得到了党的八大的肯定。毛泽东在开幕词中说，我们一定能够一步一步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刘少奇在八大的政治报告中说："我国的科学家们已经初步拟定了一个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七年的科学发展规划，这个规划要求我国的最急需的科学和技术的部门，在十二年左右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在规划纲要中提出了57项重要科学技术任务和616个中心问题。并把原子能的和平利用、无线电电子学中的新技术、喷气技术、生产过程自动化和精密仪器等12项作为重点。

国家的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国防的现代化建设。1958年建设了亚洲最大的重水型原子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开始筹建宇航系统的研究所、生产厂和发射试验设施，研制第一枚运载火箭。同时，也开始了以战略导弹和原子弹为主要内容的国防尖端技术的研究。

1962年11月3日，毛泽东在罗瑞卿《关于成立专门委员会加强原子能工业领导的报告》中作了这样的批示：

"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①

当时，罗瑞卿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0月30日他在向毛泽东、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最近二机部在分析各方面的条件后提出，力争在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实现原子弹爆炸，是全国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水平的集中表现，绝非哪一个部门所能单独办到的。因此，除了二机部本身做艰苦努力外，还必须取得各工业部门、科学研究单位的密切配合，以及全国在人力、物力上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212页，1996年8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的大力支援。现在，离预定的日期只有两年的时间，建议在中央直接领导下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加强对原子能工业的领导，随时检查，督促计划执行情况，并在必需的人力、物力上进行具体的调度，及时解决在研究、设计和生产建设中所遇到的问题。这个建议在10月19日国防工业办公室向中央常委汇报时，刘少奇已原则同意。同时还提出，这个委员会由周恩来总理抓总的，由贺龙、李富春、李先念参加。毛泽东很快对这报告作了批示。

1964年1月12日，毛泽东发表了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巴拿马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的谈话，再一次指出，"美帝国主义手里的原子弹、氢弹，是吓不倒一切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的。"①中国人民掌握原子弹的科学技术，打破帝国主义的核垄断、核讹诈的时代为期不远了。

1964年9月21日，毛泽东在周恩来1964年9月21日关于将在10月份进行正式核试验的报告给毛泽东的信上作了：

"已阅，拟即办。"

周恩来在信中说，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于9月16、17日开了两次会，讨论关于核爆炸及其有关问题，急需待主席回来后当面报告，以便中央早作决定，时间以不迟于9月29日为好。因为如决定今年爆炸，以10月中旬到11月上旬为最好，而事前准备时间至少需要20天。

毛泽东批示后，不到一个月，即1964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神奇般的蘑菇云在中国大地上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标志着中国人民

① 《人民日报》1964年1月13日。

依靠自己的力量开始掌握核技术，为打破帝国主义的核垄断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从此，中国跻身于掌握核技术大国行列之中。

当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消息发表后，全国上下为之振奋，中国人民几代人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也引起了国际上的强烈反响。

也许是历史的巧合。10月16日，也正是赫鲁晓夫落选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烈日涅夫当选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日子，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了贺电。在贺电上特别写了这样一段：

"最近苏联'上升'号宇宙飞船成功发射和顺利着陆，是苏联劳动人民的又一项伟大成就。我们愿意借此机会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伟大的苏联人民，表示衷心的庆贺。"①

毛泽东在电文中对苏联宇航事业巨大成就的庆贺，也是对我国宇航事业的企盼。历史仅仅过了几年，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送上了太空。到1976年为止，我国共有7颗卫星送人太空。当"东方红"乐曲从卫星送回地面，响彻神州大地时，毛泽东提出的：西方人办到的，我们东方人也一定能办到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在国际科技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为保卫国家的安危、独立和领土主权不受侵犯，毛泽东也曾作出了一个又一个的重要决策，领导和指挥全国人民为保卫国家而斗争。从1959年以后，毛泽东十分重视中印边界的问题。中印两国的边界长达2000公里，但从未正式勘定过，两国人民长期维持着一条传

① 《人民日报》1964年10月17日。

统的边界线：东段沿喜马拉雅的南麓，中段沿喜马拉雅山脉，西段沿喀喇昆仑山脉。英国入侵印度后，不断地吞食中国领土，并于1914年3月制造了一条所谓“麦克马洪线”，以此为界限，将中国9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归英属印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力图与印度政府合作，友好处理两国关系。但是，印度政府在1959年8月制造中印边界冲突，印度军队侵入“麦克马洪线”以北良久地区向中国驻军开火，挑起了严重的流血事件。10月21日，印军又在中印边界西段侵入中国空喀山口，制造事端。为避免冲突，中国政府多次建议中印双方遵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协商解决边界问题。

1959年11月7日，毛泽东在周恩来关于中印边界问题复印度政府总理尼赫鲁的信中，加了一段十分重要的话：

“由于中印两国边界从来没有划定过，而又非常漫长，距离两国政治中心很远或者比较远，如果两国政府不想出一个十分妥善的解决办法，我担心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边境冲突今后还有可能出现。而只要出现了这类冲突，哪怕是很小的冲突，就会被那些敌视我们两国友谊的人们所利用，以达其不可告人的目的。”①

然而，印度政府并无诚意。1960年4月，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同尼赫鲁会谈，力求达成有助于解决边界问题的协议，但是，印度政府提出无理要求，要中国政府无条件地接受他的全部领土要求，使会谈毫无结果。相反变本加厉从1960年4月至1961年8月印度军队侵犯中国领土的行动达17次之多，不断地占据中国领土。1961年9月，印军越过“麦克马

① 《人民日报》1959年11月10日。

洪线”，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进攻。10月12日，印度政府下令印军要“清除掉”中国边境上的中国军队，10月20日派出10多个旅的兵力，在中印边界东西段发动了进攻，中国边防部队遭到严重伤亡。

至此，只有被迫进行边界自卫反击战，以保卫我国的领土与安全了。经过两个月的斗争，击退了印军的入侵，维护了中印边界的安宁，印度政府自食其果。

13．15年来文艺“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

在反修防修中，毛泽东还十分重视文艺工作。当他的第一个文艺批示下达后，对文艺界以及全党都引起了极大的震动。第一个文艺批示有过分的地方，但是这个批示是毛泽东作出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1964年1月3日，刘少奇召集文艺座谈会。中宣部和文艺界人士30多人参加了会议。邓小平、彭真、周扬等都到会听取大家的意见。周扬还作了中心发言。他以积极的态度和良好的愿望谈了对第一个文艺批示的看法和文艺方面存在的问题。如对文艺推陈出新问题、民族化问题、文艺工作者同工农群众结合问题发表了意见。在会上，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也作了讲话。他们都勉励文艺工作者要好好地学习毛泽东对文艺工作的批示，要求他们下乡下厂，反映工农兵生活，塑造现代人物的形象，提出少演历史剧、外国剧。但是，他们几个人对文艺界状况的估计与毛泽东在批示中说的是很不一致的。他们没有把文艺

界的问题看得那样严重。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周扬等希望用保护的办法使文艺界克服缺点。

但是，事与愿违，毛泽东发现了他们的做法，指责了他们，明确指示不准这样做。这件事还没有完全过去，又发生了“迎春晚会节目有庸俗化”的问题。1964年2月3日，中国戏剧家协会举行迎春晚会，演出的节目因“革命气息不浓，庸俗低级”受到批评指责。中宣部不得不在3月下旬召开文联各协会党组成员、总支和支部书记会议，讨论迎春晚会文艺节目的问题，并决定在文联和各协会干部中开展一次整风学习运动。4月，全国文联，作家协会等10个单位的全体干部开展了整风学习。在这次整风学习中，中宣部文艺局起草了《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这个报告仅仅是一个草稿，未经中宣部部务会议讨论修改，就被江青要去了，并直接递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后，于6月27日作了批示：

>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①

这个批示，当时称为毛泽东对文艺问题的第二个批示。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91页，1996年8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这个批示把问题提到了更严重的程度。7月11日，这个批示下达后，不仅引起了文艺界的震惊，而且使全党为之震动。文艺界又开始了第二次整风学习。这次整风前后长达10个月之久。在整风学习中，有不少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受到了不应有的指责和批评。其中有齐燕铭、夏衍、陈荒煤、邵荃麟、阳翰笙、田汉等。

在文艺界开展整风学习以及批判所谓代表人物的同时，中宣部根据康生下达的指令，于8月14日向中央书记处写了《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18日，毛泽东对这个报告作了批示：

> "不但在几个大城市放映，而且应在几十个至一百多个中等城市放映，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些别的，都需要批判。"①

毛泽东这个批示下达后，不仅把这两部影片定为修正主义影片，而且还对一大批电影、戏剧都进行了批判。其中有《刘志丹》、《怒潮》、《不夜城》、《抓壮丁》、《红日》、《逆风千里》、《林家铺子》、《苦斗》、《三家巷》、《兵临城下》、《革命家庭》等。这些影片有的可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不足，但当时都被指责为修正主义的影片。这不仅混淆了矛盾，使影片受到不应有的批判，而且还牵连到影片的作者、导演、演员，也都受到了不应有的批判。对电影的批判，也必然扩大到对戏剧的批判。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135页，1996年8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当时开创了建国以来对电影、戏剧最广泛的批判，使文艺界出现了等待挨批，惶惶不可终日的局面。

关于文艺问题，毛泽东在1964年6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还有一段批评：文艺界为什么弄那么多协会摆在北京？无所事事，或者办些乱七八糟的事。文艺会演，军队的第一，地方的第二，中央的最糟。这个协会，那个协会，这一套也是从苏联搬来的，中央文艺团体，还是洋人、死人统治着。老搞死人洋人，我们的国家是要亡的。要为工人、贫下中农服务。体育也要对革命斗争和建设有益处。由于毛泽东对文艺界状况的估计过于严重，对文艺问题的批评过于尖锐，所以各种报刊也发表了大量的文章，点名批判，其范围之广，点名批判的人之多，是建国以来所没有的。几乎有影响的戏剧、电影绝大部分都受到了批判或指责。当时，在报刊上批判一部影片，或点名批判哪个人，几乎不用组织批准。这样就造成了只要是批判文章，都被视为是正确的、革命的，写批判文章的人肯定是革命的左派。这样的批判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在文艺界开展所谓大批判的同时，哲学界、经济学界、历史学界等学术领域中，也开展了各种批判。其中，在哲学界批判杨献珍的所谓“合二而一”论，批判冯定的所谓错误哲学观点；在经济学界，批判孙冶方的所谓“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的错误观点；在历史学界，批判吴晗、翦伯赞的所谓“非阶级观点”、“让步政策”。1964年下半年由毛泽东主张和发起的批判运动已广泛地开展起来，并且在批判中，都上纲上线，作为政治问题加以批判，这必然导致过火的错误批判。

在文艺、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学术领域中开展批判的过程中，康生、江青等人起了极坏的作用。他们煽风点火，唯

恐天下不乱。在批判中，姚文元、关锋、戚本禹等人也初露锋芒，以左派面目出现。他们十分活跃，到处发表文章，四处出击，一会儿批判这个，一会儿又批判那个。毛泽东多次地称赞他们，认为他们是革命派，是左派，要支持他们，保护他们，让他们更好地发挥"战斗作用"。

历史证明，这是一次过火的政治批判运动，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对文艺界所作的两个批示。毛泽东所以对文艺界问题作如此严重的估计，其中有一个原因是把国内的问题与国际的问题联系了起来，认为文艺界是最容易出修正主义的。他极力要解决文艺界的问题，并把它视为最严重的领域。这样的过火的批判运动为"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作了舆论准备。

14."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

一个理论的形成总是离不开社会实践的。无论正确的理论，还是错误的理论，都一样地可以在社会实践中找到其产生的原因。1964年下半年，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已逐渐地走向系统化。他作出了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的判断。这判断确实是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直接地推动这理论产生和形成的，有两个原因，一是国内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是中苏论战的全面爆发和进行。

1964年下半年是农村的四清运动和城市的"五反"运动进行得最尖锐激烈的一年，也是规模最大、派出去工作队最

多、时间最长的一年。同时，也是四清运动遇到的问题最多，搞不下去的一年。毛泽东为了将农村的四清运动坚持下去，提出了搞好四清的6条标准。这6条标准在一定程度上是纠正“左”的做法。这6条标准是：

(1)要看贫、下中农是真正发动起来了，还是没有发动起来；

(2)干部中的“四不清”问题是解决了，还是没有解决；

(3)干部是参加了劳动，还是没有参加劳动；

(4)一个好的领导核心是建立起来了，还是没有建立起来；

(5)发现有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是将矛盾上交，还是发动群众，认真监督，就地改造；

(6)要看增产，还是减产。

这6条作为农村四清运动的标准是很必要的，也是很具体的。这6条中的核心是干部问题、增产问题。如果这两个问题解决得好，农村基层组织的作用是很大的。但是在农村的四清运动和城市的“五反”运动中，要解决上述问题不是很容易的，必须长期地、反复地进行，才有所前进。因此，原来计划一二年内搞完四清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样的一个客观实践，必然反映到毛泽东的思想上，对社会主义社会作一个新的思考和回答。

与国内开展四清运动和对文艺界、哲学界、经济学界、历史学界进行政治批判的同时，国际上与帝修反的斗争也进入到一个最激烈的阶段。中苏论战已全面爆发，中苏关系已恶化。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的蜕化变质，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复辟已不可避免地成为现实了。这样的国际形势

也必然促使和要求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作出新的判断，回答社会主义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的判断，就是在国内外客观实践的要求下作出的，它的基本内容虽然有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一面，但它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的。

1964年7月14日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长篇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简称《九评》。文章提出：

> "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中，究竟存在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究竟是应当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对于这些问题，必须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给予正确的回答。"

文章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和无产阶级专政、苏联的特权阶层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驳所谓"全民国家"、驳所谓"全民党"、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等6个方面的重大理论和实践的问题，同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观点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文章最后说：

> "怎样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呢？在这个问题上，毛

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总结了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经验，也研究了国际的主要是苏联的正面的和反面的经验，提出了系统的理论和政策，从而丰富了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对毛泽东的关于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作了系统的概括，共有15条：

“第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事物的矛盾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例外。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两类社会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这两类社会矛盾性质完全不同，处理方法也应当不同。正确处理这两类社会矛盾，将使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将使社会主义社会日益巩固和发展。许多人承认对立统一的规律，但是不能应用这个规律去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他们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不承认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仅有敌我矛盾，而且有人民内部矛盾，不懂得正确地区别和正确地处理这两类社会矛盾，这样也就不能正确地处理无产阶级专政问题。

第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

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单有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受害。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

第三，无产阶级专政，是工人阶级领导的，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工人阶级和在它领导下的人民，对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实行专政。在人民内部是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的这种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

第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线。必须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多数，首先是工农基本群众的多数。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反对命令主义和恩赐观点。我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创

造出来的大鸣、大放、大辩论，是依靠人民群众，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一种重要的革命斗争形式。

第五，不论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或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必须解决依靠谁、争取谁、反对谁的问题。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必须对社会主义社会做阶级分析，依靠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真正可靠的力量，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同盟者，团结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共同对付社会主义的敌人。在农村中，在农业集体化以后，也必须依靠贫农、下中农，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巩固工农联盟，才能击败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不断地巩固和扩大社会主义阵地。

第六，必须在城市和乡村中普遍地、反复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这个不断地教育人的运动中，要善于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在这个运动中，要向那些敌视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向那些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那些贪污盗窃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进行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打败他们对社会主义的进攻，把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

第七，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必须在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的指导下，逐步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的现代化。必须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地普遍地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

第八，全民所有制经济，同集体所有制经济，是社会

主义经济的两种形式。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从两种所有制过渡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集体所有制本身也有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中国人民创造的人民公社，就是解决这个过渡问题的一种适宜的组织形式。

第九，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在科学、文化、艺术、教育队伍中，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也是长期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我们要在经过文化革命，经过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革命实践，建立一支广大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

第十，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

第十一，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当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

第十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武装部队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永远保

持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军民一致，官兵一致。坚持军官当兵的制度。实行军事民主、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同时，普遍组织和训练民兵，实行全民皆兵的制度。枪杆子要永远掌握在党和人民手里，绝不能让它成为个人野心家的工具。

第十三，人民公安机关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在保卫社会主义成果和人民利益的斗争中，要实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和专门机关相结合的方针，不放过一个坏人，不冤枉一个好人。有反必肃，有错必纠。

第十四，在对外政策方面，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社会主义阵营是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斗争的产物。社会主义阵营不仅属于社会主义各国人民，而且属于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必须真正实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和'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政策，援助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应当建立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相互支持和相互援助的原则的基础上。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事业，主要地应当依靠自力更生。如果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外政策上实行民族利己主义，甚至热衷于与帝国主义合伙瓜分世界，那就是蜕化变质，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第十五，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必须同无产阶级专政一起存在。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

式。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就是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的。在一切部门中，都必须实行党委领导的制度。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保持和发展它同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密切联系，保持和发扬它的生气勃勃的革命风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坚持反对修正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和反对一切机会主义的斗争。”

在上述15条中，基本上概括了毛泽东自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观点，当时虽然是针对批判赫鲁晓夫错误观点的，但实际上是针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讲的。这15条，当时作为区别马克思主义还是修正主义、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标志。这15条，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检验证明，虽不少是错误的，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但部分是正确的。不少论断不仅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也符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当时，赫鲁晓夫标榜他们在搞共产主义建设，提出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是有着鲜明的针对性的。当然，对于中国来说，社会主义更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这个论断的作出，为以后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作了思想上的准备。这就是说在中国不仅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而且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为代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已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15.“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在《九评》中，毛泽东提出：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任务。也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与命运的大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社会主义事业就有失败的危险。《九评》在最后指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我们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毛泽东把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是作为反修防修，反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使中国党不变修、国不变色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的事业提出的。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的历史看，这确实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大事。毛泽东在1964年6月16日十三陵会议讲话的基础上，在《九评》中又作了文字的概括，提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条件。

“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够充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呢？

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的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

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

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

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绝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

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

毛泽东提出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任务和条件，更注重在实践上如何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他在1964年下半年，对阶级斗争抓得更紧、更具体、更深入了。他认为，不抓阶级斗争，是要出修正主义的，在中国也是要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建设也是不会成功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培养任务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他在1964年7月又与他的侄子毛远新作了一次谈话。

毛泽东一开头就问毛远新，你看过《九评》没有？接班人的五个条件看了没有？当毛远新回答看过后，毛泽东作了解释：

这五条是互相联系的，不可分割的，第一条是理论，也是方向；第二条是目的，到底为谁服务，这是主要的，这一条学好，什么都好办；三、四、五条是方法问题，是团结多数人，要搞民主集中制，不是一个人说了算，要有自我批评，要谦虚谨慎。

毛泽东对接班人的五个条件作了解释后又问毛远新：你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修正主义？然后毛泽东又讲了一段十分重要的话。毛泽东说，马列主义的基本思想是要搞革命。什么是革命？革命就是无产阶级打倒资本家，农民推翻地主，然后建立工农联合的政府并把它巩固下去。现在革命的任务还没有完，到底谁打倒谁还不一定。苏联还不是赫鲁晓夫当政，资产阶级当权？我们也有资产阶级把握政权的，有的生产队、县委、地委、省委都有他们的人。有的公安厅副厅长也是他们的人。文化部都是谁领导的？电影、戏剧都是为他们服务的，不是为多数人服务的。学习马列主义，就是要学习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到处都有。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是青

年学生的一门主课。后来，毛泽东又和林彪讲了这个问题。毛泽东认为，大学生参加阶级斗争，最好是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四清、五反中学习阶级斗争。毛泽东要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广大师生到农村去搞四清运动，从干部到学生全部下去，一个不要留。他主张1964年冬天到第二年春天就去，早去比晚去好，总之一定要去。毛泽东对毛远新说：阶级斗争是一门主课。我已和总长讲了这个问题，你们学院应该到农村去搞四清，从干部到学员全部去，一个也不留。今年冬天或明年春天就去，早去比晚去好，一定要去。对于你不仅要去参加五个月四清，而且还要去工厂搞上半年五反。你对社会一点也不了解嘛，不搞四清，你不了解农民，不搞五反，你不了解工人，这样对于社会谈不上有什么了解。对社会不了解，阶级斗争也不知道，怎么能算毕业生呢？这样一个政治教育完成了，我才算你毕了业。不然，军事工程学院让你毕业，我还不承认你毕业。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算大学毕业？你毕业了，我还要给你安排这一课。

毛泽东要求大学生了解工人、农民，了解社会，了解阶级斗争，并作为一门主课，应该说其中含有合理的因素。撇开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来看，一个青年学生只有书本知识，没有社会实践知识，是不全面的，也是不深刻的。但是，当时存在着一个严重的问题，1964年下半年的农村四清运动，城市五反运动，已脱离了实事求是的正确指导，贯彻了一条“左”的指导方针。大学生参加四清、五反，完全是去搞人为的“阶级斗争”，而他们所学到的只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的一些观点和做法。这对培养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接班人是一种危害。

毛泽东要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还提出要从教学革命这

一方面出发。他认为,现在教育制度是公开号召学生争5分。他对毛远新说,你不要争那个分数,那会把你限制死的。你姐姐就是吃了那个亏。北京大学有一个学生平时不记笔记,考试只得3分半、4分,可是毕业论文水平最高。人家就把那一套看透了。你们教员就是会灌,天天上课,哪有那么多课讲的?应该让学员自己研究,然后提出问题,讨论讲课。

毛泽东大力提倡真才实学,他本人就是一个最好的典型。他认为,学校中的全优生,在工作中不一定能做到全优。他多次说过,历史上当状元的都没有真才实学,然而连举人都没有考取的,反倒是有真才实学的人。唐朝的伟大诗人中,有的连举人都没有考取,但他却成了大诗人。他主张不要把分数看得太重,应把精力集中在培养训练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在大学生中,"高分低能"的学生是大有人在的,这是旧的教学制度造成的。

毛泽东认为,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的问题。他所以这样说,认为教员和学生关系最密切,天天上课,天天见面,言教身教。其实,教学中的问题,不是教员问题。教员是一个无权者。教学中的主要问题是教学制度和教学体制的问题。有什么样的教学体制,就有什么样的教学方法,也就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所以改革教学体制是关键性的。

毛泽东主张大学生要了解社会,参加社会的实践,尤其是要参加阶级斗争。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中,有这样一段:

有阶级斗争才有哲学,学哲学的同志应当下乡去。今冬明春就下去,去参加阶级斗争。

大学文科现在的搞法不行,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

念。书本里怎能出哲学？马克思主义三个构成部分，基础是社会学、阶级斗争。

大学生今年冬天就要下去。所有学文科的、学历史的、学政治经济学的、学文学的、学法学的，统统下去。教授、助教、学生统统下去。去五个月，有始有终。

1964年冬到1965年春派下去搞四清的工作队是最多的一年，其中不少是大学的师生。他们下去最大的收获是了解社会，了解工人、农民，增加工农业生产的知识，这对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有很大好处的，能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共产主义世界观。当然，他们在实践中，也会接受毛泽东提出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

16.必须进行夺权斗争

1964年下半年，毛泽东对社会上的阶级斗争抓得更紧、更具体、更深入了。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和东欧国家不抓阶级斗争，出了修正主义。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教训。如果中国不抓阶级斗争，中国也要出修正主义，也有可能复辟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建设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社会主义制度是无法巩固的。“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现象，在苏联已出现了。如果中国也和苏联一样，那苏联的历史悲剧也会在中国重演。

1964年底，毛泽东手中又掌握了一大批典型材料。这些材料有的是省委送来的综合报告，有的是开展阶级斗争的典

型经验。毛泽东根据这些材料，对农村和城市的阶级斗争状况、对党的状况、对干部状况、对“四清”和“五反”运动等作了新的估计，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观点，采取了一系列的重要步骤。

在党内要开展反对右倾思想的斗争。1964 年 10 月 12 日，中共中央批转李雪峰给刘少奇的信。在批示中明确地提出：

> “在目前情况下，不向党内各级干部明确地指出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右倾危险，是不利的。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应当参照李雪峰同志的经验，根据各地干部的思想情况，及时地要地委书记和县委书记提出反对右倾的问题，怕左不怕右，宁右勿左的问题，进行认真的讨论，以便为当前的社会主义革命打好思想基础。”

毛泽东以及中共中央都认为，现在已出现了不少单位的权力不在共产党手中，而是被阶级敌人篡夺了，然而领导的思想还存在着右倾，跟不上形势，不敢进行夺权斗争。在上述批示中还说：

> “对于已经烂掉了的地委、县委、区委、公社、大队和厂矿企业及其他机构，应当在调查确实以后，采用信阳经验、小站经验、白银厂经验，进行夺权斗争、发动群众，迅速加以解决。”

要做到这点，必须反对右倾思想。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1964年下半年明确提出反对所谓右倾思想的问题。

在“四清”和“五反”运动中要进行必要的夺权斗争。这是1964年下半年作出的一个新的部署。

毛泽东所以作出这个部署，是认为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十分严重。我们的国家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权力掌握在敌人或敌人的同情者手中。我们搞了15年，三分天下有其二，这种情况复辟资本主义是很可能的。现在用几包纸烟就能收买一个支部书记，嫁给个女儿就更不必说了。有些地区过去搞的是和平土改，土改工作队力量也很弱，现在看来问题不少。对于城市中的阶级斗争，他估计得也很严重。1964年12月5日，毛泽东在谢富治关于沈阳冶炼厂的蹲点报告上作了这样的批示：

> “此件是否可以转发中央各部委，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领导同志看看，请酌定。”
>
> 我们的工业究竟有多少在经营管理方面已经资本主义化了，是三分之一，二分之一，或者还更多些，要一个一个地清查改造，才能知道。而要这样做，必须派政治上很强的工作队分期分批去做。谢富治同志这个报告很可一看。”①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256页，1996年8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毛泽东作了上述批示后，1964年12月7日中央转发了上述报告和批示。谢富治这个报告，给两个月前即10月24日中央作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提供了佐证。中央根据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作了这样的批示：

“凡是被敌人操纵或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被蜕化变质分子把持了领导权的地方，都必须进行夺权斗争，否则，要犯严重的错误。这种斗争的经验，在一个地委和县委，有信阳的经验；在一个农村或镇子，有小站地区的经验以及其他农村的不少经验；在一个大企业，有白银厂的经验；在一个城市，将会有贵阳市、白银市的经验。……

不论在信阳、小站、白银厂和贵阳，在夺权以前，都由上级派人进行了长期的工作，才确定地认识这些地方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才下决心进行夺权斗争。一下决心进行夺权斗争，局面就迅速打开，群众立即发动，表现了我们料想不到的革命热情。在这种群众的革命热情的基础上，只要我们给以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就一切困难都可以克服，一切工作都可以作好。最落后的地方就可以迅速地走向它的反面，变为最先进的地方。这里也有一个教训，就是在下决心进行夺权斗争以前，必须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才能确定领导权是否在敌人手里，才能确定这个地方的领导核心是否已经变质，才能决定是否应当进行夺权斗争。不进行调查研究

工作，就在许多地方套用信阳经验，盲目地进行夺权斗争，那是要犯错误的。如果我们认真地进行调查研究工作，调查研究的方法又对头，那我们就不会如信阳问题、小站问题、白银厂问题、贵阳问题那样，拖延很久才去解决，就可以比较早地加以解决，并在基本上不会犯错误。”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无论是在城市或农村，还是在工厂企业或生产大队，都能发现一些市、县、企业、大队的领导权不在共产党员手中，而在表面上是共产党实际上已蜕化变质成为贪污分子、阶级异己分子的手中。不进行夺权斗争，不给他们坚决的打击，就不可能实现共产党的领导，提高共产党的威信，那里的工作、生产、人民生活都将存在严重问题，甚至变为落后地区。但也必须指出另一面，当时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十分严重的情况下，中央又强调反对右倾，把夺权斗争作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大步骤，是很容易造成扩大化的。即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人民内部矛盾说成是敌我矛盾，把不需要夺权的判断为需要夺权的地方和单位。因而造成冤假错案。

1964年12月21日、22日，周恩来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这个报告送毛泽东审阅时，毛泽东看后作了不少批改。其一：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

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

其二：

"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吗？过去西方人加给我们的所谓东方病夫的称号，现在不是抛

掉了吗？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①

在这两段话中，毛泽东总是强调中华民族对人类应该作出贡献，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应该加快发展。毛泽东还提出要革命化、要学习唯物辩证法、要学习大庆的经验。

什么是革命化呢？毛泽东对柯庆施谈过，革命化有三个意思：(1)要反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思想；(2)要下去实践，同工农相结合；(3)要学习唯物辩证法。1964年12月毛泽东在国家计委的一个报告上作了这样的批示：

"十几年来，形而上学盛行，唯物辩证法很少人理，现在是改变的时候了。"②

毛泽东号召各行各业都要学习大庆的经验，因为他们是靠"两论"起家的，即学习《矛盾论》和《实践论》才取得成就的。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学大庆经验的通知中，他特地加了这样一段话，要求各行各业以大庆为榜样，学习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毛泽东加的话是：

①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270～271页、第262页，1996年8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大庆石油工业的经验虽然有其特殊性，但是具有普遍意义。他们贯彻执行了党的社会主义总路线，坚持政治挂帅，坚持群众路线，系统地学习和运用解放军的政治工作经验，把政治思想工作，革命干劲和科学管理紧密结合起来，把工作作活了，把事情作活了，它是一个多、快、好、省的典型，它的一些重要经验，不仅在工业部门中适用，在交通、财贸、文教各部门，在党、政、军、群众团体的各级机关中也都适用或者作参考。"

毛泽东在1964年下半年的思想又有很大的变化。他抓阶级斗争也好，抓学习大庆经验也好，抓青年知识分子参加"四清"、"五反"也好，抓夺权斗争也好，目的是为了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使社会主义的中国牢固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国不变色，党不变修。同时，也是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使中国出现一个真正的大跃进，不让中国落在别国的后面，而是要走在别国的前头，只有这样，才能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上述思想，反映了作为戎马生涯几十年的革命家、思想家、战略家的毛泽东，在进入老年时期后仍希望为党为国多做几件大事，使中国有更大的进步的心态。毛泽东十分担忧中国会出现苏联的悲剧，总在思考着中国如何进行反修防修的斗争，他把这件事看作一生中所做的第二件大事。

17. 与刘少奇的一场争论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全国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四清”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这是继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以来党的主要领导人之间一次最严重的争论和斗争。毛泽东把刘少奇当作赫鲁晓夫看待，开始下决心搬掉刘少奇。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主要是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在一个月的会议期间，前半段是汇报情况，讨论四清中提出的问题，后半段是制定《二十三条》。在这样的会议上，与会者们绝没有料到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会有如此严重的分歧和冲突。其实，这场斗争是经过了长时间的酝酿后爆发的，也就是说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的。经过这场斗争，毛泽东完全改变了对刘少奇的看法和态度，下决心打倒刘少奇。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刘少奇虽然也较积极地抓阶级斗争，抓“四清”运动，做了不少工作，也创造了“四清”运动的“经验”。但是，他没有像林彪那样所谓突出政治，突出毛泽东思想，突出学习毛泽东著作。这一点毛泽东是早有感觉和意见的。

例如，林彪能提出《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而刘少奇则没有。林彪在《指示》中，明确提出：1964年全军各方面的

工作成绩是主要的，但也出现了军事训练冲击政治，忽视政治思想工作等问题，要求在1965年的工作中一定要突出政治、大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大抓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在全军掀起一个更大、更广泛的学习毛著的高潮，使之成为最根本的必修课。在党内外、军内外似乎形成了这样的看法，林彪是突出政治的，是紧跟毛主席的，而刘少奇做不到。从党内外的职位讲，刘少奇的地位仅在毛泽东之下，而林彪的地位则不及刘少奇高，这就形成了毛、刘以及林、刘之间的矛盾与斗争。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争论是这矛盾激化的表现。毛、刘之间的分歧的发生不是偶然的。

对于刘少奇来说，他抓了"四清"的工作，又蹲了点，是有一定发言权的，他必然对"四清"运动中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1964年底，全国已有100万以上的干部参加"四清"运动，但是，普遍地反映"四清"运动搞不下去，提出了种种意见和看法。会议在听取汇报后就开始讨论"四清"运动的性质问题。与会者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和意见。以刘少奇为代表对"四清"提出了系统的看法，认为这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既在党内，也在党外，既有敌我矛盾，又有人民内部矛盾，并且是相互交叉着。然而，这些意见毛泽东根本不同意，并把它们视为原则分歧、两条路线的斗争。12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讲话，明确提出，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严厉地批评了刘少奇的上述提法，同时也基本否定了会议制定的《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共17条，根据毛泽东的讲话，重新讨论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

就《二十三条》来说，一方面对1964年下半年"四清"运动

中的“左”的偏差作了适当的纠正，要求正确地对待基层干部，把基层干部分为：好的、比较好的、问题多的、性质严重的四种，而好的和比较好的占多数，要求尽快地解放干部，对干部一定用一分为二的方法去对待。采取严肃、积极、热情的态度，对犯错误的干部，也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从而实现群众、干部、工作队的三结合。同时在《二十三条》中提出了搞好四清运动的6条标准，在6条标准中，把增产还是减产作为标准之一，这说明《二十三条》有其正确的方面。但另一方面，《二十三条》对城乡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十分严重，并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论断，强调抓阶级斗争这个纲，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这个纲，这是十几年来我党的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总之，《二十三条》的基本方面是表现了“左”的错误倾向。另外还须指出，《二十三条》基本上是按毛泽东讲话列的条文，有的作了文字加工，有的就是原话，这个文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结构。

毛泽东在讲话中，批评刘少奇的两个提法：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交叉和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交叉。认为这种提法没有说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根本性质，没有说明是什么社会里的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也没有说明是什么党的内外矛盾的交叉，也没有说明是什么历史时期、什么阶级内容的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从字面上看来，所谓四清和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可能有；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可能有；所谓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什么历史时期也可能有；这些都没有说明当前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只有这个提法才是马克思

主义的,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这个提法是符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关于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的论断的,忘记十几年来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走到邪路上去。

这段讲话基本上写进了《二十三条》:

> 几种提法:
>
> 1.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
>
> 2.党内外矛盾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
>
> 3.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
>
> 前两种提法,没有说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根本性质。这两种提法,不说是什么社会里的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说是什么党的内外矛盾交叉,也不说是什么历史时期、什么阶级内容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从字面上看来,所谓四清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可能有;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可能有;所谓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什么历史时期也可能有。这些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在文件中虽然没有点名批判刘少奇,但实际上已把刘少奇推出来了,也就是把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矛盾与斗争公开了。因为在《二十三条》关于运动的性质中还有一段尖锐的论述: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一步地巩固和发展城乡社会主义阵地。

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

支持这些当权派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

在下面的，有已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也有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

在上面的，有在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

在中央的是些什么人呢？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中批评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显然这是指刘少奇、邓小平等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以及李富春等主持的国家计划委员会。这等于告诉全党，在党和国家的最高部门中也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代表人物。

在《二十三条》发出前，中共中央于1965年1月14日还专门写了一个通知。特别强调：

“中央政治局召集全国工作会议，讨论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并写出了讨论纪要。现在把这个文件发给你们。中央过去发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如有同这个文件抵触的，一律以这个

文件为准。”

这就是说《二十三条》是绝对正确的。正因为如此,《二十三条》的制定标志着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导思想有着深刻的转变。特别是关于阶级斗争问题,《二十三条》中又作了这样的论述:

“我国城市和农村都存在着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反对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企图用‘和平演变’的方式,恢复资本主义。这种阶级斗争势必反映到党内。有些社、队、企业、单位的领导,受到腐蚀,或者被篡夺。我们的工作,在前进过程中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实践证明,只要全党更深入地、更正确地继续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各项规定,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抓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分子,注意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那末,城乡存在的许多问题,并不难发现,也不难解决。”

在讨论中,刘少奇不同意提“四清”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论断,并打断了毛泽东的讲话。从而使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关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做法十分不满,并指责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

随后，刘少奇虽多次作了自我批评和检讨，但都没有改变毛泽东对他的看法，没有争取到毛泽东对他的原谅。后来，毛泽东对别人说，他在“四清”时候已下决心要打倒刘少奇，主要是指这场争论。在《二十三条》中，虽然没有点名批评刘少奇，但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矛盾已公开地表现在这个文件中了，只要仔细地阅读《二十三条》，就可以知道在党中央主要领导人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分歧和斗争。但更严重的是，毛泽东把刘少奇看作为中国的赫鲁晓夫，认为刘少奇坚持的是一条资产阶级路线，认为在中国从上至下出现了修正主义。这一场争论关系到“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关系到毛泽东采用更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解决所谓的党内问题。这场斗争加剧了党内分歧和“左”倾错误的发展。尤其是毛泽东提出的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论断，更发展了党内的“左”倾思想。

什么是党内的走资派呢？以什么标准划分呢？毛泽东没有作出回答。当时也不可能作出明确的回答。但从实际看，所谓走资派，主要是指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而在党内外又掌握一定权力、担任一定职务的人。在当时“左”的阶级斗争思想指导下，把党内一些犯有这样那样错误，或根本没有错误的同志都划成了所谓“走资派”。尤其是在“四清”中，农村中的基层干部，基本上都被打成了“走资派”。“走资派”概念的提出，实际上为“文化大革命”作了理论上的准备，尤其是把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不同意见和分歧，直接地写进《二十三条》中，并作了论述和批判，这不难让人看出，刘少奇就是所谓“走资派”。事实上，毛泽东也是把刘少奇看作为中国最大的“走资派”，睡在身边的“中国的赫鲁晓夫”。

1965年初，在制定《二十三条》中毛泽东与刘少奇的这场分歧和冲突是至关重要的。从此，毛泽东下决心要搬掉刘少奇，要通过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以实现他的计划和目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酝酿从1965年春就开始了。

18.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

从1964年下半年到1965年底，毛泽东作了很多指示，写了大量的批语，发表了不少谈话，反映了他的思想正在起变化。特别是1965年春以后，他认为中央已出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修正主义，不解决这个问题，是极其危险的。在这里列举一些批示和谈话就可以知道。

其一，1964年7月，毛泽东对当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说，摆设盆花是旧社会留下来的东西，是封建士大夫阶级、资产阶级的公子哥儿提笼架鸟的人干的，那些吃了饭没事做的人，才有工夫养花摆花。毛泽东的这段谈话传出后，很快地刮起一阵批判养花的风。于是花房不要了，养花的师傅失业了。他反对房间内摆花，反对院子内种花，主张种树木，种粮食、蔬菜、油料作物等，在60年代初经济困难时期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不是一个全面的正确的做法。尤其是他主张北京的中山公园和香山也要改种树木和油料作物，并认为这既好看又实惠，对子孙后代有好处的说法更是片面的。显然这是一种主观愿望，但是，毛泽东的这段谈话，在当时影

响是很大的。

其二，1965年6月26日，他对卫生部的工作作了指示，即《六·二六指示》。他批评卫生部不是为人民服务的卫生部。他认为，卫生部应改为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他说：

>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百分之十五的人工作，而且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的还是老爷，广大的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

他主张医学教育要改革。他认为医科大学生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陀读的是几年制？明朝的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六年级毕业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也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医院那套检查医疗的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5亿多农民。

他主张医生应该下乡。城市里的医生应该留一些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六·二六指示》下达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公开全面地宣传贯彻，在这指示中有不少是无法办到的。

其三，1965年7月3日，毛泽东在对北京师范学院的调查

报告上作了这样的批示：

> “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今后的几十年对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是多么宝贵而重要的时间啊！现在二十岁的青年，再过二三十年是四五十岁的人。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将亲手参加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奋斗终身！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要下决心一辈子艰苦奋斗。”

毛泽东的这个批示，对青年寄予莫大的期望。

其四，毛泽东对“官僚”、“老爷”十分痛恨，认为他们是目前革命的对象。他在一个报告上曾作过这样的批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的对象，革命的对象。在他看来，当时在我国已形成了一个官僚主义阶级。

毛泽东的思想在1965年春以后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他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要采取一切措施解决这个极其重大的问题。在1965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后毛泽东多次地讲到中国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

1965年6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把他的话传达下去，传达到县，如果中国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央出

了修正主义怎么办？各省委要顶住修正主义中央。同年九十月间，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再一次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很危险的。他所以这样说，是给县以上干部打个招呼，将来不要大惊小怪。因为，他认定刘少奇就是中国修正主义的代表。他决心要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所以，他多次地讲中国出了修正主义的问题。

当他在下决心要搬掉刘少奇的时候，他开始怀疑用"四清"运动能否解决问题。一方面，他制定的《二十三条》要求坚决地贯彻执行，把"四清"运动进行到底。另一方面，他正在寻找一个新的方法，以解决中国出修正主义的问题。

毛泽东在1964年上海会议后，曾问过许世友：假如北京发生了政变，你怎么办？还说，修正主义不只是出在文化界，党政军中也会出，主要是党政军，这是最危险的。正因为他有这个看法和估计，林彪在1966年5月18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大讲政变问题，并且有一段是讲毛泽东对政变问题的言行。林彪说，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他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这几个月毛主席就是做这个文章。林彪的这个讲话，毛泽东是阅读后批准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历史证明，第一，中央没有出修正主义，第二，中国没有发生政变的问题。毛泽东的错误估计和判断，被林彪利用了。

关于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毛泽东是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酝酿才形成的。认为他们官做大了，政治思想开始变了，同修正主义越来越近了。毛泽东认为他与刘少奇的严重分歧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是原则问题、路线问题。

19.《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出笼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署名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长篇文章，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图推上了历史进程的日程表上。这篇文章的出笼，是江青等人经过精心策划的结果，当然也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

江青要批判吴晗是由来已久的。早在1962年，她找中宣部、文化部的4位正副部长，提出要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但是遭到部长们的拒绝。此时，江青也没有办法。毛泽东没有支持她、放任她，她也不敢胡作非为，只好暂时作罢。1964年下半年，她感到时机到来了。她察觉到毛泽东正在狠抓阶级斗争以及反修防修，认为中国可能复辟资本主义。她先在北京找人，组织批判文章。她找在《人民日报》工作的李希凡。她估计李会接受这任务的。然而李没有答应。她估计在北京组织写作班子批判吴晗是不可能了，她就把注意力转向上海。

1965年春，江青到上海，找到了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结果一拍即合。在严密封锁消息的情况下，组织写批判文章。此时，毛泽东对江青的态度已有很大变化了。他支持江青，使江青越来越多地参与当时的政治斗争。不久，批判文章写成后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这文章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而先在《文汇报》上突然发表。这篇文章发表后受到了各方面的抵制和指责。在报界，几乎大部分不予转载。后来《人民日

报》转载时特地加了一个很长的按语，并把它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开展讨论。

这篇文章的发表不是作为批评一出戏的问题，而是针对党内的重大政治问题，体现毛泽东的战略部署而出现的。这篇文章的发表成为“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导火线。毛泽东在该文发表前后，始终没有和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刘少奇等商量过。中央也没有发出各报转载的通知。北京市委在彭真的主持下，《北京日报》也不予转载。到11月30日，《人民日报》才被迫转载，所加的按语送给了周恩来审阅并作了修改。在按语中，尽力把它限制在文化学术领域中进行。这些做法，一方面无法阻止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另一方面也加剧了中央领导层之间的分歧。这就促使这篇文章的发表成为斗争的新起点。经过几个月的策划，又一批批判吴晗的文章出笼了。江青又在林彪的支持下，发动了更大规模的斗争。

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之所以成为“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序幕或前奏，因为它不仅仅是批一出戏，而是涉及到党的领导层以及政治、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也标志着江青步入政治斗争的领域以及她政治地位的上升。在这次批判中，表面上是批判吴晗，实际上是指向北京市委，指向彭真、刘少奇等人。江青明显地表现复仇的心理。她仇恨30年代了解她生平历史的人们，她仇恨中央那些反对她和毛泽东结合的人们，她更仇恨中央内部作出决定不让她参预党中央政治活动的人们，她还仇恨在文艺界中把她冷落了几十年的人们。她抓住这个有利时机，要把他们一个一个地打倒，置于死地而后快。她决心到上海另起炉灶，寻找一批心腹，充当她的打手，而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正是最合适的人选。她要实现这个目的，只好撇

开所有的中央领导人。但是，她离不开毛泽东，只有取得毛泽东的支持才能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她处处表现出与毛泽东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而毛泽东为了发动“文化大革命”，也需要有一批人打开这个局面。在这点上，江青的行为正符合了毛泽东的需要。毛泽东让她参预这场“文化大革命”，这是江青所求之不得的。她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达到几十年来梦寐以求的目的。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发表，是江青炮制的一颗重型炮弹，首先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同时她也尽力争取林彪的支持。自1959年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后，毛泽东把林彪作为最可靠和得力的人，不断地重用林彪。对于这一点，江青是一清二楚的。林彪手中握有多大的生杀之权，江青也是十分了解的。而林彪也非常需要江青这样的人。江青以夫人的身份接近毛泽东，这点别人是无法办到的。所以，二者一拍即合。由江青出面，于1966年2月2日至20日在上海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参加者中有刘志坚、谢镗忠、李曼村、陈亚丁等人，讨论建国17年来文艺工作贯彻党的路线问题。经讨论，整理了《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纪要》。在这个纪要中，炮制出有一条“文艺黑线”的谬论。纪要说：“建国以来文艺界有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个纪要由江青等人炮制出后，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然后又报送给林彪，让林彪以中央军委名义上报中共中央。这个纪要标志江林结合一同向文艺界开火。

毛泽东对江青的上述做法，不仅同意而且还发表了不少重要指示加以支持。例如，江青炮制批判吴晗的文章是在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但她并没有对毛泽东保密。江青说：张

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春桥同志每来北京一次……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

对于这件事，毛泽东说：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搞了交给我看。江青并没有对毛泽东采取完全保密的态度。因为没有毛泽东的支持，这篇文章是不可能出笼的。即使出笼了，也会受到抵制。文章发表后受到各方面的责难时，毛泽东采取了极力支持的态度。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等人谈话。毛泽东说：

> “《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这个谈话，一是支持江青批判吴晗；二是又一次批判彭德怀；三是把批判吴晗与批判彭德怀联系起来。这个谈话传达后，使《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与党内路线斗争联系在一起，认为这不是文艺的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到1966年初，批判达到了高潮。不仅在文艺界开展了激烈的批判，而且在史学界、哲学界、教育界等各个社会科学领域中全面展开，全面地“揭盖子”了。

面对这种形势，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宣传部的不少同志一方面是缺乏思想准备的，另一方面是持有不同

观点和看法的。经中共中央同意，于1966年2月3日，彭真召集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这五人小组成立于1964年5月，经毛泽东同意，在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主管文化革命工作。当时，中央指定由彭真任组长，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为组员。会后，拟定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这个提纲试图把刚刚发动起来的所谓大批判运动加以约束，把它置于党中央的领导下和学术讨论的范围内，不同意把它发展成为一个政治的大批判运动。这个提纲于2月5日首先向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作了汇报，并得到了他们的同意。并于2月8日，在武汉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对此没有表示反对。参加汇报的有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胡绳、许立群等人。在汇报时，毛泽东谈到：何明的文章我看过，还不差。左派问题以后再说。对郭老、范老要保护，不要批评。对吴晗不要罢官，还是当他的副市长。这样讨论可以放了吧！《二月提纲》在2月12日由中共中央批发到全党，加以贯彻执行。

然而，这个提法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图是背道而驰的，与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利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更是相距甚远。围绕着《二月提纲》，必然展开一场激烈复杂的斗争。3月30日，毛泽东的态度有了根本性的变化，他在上海发表谈话，严厉地指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二月提纲》是完全错误的，指责中共中央宣传部不支持左派，扣押左派稿件，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如再不支持左派，就解散五人小组、中央宣传部、北京市委。

一场急风暴雨式的政治斗争已是不可避免的了。4月，全国形势急转直下。大批判运动不仅仅对准吴晗的《海瑞罢

官》，而且开始了更尖锐的、规模更大的对《二月提纲》、对中宣部、北京市委的政治批判，使原有的文化革命运动成为一个全国范围内的“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运动。

毛泽东所以改变态度是有深刻原因的。毛泽东要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而《二月提纲》是要限制这场运动的发动。这必然促使毛泽东批判《二月提纲》，发动“文化大革命”。这其中与他对康生、江青等人偏听偏信也是有密切关系的。1966年3月下旬，毛泽东到了上海，康生到上海向他作了汇报。在汇报时，康生歪曲事实真相，讲了不少刘少奇的坏话。随即毛泽东作了表态。如1966年春中日两党会谈，在联合公报中，宫本显治坚持不点名批判苏共，对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刘少奇的主持下表示同意。此事汇报给毛泽东后，毛泽东说：中央同意了，我可不同意，联合公报就不发了，我也不接见宫本显治了。又例如，苏共召开二十三大，向中共中央发了邀请信。毛泽东对此，先是未置可否，要在北京的中央常委讨论，后经中央常委讨论，提出应邀参加进行斗争的方案。这件事汇报给毛泽东时，毛泽东也予以否定，并在3月24日发表了中共中央不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的公告。这些事，在毛泽东看来，之所以作出与他不同的决策，是刘少奇“妄图以妥协来解决中苏之间的僵局问题”，刘少奇是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危险人物”。但是，刘少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是党内享有崇高威望的主要领导人。要把他打倒，用“四清”运动的方法是不可能的，只有采用一种更大规模的、从上至下和从下至上相结合的群众运动的方法才能实现，那就是“文化大革命”运动。

第四章

身穿军装，发动一场新的“革命”

（1966年春—1969年夏）

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用“颇有点近乎黑话的话”，给江青写了一封在当时“不能公开”的信，全面阐述“文化大革命”。8月18日毛泽突然穿上军装与林彪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群众，接见百万红卫兵。不少没有穿军装的老同志不得不回去换军装后又赶来参加大会。

毛泽东批评邓小平“耳朵聋”，一开会就在和我很远的地方坐着。1959年以来，6年不向我汇报工作，对我是敬而远之。从而开始全国范围的“炮打”、“火烧”、“刘邓司令部”。1969年11月刘少奇在开封含冤去逝。

毛泽东认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他一生中要做的第二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是打倒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中国独立和中华民族解放的任务；第二件大事，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打倒以刘少奇为代表的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完成反修防修、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任务。

他在完成第二件大事的时候，犯了方向性的错误，“文化大革命”运动给党、国家、人民带来了灾难，也造成了毛泽东人生中的悲剧。

然而，在1966年春的时候，毛泽东仍然雄心勃勃地要在中国的大地上干一番新的“伟大的革命”。他奔走于全国，把握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命运和航向，党和国家的大事都要由他来决策。

他虽然处在老年时期，但仍然豪情满怀，敢于冒各种风险。他不怕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也不怕自然界的风浪。他敢于畅游长江、湘江、邕江。与人斗，其乐无穷；与天斗，其乐无穷。他神采奕奕，来到群众中，了解各种实情；他站在敞篷轿车上，挥动大手，一次又一次地接见群众和红卫兵。他穿上军装，再一次来到了井冈山。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他一生中铸成的最大错误。当然，他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党内的的绝大部分同志也没有认识到。他之所以发动“文化大革命”，他认为是因为过去搞了许多运动，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采用“文化大革命”才能从根本上达到反修防修的目的。他虽然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的问题，担忧党变修国变色，实践证明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是完全错误的。他把中国共产党内存

在的问题，看成是修正主义，因而采取了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的办法，颠倒了敌我关系，重用了林彪、江青等一批野心家、阴谋家，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篡党夺权的机会。起初，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搞一年就差不多了，然而“文革”一旦发动以后，在林、江这批野心家、阴谋家的利用和控制下，使“文化大革命”运动得以长期持续。

“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使他逐渐地察觉到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他虽然掌握着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但他已衰老了，感到力不从心，不能像过去那样叱咤风云、扭转乾坤了。他想选择接班人。他重用林彪，但不相信林彪；他相信江青，但不重用江青。这就从根本上使他们的夺权阴谋彻底失败。

他日夜思虑着的是中国会不会变修的问题。他把林彪、江青等人推入争夺接班人的斗争中，但他始终稳稳地坐在漩涡的中心点上。他不交权，不放权，宁愿终身制，使野心家、阴谋家的真面目彻底暴露。

“文化人革命”发动前后，林彪看到了毛泽东要做的一切，以及所喜欢的一切。他做了不少讨好毛泽东的事。他大搞个人崇拜。把毛泽东从人的行列上吹到了神的位置上，从领袖的集团成员中的一分子吹成了几千年才出一个超天才的救世主。毛泽东看到了林彪的险恶用心。他虽然主张在党的九大党章中规定林彪是他的接班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但是他没有把实权交给他。这就从根本上使林彪夺权阴谋彻底失败。按惯例，中共中央的权力一定会旁落到林彪的手中。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历史的结局是以林彪集团的彻底覆灭而告终。所以“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人民带来了灾难，而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却没有落在林彪手中，这又使党、国家、人民

幸免于难。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完全错误的。但他毕竟是一位伟大的领袖。即使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仍然运筹帷幄，为国家的安危决策着一件又一件的大事，立下了不朽的功绩。有人说他的晚年是一个错误的晚年、唯心主义的晚年、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晚年，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经不起历史考验的，中国人民也是不能接受的。

1.给林彪的一封信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毛泽东真切地描绘了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模式，以及社会主义新人成长培养的道路。这封信就是所谓的“五七指示”。在60年代下半期，这个“五七指示”把上千万的干部、知识分子、军人等引上了所谓“光辉的五七道路”。

1966年3月在杭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发表了长篇讲话。从讲话中，可以看出他写这封信的思想脉络。他说：

> 学术问题，我们被蒙在鼓里，许多事我们都不知道。事实上学术界、教育界是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手里掌握着。现在，大中小学大部分都是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主、富农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垄断了。现在，要

搞学术批判，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不然，要出修正主义。将来的修正主义就是这些人。如吴晗、翦伯赞都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但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反对共产党、反对唯物论，这是一场广泛的阶级斗争。现在全国28个省市中，有15个省市开展了这场斗争，还有13个省市未动。对知识分子包下来有好处，也有坏处，这些人实际上讲是一批国民党员。北京有个《前线》刊物，实际上是吴晗、邓拓、廖沫沙他们办的，有个"三家村"就是他们办的。廖沫沙是为《李慧娘》捧过场的，提倡过"有鬼无害论"。阶级斗争是很尖锐、很广泛的，请大局、省委注意一下，如学术、报纸、出版、文艺、电影、戏剧等，各方面都要搞阶级斗争。文艺界、医务界下乡好。中专技校半工半读，统统到乡下去。尽读古文书不行，要接触实际。学文学的，要学写作，写诗，写小说，不从写作搞起怎么能行，能写就行，以后以写为主。我们部队的人，那些将军、师长，什么尧舜黄帝都不知道，孙子兵法也没有学过，不一样打仗。不要压青年人，让他冒出来。就像戚本禹批判罗尔纲，戚是中央办公厅信访办公室的一个工作人员，罗是教授，不要怕触犯他们。现在是年纪小的、学问少的打倒那些老的、学问多的。现在权威是谁？是姚文元、戚本禹、尹达。要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定的人来接班，这个问题很大。

毛泽东把知识分子问题、接班人的培养和挑选问题，看得十分严重。他认为，把他们放在阶级斗争的实践中去，是一个极好的锻炼。他认为培养接班人是一个大问题，是一项艰巨

的任务。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做到反修防修。

毛泽东写这封信的时间是在5月7日。而在3月他开完杭州中央工作会议后，没有立即回北京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而是到了武汉，并住了下来。在这风云突变的岁月中，一场所谓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即将掀起，然而他似乎并不在第一线指挥，给人以一种时隐时现、难以捉摸的感觉。然而他却对当时的各种风风雨雨，各方面人物的动向，都知道得十分清楚。尤其是对即将来临的"文化大革命"风暴，更是了如指掌。他确实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组织者，为"文化大革命"作出了一个又一个的部署。他写给林彪的信，就是带有战略意义的步骤。他在信中说：

你在五月六日寄来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作出适当的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

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有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①

毛泽东这个“五七”指示，可以说是他多年来憧憬的在中国大地上要建立的一种理想的新社会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人人都要学军、学工、学农、学政治、学文化，批判资产阶

① 《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下册，第250页，1991年5月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级；但人人又以一项为主，工人以工为主，农民以农为主，学生以学为主，这是分工的不同，从而消灭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之间的差别，消灭城乡之间的差别。由此可见，他想通过这个“五七”道路，培养一代又一代全面发展的人才，使中国走向发达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对于这条道路，毛泽东认为，林彪在军队中已推行多年了，而地方上还没有实行。所以，他给林彪写信，要他发展、创新，要他在全国普及。事实正是如此。“五七”指示公开发表后，全国很快地实行起来了。这也说明，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已经开始考虑和规划“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社会应该如何发展和前进的问题了。

“五七”指示发布后，在中国城乡推行了整整10年。这里毛泽东规划的一种具有理想色彩的、平均主义的社会经济模式。他要每一个人在各个方面都要学一点，造就所谓全面发展的一代共产主义新人。在这一代新人中，没有资产阶级，没有邪恶思想，人人平等，共同劳动。在这里看不到社会发展规律、经济发展规律的作用。“五七”指示并不是一封普通的信，而是关系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社会如何发展的大问题。

这封信写给林彪，提高了林彪的个人威信，并使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干部从此奔向“五七”干校，走“五七”道路。时间之长、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尤其是到后来，把“文化大革命”中揪出来的所谓走资派等统统地长期地赶到“五七”干校，走“五七”道路，接受改造和锻炼。“五七”指示的发表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历史证明，“五七”指示中这种设想，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条件下是很难办到的。贯彻“五七”指示必然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而终结。

2.再不发动“文化大革命”，老中小都要挨整了

1966年3月，康生在上海向毛泽东汇报国际关系问题时，趁机向毛泽东告状，说彭真于3月16日通过许立群给上海市委宣传部杨永直打电话，质问《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上海市委不跟中宣部打招呼，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这是整到毛主席头上了。毛泽东听后说，再不发动“文化大革命”，老的、中的、小的都要挨整了，并对彭真、陆定一等讲了一大篇话。这些话，康生如获至宝。3月底，康生赶回北京后，立即向钓鱼台的写作班子作了传达，并要王力整理一份文字材料，作为他在4月向中央政治局传达、5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报告的蓝本。同时还要王力起草一个通知，批判《二月提纲》。通知的初稿写出后立即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看后，认为写得太简单，不能用，并指示要陈伯达另写一个批判《二月提纲》的通知。后陈伯达叫王力共同起草。康生又认为，只有通知还不够，还看不清最近一个时期的斗争情况，还应当有一份大事记，作为通知的附件一起下发。后来，又成立了文件起草小组，成员有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吴冷西、王力、关锋、戚本禹、尹达、穆欣、陈亚丁等。4月16日至26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同时在上海的锦江饭店召开中央文件起草小组会议。毛泽东对起草的通知稿作了极为认真的修改和审定工作，准备提交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至此，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运动已准备完毕。此时，全国从理论到实践，从思想到组织，都具备了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条件。也就是说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形势已形成。但是仅此还不够，还必须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让全党接受下来，才能真正地形成一个统一领导的群众运动。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武汉等地，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刘少奇主持了这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及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共26人，其中包括即将正式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等8人。这次会议标志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全面发动。

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主持会议。会议共开了23天。会议一扫过去开会的风气。会议充满着批判、斗争的气氛。尤其是传达毛泽东在会前的讲话后，会议便把"文化大革命"的旗帜高高地举起来了。

毛泽东虽然没有主持这次会议，但他对会议作了各方面的指示，也密切地关注着会议的进展。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会上集中地批判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领导人的所谓反党罪行，并决定停止和撤销他们在党内外的一切职务。打倒这些同志，有的是毛泽东的旨意；有的是出于林彪的目的，有的是出于江青的要求。林彪、江青打着毛泽东的旗号，也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很快地把彭、罗、陆、杨打倒了。

当然，标志"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还在于5月16日会议讨论通过的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这个通知虽然经过几个月的酝酿、讨论，最后还是在毛泽东的主持下起草完成的。在这个通知中，对"文化大革命"的性质、革命的对

象、运动的步骤、以及政策等各个方面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尤其是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和理论都写了进去，从而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纲领。

毛泽东在审定通知时，亲自写了这样至关重要的三段话：

“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我们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①

这三段论述，充分反映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思

① 《人民日报》1966年5月17日。

想和理论，它严重地混淆了敌我界线，把"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矛头指向了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对有成就的知识分子，把他们打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毛泽东错误地认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才能发动广大群众起来揭发党、政府和各个机关、单位中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的领导权重新夺回来。所以，"文化大革命"又是一场夺权斗争。所谓"文化大革命"，是从文化领域开刀，而实际上，当"文化大革命"真正地发动以后，就没有"文化"的特点了，而只有"大革命"的政治色彩了。

《五·一六通知》在大会上通过后，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为题的社论，将《通知》的内容散布全国。

5月16日，中共中央还批转了《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中共中央对这报告作了批示：

> "中央认为，罗瑞卿同志的错误，是用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是用修正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彪同志的错误，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篡军反党的错误。"（于是中央决定）"停止罗瑞卿同志的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5月18日，林彪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长篇

讲话。他一方面大讲毛泽东的个人天才，大造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另一方面，他大造党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搞颠覆的舆论，制造恐怖气氛。被批准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到县团级。

林彪在《五·一八讲话》中鼓吹毛泽东的个人天才论。他说：毛主席经历的事情，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多得多。他们没有经历过像毛主席那样长期、那样复杂、那样激烈、那样多方面的斗争。毛主席革命经验之丰富没有哪一个人能超过。毛主席在全国、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的无产阶级的天才。有些人不承认天才，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能不承认天才。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广泛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在当代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19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20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不要不服气，不行就不行，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要犯大错误，不看到这一点，就不晓得把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天才能手选为我们的领袖。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也拥护毛主席。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林彪在大造毛泽东个人天才论的同时，又大讲政变问题。从古今中外的政变事例中，要全党注意防止中国也发生政变问题。林彪说：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他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

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作了布置。毛主席在这几个月中就是做这个文章。这是没有完全写出来的文章，没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是很深刻很严重的问题。

林彪大讲中国历史上的历次政变以及1960年以来世界各国的政变。他所以这样讲，除在党内外制造恐怖气氛外，目的是借此打倒一大批人，特别是打倒党内、军内反对过林彪的高级将领和干部，为他篡党夺权制造舆论，扫清障碍。

5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作出决定，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撤销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撤销陆定一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职务；调陶铸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并兼任中央宣传部长；调叶剑英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任命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5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作出了《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在说明中，给陆定一扣的罪名是：与妻子严慰冰反革命案件有密切的牵连；一有机会就猖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把活学活用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骂成是"实用主义"、"庸俗化"、"简单化"；他大反斯大林，大反所谓的"教条主义"，与中央唱对台戏；反对林彪，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的立场与彭真相一致；垄断中央宣传部的工作，打击左派，包庇右派，替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这些都是加在陆定一头上的不实之词。只有他反对林彪的所谓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才是事实。在说明中，给杨尚昆的罪名是：他不顾中央多次关于禁止安设窃听器的

决定，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主席和中央常委同志的讲话，盗窃党的机密；他同罗瑞卿等人关系极不正常，积极参加了反党活动；他把大量的机密的文件和档案擅自提供给别人抄录，严重地泄露党的核心机密；他还有其他方面的严重错误。这些罪状是莫须有的。但当时就以这4条罪名把杨尚昆打倒了。

毛泽东虽然没有参加长达23天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但他始终掌握着会议的进程以及解决的问题。会议完成了毛泽东事先所确定的任务，终于在5月26日宣告闭幕。

一场“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在毛泽东的发动下，在《五·一六通知》的号召下，很快地从全国各地汹涌而起，从而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开始了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

3.批准成立中央文革小组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会议期间批判了彭真等拟的《二月提纲》，通过的《五·一六通知》中确定了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路线和方针政策，这为“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作了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准备。同时在会上，也撤销了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并决定重新成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这是从组织上保证“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与开展。

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名单的通知：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有谢忠镗、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华北、东北、西北、西南四大区参加成员（四人）确定后另行通知。

中央文革小组的成立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在组织上准备全部就绪。8月2日，中央决定陶铸担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名列康生之前。后来中央又补充了代表华北局的郭影秋、东北局的郑季翘、西北局的杨植霖、西南局的刘文珍。这样，中央文革小组共18人组成。但大区中央局的代表只参加过几次讨论起草文件的会议，并未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的实际工作，所以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实际上是14人。

中央文革小组是适应"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而成立的，也是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要机构。在成立之初，虽然排斥了彭真等人参加，但也不可能全是林彪、江青方面的人，中央政治局还在主持工作和活动，有权决定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小组的成员各方面的人都有。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中央文革小组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显赫，而且小组的权力也逐渐地落人林彪、江青之手，中央文革小组的地位和作用便更突出了，最后成为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有力工具，也成了林彪、江青一伙篡党夺权的工具。

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后，以它特有的地位活动于这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的政治运动的舞台上。"文化大革命"初期给广大干部和群众留下的许多灾难，绝大部分是与它有关的，或是它干的，它在"文化大革命"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作用。

中央文革小组从它成立到自行结束，经历了两个阶段：1966年5月至12月为中央政治局的"秘书班子"阶段；1967年

1月至1969年4月是实际上逐渐地代替了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阶段。

1966年5月至12月,“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掀起,党政机关开始陷于瘫痪状态,党政干部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此时,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由刘少奇、邓小平等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刘、邓虽受到批判,党中央的日常工作由周恩来、陶铸主持。在这半年中,中央文革小组的地位作用,不可能代替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发号施令的机构,它只能起“秘书班子”的作用;同时期中,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还有陶铸、王任重等人,他们极力抵制各种“左”的错误,也使江青等人不可能胡作非为。对此,江青非常不满。她说,中央文革小组是中央常委的“秘书班子”。尽管如此,这个“班子”也非同一般。由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需要,这个班子所起的作用便越来越大,地位便越来越高,再加上江青等人有着特殊的身份,能经常地见到毛泽东,起到了别人起不到的作用。在这半年中,中央文革小组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干了“许多事”,受到了毛泽东的多次称赞。这就为第二阶段逐渐地代替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作了充分的准备。

1967年1月以后,由于“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也由于党内政治生活的极度不正常,中央文革小组逐渐地代替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作用。一方面,篡夺了党和国家的一部分权力,进行发号施令;并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并列,发出了一系列的文件。另一方面,借“文化大革命”,打倒了大批党内外的干部,使大批干部遭到迫害、打击,

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灾难。中央文革小组在“文化大革命”中干了许多坏事，使全党和全国人民认识了它的本质。到1969年4月党的九大的时候，中央文革小组也停止了。

中央文革小组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而产生的，也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而发展的，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特殊的机构。由于参加的成员大部分是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中的野心家、阴谋家，中央文革小组如同“文化大革命”一样，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了灾难。毛泽东批准成立中央文革小组是一个错误的决策。

4.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发表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开和《五·一六通知》的制定，只是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但还不是斗争的高潮。只有毛泽东肯定的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发表，才掀起了“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斗争风暴。

5月31日，毛泽东批准，陈伯达率领穆欣、唐平铸等人组成的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夺了吴冷西的权。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陈伯达掌握新闻大权后，开始了“文化大革命”的鼓动宣传工作。6月1日，《人民日报》社发表了由陈伯达起草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并连续5天，每天发表一篇社论，一反过去状态，把“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动起来了。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中有这样几段话：“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

正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社会主义中国兴起。”

“在短短几个月内，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斗号召下，亿万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打碎了多少年来剥削阶级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把所谓资产阶级‘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目前，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模和声势，在人类历史上还不曾有过，它的威力之大，来势之猛，在运动中所迸发出的劳动人民无限的智慧，远远超出了资产阶级老爷们的想象。事实雄辩地证明，毛泽东思想一旦掌握了群众，就成为威力无穷的精神原子弹。这一场文化大革命，正在大大推动中国人民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也必将对世界的现在和未来，发生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在这些蛊惑人心的词句激励下，人们投入到了这场所谓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但是，更能动员广大群众投入这场运动的，是毛泽东批准公开发表的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这张大字报的出笼是有很深刻的背景的。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策划批判吴晗，只不过是找一个突破口，目的在于所谓揭开北京市委的盖子，打倒彭真，打倒刘少奇。江青在炮制批判吴晗的文章时，在组织上是不合法的，所以她一定要争取毛泽东的支持。《5·16通知》的制定，不仅批判吴晗合法了，而且批判彭真也可以了。这是陈伯达、江青、康生策划已久的阴谋。但是，批判彭真、批判刘少奇如何成为群众的行动，还要做工作。换句话说，必须借用群众运动的力量，才能打倒彭真、打倒刘少奇。

康生不愧为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阴谋家、野心家。他导演了欺骗亿万群众的丑剧。5月14日，康生派他的妻子曹轶欧带领调查组到北京大学支持“文化大革命”。在曹的策划下，5月25日下午2时许，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7人在大饭厅东墙上贴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为何能出笼，广大师生是不了解内情的，但就内容看，这张大字报把斗争的矛头引向了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他们认为，北大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广大师生的革命被压制下来，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原因在哪里？这里有鬼，于是列举了最近一二个月来北大党委所做的工作。他们认为这是在破坏“文化大革命”，是在负隅顽抗，螳臂挡车，蚍蜉撼树。他们号召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战斗的时候了。但是，广大师生不同意这张大字报的内容，半天之内全校贴出1500张大字报与之辩论，声势之大，反应之强烈是空前的。这张大字报的内容通过康生很快地传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出于全面地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需要，充分肯定了它，并批准将这张大字报在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称它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6月2日，《人民日报》又以显赫的位置全文刊载。同时还发表了由王力、关锋、曹轶欧等共同炮制的所谓《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从此，一场所谓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以北京为中心，很快地在全国蔓延开来。

1966年6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中央决定，由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调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对北京市委进行了彻底的改组。同日，北京新市委决定改组北京

大学党委，派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进驻北大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

6月初，有成千上万的人到北京大学看大字报，了解情况，进行串连，出现混乱的局面。为了控制局势的发展，使“文化大革命”运动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刘少奇主持党中央工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6月1日，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研究如何稳定局势，控制“文化大革命”运动。6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级党委不仅要参加运动，而且要负起领导责任。为支持各级党委的工作，中央制定了《八条指示》；接着，从中央各部中抽调大量干部组成工作组，进驻北京的几所高校，许多省市也派出工作组进入大专院校，使日趋严重的局势开始稳定下来。这个做法，虽然是刘少奇主持会议作出的，但这做法是党的工作中的一个传统。6月20日，刘少奇以中央名义转发了北京大学关于“六·一八”事件的文化革命简报第9号。所谓“六·一八”事件，就是在6月18日上午，北大的化学、生物、东语、西语、中文、无线电系等单位，先后发生乱揪乱斗干部教师的现象，共批斗40多人。在批斗时，发生了脸上抹黑、戴高帽子、罚跪，以及少数人被扭打的混乱现象。校工作组立即奔赴现场，加以制止。中央在转发北大简报时加的按语是：

> 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

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人反对这种做法。毛泽东在武汉知道这情况后作了这样的批示：

"六·一八"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革命事件。

这指示发往北京后，否定了刘少奇以中央名义转发的正确意见。从北大的六·一八事件开始，在北京市、在全国立即掀起了一股反对各级党委、残酷迫害各级干部，大搞打、砸、抢的浪潮。

1966年6月15日毛泽东离开武汉来到了湖南他的家乡韶山滴水洞住了十几天。28日，又回到武汉，住了10天。他看了不少材料，对"文化大革命"运动又产生了许多新的看法，运筹了更大的战略部署。

5.给江青的一封信

1966年6月28日，毛泽东又到了武汉。其间，他看到了不少材料。感到问题最大的是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的"五·一八讲话"。这个讲话是专门讲天才和政变问题的。毛泽东不同意这个讲话。他重视林彪，但不相信林彪。有许多话他只能向江青讲。他在看材料之余，于1966年7月8日给江青写了一封长信。这封信，在当时并没有立即公布。直到林彪摔死在蒙古的温多尔汗后才向全党公布。这封信公布

后，一方面说明，毛泽东对林彪是早有看法和察觉的；另一方面也说明，毛泽东在当时是十分相信江青的。江青的地位也由此明显地提高了。

毛泽东的信有这样几段：

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从六月十五日离开武汉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①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二十八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上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

① 是指湖南湘潭韶山冲西面的一处住所，称滴水洞。毛泽东的祖辈原住在滴水洞，后迁至韶山冲。

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础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

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毛泽东在这封信中，已经察觉到了林彪"五·一八讲话"的险恶用心，但他也第一次违心地同意批准这个报告，发向全党。其后果严重的后果是显然易见的。

毛泽东在信中提出了"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思想。这思想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中，却始终没有能够实现。原因有二：一是"文化大革命"混淆了敌我关系，本来是乱敌人，而现在却乱了自己，使自己天下大乱，所以"文化大革命"不可能达到天下大治；二是林彪、江青等野心家、阴谋家对"文化大革命"的利用，当他们的夺权阴谋没有实现的时候，是决不会结束这个大乱的。天下大乱达不到天下大治。毛泽东认为乱的根源是林彪，这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

毛泽东对林彪的看法，是很有远见的。这看法是自1959年庐山会议以来逐渐地形成的；毛泽东虽然十分重用林彪，甚至在"文化大革命"发动后，始终把他放在最可靠的接班人的

位置上，在党内仅次于毛泽东本人，并在1969年4月党的九大通过的党章中又明确规定林彪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接班人。但是，毛泽东却没有把更多更大的权力交给林彪。这与毛泽东对林彪的看法是分不开的。

毛泽东虽重用林彪，但不相信林彪。这为林彪篡党夺权设置了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从而最终使林彪在篡党夺权中归于彻底失败。

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在不少人的陪同下，畅游了长江。他虽然是一位72岁的老人了，但他的精力、兴趣还不减当年。他喜欢游泳，并与身边的工作人员谈了不少关于游泳的话。他说：

"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们顶了他一下，也没有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东西，其实并不可怕。"

"长江又宽、又深，是游泳的好地方。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锻炼身体，可以锻炼意志。学游泳有个规律，摸到了规律就容易学会。"

毛泽东在长江、湘江、邕江、十三陵水库等江河中曾多次地游泳。他去游泳的地方，一般人是不敢去的。他的气魄、胆量是世人所不及的。尤其是72岁高龄的老人，敢于在长江中畅游，在中外历史上是少见的。

畅游完长江，毛泽东启程回北京。

去指挥"文化大革命"运动。

6.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

1966年7月18日，毛泽东离开武汉，回到了北京，开始直接指挥“文化大革命”运动。

毛泽东回京后，听取了各方面的汇报，给他的一个总的印象是，刘少奇、邓小平等主持中央工作，对“文化大革命”运动采取的种种限制，总是与他的意图相反，毛泽东对此是不能容忍的。

7月25日，毛泽东召见了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并发表了讲话。他说：今天各大区的书记和文革小组的成员都到了，会议的任务是，商量如何搞好文件，主要是改变派工作组的方法。由学校革命师生组成文化革命小组来领导文化大革命。学校的事只有他们懂得，工作组不懂。有些工作组搞了些乱子，学校的文化大革命无非是斗和改，工作组起了阻碍运动的作用。翦伯赞写了那么多书，你还没有读，怎么斗怎么改？学校的事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要依靠学校内部的力量，工作组是不行的。我也不行，你也不行，省委也不行。要斗要改都得靠本校本单位，不能靠工作组。工作组能否改成为联络员，改为顾问，权力太大，或者叫观察员。工作组阻碍革命，也有不阻碍革命的。

工作组阻碍革命势必变成反革命。

毛泽东的这段讲话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央派工作组到学校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做法。他认为工作组起了压制群众的作

用，阻碍"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他又说：西安交大的工作组不让人家打电话，不让人家打电报，也不让人家派人到中央，为什么怕人到中央，让他们来包围国务院，文件要写上，可以打电话、打电报，也可以派人，那样怕行吗？所以，西安、南京的报馆被围3天，吓得魂不附体，就那么怕？你们这些人呀，你不革命就革到自己头上来了。有些地方不准围报馆，不准围省委，不准到国务院，为什么这么怕？到了国务院接待的人又是无名小将，说不清问题，为什么这样？你们不出面，我就出面，说来说去，怕字当头，怕反革命，怕动刀枪，哪有那么多反革命？

毛泽东的这段讲话是批评工作组，也批评大区一级书记，也批评各省省委的干部。批评他们在群众运动面前，怕字当头，不敢领导运动。批评之后，当然要表扬一些人，这是毛泽东一贯的工作方法。他说：这几天康生、陈伯达、江青都下去了，到学校看大字报，没有感性知识怎么行？都不下去，天天忙干日常事务，停了日常事务也要下去，取得感性知识。南京做得好，没有阻挡学生到中央，开会期间，到会的同志要去北大、广播学院去看大字报，要到出问题最多的地方去看一看。你们看大字报时，就说是来学习的，来支持你们闹革命的，去那里点火支持革命师生，不是听反革命、右派的话的。搞了两个月，一点感性知识也没有，官僚主义。

毛泽东的上述讲话，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到北京大学参观学习的人数突然地增加起来。陈伯达、江青等人将毛泽东的上述讲话，极力宣传起来，使全国各地的人员似潮水般地涌向北京大学。据不完全统计，从1966年7月29日到8月28日的一个月中，到北大看大字报、学习取经、串连的

共212.4万多人次，其中仅8月12日这一天中就有17.96万人次。当时，曾有人自诩：北大是“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实际上当时北大的“文化大革命”已发展成为一个乱斗、乱批、乱抄的典型地方，是“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地方。到北大参观所起的作用，只能是造成天下大乱的局面。然而由于毛泽东一提倡，陈伯达、江青一鼓吹，就成了“文化大革命”发动的样板了。

毛泽东所以这样提倡，总认为“文化大革命”必须充分地发动群众，而现在还不够，所以必须有个典型把运动带起来。毛泽东在筹备召开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又听取了不少汇报，也收到了大量的信件和材料。此时此刻，被陈伯达等人到处宣传的所谓“文化大革命”的统帅，他要发动群众运动，又要驾驭群众运动。他已成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中心，无一不是由他作出决策，发出命令。他确实是“文化大革命”的统帅。他善于捕捉要害，抓典型。在信件和材料中，他看到了清华附中红卫兵写的一封信。毛泽东读后十分兴奋。他认为应当有这个典型将群众运动带动起来。

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成立于1966年5月下旬，参加的学生大多是革命干部、工人、贫下中农出身的孩子。红卫兵组织成立后，在学校内开展大批判活动，但没有引起社会的重视，学校也不很支持。他们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读后，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那天，即1966年8月1日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鼓励和支持红卫兵的行动。这封信写出后，不径而走，很快传抄到全国。一个红卫兵运动在“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中又突起了。红卫兵组织从中学生扩大到大学生中，从北京发展到全国，成为一个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并把毛泽

东称为"红司令"。江青也到处代表毛泽东称赞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的"小将"、"闯将"。

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是这样写的：

"你们在7月28日寄给我的两张大字报① 以及转交给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

你们在6月24日和7月4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说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和彭小蒙同志于7月25日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他们红旗战斗小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地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的态度。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态度的人们，我们一样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予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

① 两张大字报为《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再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①

毛泽东的这封信,犹如吹响了号角,一支冲杀在"文化大革命"最前沿的红卫兵异军突起,出现在大街小巷和各种斗争场合。他们身穿没有红领章的军装,头戴没有红五星的军帽,腰拴皮带,臂上别着红袖章,手拿《毛主席语录》,口喊造反有理的口号,到处造反。他们很年轻,然而历史的潮流把他们推入到斗争的漩涡中。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毛泽东更加积极支持红卫兵运动。从8月18日第一次在北京接见红卫兵以后的3个月中,毛泽东一共8次接见红卫兵及群众,计2000万人次,从而使红卫兵运动成为在"文化大革命"第一个历史阶段中规模最大的一个群众运动。

毛泽东所以如此支持红卫兵,目的是要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林彪、江青集团也利用红卫兵运动,特别是江青集团利用红卫兵运动干了不少她们所干不了的坏事。

1966年8月至9月,林彪在接见红卫兵的几次大会上公开煽动"要打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北京地区首先掀起了一个"破四旧"运动并迅即波及全国。8月24日,北京红卫兵组织了40万人的大会。将苏联驻华大使馆前的"扬威路",改名为"反修路",将北京的协和医院改名为"反帝医院",将"全聚德"改名为"北京烤鸭店",将上海的《新民晚报》改名为《上海晚报》,将天津的劝业场改名为"人民商场",将杭州的"张小泉"改名为"杭州剪刀店";其次是拿

① 《红旗》1966年第11期。

着剪刀，剪长发、烫发，剪所谓奇装异服；最后发展到打砸历史文物。据统计，北京在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来的6843处文物古迹中，竟有4922处被毁掉，其中大多数被毁于1966年八九月间。北京从各个炼钢厂抢救出的各类金属文物就达117吨，从造纸厂中抢救出图书资料320多万吨，从各个查抄物资的集中点挑拣出的字画达18.5万件，古旧图书235.7万册，其他各类杂项文物53.8万件。红卫兵运动从一开始，就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动荡和冲击。

红卫兵运动从中学发展到大学，从北京遍及全国的进程中，很快地发生了严重的分化现象，不少红卫兵在上述"战斗"中觉醒过来。尽管也有不少人完全陷人了林彪、江青集团的反革命深渊中。但激烈的斗争，使他们产生激烈的分化。历史是无情的，这一代青年人一步人人生的道路，社会就给他们上了最深刻的一课。他们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在红旗下长大，在风浪中成长。他们留下了深深的伤痕，打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沉重的历史教训令人深思。

7."炮打司令部"

毛泽东回到北京后，全力投入到筹备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中。1966年8月1日至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这次中央全会，与过去的中央全会相比，有着明显的不同之处。参加会议的人员中，除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外，还有不少的列席人员参加。而列席人员中，不仅有中

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而且还有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首都高校革命师生的代表。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讨论制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共16条，简称“文化大革命十六条”。

在这次全会上，毛泽东决心打倒刘少奇。如果说，他在1965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有意要把刘少奇从“政治上除掉”，那么，这次全会他就要把刘少奇打倒了。在这一年零八个月中，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分歧，确实是越来越大了。尤其是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态度上，刘少奇的那一套做法，毛泽东是不能容忍的。8月4日，毛泽东在全会期间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

派工作组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于中央。

这些话，显然是在指责和批判刘少奇等人，并把他们置于牛鬼蛇神的行列了。毛泽东在工作组问题上所以作出这样的判断，除他思想上的主观武断外，主要的是偏听偏信了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人的谗言。

8月5日，他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在当时身为中共中央主席的毛泽东，向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写大字报，他也许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在党的历史和共和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当然，也有人兴高采烈；也有人把它看作是进行“战斗”的机会到了……

毛泽东的大字报是这样写的：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毛泽东发表这张大字报，是一个重大的政治行动。他要把刘少奇打倒。这样一来也必然要把成千上万的干部打倒。事实正是如此。所谓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的帽子，全扣在刘少奇的头上。刘少奇对于这点是难以接受的。

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前夕，即7月28日，北京市委召开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刘少奇在会上说：

"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

得。”

这时，党内绝大多数人是处在“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的境遇中，至于把自己放在被炮打的地位，那更不能理解和接受，并由此产生抵触情绪，从思想、组织上等等都采取了抵制的措施。

1966年8月1日，即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式上，刘少奇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工作的报告，他对派工作组一事，承担了责任。但刘少奇也并没料到要把他打倒。

8月8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个决定，标志着又一个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的诞生，也是继《五·一六通知》以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思想的又一个代表作。这决定共有16条。在这决定中，总结了近两个月来“文化大革命”的经验，部署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计划。在决定中规定：

“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

“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个决定的通过，标志着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思想、理论再一次被全党肯定和接受下来。

8月12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毛泽东在闭幕式上又作了总结性的讲话。主要内容有：

(一)关于召开党的九大问题。他说，关于党的九大，要准备一下。什么时候召开，要讨论。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到现在

已有10年了。现在需要开党的九大。大概是在明年一个适当时候开，现在要准备。建议委托中央政治局的常委来筹备这件事。

（二）关于这次全会所确定的路线问题。他说，这次大会所决定的问题，究竟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要看以后的实践。我们所决定的那些东西，看来群众是欢迎的，比如中央的一个重要决定，就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广大的学生和革命的教师是支持我们的，而过去那些方针，广大的革命学生和教师是抵制的。但是，这个决定能不能实行，还要靠我们各级领导去做工作。决不要以为决定上写了，所有的党委、所有的同志都会实行。总有一部分人不愿意实行。

（三）关于对犯错误同志的问题。他说，对犯错误的同志，总是要给他出路，要准许改正错误。我们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看二帮，团结——批评——团结。我们这个党不是党外无党，我看是党外有党，党内有派，从来就是这样。这是正常现象。我们过去批评国民党，国民党说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有人就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共产党也正是这样。你说党内无派，他就是有。比如说群众运动就有两派。不过是占多占少的问题。如果不开这次全会，再搞几个月，我看事情就要坏得多。所以这次会是开得好的，有效果的。

毛泽东的上述讲话，对“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充满信心的。他认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非常必要的。他并没有察觉到“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会使全国陷于混乱之中，会给党、国家、人民带来灾难。他强烈要求全党坚决地贯彻这《十六条》。

毛泽东还认为，这次会议对中共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人员的变动是正确的，是有力地保证这决定的贯彻和执行的。他说，这次组织有些改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常委的调整，就保证了中央这个决定以及公报的实行。全会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改组党中央领导机构的。全会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林彪名列第二位，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会议没有选举中共中央主席、副主席。原来的党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全会后没有提及了，而会后不久，林彪却被宣布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这实际上只有林彪一人为副主席了。这次全会使林彪的地位显著地上升了。而刘少奇虽然还保留在政治局常委之中，但已排到第八位了。从而改变了自党的七大以来刘少奇在党的历史上形成的地位。陈伯达、康生的地位也显著地上升了。

8月12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还讨论通过了全会的公报。在公报中，列数了毛泽东近四年来以及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所谓“英明决策”。这里摘引一段：

近几年来，在全国的农村、城市和军队，广泛地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现在，一个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我国兴起。工农兵群众、革命知识分子和广大干部活学活用毛泽东同志著作的群众运动，开创了劳动人民直接掌握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纪元。

全会完全同意1963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完全同意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农村社会

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这两个文件，是在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下制定的，是我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强大的思想武器。在农村和城市，应该继续按照这两个文件，结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四清"运动，也就是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到底。

全会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近四年提出的一系列英明决策。这些决策主要的是：

关于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发扬群众路线的革命传统的问题。

关于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

关于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号召。

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

关于打破洋框框，走自己工业发展道路的问题。

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体系和布局的问题。

关于全党抓军事、实行全民皆兵的号召。

关于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规划和部署的问题。

关于人民解放军和工厂、农村、学校、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都应该成为一个革命化的大学校的号召。

全会强调指出，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是当前我国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①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不仅肯定了毛泽东作出的一系列的

① 《人民日报》1966年8月14日。

决策，而且也高度评价了他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决策。这表明全会再一次接受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思想。全会的召开在政治上、路线方针上、组织上等，都保证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开展。至此，“文化大革命”运动已全面铺开。

8.八次接见红卫兵

没有毛泽东的发动和支持，全国的红卫兵运动是不会兴起的；同样，没有林彪、江青等唆使和利用，红卫兵运动也不至于发展成悲剧。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先后8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8月18日，首都百万红卫兵、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大会，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进行。那天，毛泽东突然穿上草绿色的军装，与林彪站在一起，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群众。不少没有穿军装的老同志不得不回去换了军服又赶来参加大会。那天的群众大会，和过去不同了。林彪处在显赫的位置上，又是穿上军装，戴上红卫兵袖章，真有点“大革命”气氛。这次大会，也是毛泽东首次接见来自全国的红卫兵、学生和教师的大会。

林彪代表中共中央讲话。这个讲话虽然很简短。但喊出了“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

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后，全国的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地发

展起来，各省市的红卫兵也纷纷来北京要求见毛泽东，开始了全国的大串联，红卫兵上京乘火车不用买车票。毛泽东出于发动群众的需要，于1966年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0日、11月26日等共8次接见了红卫兵、学生、教师。在这8次接见中，外地共有1100多万人来到北京。为解决这个大串联的需要，中央调集了大批的物资，有吃的，也有穿的和用的，特别是交通的问题，从不少省市调公共汽车进京，负责运输。当时北京的马路上，跑着外省市调来的公共汽车，以应付潮水般涌向北京要求毛泽东接见的红卫兵。

1966年9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组织外地师生到北京参观学习“文化大革命”运动。通知规定，从9月6日起分期分批来京参观、学习，相互支援、交流革命经验，来京参观一律免费坐火车，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中开支。很快形成了全国性的革命大串联，其中有不少人借机跑了全国许多地方。

红卫兵、革命群众进行大串联，以及毛泽东8次接见红卫兵，加剧了全国大动乱的气氛，增加了国家不必要的开支。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公布，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后，全国形势急转直下。中共中央又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如何贯彻16条。8月23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讲话。他认为：当前主要问题是各地所谓乱的问题。采取什么方针？我的意见乱他几个月，坚决相信大多数是好的，坏的是少数。没有省委也不要紧，还有地委、县委，《人民日报》要发表社论，工农兵不要干涉学生的行动。提倡文斗，不要武斗。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学

生开了10万人大会，把凶手抓出来，惊慌失措。北京太文明了。过去急急忙忙派工作组，急急忙忙斗右派，急急忙忙开10万人大会，急急忙忙发呼吁书，急急忙忙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为什么反不得，我出了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有些问题要快些决定。

毛泽东在这时，还把重点放在发动群众上。他积极主张把"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不要怕，也不要压制。学生上街就让他们上街，工农群众不要干涉。但他又提倡文斗，不要武斗。

9月7日，毛泽东对青岛、长沙、西安等地问题的报告作了批示。他对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康生、江青等说：

> 此件已读。青岛、长沙、西安等地发生的情况都是一样的，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这都是错误的。这样下去是不行的。请以中央名义发指示，不准这样做。再发社论告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北京就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除人民大学调600农民进城保郭影秋之外，其他没有，以北京的经验告外地照办。

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了这样的决定：

一、不准用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挑动和组织工人、农民、市民反学生；

二、凡是发动挑动和组织工人、农民、市民反学生事件的地方必须公开承认错误，承认责任，平息工农、市民与学生之间的纠纷，绝不允许把责任推给群众；

三、劝说工人、农民、市民不要干预学生运动，相信学生绝大多数是革命的，是能够自己教育自己的，对他们的言论行动有意见，可以向上级机关提出，不要直接同学生辩论，不要同学生发生冲突；

四、各级党委负责人，不要怕学生，不要怕工人，不要怕农民，不要怕群众，要放下架子站到学生中去，到群众中去，同他们商量问题，坚决走群众路线，坚持党的政策原则，坚持《十六条》，没有什么不可以解决的问题。在北京有些负责同志这样做了，效果很好。

1966年8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作出了《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8月22日，中央同意公安部作出的《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以及中央的上述四条规定，目的是在于发动群众。全国的学生运动在9月有了更大规模的开展。

1966年10月13日，毛泽东对外地来京串联的革命师生作了这样的批示：

下次接见，采取阅兵式的办法，不管多少人，解放军要统统包下来。由军队负责将外地来京的师生，按解放军的编制，编组成班、排、连、营、团、师，编好后进行训练。学习政治，学习解放军，学习林彪和周恩来的讲话，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习解放军的三八作风，学习编队队形，学习队列基本动作，学习步法，每个人都要学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子，使外地师生有秩序地接受检阅。经过训练，把解放军的光荣传统，三八作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带到全国各地去。

毛泽东8次接见红卫兵虽然是史无前例的，但是这样的

大串联，一方面加重了全国动乱，一方面增加了国家的财力物力的开支，不少人来到北京后，一连几个月不回去。对此举动，党内外不少同志有意见。

1966年10月9日至2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他在会议期间，发表了多次讲话。在一次讲话中，他批评了邓小平。他说邓小平耳朵聋，一开会就在离我很远的地方坐着。1959年以来，6年不向我汇报工作。书记处的工作他就抓彭真。你们不是说他很有能力吗？李富春休息一年，计委谁主持工作，我都不知道，富春是守纪律的，有些事是对书记处讲的，书记处没有向我讲，邓小平对我是敬而远之的。这个讲话内容传出以后，社会上又开始贴批判邓小平的大字报，从而喊出了打倒所谓"刘邓路线"、"刘邓司令部"的口号。

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有不少同志反映和表现了对"文化大革命"的不理解，有意见，说犯错误是糊里糊涂的。毛泽东说，5个月的"文化大革命"的火是我放起来的，时间仓促，不到半年，不那么通，有抵触，是可以理解的。

在会上，陈伯达作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他公开点名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等，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煽动人们要以无所畏惧的精神去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会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批判所谓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在大批判中，大批的党政干部受到冲击、批判，扣上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帽子，使党政机关陷于瘫痪状态。很多有造诣的知识分子被称为反动学术权威而受到批判、打击，有的被抄家，有的被关押，党团员停止组织生活，混乱局面十分严重。

此时此刻他不得不承认：

> 文化大革命闹了一个大祸，就是批了北大聂元梓一张大字报、给清华附中写了一封信、还有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时间很短，六七八九十。5个月不到，难怪同志们还不那么理解，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北大大字报一广播，全国都闹起来了。红卫兵信还没有发出，全国红卫兵都动起来了，一冲就把你们冲了个不亦乐乎。我这个人闯了这么个大祸，所以你们有怨言，也是难怪的。

毛泽东承认自己闯了一个大祸。有不少地方他是没有估计到的。他计划"文化大革命"运动只搞两个月、五个月，也许还多一点，即一年或一年多一点时间。然而现在的情况完全超出了估计。他没有料到运动会弄成这个样子，更没有估计到会发展为全国的大动乱。

对此中共中央不得不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以稳定全国的政治形势。其中有：

一、停止所谓的革命大串联。1966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北京大中学校革命师生暂缓外出串联的紧急通知》。11月16日、12月1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连续发出通知，一律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来北京和到各地串联。1967年2月3日、3月19日又发出通知，停止全国大串联。这样大批外出的人员才逐渐回到本单位。

二、坚持抓革命、促生产。1966年下半年，全国大动乱形

势的出现，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冲击。1966年12月9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要求全国工人坚持8小时工作制，遵守劳动纪律，完成生产定额，利用业余时间搞“文化大革命”。

三、作出了关于农村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指示。1966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农村的“文化大革命”按《十六条》、《前十条》、《二十三条》进行。

四、对大中学校师生实行军训。1966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对大中学校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毛泽东指出：

> “派军队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方法很好。训练一下和不训练大不一样。这样做，可以向解放军学政治，学军事，学四个第一，学三八作风，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加强组织性纪律性。”

从部队抽调大批干部，到大中学校开始军训的工作。计划用半年多时间，分期分批地对大中学生实行军训。

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全国动乱的形势暂时平稳下来。但是林彪、江青集团篡党夺权的目的还没有达到，因此，动乱绝不会就此停止下来。但此时红卫兵的大串联基本上结束了。

9."叫革命委员会好"

"文化大革命"运动从它发动起，就受到了不少干部、群众的反对，阻力之大是空前的。毛泽东竭尽全力，调动各方面的力量，要把这种阻力冲垮。林彪、江青等野心家、阴谋家为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必然以积极的姿态和"左"的面目出现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舞台上。他们站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一边，向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陈毅、叶剑英等发起攻击，斗争十分尖锐，最激烈的有下述几次。

一是关于派工作组的问题

在政治运动中派工作组去领导是党的一个传统做法。特别是在全国动乱十分严重的情况下，刘少奇主持党中央工作，决定派工作组进驻学校稳定局势是很有必要的。工作组同学生的无政府主义斗争也是正确的。这不是镇压学生运动。然而，毛泽东对此大为不满，林彪、江青一伙也借工作组问题大做文章，攻击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刘少奇等对"文化大革命"表示了极大的不理解，跟不上形势。1966年7月28日北京市委召开的首都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在讲话中，都谈到了这次"文化大革命"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刘少奇还说怎样进行"文化大革命"，"我也不晓得"。这些明显地表现了党中央主要领导人对"文化大革命"的不同认识、不同理解、不同意

见。但是，毛泽东把刘少奇看成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代表，犯了路线错误，必须搬掉。林彪、江青一伙对这分歧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毛泽东在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严厉指责派工作组"是镇压"，"是恐怖"，"牛鬼蛇神，在坐的就有"等，完全剥夺了刘少奇等争辩的权利和机会，从而把派不派工作组当成了划分两条路线是非的标准。

二是关于贯彻《十六条》的问题

1966年8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是在党内民主生活极端不正常的情况下，毛泽东个人领导代替党中央集体领导的历史条件下制定的。这个决定的制定，使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思想、理论、方针等再一次合法化。但是，这决定的贯彻，并不是完全以毛泽东的意志为转移的。毛泽东估计到：很有可能会遭到广大干部的反对和抵触。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马上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研究如何传达贯彻的问题。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文化大革命"像一匹脱缰的野马，狂奔而去。尤其是青年学生冲出学校，到处进行所谓的"造反"。对此，不少党员干部深感困惑，处在被动、抵触和不安的状态。这反映了不少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和斗争。特别是在10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承认自己"闯了大祸"，也不得不说"不能全怪刘少奇、邓小平同志"。

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的态度以及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明显地表现了他处在一进一退之中，也反映了党内不少同志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和斗争。

三是关于人民解放军不能乱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发动后，很快波及到军队。尤其在林彪的唆使下，军队也开始动乱起来了。对此，老帅们极力反对。1966年11月13日，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在会上，除要求来京人员迅速地回原单位工作、学习，参加"文化大革命"外，老帅们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陈毅在会上的讲话中说：

"人民解放军不能乱，一定要有秩序。"

"今天陈老总在体育场给你们泼冷水。泼冷水不好，有时热过了头，泼冷水擦一擦有好处。"

"我1927年参军，当解放军三十九年了，还没有见过解放军打解放军。"

"在斗争中，我不赞成逐步升级。不是口号提得越高越好。"

"作为路线斗争，要有限制，有多大错误，作多大估计，不要一味扩大。"

徐向前在会上的讲话中说：

"我们解放军：海军、陆军、空军，随时保持战斗状态，一声令下，就要开得动。"

叶剑英在会上的讲话中说：

“真理就是真理，跨过真理一步，就是错误，就变成了谬误。”

“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不要当圣经念。”

“允许人家犯错误，更要允许人家改正错误。有少数人，有的干部心脏病都发了，倒下了，还要抓人家斗。对这件事我很愤恨！这些人没有无产阶级的感情，不是无产阶级的军人。”

1966年11月29日，陈毅在工人体育场召开的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中又说：

凭主观空想干革命，就要犯错误。

我的讲话是有意得罪人的，整天讲伟大、伟大，这有什么好处？这不好。

现在的斗争，我非常担心，每个部队都在斗他们的首长，每个部都在斗他们的部长，抓住一句话就斗，就批，我很担心，这样下去文化大革命搞不好。一讲黑帮，所有的干部都是黑帮。一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有的干部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有的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打击面太宽、

太大。以前我们就犯过这样的错误。

5个月的“文化大革命”实践，没有给党、国家、人民带来什么好处，相反，造成了全国大动乱。此时此刻，毛泽东也处在困境之中。

然而解脱这种困境，把“文化大革命”运动向前推进的是上海的称之为“一月风暴”的夺权斗争。

其实，“文化大革命”中的夺权斗争，并不是从上海开始的。夺权之风，首先来自于中央。如，撤销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以陈伯达为组长的中央文革小组是夺权斗争；打倒陆定一，改组中央宣传部，也是夺权斗争；打倒彭真，改组北京市委也是夺权斗争；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党中央领导人员，林彪居毛泽东之后为第二位，刘少奇降为第八位也是夺权；陈伯达率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夺吴冷西的权也是夺权斗争；《解放日报》、《文汇报》、《解放军报》造反派掌权也是夺权斗争。这些夺权斗争在当时没有普遍的影响。而具有重大影响的是要解决省市委这一级的问题。

自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作为党中央已完成了改组的工作；作为基层，群众已发动起来了。而唯独处在中间状态的——省市委机关的问题没有解决。发动向省市委夺权，既可以解决中间这一层的问题，也可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的特点。上海的所谓“一月风暴”符合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部署，因此，得到他的称赞和支持。

上海的所谓“一月风暴”，是在深刻的历史背景下掀起的。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元旦社

论。在社论中传达了毛泽东提出1967年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的指示，号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首先行动的是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他们在北京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兵团”时，诬陷陶铸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叫嚣打倒保皇派，打倒陶铸。

他们在元旦之际就急急忙忙地策划要打倒陶铸。

陶铸当时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他是名列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而在康生、陈伯达之前的第4号人物。打倒陶铸，康生、陈伯达的地位就仅次于林彪、周恩来之后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权力全落在江青一伙手中。

其次行动的是上海的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人。

1967年1月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下，以王洪文为头目的上海造反派组织召开“打倒上海市委大会”，篡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8日，毛泽东发出指示，对此大加称赞：

> “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

1月11日，经毛泽东授意，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名义给上海市各造反团体发贺电，祝贺他们的胜利。《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社

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在这些社论中，热烈地支持上海的夺权斗争，并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

由于毛泽东的支持，上海的夺权之风，很快地刮遍全国。1月14日，山西发生夺权；1月25日，贵州发生夺权；1月31日，黑龙江发生夺权；2月3日，山东发生夺权；4月20日，北京发生夺权；8月12日，青海发生夺权；11月1日，内蒙古发生夺权；12月6日，天津发生夺权。

1967年3月30日，《红旗》杂志发表《论革命的"三结合"》一文。文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

> "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①

随后全国上下都叫起了"革命委员会"。4月20日，北京市成立革命委员会时，毛泽东对谢富治说，革命委员会要以造反派为主体。当时，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委员共有35人，其中造反派代表22人，革命干部7人，解放军6人。毛泽东还认为，要让真正的造反派掌权，不要只是数量上占优势，造反派有群众基础，有强大的生命力，要在工作中锻炼和培养。

在夺权之风刮遍全国的过程中，各机关、各单位的群众纷纷分裂为两派，而且日益对立，斗争逐步升级。中共中央、国

① 《红旗》1967年第5期。

务院、中央军委不得不在1967年的1月23日作出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在决定中指出："最近，毛主席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不久，毛泽东又要军队承担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等任务。中央军委也作出了《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部队派出大批的干部战士，实行"三支两军"的工作。这对于密切军民关系，稳定社会秩序起了积极的作用。

1967年2月1日，毛泽东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出一定要坚持文斗，反对武斗。信中说：最近以来，许多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来信问我，给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脸、游街，是否算武斗？我认为是武斗的一种形式。这种做法起不了教育人的作用。这里我顺便强调一下，在斗争中一定要坚持文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才能达到教育人的目的。应当分析武斗的大多数是党内的一小撮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挑起来的，他们有意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党的政策，降低党的威信。凡动手打人应依法处置，请你转告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在林彪、江青的唆使挑拨下，武斗愈演愈烈，特别是江青公开提倡"文攻武卫"以后，武斗更为严重。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尼亚的卡博·巴卢库时对"文化大革命"运动作了这样的评价和估计。他认为：

一、"文化大革命"现在正处在决战时期，谁胜谁负还不能作结论，到明年这个时候，可能差不多了；

二、多年来，我们党内斗争是没有公开化的。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毛泽东此时对"文化大革命"已开始了思考与总结，并看到了它的长期性。这与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时的看法和估计是不同的。同时，他也下决心要把这场"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文化大革命"当作为解决党内问题，进行党内斗争，实现反修防修的一场最有效的斗争方式。

这是1967年1月全国刮起夺权之风以后毛泽东作的考虑和部署。当然，在这个时候，他还认为"明年这个时候就差不多了"，而没有料到"文化大革命"会延续达10年之久。

10. 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把矛头对准了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但是，这个高潮没有持续多久，就跌入深谷了。

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没有什么确切的内容。当时，主要是批工作组。而工作组在各校中，虽然出现过与群众

对立的情况，但工作组在学校中都做了不少好事，给广大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批工作组也批不起来。批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只留下一些标语、口号。

二、所谓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没有实际的效果。当时，批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虚”的，而“实”的是夺权斗争。自1967年1月以后，各单位的头目们都忙于夺权斗争。夺权的风暴压倒了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三、各单位分裂为两派，全国处在混乱之中。伴随着夺权斗争而来的是造反派的分裂与争权夺利的厮杀。全国上下，几乎无例外地都分裂为几大派，进行了长期的派性斗争。

1967年全国混乱局面的形成，与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的挑动和唆使是分不开的。他们利用各种机会和手段，实行支一派压一派，挑起派性斗争，制造武斗事件，从而把全国形势搞乱。

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全国混乱的局面更为不满。他们敢于公开地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也敢于公开地反对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等打击干部、挑起武斗、搞乱军队等一系列的倒行逆施。他们为了国家、民族、党、人民的利益，不怕被打倒，不怕被打成反革命，坚决地起来斗争。

陈毅、叶剑英、谭震林、李先念等对“文化大革命”始终持反对的态度，或持有不同意见。他们在1966年1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曾作了一次斗争，对“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的不少错误做法，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和意见。这次不仅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而且更重要的是反对林彪、江青等人利用“文化大革命”搞篡党夺权。这次斗争的激烈程度远远地超过了前一次。

1967年1月28日，毛泽东对中央军委提出的八条命令，作了批示：

“所定八条，很好，照发。”

这八条借毛泽东的指示，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全面的阶级斗争新阶段，军队必须改变过去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规定，以便适应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新形势：

一、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二、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三、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充分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子、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

四、一切外出串联的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把本单位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的权夺回来。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它地方；

五、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允许冲击；

六、军队内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联。凡非“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档案和技术资料，一概不得索取和抢劫。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资料暂时封存，听候处理；

七、军以上机关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

八、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教育他们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与工农相结合，拜工农为师，参加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争取做无产阶级革命派。

毛泽东在1967年1月23日作出的关于军队支持革命左派的指示中说：

> “林彪同志，应派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群众。又及，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
>
> 此事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 。请酌。”

林彪、江青等利用全国夺权斗争的形势，利用军队可以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之机，到处插手，到处打击党政军干部，到处夺取权力。对此，陈毅、叶剑英、谭震林、李先念等再也忍耐不下去了。

1967年2月11日和16日，在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和稍前召开的军委会议上，他们对林彪、江青、张春桥等人

进行了斗争。

在斗争中，表现了老同志们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强烈不满，对林彪、江青的罪恶活动无比愤怒。这场斗争，充分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畏强权，敢于坚持真理的高风亮节。

2月16日晚，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秘密整理了《2月16日怀仁堂会议》材料，经与江青密谋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从保卫"文化大革命"出发，于2月18日晚，严厉地批评了这些老同志。

2月19日，林彪在谭震林于2月17日写给他的信上作了这样的批示：

> "主席，谭震林最近的思想意识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于意料之外，现将他的来信送上，请阅。"

林彪认为，将这封信转给毛泽东，谭震林一定会受到严厉批评的。然而，毛泽东看完信后，只批了"已阅"两字，退给了林彪。林彪一见，恼羞成怒，将毛泽东的批条撕成碎块，丢到了痰盂里。后来，秘书偷偷地捡了出来，才把这个批示保存下来。

在林彪看来，只要把谭震林的信转给毛泽东，毛泽东一定会同意他的批示，或者大骂一顿谭震林的。因为谭的信是公开批评江青的。谭的信是这样写的：

"昨天碰头会上是我第三次反击。第一次是前天在电话中,第二次是昨天一早写了一封信,我所以要如此,是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他们(指江青等)不仅不听主席的指示,当着主席的面说'我要造你的反'。他们把主席放在什么地位,真比武则天还凶。"

"……大批老干部,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在中南海的,几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坐了飞机,身体搞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人不少,谭启龙、江华同志就是如此。我们党被丑化到无以复加了。北京百丑图出笼后,上海、西安照办。真正的修正主义反革命分子无人过问,他们有兴趣的是打倒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非整死你不可……他们能执政吗?能接班吗?我怀疑。"

"我想了很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绝不自杀也不叛国,也决不允许他们如此蛮干。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心襟宽,想得开,等候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的老干部都下去了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拚下去……"①

这封信,写得多么正义凛然,多么铿锵有力。林彪借机欲置谭震林于死地,但是,毛泽东没有听林彪这一套,林彪的阴谋没有得逞。毛泽东也没有听谭震林信中的忠言,对江青一

① 《党史文汇》1986年第3期

伙给予批评，更没有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这样，老同志们被打倒的厄运就注定了。

江青、康生、陈伯达等借机从2月25日至3月18日以中央的名义多次召开会议，布置任务，批斗这批老同志，并以所谓"二月逆流"的罪名，唆使造反派把他们一个一个地打倒。此后，批"二月逆流"的恶浪汹涌而来，持续了很长的时间。

把这批老同志打倒以后，林彪、江青一伙夺得了更多的权力。首先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停止了活动，中央文革实际上取代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文革便成为毛泽东指挥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机构，是陈伯达、康生、江青等篡党夺权的一个合法组织。此时，不是毛泽东左右着中央文革，而是中央文革左右着毛泽东了。

1967年4月开始，又回到了批所谓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来了。

这次批刘少奇比过去有所不同了，从深度、广度上都有所发展了。这次批判，一是带有"理论性"，二是翻历史旧帐，有计划有步骤地查历史，伪造证据，一步一步地置刘少奇于死地。

刘少奇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为党为人民做了无数的革命工作，倾注了一生的心血，逐渐地成为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然而"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恶浪，把他吞没了。

11.“文化大革命”还要搞多次

1967年3月，毛泽东提出要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毛泽东说：

> 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看过几遍，这是唯心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本书尽管讲了那么多的马列主义概念、阶级斗争概念，结果把阶级斗争变成了个人修养，提倡资产阶级的个人修养。不讲现实的阶级斗争，不讲夺取政权的斗争，只讲个人修养。蒋介石也可以接受，世界上资产阶级也可以接受。什么个人修养，每个人都是阶级的人，没有孤立的个人，抽象的个人。他讲的是孔孟之道，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都可以接受。
>
> 这本书脱离阶级斗争，脱离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空空洞洞，讲一些个人修养，是欺人之谈。我看大学生应该更好地研究一下，选几段写些文章批判。

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写于1939年7月，是一部关于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名著。无数共产党员、革命者、青年人在这本书中受到了深刻教育。然而，怎么一下子变成一本黑“修养”呢？不少人又拿起了这本书从头到尾地读了起来，并且带着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寻找能批判的一字一句，但读

完后总觉得没有什么可以批判的。

1967年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戚本禹写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这篇文章虽然没有公开点名批判刘少奇，但国人一看便知。不过这篇文章的发表起不到重要作用，而起重要作用的，是1967年4月12日至18日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指名批判刘少奇。5月8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了《"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一文。这篇文章是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文章不是摆事实，讲道理，而是无限上纲，无中生有。5月11日，中共中央又发出通知，要求各单位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

1967年2月间在这个时候的一次谈话中说：

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而"文化大革命"运动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一种最好的形式。这是严重的混淆了敌我矛盾。他说：我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基本问题是在夺取政权以后，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中国究竟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资产阶级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很明显的。在我们共产党内部，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有一部分人却认为中国是一个很穷的国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在一段时间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然后再走社会主义道路。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解放初期有这个问题，

现在仍有这个问题，苏联搞了50多年，仍是这个问题。

根据这个论断，毛泽东又说：

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须进行多次。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12.“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

1967年3月以后，毛泽东虽然号召大家开展大批判运动，但实际上开展不起来，即使开展的地方，也徒有其形式。主要原因是各单位普遍地分裂为几大派，并开始了无休止的夺权等派性斗争。“文化大革命”如何向前发展？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他深深地感到中央发了不少指示，但贯彻不下去，没有人执行。

1967年7月至9月，毛泽东视察了华北、中南、华东三个地区，调查了河南、湖南、湖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他要从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中寻找答案。9月下旬，他回到北京。他在视察中，对“文化大革命”发表了一系列的意见。10月7日，中共中央将他的谈话整理成文，并发出通知：

现将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记录稿转发给你们。希望你们组织群众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以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为武器，总结前一阶段运动的经验教训，制定贯彻执行的具体措施，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阶段。毛泽东的谈话内容主要有：

一、关于形势：

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

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像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全国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到处都在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过去一家人碰到一块，说闲话的时候多。现在不是，到一块就是辩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连十几岁娃娃和老太太都参加了辩论。

有些地方前一阶段好像很乱，其实都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

二、关于大联合：

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

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革命的红卫兵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都作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利于革命的大联合。

三、关于对待干部：

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打倒。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巩固革命的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有些干部为什么会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地脱离了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

四、关于红卫兵：

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了。要用我们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教育他们。对他们做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同他们讲道理。

毛泽东视察三个地区时，一方面了解到了他在北京不可能知道的情况，因此他谈话的内容更具体、更深入；但另一方

面，"文化大革命"中还有许多重大的事件，他听不到，也没有人向他汇报。他总是把"文化大革命"运动看作为与过去其它运动一样，他讲了不少不切实际的话，作了不正确的判断。尤其是林彪、江青等背着他干的许多坏事，他知道得更少或不知道。

如，7月18日，江青、康生、陈伯达等趁毛泽东不在北京之机，擅自决定组织批斗王光美、刘少奇大会，并对刘少奇进行抄家和人身迫害；

又如，7月22日，江青对河南一派群众组织的代表们说，要"文攻武卫"，挑起两派内战；

又如，7月25日，林彪、江青在北京举行支持武汉造反派群众大会，在会上，他们公开提出"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错误口号；

又如，8月7日，谢富治发表讲话，公开提出"砸烂公检法"的口号，把斗争的矛头引向了无产阶级专政机关；

又如，8月7日，王力煽动部分群众夺外交部的权；等等。

这些严重事件发生后，根本没有及时向毛泽东汇报。有的事后来闹大了才向毛泽东报告。有的到最后也没有汇报。所以，毛泽东的上述讲话，明显地脱离实际。当时，最需要的是制止武斗，制止夺权，制止迫害干部，制止林彪、江青等罪恶活动，只有这样，全国大混乱的形势才有可能平稳下来。当时并不是形势大好，而是大乱，发展大联合，让干部改正错误等根本不可能实现。

但是，毛泽东作出了"形势大好"的错误判断。之所以造成这种错误判断，原因之一，是他了解不到真实的情况，被林彪、江青等人包围、封锁住了，但他又没有意识到这种封锁。

13.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

1967年11月6日,首都人民举行了纪念十月革命50周年大会。《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发表了《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一文。这篇文章是由陈伯达等人起草,经毛泽东审阅后发表的。在这篇文章中,把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思想理论,以及有关的论断,概括为6条,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向毛泽东作了说明,说关于主席思想6条,作了新的整理。毛泽东看后,认为可用。文章发表后,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有了特定的含义。文章说:

“毛泽东同志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并且亲自发动和领导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即毛泽东思想阶段的一个极其重大的标志。”

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要点是:

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同志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敌我之间的矛

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毛泽东同志告诫我们必须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限"，"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才能使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和加强，使社会主义制度日益发展。

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四、社会上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充分注意识破睡

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充分揭露他们,批判他们,整倒他们,使他们不能翻天,把那些被他们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

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就是说,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方法,自下而上地放手发动群众,同时,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实行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的革命三结合。

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判修正主义,用无产阶级思想去战胜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和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上述这些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阶级斗争的观念,天才地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立了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

上述六个方面是1957年以来毛泽东关于在阶级斗争、两类矛盾、文化大革命运动、无产阶级专政等方面作出的论断的综合。这六个方面反映了毛泽东指导"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思

想和理论。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有了特定的内容。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实际上就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与实践的概括，是一种“左”的错误理论。

但是，在《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一文中，把这理论说成是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三个里程碑。这就从根本上歪曲和否定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内容和形成的时代特点。

毛泽东思想是酝酿于20年代、形成于30年代、命名于40年代、以后又有新的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关于革命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的理论、关于政策和策略的思想、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理论、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而它的精髓和活的灵魂，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自力更生。而绝不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相反，“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毛泽东在自1957年以后逐步形成的一种“左”倾理论，是不包含在毛泽东思想中的一种错误理论。可是，当时陈伯达等人把文章写成后送给毛泽东审阅时，毛认为可以用，同意了这种说法。可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这个提法的出现以及后来的宣传贯彻，都是与毛泽东有密切关系的。

14.要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

在各单位群众普遍地分裂为两派、进行派性斗争的混乱局势下，毛泽东以极大的精力引导群众走向大联合，实现三结合，以稳定全国的政治局势。

1967年3月7日，毛泽东对《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的报告，作了批示，要求全校师生实现大联合。毛泽东批示：

> "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预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先作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还要说服学生，实行马克思所说的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教导，在军训时不要排斥犯错误的教师和干部。除老年和生病的以外，要让这些人参加，以利改造。所有这些，只要认真去做，问题并不难解决的。"①

然而像天津延安中学那样做的，在当时是极少数，而绝大多数大中小学都实行所谓的"停课闹革命"了。毛泽东的批示

① 《人民日报》1968年3月18日。

也就无法认真地贯彻执行。

1967年3月27日，毛泽东又提出了：“大中小学校都要复课闹革命”的口号，号召广大学生迅速地回校上课。一边上课，一边参加“文化大革命”。部分学校开始了“复课闹革命”。

6月25日，毛泽东又提出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的问题。他认为，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

7月7日，毛泽东又提出，凡属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互相对立很严重的，只要进行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至于有群众的保守组织，甚至于反动组织，也要进行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

在七八九三个月的南巡中，毛泽东对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又发表了一系列意见。其中还谈到：在两派的联合中，经常争吵的是以哪一派为核心的问题。毛泽东说：

> 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王明、博古，他要做核心，要人家承认他是核心，结果垮台了。什么是农民，什么是工人，什么是打仗，什么是打土豪分田地，他们都不懂。
>
> 我们党，经过延安整风，教育了广大干部，团结了全党，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个传统，我们一定要发扬。

10月17日，毛泽东对各单位如何进行大联合又作了详细的批示。他说：

> “各工厂、各学校、各部门、各企业单位，都必须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以利于促进革命三结合的建立，以利大批判和各单位斗批改的进行，以利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①

从上述一系列批示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在1967年3月以后到年底，特别是视察大江南北回到北京后，他的思想和注意力转移到斗、批、改上了。所以这样做，他是想早日结束“文化大革命”。

1968年春以后，毛泽东所作的谈话和批示，基本上都是讲斗、批、改的问题了。林彪、江青不甘心早日结束“文化大革命”。

1968年3月，林彪、江青相互勾结，共同策划了打倒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三人的所谓“杨余傅事件”，篡夺了部分的军权。3月以后，林彪、江青等人制造派性斗争，支持一派压迫另一派，全国武斗事件不断发生。有的破坏交通，有的抢劫军用列车，有的冲击军事机关，甚至还有杀伤解放军的恶性事件发生，使全国处在内战之中。

这种情况说明，只有采取强有力的紧急措施，才有可能制

① 《人民日报》1967年10月18日。

止武斗、制止内战，扭转全国大动荡的局面。到7月底，毛泽东不得不同意决定组织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整顿秩序，制止武斗。同时也决定组织毛泽东思想军宣队配合工宣队，一同进驻学校。

这一决策，实际上是由工宣队和军宣队进驻各学校、单位，领导那里的"文化大革命"运动。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社论。8月25日的通知指出：

"毛主席最近指出：'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对于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具有极其重大的战略意义。"

"中央认为：整顿教育，时机到了。各地应该仿照北京的办法，把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学校逐步管起来。在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在工人中已经实行革命大联合，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已经有了显著成效的大、中城市，都要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批分期，进入各学校。先搞试点，总结经验，逐步普及。先进大学，后进中、小学。没有两派组织，也没有武斗的学校，也要进入。抽调工人的人数，大体上可占当地产业工人十分之一左右，或更少一点，不会妨碍生产。可以轮换。宣传队不要带武器……"

8月26日的社论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

"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

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

北京首先组织大量的工宣队和军宣队，浩浩荡荡地开进各个大学。随后各省市也遵照中央通知精神，组织工宣队和军宣队进驻大学，以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

对于学校的斗批改，毛泽东还作过这样的批示：

“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对于工厂里的斗批改，毛泽东作了这样的批示：

“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

毛泽东对工厂、学校的斗、批、改作出了新的安排。对于大学办不办的问题，毛泽东于 1968 年 7 月 21 日在《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报告上作了这样的批示：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①

1968年9月12日，毛泽东又作了这样的批示：

"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②

组织工宣队、军宣队，提倡大联合、三结合，进行斗、批、改等，对制止学校的混乱局面，尤其是制止武斗，促进大联合，克服无政府主义思潮等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使学校先后进入了斗、批、改阶段。但是，要深入地领导教育革命，进行教学改革，困难重重。尤其是工宣队、军宣队的成员由于文化水平低、能力差，领导不了教育革命，权力越来越集中在军宣队手中。

1968年9月5日，西藏、新疆两个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至此，29个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标志着"文化大革命"运动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毛泽东对

① 《人民日报》1968年7月22日。
② 《人民日报》1968年9月12日

此是十分欣慰的。因为全国的党政机关已瘫痪了很长时间了，这种无政府状态必须早日结束，才能有计划有领导地进行斗、批、改，才能稳定全国的政治局势。

15. 主持召开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八届十二中全会，这次中央全会，是毛泽东主持的。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有两个决策是完全错误的。一是批准江青等人一手伪造的关于刘少奇的罪证审查报告提交中央全会讨论通过；二是批准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关于党的九大的党章。在毛泽东看来，要早日结束"文化大革命"，就应当完成这两件事。这铸成了他发动"文化大革命"以来两件最严重的错误。

江青一伙采取法西斯的手段逼供诱供、编造了有关的所谓证据，以打倒刘少奇，欺骗中央全会。江青在一次接见中国京剧团等单位的代表时说："我现在担负着第一个大专案，有一天，我搞了五六个小时，虽然那些材料，我都重复看了，但是，因为我还得重批。……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刘少奇是一个五毒俱全的大反革命、大内奸、大叛徒、大特务。"

1968年9月16日，江青在诬陷刘少奇的所谓"罪证"上作了这样的批语："我愤怒！我愤恨！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可说是五毒俱全的最阴险、最凶狠、最狡猾、最狠毒的阶级敌人。"

江青对刘少奇已恨到了发疯的地步，给刘少奇扣上了天下、地上、人间最大的"罪恶"帽子。

9月29日，林彪看了江青一伙诬陷刘少奇的所谓"罪行"材料后，写信给江青，表示完全同意她的批语，并特地加了这样的话："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林彪、江青相互勾结，欲置刘少奇于死地而后快。张春桥在一次会议上说："你不要看这么一本啊！这个工作是江青同志抓的，这一本搞了一年多啦……这样一本东西就要叫刘少奇永世不得翻身！"

林彪、江青、张春桥等野心家、阴谋家所伪造的材料是经不住历史检验的。但是，这个"罪证"报告在当时欺骗了绝大多数的中央委员，欺骗了全国不了解真相的人民群众，从而使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作出了完全错误的决定，把刘少奇错误地定为"内奸、工贼、叛徒"，"中国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只有一个人举手反对，那就是中央委员陈少敏。她不相信这些"材料"是真的。她相信刘少奇绝不是这样的人。她不怕任何压力，公开表示了共产党员坚持真理，不怕受任何打击的态度，投了反对的一票。

刘少奇的冤案，毛泽东要负主要责任。

毛泽东的又一个错误，是他在1968年10月13日提议，将会前起草的党章草案"印发十二中全会各同志，作为讨论的基础。"这个党章草案虽然要提交给党的九大讨论通过，但是在党章草案中规定林彪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并确定为接班人的提法被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接受了。

这个决策不仅把党内的野心家、阴谋家当作亲密战友并确定为接班人，而且严重违反了党的原则。

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林彪、江青等又一次围攻了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朱德、陈云、邓子恢等老同志。在全会的公报中写了这样一段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话："全会严肃地批判了那个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1966年的'二月逆流'。全会认为，击败'二月逆流'和今春那股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重大的胜利。"

在全会上，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还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由于毛泽东的反对，他们未能如愿。

在全会上，毛泽东发表了讲话。其中说：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八届十二中全会再一次肯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所谓功绩。

八届十二中全会后，"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的阶段。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各方面的准备。

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召开，林彪在党内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和巩固，但是，江青集团并没有获得更多的权力。江青一伙与林彪集团之间的矛盾与斗争也在酝酿和发展着。

16."九大"——所谓"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共"九大"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主持了会议，并作了讲话。在他看来，"文化大革命"运动已进行了3年，应当作个总结，肯定成绩，明确任务，最终完成"文化大革命"的任务。而林彪、江青等人不同。他们中把党的"九大"当作争夺党的权力的一次重要会议。

毛泽东在党的"九大"开幕式上作了讲话。他希望把这次代表大会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1945年4月召开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实是开成了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党的"七大"以后，不仅很快地夺取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而且也赢得了解放战争以及整个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希望党的"九大"也开成这样的大会，夺取"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毛泽东在讲话中，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几次重要的代表大会。他说：

> 我们党，从1921年成立，到今年已经有48年这么长的时间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只有12个代表。现在在座的还有两个：一个就是董老，再一个就是我。有好几个代表牺牲了。山东的代表王尽美、邓恩铭，湖北的代表陈潭秋，湖南的代表何叔衡，上海的代表李汉俊，都是牺牲了。

叛变的、当了汉奸的、反革命的，有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刘仁静4个，后头这两个还活着。还有一个叫李达，在早两年去世了。那个时候，全国的党员只有几十个人，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后来就发展了。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代表大会，每次到会的代表都很少，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武汉开，人数比较多一些，有几百人。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几十名代表，恩来同志、伯承同志参加了。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开的，开了一个团结大会。那个时候，也是党内分歧。因为有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错误，特别是王明路线。那个时候，有人建议不要选王明路线那些同志到中央，我们不赞成，说服他们选举，结果呢？结果，就有几个不好了，王明跑到国外反对我们，李立三也是不好的，张闻天、王稼祥犯了错误，就这么几个。其他一些，比如刘少奇，什么彭真、薄一波这些人，我们不知道他们不好，他们的政治历史我们不清楚，也选进来了。经过八大到现在，搞得比较清楚了。在政治路线上、组织路线上、思想方面，都搞得比较清楚。因此我们希望这一次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在这个团结的基础上，我们能不能取得胜利？就这个大会来说，能不能开成一个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能不能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我以为，可以的。可以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可以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

但是，事与愿违。党的“九大”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没有任何的积极意义。会议也没有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

大会"。其根本原因是什么呢？一是混淆了敌我关系，排斥了党的"八大"的大批中央委员，把刘少奇、彭真、薄一波、张闻天、王稼祥等人都作为敌人，而把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等野心家、阴谋家作为接班人和主要领导人；二是林彪、江青一伙极力利用"九大"进行篡党夺权，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他们为了夺权的需要，甚至把还不是党员的人叫来参加"九大"，这就从根本上破坏了党的原则制度；三是仍然坚持推行"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左"倾路线，由林彪作大会的政治报告，大肆宣扬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四是林彪被确定为接班人，林彪、江青等人夺得了党中央的更大权力。

在"九大"上，林彪以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接班人的身份作了政治报告。在报告中，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指导，论述了"文化大革命"的准备，"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以及关于认真搞好斗、批、改，"文化大革命"的政策，关于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关于党的整顿和建设等问题，提出了所谓全面完成"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党的"九大"并没有宣布"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在"九大"通过的党章总纲中，肯定了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再一次被全党接受下来。同时在总纲中还写了这样一段："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林彪在党内的地位完全确定下来了。

"九大"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这是在排挤了"八大"的大部分中央委员的情况下形成的。在170个中央委员、109个候补中央委员中，大部分都是新选人的。尤其是把林彪、江青

集团的骨干分子和亲信人物都选入了中央委员会。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林彪当选为唯一的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陈伯达、康生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江青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九届一中全会选出的21个政治局委员中，林彪、江青集团的人占一半以上，除林彪、江青外，还有叶群、陈伯达、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姚文元、康生、黄永胜等11人，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的5人中，有林彪、陈伯达、康生3人。这说明林彪、江青集团已夺得了党中央的不少权力。

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还说：

> "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继续。这个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如斗、批、改。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

"九大"又一次否定了党的"八大"以来制定的正确路线。"九大"所强调的毛泽东思想，实际上主要是指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是指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九大"提出了进一步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所谓"伟大任务"。它没有结束"文化大革命"，而只是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全面夺权斗争的结束，以及进入斗批改的阶段。毛泽东虽然有意要早日结束"文化大革命"，认为"文化大革命"已差不多了，只不过还有一些事没有做完。但是，林彪、江青一伙为了进一步篡党夺权，还要利用"文化大革命"。

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受尽人间迫害，在河南开封含冤逝世。刘少奇的冤案是建国以来最大的冤案，牵连了成千上万的干部。

“九大”没有结束“文化大革命”，党、国家、人民还在蒙受着灾难。但是，“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日益暴露出来。作为革命家的毛泽东也逐渐地察觉到了、他试图采取措施，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落实政策、纠正一些冤假错案，解放干部等。他也开始察觉到林彪、江青一伙正在利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进行篡党夺权，于是采取措施，与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多次的斗争。

第五章

八十高龄，还在叱咤风云

（1969年夏—1976年春）

“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毛泽东在空军司令吴法宪的检讨书上批：“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两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过”，叶群是“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随之，在组织上采取“挖墙脚”，“甩石头”、“掺沙子”……林彪集团折戟沉沙成定局。

毛泽东批评江青不要搞“四人帮”，“你的任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

1975年9月毛远新又向毛泽东汇报“他担心中央怕出反复”。并说，我很注意邓小平同志的讲话，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其余两项都不提了……

毛泽东让人传话尼克松，表示愿意和他谈，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访也行。中美、中日关系实现正常化。

“九大”后，毛泽东认为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已进行得差不多了，只不过还有一些斗批改的任务没有完成，他要实现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的局面。然而，此时的他已近八十高龄了。如果是普通的平民百姓，应当享受安度晚年的幸福生活了。但他是一位中国近代以来少有的革命家、思想家、战略家，他仍然掌握着党和国家最高的权力。正因如此，他晚年的贡献和历史的悲剧紧紧地交织在一起。他要描绘一幅不仅使中国人民而且也使世界人民仰慕的最好最美的图画，尽管他已力不从心。他虽无力控制和结束“文化大革命”，但他始终没有把权力交给林彪和江青。他越来越察觉到“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后果。他始终关注着国际大势，及时地把握国际风向，与苏联决裂，与美国、日本举行谈判，结束几十年来对立僵持的局面。他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正确地指导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外交活动。然而直到他去世没有能实现“天下大治”，没有结束“文化大革命”，党、国家、人民还在蒙受灾难。

1.不设国家主席

九大以后，林彪、江青一伙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

毛泽东对此有所觉察，他强调：我们讲的胜利，就是要保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去争取胜利。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

然而林彪、江青一伙根本不听毛泽东的劝告，置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利益于不顾。为了篡党夺权，他们继续破坏团结，促使“文化大革命”运动长期延续下去。

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如斗批改”，但同时也明显地表示出了要早日结束“文化大革命”。1969 年 7 月 1 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48 周年的社论再一次表示了这个意思，希望早日结束“文化大革命”。

在“九大”党章中，规定：林彪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但是，林彪一伙迫不及待地要抢班夺权。以什么为借口呢？

1969 年 11 月 12 日，刘少奇含冤去世。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位置空了出来。这对林彪来说，为夺取国家权力的好时机，1970 年 3 月，中共中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关于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问题。林彪一伙认为，这是一个好时机。在会前，毛泽东提出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将我国的政治体制作适当的改变。毛泽东的这个建议，林彪、陈伯达等是知道的。但是，他们根本不顾毛泽东的建议。经密谋后于 4 月 11 日，林彪正式提出了要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并建议由毛泽东当国家主席。他们认为，提出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是名正言顺的事，一定会得到各方面的同情和支持。尤其是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更不会有人反对。如果毛泽东同意设国家主席，那国家主席的位置一定是林彪的，因为在会前的半年中，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先后 6 次说过不设国家主席和他不担任国家主席的问题。

毛泽东已经察觉到这件事情的奥秘，于 4 月 12 日作出批

示：

“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议不妥。”

林彪企图当国家主席的心情是很迫切的。1970年5月中旬，林彪对吴法宪说，不设国家主席，国家就没有个头。同年1月间，叶群对吴法宪说：“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当林彪的建议遭到毛泽东否决后，就只有公开抗争了。他们策划了一个政治攻势。陈伯达、黄永胜、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在各种场合极力吹捧林彪，说他是“非凡的天才”，说恩格斯是马克思的最好助手，斯大林是列宁的最好助手，而林彪是毛泽东的“最光辉的助手”，并说，这三大助手中，林彪是最好的助手。大造“天才论”的目的，是为林彪争夺国家主席作舆论准备，同时也给毛泽东以压力，迫使他同意设国家主席以让林彪当国家主席。

但是毛泽东的决策不仅把林彪的美梦完全打碎了，而且使林彪一伙搞的阴谋诡计暴露出来了。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在这次全会上，毛泽东没有作长篇讲话，只强调要把这次全会开成一个团结的会、胜利的会，不要开成一个分裂的会、失败的会。毛泽东的这几句话，似乎在提醒林彪等人。

然而，权欲极强的林彪等人已陷在泥泽中不能自拔，他们仍然按照事先密谋的计划进行。在九届二中全会的开幕式上，林彪利用自己在“九大”上确定的地位，首先发难。他在讲话中，大讲毛泽东的“天才”，并再次提出了要设国家主席的建议。

林彪的讲话，打乱了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他的讲话，事

先没有与毛泽东商量，讲话稿也没有给毛泽东看过。当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以解决这个问题。在会上，吴法宪开头炮，提出要学林彪的讲话。24日，九届二中全会召开分组会议。陈伯达、吴法宪、叶群、邱会作等人按他们原定的计划在各组宣讲称"天才"的材料。陈伯达在华北组说，有人反对毛泽东当国家主席，反对称毛泽东为天才，他坚决地提出要设国家主席。其实，在党内，尤其在党中央内部根本没有人反对毛泽东当国家主席，也没有人反对称毛泽东为天才。吴法宪在西南组说，有人利用毛泽东的"伟大的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叶群在中南组说，关于"天才"的观点，就是把"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可见，他们的行动是统一的，都以主动的态度，首先发难；他们的话也是如出一辙的。因为，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的言行，都是在林彪操纵指挥下登台表演的。关于"天才论"的材料，是由陈伯达选编后经林彪审定，才统一宣讲的。同时在会上宣讲时的表情也是一致的，叶群曾授意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要含着眼泪在小组会上发言。把假的说成真的，要动感情，要打动人。这样才能收到好的效果，让中央委员上当受骗。

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很快地印成了简报，抢先在全会上散发。在林彪一伙发难的情况下，上海小组的王洪文在发言中也说：

"林副主席讲的很重要，给我们敲了警钟，不承认天才，就是不承认毛主席的正确领导。"

8月2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责令收回华北组登载陈伯达讲话的简报，责令陈伯达作检讨。会后，毛泽东找林彪谈话，周恩来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要他们向中央作检讨。从而，扭转了林彪一伙制造的混乱局面。会议也转向了批判陈伯达的所谓"天才论"。

8月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他针对林彪、陈伯达一伙制造的谬论，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不要上他们的当。这篇文章虽然不太长，但击中了林彪的要害，把陈伯达揪了出来。毛泽东的文章是：

"这个材料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第二次，讨论工业七十条，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为了什么原因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

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俩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把斗争的矛头只指向陈伯达，而且提得十分尖锐和深刻，以说明与陈伯达之间不仅在思想理论上有原则分歧，而且把陈伯达的两面派作风，写得很透彻。毛泽东在这篇文章只抓陈伯达一人，没有涉及别人，更没有涉及林彪，是采取了有意保护林彪的策略。文中说："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俩人一致认为……"把林彪与毛泽东连在

一起。毛泽东所以这样做，道理十分简单，党的“九大”确定了林彪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毛泽东的确还想挽救林彪。同时认识林彪的问题，要有一个过程，人们对林彪的认识也需要时间。当然，从实际情况说，这次庐山会议的斗争，关键不在陈伯达身上，而在于林彪及其同伙，陈伯达只不过充当了炮手而已。对于这一点，毛泽东十分清楚。林彪对毛泽东采取的策略，也很了解。

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的发表以及一系列措施的采取，使参加全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了解了真相，并一致地站在毛泽东的一边。毛泽东后来说，几百个中央委员被几个号称懂得马克思主义，其实根本不懂的人骗了，这是党诞生以来少有的。

全会决定，对陈伯达进行审查和批判，从而挫败了林彪一伙抢班夺权的阴谋。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又按原计划进行了。但是，问题并没有完结。

从中共中央、毛泽东来说，把陈伯达揪出来，只不过是对林彪采取挽救教育的一个重大步骤，而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根子在林彪那里。林彪问题不解决，只解决陈伯达的问题，那是不彻底、不全面的。所以第二步还要解决林彪一伙的问题。不然有机会他们还会发难，还会兴风作浪。

照常规，“九大”已确定了“林彪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并写进了党章，林彪又担任了中共中央唯一的副主席职务，如果，毛泽东不担任国家主席，理所当然地由林彪担任。然而毛泽东没有让林彪担任国家主席的阴谋得逞，相反，他站在林彪的对立面上，坚决反对林彪当国家主席，并从陈伯达那里下手揭露林彪的夺权阴谋。这对林彪是一次最沉重的打

击，林彪一伙也没有估计到会有这个下场。毛泽东的这一举措，是毛泽东晚年一次果断的行动和英明的决策。

经过这场斗争，毛泽东与林彪之间的矛盾与斗争迅速地发展与暴露出来了。在这决定林彪集团命运的关键时刻，林彪及其同伙们认为：等待"自然接班"已不可能了。因为毛泽东不仅有力量把林彪定为"接班人"，而且也有力量去掉林彪这个"接班人"。另外，从身体条件来说，叶群就说过：林彪的身体不一定能熬过毛泽东。在这场短兵相接的斗争中，林彪深知毛泽东的意图，他是不会轻易地把权交出来，让林彪马上接班的。再加上江青集团的力量正在崛起，到一定时候，江青集团的人也会起来夺权的，林彪一伙人斗武的可以，斗文的不如江青一伙人。江青虽然与毛泽东有矛盾，但毕竟是毛泽东的妻子，只要毛泽东健在，谁都会投鼠忌器，尤其是现在，毛泽东还信任江青集团的人。同时还有一批久经考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会站在毛泽东一边，除掉林彪一伙是轻而易举的事。

此时此刻，林彪及其同伙认为，这场夺权斗争不能拖得太久，时间拖得越长，对他们越不利。事实正是如此。这就决定了林彪及其同伙必然采取别的方针和策略，那就是用武力抢班夺权。

2.开展"批陈整风"运动

庐山会议上的斗争并不因为九届二中全会结束而停止。

这是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后对林彪篡党夺权的阴谋有了高度的警觉，从而从根本上决定了林彪及其同伙必然失败的命运。

林彪及其一伙对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抢班夺权斗争的失败是决不甘心的。他们总结了这场斗争失败的教训，认为应当改变斗争的方式。林彪曾对吴法宪说过："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林立果对王维国、陈励耘说得更明白和露骨："看来这个斗争还长"，"我们要抓军队，准备干！"这些谈话，已表明他们改变方式了，不用陈伯达这类文的了，而动用武力来抢班夺权。

林彪及其同伙的险恶用心及其抢班夺权的阴谋，在党的"九大"时，毛泽东还没有充分估计到。从"九大"到九届二中全会的一年零四个月中，林彪会如此对待毛泽东，变化之快之大，不仅一般的党员干部没有想到，而且就是毛泽东自己也是没有料到的。这对毛泽东的打击是难以想像的。他重用的人、选择的人，却搞起了抢班夺权的阴谋。毛泽东知道他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揭露了陈伯达的阴谋，实质上就是揭露了林彪的阴谋，九届二中全会后又开展了批陈运动，林彪一伙是决不罢休的。毛泽东在他们的检讨上所作的批语中就说明了这一点。

1970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吴法宪的检讨上写了这样一段批语：

"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

来，没有见过。”

“办事组各同志(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

“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

批语揭露了林彪及其同伙的阴谋诡计，很快地传到了林彪的耳中。

1970年10月15日，毛泽东又在叶群所作的检讨上写了这样的批语：

“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

“九大胜利了，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的路线抛到九霄云外”。“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是如此。”

在这个批示中，毛泽东短短的几句，就把叶群这个人的形象和特点勾画出来了。

11月13日，毛泽东对黄永胜也进行了批评。不久，中共中央又转发了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要全党学习。

1970年11月6日，毛泽东批发了《中共中央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在通知中指出，毛泽东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鉴于陈伯达等少数人欺骗多数中央委员的事实，要求全党的高级干部，不管工作多忙，都要挤时间，读一些马列的书，区别真、假马列主义。九届二中全会的公报号召全党用马

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自觉地改造世界观。全党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提倡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

中共中央要求进一步提高党的高级干部学习的自觉性。所谓高级干部，主要是指：中央委员，中央各部委领导人、地方省、市、自治区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军队军党委常委以上的干部。同时，中央又规定了高级干部学习的书目，要求先读《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命》等6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以及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5篇哲学著作。毛泽东指示：第一次宜少，大本书宜选读（如《反杜林论》）。中央还规定：在学习中，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以自学为主，和集体讨论相结合。学习时间，首先靠自己挤，坚持天天读。后来在理论界、教育界和中层干部中也开展了学习运动。

1970年11月16日，毛泽东批发了《中共中央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指示说：

> “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采取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一切，立即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粉碎了陈伯达的反党阴谋，拨正了全会的航向。在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下，全会揭露了陈伯达反

党、反九大路线、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严重罪行，揭露了他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的面目。这是我们党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这个通知，虽然对陈伯达的行为作了充分的揭露，但是一字不提林彪的事，对林彪仍采取保护的态度。

1970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38军党委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上作了这样的批示：

林、周、康及中央、军委各同志，此件请你们讨论一次，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一次，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托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林彪对我说，他都不便找三十八军的人谈话了。北京军区对陈伯达问题没有集中开过会，只在各省各军传达，因此没有很好打通思想，使全军更好团结起来。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接见了美国著名记者斯诺。他们之间的谈话进行了5个小时。1965年斯诺来中国，与毛泽东长谈后又过了整整5年。在5年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是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并席卷全国。世界各国对中国的看法也有很大的变化。对斯诺来说，也有不少问题要直接地问毛泽东。他们之间的谈话内容很多，时间很

长，特别是斯诺感兴趣的方面很多，涉及到各个方面。

例如，关于个人崇拜问题。毛泽东说：

> 你说我个人崇拜，你们美国人才是个人崇拜多呢！人总要有人崇拜嘛！你斯诺没有人崇拜你，你就高兴啦？你的文章，你的书写出来没有人读你就高兴啦？总要有点个人崇拜，你也有嘛。你们美国每个州长、每个总统、每个部长没有一批人崇拜他怎么混得下去呢？

在这段话中，毛泽东认为个人崇拜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不仅中国有，美国也有；不仅国家的领导人员有，而且一般的著名人士也会有。这段话与1965年1月毛泽东与斯诺谈的是完全一致的。当时毛泽东承认：中国确有个人崇拜，也需要有点个人崇拜。因为当时要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没有一点个人崇拜，"文化大革命"运动就发动不起来。但是，现在不同了，"文化大革命"已进行4年多了，毛泽东对这问题又有了新的意见。他对斯诺说：

> 现在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了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即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一概去掉。过去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对个人崇拜有三种人，第一种是真的，第二种

是随大流，第三种是假的，你才不要相信那一套呢。

在这段话中，毛泽东已看到了林彪搞个人崇拜的实质。也分析了对个人崇拜有三种人，指出了第三种人是假的，这是这几年来毛泽东观察的结果。林彪对毛泽东吹得最厉害，四个伟大是他首先叫出来的，并作了题词。毛泽东的这段话是针对林彪讲的。

毛泽东与斯诺又谈到了关于讲假话和虐待俘虏的问题。毛泽东说：

有人一面说要文斗，不要武斗，而实际上却在桌子下面踢人家的脚，然后把脚收回来，当人家问他为什么踢人时，他又说"没人踢"，这就是讲假话。如果一个人不讲真话，也就得不到别人的信任。

毛泽东一贯反对说假话以及说假话的人。而"文化大革命"以来，说假话的人是很多的。林彪说过，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林彪是说假话的代表人物。毛泽东对林彪是有一个认识过程的，与斯诺谈话时，已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在谈话中表现了对林彪的厌恶。

1970年12月22日起至1971年1月24日止，周恩来主持华北会议，开展"批陈整风"。这标志着党中央进一步解决陈伯达的问题。

从1971年1月起，在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中开展"批陈整风"运动，进一步揭发陈伯达的反党罪行。这对于林彪一伙是

一个沉重的打击。此时毛泽东对林彪和陈伯达仍然采取了不同的方针。

1971年2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邀集各地来京参加国家计划会议的各大军区党委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或党的核心小组主要负责同志开会。在会上宣读了毛泽东对会议的指示。中共中央于2月23日将这指示转发全党。即毛泽东关于批陈整风的指示：

> "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更不要学华北前期，批陈不痛不痒，如李、郑①主持时期那样。"

毛泽东这个指示下达后，全党的批陈整风运动便普遍地开展起来了。1971年2月2日至3月20日，北京军区直属单位召开批陈整风会议，有1219人参加。

1971年4月15日至2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出席会议的共99人，由中央的、地方的、军队的三部分人组成。正在参加军委座谈会的143人也参加了这个会议。这次会议内容：一是开展批陈，揭发陈伯达的反党罪行；二是整风，批评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邱会作、李作鹏等5人的错误。最后由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总结讲话。其中明确指出："军委办事组五同志所犯错误，是方向路线错误"，也就是"在政治上是方向路线错误，在组织上是宗派

① 李，为李雪峰；郑，为郑维三。

主义错误”。中央决定,把批陈整风推向深入发展,把陈伯达的反党罪行材料向全党基层传达,把黄永胜等人的检讨,向高级干部公布。

批陈整风运动的开展,虽然重点在批陈,但同时也沉重地打击了林彪集团,使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进一步暴露。特别是改组北京军区,毛泽东称它为“挖墙脚”;对38军的批示称它为“甩石头”;派得力干部加入军委办事组称它为“掺沙子”,完全打乱了林彪集团篡党夺权的步骤和计划,使他们处在惶惶不可终日的境地。

3.南巡两月知实情

批陈整风运动的深入发展,使林彪集团的篡党夺权的阴谋更逐渐暴露出来了。但是,他们究竟要干什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还是不清楚的。欲知天下事,走遍天下路。毛泽东南巡两月从而奠定了对林斗争的胜利。

在批陈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对林彪虽然采取保护的态度,但是林彪一伙却不是这样地对待毛泽东。他们开始阴谋策划“武装政变”计划。1971年2月12日,北京正在进行批陈整风运动,而林彪、叶群、林立果到达苏州,进行具体的密谋和部署。他们作了这样的判断:以和平过渡的方式接班已不可能了,而且被别人抢班夺权的可能性也很大,于是只有提前接班,其方式为“武装起义”。3月23日,于新野起草了《“571”工程纪要》。这是一个反革命的阴谋暗杀计划。所谓“571”,即

"武装起义"的谐音，就是用武力暗杀手段谋害毛泽东，以达到抢班夺权的目的。他们认为：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政局不稳，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右派势力抬头，军队受压。10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级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B52（指毛泽东）'对我们不放心。与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在政治上后发制人，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以便"夺取全国政权"，或造成"割据局面"。"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于是，他们开始实施"武装政变"和阴谋暗杀计划。

在这段时间内，毛泽东作了一系列的批示，给林彪一伙以沉重打击。

其一，1971年1月8日，毛泽东对济南军区政治部《关于学习贯彻毛主席"军队要谨慎"指示的情况报告》上作了这样的批示：

> "军队和地方多年没有进行反骄破满，没有从这方面的错误思想整风，现在是进行自我教育的好时机了。"

毛泽东的这个批示是甩向林彪集团的一块石头，林彪要调动军队是不可能的。

其二，1971年3月15日，毛泽东在审阅《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一稿中，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后面的毛泽东思想并列一词去掉，并说：

"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

这个批示不仅是说陈伯达骗了大家多年，实际上也在说林彪骗了大家多年。这个教训应当好好地吸取。

其三，1971年3月30日，毛泽东在林彪集团成员写的检讨上又作了这样的批示：

"此件留待军委办事组各同志一阅。上了陈伯达贼船，年深日久，虽有庐山以来半年的时间，经过各种批判会议，到3月19日才讲出几句真话，真是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人一输了理(就是走错了路线)就怕揭，庐山会议上那种猖狂进攻的勇气，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上述三个批示，名义上是在批陈伯达，但实际上是批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叶群、邱会作、李作鹏等5人。所谓上贼船，名义上是指陈伯达，实际上是指林彪。毛泽东作这些批示，打中了林彪集团的要害。

毛泽东作上述批示，期望能把林彪保护下来，维护"九大"规定的接班人地位。但是，谁能料到，党的"九大"刚刚开完，林彪就迫不及待地要抢班夺权，下这样的毒手，可是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这对于毛泽东来说，将是一个何等重大的打击啊！戎马生涯几十年，为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为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如此巨大贡献的毛泽东，到晚年时期，挑选了林彪作为自己的接班人，可是林彪还要抢班夺权，要下毒手杀害毛泽东，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一个最凶恶的最奇特的阴谋事件。

林彪一伙在苏州策划完阴谋杀害毛泽东的计划后，又急急地赶回北京，等待时机，实施这个暴行计划。

1971年4月15日起召开的有党政军负责同志99人参加的“批陈整风”汇报会，以及中央派人进入军委办事组，即毛泽东说的用“掺沙子”、“甩石头”、“挖墙脚”的办法，打乱了林彪的步骤，使他不得不从北戴河赶回北京“坐镇”。此时，毛泽东还在主要地批判陈伯达，对林彪还是采取保护的态度。对黄永胜，叶群等人的批评也还只限在与陈伯达有关系的方面。毛泽东与林彪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已十分紧张了。林彪一伙面对着覆灭的命运，加快了所谓“武装起义”计划的策划和准备。

在这个关键时刻，毛泽东似乎察觉到了什么，估计到会有重大的事件发生，但似乎又要了解什么，只好到外地走走。1971年8月14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到南方各省巡视一番。这是一个英明的决策，但在当时也确实存在着危险。

毛泽东的南巡行动，林彪一伙惶惶不可终日。他们极力寻找机会，乘毛泽东外出下毒手。8月16日，毛泽东到达武汉，住了10天，与湖北、河南的党政军负责人谈话5次，除了解各地的问题外，主要是谈1970年庐山会议这场斗争。毛泽东南巡的谈话后来作了整理：《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其中谈到林彪集团问题的有：

“希望你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我们这个党已有五十年的历史了……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分裂成。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

“1970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5个常委瞒着3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还有李雪峰、郑维三①。他们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他们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8月23、24到25中午，共两天半。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

“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先验论，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我

① 李雪峰、郑维三不是林彪集团中的大将，当时把他们当作大将是错误的。

不是天才。我读了6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7年资本主义的书，到1918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那几个副词①，是我圈过几次的嘛。九大党章已经定了，为什么不翻开看看？《我的一点意见》是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才写的，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说不要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或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

"林彪同志那个讲话②，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快收回记录③。既然有理，为什么收回呢？说明他们空虚恐慌。"

"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9次不同，前9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还是要保。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太好吧，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

"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

① 指"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三个副词。
② 指1970年8月23日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③ 指叶群私自收回她在九届二中全会中南组会议上的发言记录。

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6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6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陈伯达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

“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三项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角。批了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批发了三十八军的报告和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报告，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座谈会，根本不批陈，我在一个文件上加了批语，我的办法，就是拿了这些石头，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这是甩石头。土太板结了就不透气，掺一点沙子就透气了。军委办事组掺的人还不够，还要增加一些人，这是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就叫挖墙角。”

“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他们要捂住，连总参二部部长一级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怎么行呢？”

上述一系列的谈话，虽然从陈伯达的问题开始，但都是针对林彪一伙的。而且一针见血地指出，林彪要当国家主席，要

分裂党，是一次路线斗争。毛泽东说：

> “我们唱了50年国际歌了，我们党有人搞十次分裂，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也不行，也是站不住脚的。”

这些谈话对林彪集团是致命的打击，林彪一伙必然千方百计地要打探到这个谈话的内容。林彪手中虽然有一定的军权，但在毛泽东看来，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信得过、靠得住的。他在谈话中曾说到：

> “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

在这段话中，毛泽东似乎察觉到林彪一伙要搞武装政变，他发出警告，同时也告诫军队，不要跟林彪干坏事。

毛泽东在武汉作的谈话，一时没有传到林彪的耳中。毛泽东也作了交待，大家都先不要传达，他讲的是个人意见，先打个招呼。

8月27日至9月2日，毛泽东到了湖南长沙及江西南昌，这两地稍住了几天，先后接见了湖南、广西、广东、江西、江苏、

福建等省的党政军负责人，并作了不少谈话。在南昌时，毛泽东听取了江西省负责人的汇报，在南昌地区作了参观。他看到了林彪在江西建造的一个巨大工程。

这个工程不在地上而在地下，是一个指挥用的工程。它可以指挥全国。江西省委负责人说，这件事是中央下达的任务，江西搞了很多年才完成的。可是毛泽东根本不知道。这引起毛泽东高度的警觉起来：这是林彪打着中央的旗号，向下下达的任务。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一看这个工程，就了解个大概了。这是林彪搞政变后，企图另立中央，实行南北割据用的一个指挥机关。江西这个工程搞了那么多年，毛泽东一点不知。毛泽东参观完这个使他"大吃一惊"的工程后，没有在南昌久住，就匆匆地奔向浙江杭州。

9月3日至10日，毛泽东在杭州逗留。这是林彪一伙组织的所谓"联合舰队"活动的地方，也就是要实施"武装政变"阴谋计划基本力量的所在地。毛泽东到杭州是很危险的，也许毛泽东在杭州期间已估计到或察觉了什么，9月8日午夜，毛泽东刚吃完夜餐，突然下令将停在杭州笕桥机场附近的专列立即转移，9月10日下午3时，又突然说："现在把车调回来，我们马上就走。"并告诉别人，不要让林彪死党陈励耘等人送行。毛泽东采取的措施使他得以安全地离开杭州。

9月10日近晚，毛泽东的专列到达上海，停在虹桥机场附近的吴家花园处。此时，林立果"联合舰队"收到了上海发来的密语情报："王维国因病住院了。"下毒手的时候到了，林立果等估计毛泽东会在上海住几天的，然而出乎意料毛泽东乘专列到上海后，并没有下火车，毛泽东就住在专列上过了一

夜。11日上午，许世友从南京赶到上海，直奔专列，毛泽东在列车上接见了他。但是，没有准许安排在上海谋杀毛泽东的林彪死党王维国上火车。事后，王维国长叹一声，一下子瘫倒在停车场休息室的沙发上。可见，毛泽东对王维国等人已有了高度警惕。11日中午，毛泽东叫许世友等人下车去吃午饭时又把王维国叫上了车。这种时叫时不叫，使王维国不知所措。11日下午，毛泽东又突然下令列车离开上海，向北京方向直奔。这一行动，完全出乎林彪一伙的意料之外。

9月11日晚，毛泽东的专列正以全速向北京驶去。晚上10点多钟，毛泽东的专列驶过苏州车站，平安地掠过硕放铁桥。南京、蚌埠、济南、天津都过去了，毛泽东不让停车。专列风驰电掣，昼夜兼程。9月12日下午4时列车到达丰台车站时，毛泽东下令停车，并把吴德、吴忠等人叫到了车上，进行长时间的谈话。列车停了2个小时，到黄昏时分，毛泽东才下令列车进人北京站。毛泽东从北京站下车，安然地回到了中南海。这个消息，使林彪一伙震惊。这个消息，宣告了毛泽东南巡两月的胜利结束，同时又宣告了林彪集团所谓“武装政变”阴谋的彻底破产。

4.“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毛泽东突然回到北京中南海住地的消息，似一声春雷，把林彪一伙炸得乱作一团。在北戴河别墅内的林彪，两眼发直，坐在沙发上不吭一声。叶群的哭声已传出了窗外。谋害毛泽

东的阴谋已彻底败露，林彪决定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实行南北割据。然而，这个阴谋很快地流产了，林彪改南逃为北叛，飞向苏联的伊尔库茨克。

1971年9月13日凌晨1时50分，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乘机叛逃。周恩来下达命令，叫这架三叉戟机立即飞回，然而机上不作任何回答，很快地越过了中国的国境，进入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上空，看来不会回来了。周恩来立即从人民大会堂驱车赶到中南海，向毛泽东请示如何处理，毛泽东听后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但是，林彪乘座的飞机，没有到达目的地，就坠落在蒙古的温都尔汗荒原上，机毁人亡，终于遭到历史的惩罚。

"九·一三"事件对毛泽东的打击太大了。"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毛泽东支持周恩来及时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周恩来进行了周密的善后处置，做了大量的工作。

9月18日，毛泽东批发了《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通知的主要内容是：

"一、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惶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

"现已查明：林彪背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极其秘密地私自调动三叉戟运输机、直升飞机各一架，开枪打伤跟随多年的警卫人员，于9月13日凌晨爬上三叉戟飞机，向外蒙、苏联方向飞去。同上飞机的，有他的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及驾驶员潘景寅、死党刘沛丰等。在三叉戟飞机越出国境以后，未见敌机阻击。中央

政治局遂命令我北京部队立即对直升机迫降。从直升飞机上查获林彪投敌时盗窃的我党我军大批绝密文件、胶卷、录音带，并有大量外币，在直升飞机迫降后，林彪死党周宇驰、于新野打死驾驶员，两人开枪自杀，其余被我活捉。"

"二、林彪叛党叛国，是长期以来，特别是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来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是林彪这个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阴谋家的总暴露和总破产。"

林彪叛党叛国的通知往下传达的时候，在党内外引起了极大的震惊。绝大多数没有料到林彪竟是这样一个野心家、阴谋家，而且还要谋杀毛泽东。

1971年10月6日，毛泽东又批发了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党叛国事件扩大传达范围的通知，即从10月中旬起，传达的范围扩大到地方基层党支部书记、副书记。11月14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印发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的通知。12月11日，毛泽东批发了中共中央关于组织传达和讨论《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的通知。随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批林运动。林彪集团的覆灭，在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与实践的失败。

5.邀请尼克松访华

1972年批林运动的深入开展，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暂

时稳定了下来。国际的和国内的形势都出现了一个相对有利的时机。“文化大革命”虽然还在延续，但是毛泽东已下定决心，一是要把国内的经济搞上去；二是要把很早开始筹划的改变中美、中日关系的大事提上日程。为打开僵持了几十年的中美、中日关系的大门，毛泽东采取了举世瞩目的行动，邀请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

早在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与斯诺作了长时间的谈话。其中很长一段时间是谈中美关系以及尼克松访华的问题。毛泽东说：“外交部研究一下，美国人左、中、右都让来，为什么右派要让来？就是说尼克松，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当然要让他来，因为解决问题中派、左派是不行的，要跟尼克松解决。我欢迎尼克松上台。他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偷偷地，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谈不成也可以，谈得成也可以嘛。何必那么僵着？但是你美国是没有秘密的，一个总统出国是不可能秘密的。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我看我不会跟他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我们也要作自我批评，就是讲我的缺点和错误了。总之，毛泽东欢迎尼克松访华的。

毛泽东与斯诺谈话后不到一年，即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结束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利问题”的辩论，并进行了表决。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由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个国家提出的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的一切

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当宣布这个决定时，会场上爆发了长时间的、热烈的掌声。这是全世界人民的胜利。它反映了世界上人心的向背和时代的潮流。10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以压倒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出的要求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这是美帝国主义二十多年来顽固坚持剥夺我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政策和在联合国内制造‘两个中国’阴谋的破产。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外交路线的胜利，这是全世界人民和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的胜利。

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提案国政府在这场斗争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许多友好国家，特别是在西哈努克亲王领导下的柬埔寨王国政府长期以来为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起了重大作用。中国政府和人民对坚持原则，主持正义的一切友好国家的政府和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支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反对外来干涉、掌握自己命运的正义斗争。中国人民受尽了帝国主义压迫的苦痛，中国永远不做欺侮其他国家的超级大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即将派出自己的代表参加联合国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同一切爱好和平和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站在一起，为维护各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为维

护国际和平，促进人类进步的事业而共同奋斗。”①

中国参加联合国，标志着中国对外关系史上一个新时期的开始。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毛泽东在建国初曾说过，总有一天，我们中国要加入联合国的。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毛泽东与斯诺谈话后仅仅过了14个月，即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真的到了北京机场。当尼克松和他的夫人走下飞机，向前来迎接的周恩来走去的时候，他下决心伸出手，周恩来也伸出了手。尼克松在回忆录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耐人寻味的话：

“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当时，周恩来说了一句更富有历史意义的话：

“总统先生，你把手伸过了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二十五年没有交往了啊。”

周恩来与尼克松在北京机场相见和握手，无疑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见和握手。他们两人都紧紧地握着，轻轻地摇晃着，足足有一分多钟，中外记者在这个珍贵的时刻摄下了一张又

① 《人民日报》1971年10月30日。

一张富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照片。

尼克松刚到钓鱼台国宾馆吃完午餐，周恩来找基辛格说："毛主席想会见总统，请你也一同去。"基辛格听了有些惊奇，没有料到安排得那么快，使他们兴奋，但尽力克制自己。尼克松、基辛格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来到中南海的丰泽园，步入毛泽东的书房。开始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中美会谈，其实只不过是一次会晤。对于这个历史性的会晤，基辛格作了这样动人的描述：

"这是一间中等大小的房间。四周墙边的书架上摆满了文稿，桌上、地下也堆着书，这房间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学者的隐居处，而不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全能领导人的会客室。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摆有一张简易的木床。我们第一眼看见的是一排摆成半圆形的沙发，都有棕色的布套，犹如一个俭省的中产阶级家庭因为家具太贵、更换不起而着意加以保护一样。每两张沙发之间有一张铺着白布的V字形茶几，正好填补两张沙发扶手间的三角形空隙。毛泽东身旁的茶几上总堆着书，只剩下一个放茉莉花茶茶杯的地方。沙发的后面有两盏落地灯，圆形的灯罩大得出奇。在毛泽东座位的右前方是一个痰盂。来访者一进入房间，毛泽东就从沙发上站起来，在我最后两次见他时，他需要两个护理人员搀扶，但他总是要站起来欢迎客人的。"①

① 《毛泽东、尼克松在1972》第287～288页，1988年9月昆仑出版社出版。

这一描述是非常具体、真实的，又是历史性的。毛泽东站起来，欢迎尼克松的到来。当他们两人握手的时候，都感到非常高兴。一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家，一位是东方社会主义中国的革命家，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后，终于在北京中南海毛泽东书房实现了历史性的会晤。似久别重逢两双紧握的手，超过了正常握手礼节的时间，这一握手似乎中美之间过去在历史上恩恩怨怨没有发生过。当时尼克松的心情是十分激动的。尼克松在回忆录中作了这样的记述：

"他身体的虚弱是很明显的。我进去时，他要秘书扶他起来。他抱歉地对我说，他已不能很好地讲话。周后来把这一点说成是患了支气管炎的缘故，不过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中风造成的后果。他的皮肤没有皱纹，不过灰黄的肤色看上去却几乎像蜡黄色的。他的面部是慈祥的，不过缺乏表情。他的双目是冷漠的，不过还可发出锐利的目光。他的双手好像不曾衰老，也不僵硬，而且还很柔软。不过，年岁影响了他的精力。中国人只安排我们会晤15分钟。毛完全被讨论吸引住了。因而延长到1个小时。我注意到周在频频地看表，因为毛已开始疲乏了。"

作了段回忆后，尼克松又写下了一段又一段的感想：

“我知道，多年来我对人民共和国的态度是主席和总理全然不能同意的。把我们带到一起来的，是认识到世界上出现了新的形势；在我们这方面还认识到，事关紧要的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哲学。重要的是他对世界其他部分和对我们的政策。”

“我们应该问问自己——当然这也是只能在这间屋子里谈谈——为什么苏联人在面对你们的边境上部署的兵力比面对西欧的边境上部署的还要多？我们必须问问自己，日本的前途如何？我知道我们的双方对日本问题是意见不一致的。但是，从中国的观点来看，日本是保持中立并且完全没有国防好呢还是和美国有某种共同防御关系好呢？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决不能留下真空，因为真空是会有人来填补的。”

“毛很活跃，紧紧抓住谈话中的每一个细微含义，但我看得出他很疲劳了。周越来越频繁地看手表，于是我决定设法结束这次会谈。”

“主席先生，在结束的时候，我想说明我们知道你和总理邀请我们来这里是冒了很大风险的。这对我们来说也是很不容易作出的决定。但是，我读过你的一些言论，知道你善于掌握时机，懂得‘只争朝夕’。”

“我还想说明一点，就个人来讲——总理先生，我这也是对你说的——你们不了解我，既然不了解我，你们就很难信任我。你们会发现，我绝不说我做不到的事。我做到的要比我说的多。我要在这个基础上同主席，当然也要同总理，进行坦率的会谈。”

“主席先生，我们大家都熟悉你的生平。你出生于一

个很穷的家庭，结果登上了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一个伟大国家的最高地位。我也出生于一个很穷的家庭，登上了一个很伟大的国家的最高地位。历史把我们带到一起来了。我们具有不同的哲学，然而都脚踏实地来自人民，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实现一个突破。这个突破不仅有利于中国和美国，而且有利于今后多年的全世界。我们就是为了这个而来的。"

"毛陪我们走到门口，他拖着脚步慢慢地走。他说他身体一直不好。"

尼克松的回忆虽然没有写出他和毛泽东谈论的各个问题，但他具体而真实地记述了这次历史性的会谈。毛泽东给他的印象，除所谈的问题外，那就是他的健康状况，他多次地说，毛泽东衰老了。

毛泽东由于长期地大量地吸烟，引起了老年性支气管炎和肺气肿，经常喘息，咳嗽，吐痰。加之林彪事件的发生，使他在精神上受到了一次巨大的打击，他明显地变老、变弱了。周恩来用频频看表的方式催促结束这次会谈。

在这次会谈中，又一次表现了毛泽东非同一般的思想、性格以及谈话的魅力。他没有客套的话，也不谈具体的问题，而和尼克松谈哲学问题。谈的内容虽然使人感到很远很远，但过后又体会到所谈的内容就是上海公报的框架。基辛格发现了这点后非常钦佩这个伟大的毛泽东把一个极其严肃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放在谈笑中完成了。

1972年2月22日至26日，是周恩来与尼克松会谈的时间。毛泽东虽然没有参加，但他掌握着谈判的进程，也过问着

谈判的细节。其间，周恩来陪同尼克松到达杭州。27日，在上海发表了著名的《中美联合公报》。从此，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这是隔绝、对立20多年后出现的突破。这个突破，是毛泽东在晚年时期作出的又一个伟大的贡献。在这里，毛泽东又以实践道破了一个真理：世界是由人类组成的，没有人类也就没有世界，世界的变化是人在起作用，没有人的努力，世界怎能变化呢？中美两国是这个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在西方，一个在东方，都在影响着世界局势的发展。中美两国长期不相往来，是人为造成的。中美两国的交往，也是人在起作用。周恩来在结束中美会谈送走尼克松后，在从上海回北京的飞机上，有记者问："总理，外电评论，这次是你导演的杰作。"周总理十分严肃地说："不，不能那么说。这是主席的英明，主席的功劳。"

中美关系的改变，震动了世界。也促进了中日关系的改善。中日两国政府经过多次接触后，1972年9月25日至29日，日本国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应邀访问中国。27日，毛泽东接见了田中。周恩来和田中进行了会谈。29日，中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声明宣布：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决定自1972年9月29日起建立外交关系。

中美、中日关系的正常化，是毛泽东晚年作出的新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地位从此大大地提高了。尼克松说：他在"这一周改变了世界"；毛泽东听到后，也说了一句："是尼克松改变了世界么？我看还是世界改变了他。"这两句话，一

句是唯心主义的，一句是唯物主义的。然而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却这样地认为，是毛泽东、周恩来把握了历史的时机，拨正了航向，改变了中美的关系、中日的关系，改变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也改变了世界的形势。尼克松为适应这种形势，也迈出了惊人的一步，作出了他应有的贡献。

此时此刻，毛泽东、周恩来都已进入晚年时期，疾病缠绕着他们。毛泽东的身体已力不从心；周恩来在1972年5月的体检中发现有早期的癌症症状。但是，他们为了改变中国的面貌，改变世界的形势，作出他们的贡献，继续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不仅在中国的历史上，而且在世界的历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中国屹立于世界之林，开始了与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平等交往的时代。这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们共同奋斗的结果。

6.不要搞"四人帮"

林彪集团覆灭后，"文化大革命"还在延续，这就为江青集团的形成提供了机会。但是，毛泽东相信江青，而不重用江青，让她当上中央政治局委员后再也不让她做什么了。

周恩来忙完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两件大事以后，又转向抓批林运动了。

从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来的一年中，全党在《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之二和之三的基础上，开展了批林运动。但是，有不少文章把林彪集团作为极右

路线批判。这是不符合实际的。林彪推行的不是极右路线，而是极左路线。如果把林彪的极左路线当作极右批判，那越批右，“左”的错误就更严重了。

为纠正这个错误的批判，周恩来在1972年的九十月间作了两次批判极左思潮的报告。10月1日，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国庆社论《夺取新的胜利》中明确提出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要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等，提倡为革命学业务，学文化和技术。10月6日，周培源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的文章。在文章中强调要加强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学习与研究。10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一文，在这三篇文章中，指出林彪是煽动极“左”思潮的罪魁祸首，因而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对极左思潮的批判。全国政治、经济形势日趋稳定和发展。

但是，对极左思潮的批判，必然牵连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所以，他们必然会极力阻挠和反对，并不断地向毛泽东打报告，对毛泽东施加影响。1972年12月17日，毛泽东说林彪“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这话如果确切地分析：林彪叛党叛国，确是极右。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推行的路线则是极左。可是毛泽东只说叛党叛国这个方面，这样说的结果是，一方面只准批林彪的极右方面，不准批极左方面；另一面却又支持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使他们有机会向周恩来发动进攻。从此，江青一伙又日益活跃起来，在党中央内部又挑起了新的矛盾和斗争。

1973年以后，毛泽东处在晚年历史上多病的时期。这

时，毛泽东已很难听到各方面的汇报，了解实情。这在客观上为江青集团的形成提供了条件。她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发号施令。这就造成了党中央其他领导人与江青集团斗争的复杂性。这时毛泽东病情时轻时重，有时还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因此，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他似乎有时支持周恩来，把党和国家的工作搞好，似乎有时又支持江青，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他带病作了不少讲话和写了许多批示，有的内容是自相矛盾的，有的文句是断断续续的，或说得不很清楚的。这也许是年老多病所致，也许是由于复杂的情况所造成的。

1973年1月1日《人民日报》等发表的《新年献词》中，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强调林彪的路线“是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这实际上公开地否定了周恩来提出的对极左思潮的批判。这是由于毛泽东判断错误，又被江青、张春桥等所利用。江青、张春桥等气焰十分嚣张。最突出的是，张春桥在周恩来主持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对文件中纠正生产建设上存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所作的规定，表示坚决的反对，并强令把文件收回，更有甚者，他不顾28个省、市、自治区负责人的反对，说“拿多数压我们，我坚决反对，我们是光荣的孤立。”张春桥在这句话中强调的是“我们”，不是“我”。所谓“我们”，显然还包含了江青等一伙人，并且态度十分蛮横，愿做一个“光荣的孤立”者，似乎真理在他们手中。其实只不过他们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罢了。从这一事件中可以看出，江青一伙以主动的姿态向周恩来进攻了。

正当江青集团一步一步地夺取各种权力的时候，毛泽东开始思考的由谁领导来把我国的经济工作搞上去，这个人选

在江青一伙中是没有的。张春桥虽然是副总理，但由他来抓经济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决心起用邓小平。

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这一决定对江青集团的篡党夺权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邓小平一家是在1973年2月从江西回到北京的。邓小平在江西的监禁生活已3年多。他是1969年10月23日离开北京到江西的。在"九大"上，毛泽东虽然讲了要区别对待邓小平，但是没有落实，后来只好离开北京，被安置到江西省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劳动。1972年8月3日，邓小平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立刻作了批示：

>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即汪东兴）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上述批示，充分说明毛泽东是十分器重邓小平的。毛泽东对邓小平在历史上作出的贡献，能一二三地列出来，同时也

反映了他要早日解放邓小平的思想，对迟迟不解决邓小平的问题表示不满。

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的批示和邓小平的信后，立即交中央办公厅印制若干份，分别送中央政治局委员传阅，以便在政治局中进行讨论。同时，周恩来又以中央名义通知江西省委，宣布邓小平立即解除监督劳动，搞一些参观访问、调查研究的活动，并指示将原来的公务员、秘书立即调到江西新建拖拉机修配厂邓小平的身边，协助他工作，改善他的生活。1973 年 3 月 10 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认真地讨论了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以及毛泽东的批示，从而作出了上述决议。

这对于邓小平说来，是他的政治生涯转机的开始，但是，复出后的邓小平便面临与江青集团的斗争。

1973 年 5 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为十大的召开作准备。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宣布解放谭震林、李井泉、乌兰夫等 13 位老干部，又决定王洪文、华国锋、吴德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参加政治局的工作。此时，毛泽东听信了张春桥等人的介绍，看中了王洪文，说他当过兵，打过仗，做过工，有过锻炼，一下子将王洪文调到了中央政治局。这是继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在组织上犯的又一个严重错误。

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一下子夺到了筹备党的十大的权力。他们起草报告，决定大会代表，推荐中央委员。特别是王洪文被任命为党章修改小组负责人，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主任。张春桥、姚文元为十大文件的起草人。可见，毛泽东对江青、王洪文、张春桥等还是十分信任的。由于江青一伙把持了十大的准备工作，因而必然在十大上夺取更多的权力。

1973 年 8 月 24 日至 28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

大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主持了会议。会上周恩来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选举了第十届中央委员会。8月30日，中国共产党召开十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主席，选举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为中共中央副主席，选举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通过"十大"和十届一中全会，江青一伙在党中央领导机构中取得了更多的位置和权力，这为他们在党中央政治局中结成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四人帮"创造了条件。同时也进一步暴露了江青一伙篡党夺权的野心。

十大后，江青一伙自以为得势，从各方面发动了对周恩来的进攻，毛泽东也越来越察觉到江青一伙有野心，特别是从以下几件事中，毛泽东更看到了江青企图篡党夺权。

评儒法斗争。1973年下半年，全国各个报刊发表了大量的评儒法斗争的文章。各单位普遍地组织大批判组，专门写评儒法斗争的稿子。有的单位的大批判组直接受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指挥，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周恩来。

宣传张铁生交白卷精神。这是破坏高校招生工作的事件。1973年6月，插队青年张铁生在辽宁兴城参加大学招生考试，语文得38分，数学得61分，理化得6分，他估计上大学无望，在考卷背面写了一封信，攻击考试制度。当时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的毛远新得知后，如获至宝，把他作为"一块有棱有角的石头"，要利用"这块石头打人了"，并在7月19日《辽宁日报》上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发表了张铁生的一封信。在编者按中说："张铁生对物理化学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

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借此大肆宣传,攻击高校招生制度,其目的是大反国务院、大反周恩来。因1973年4月3日,国务院批转科教组《关于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在意见中强调在政治条件合格的基础上要重视文化程度,进行文化考查。江青一伙则攻击这是"坚持智育第一","文化至上",要辽宁拿出材料来加以反对并选中张铁生做典型,制造了所谓白卷事件。一时间,不少报刊发表文章批判教育制度,甚至发生了考教授的事等,反对"师道尊严",鼓励学生"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向毛泽东要稿费。1973年10月,江青去见毛泽东,提出要钱。这件事使毛泽东大为生气,药也不吃了,并对人说:"他们看我不行了,为自己准备后路。"后来,毛泽东在稿费中拿出3万元存款,叫秘书张玉凤送去。江青见了喜出望外,对张玉凤说:"小张,这些钱对我来说是不够的。我跟你不一样,将来我是准备杀头、坐牢的,这个我不怕,也可能不死不活地养着,这个难些。"从这些话中,江青似乎看到了自己的下场。

掀起批林批孔运动。江青一伙知道毛泽东对林彪的尊孔有个批评,就借机选编了《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送毛泽东审阅,经毛泽东同意作为1974年中共中央第1号文件下发。在1974年1月24日、25日,江青等人主持召开了在京部队单位、中央直属机关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名义上是批林批孔,实际上是要批周恩来。王洪文说:"批林批孔运动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开始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批林批孔"运动。在运动中,不少人被蒙蔽,认为这是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但是,毛泽东看出了问题。1974年2月15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说:

“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

制造蜗牛事件。1973年底，四机部派人到美国考察，准备引进彩色显像管生产线。美国康宁公司赠给代表团成员每人一件玻璃制的小蜗牛作为礼品，并无什么恶意。后来，有人写信给江青。1974年2月10日，江青突然到四机部说送蜗牛“是骂我们，侮辱我们，说我们爬行”，说引进显像管生产线是“屈辱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崇洋媚外”，以此大做文章，把矛头对准国务院，对准周恩来。

江青制造种种事端，攻击周恩来。但是，她们越是跳得高，就愈加暴露他们的真面目，也愈加引起毛泽东对他们夺权阴谋的警觉。

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参加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严厉地批评了江青一伙。毛泽东说：

“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

毛泽东还针对江青到处说“我代表毛主席”等，当众宣布：

“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

毛泽东在会上还批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搞帮派活动，说：

"你们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的"四人帮"问题。毛泽东虽然对江青很不满，但还是从教育出发。尽管如此，这次批评对江青一伙仍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从此，对江青一伙反不得、批评不得的时期结束了。在过去，批评江青，不得不顾及毛泽东。而现在，毛泽东带了一个头，并宣布江青只代表她自己，不能代表毛泽东，这个护身符她们没有了。毛泽东对江青一伙的批评，从根本上就决定了她们要覆灭的命运。

7. 重新起用邓小平

1974年夏，周恩来因病情恶化住进了医院，国务院的工作越来越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承担。这人就是邓小平。

1973年2月，邓小平得到毛泽东的同意，全家离赣返京。3月10日，中央恢复了他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8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被选为中央委员。从

此开始协助周恩来整顿和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

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在会上提出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的建议，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提议邓小平参加军委，任总参谋长。

邓小平在抓国内经济工作中，与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的倒行逆施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些斗争有的是在毛泽东支持或同意下进行的。

1974年10月4日，由王洪文记录、秘书张玉凤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谁当第一副总理？（邓）”对此，江青一伙极为不满。10月1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江青一伙借机攻击邓小平。当晚，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进行密谋后决定派王洪文到长沙，向在长沙养病的毛泽东告状，妄图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以实现她的组阁阴谋。毛泽东察觉了她们的阴谋，当即批评了王洪文，使这次告状未能得逞。

1974年10月20日，毛泽东又提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对此，江青一伙更为不满。她直接向毛泽东写信。11月12日，毛泽东在江青的信上作了这样的批示：

> “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毛泽东对江青的“三不要”批示，是批评，也是教育，更是爱护；但在江青看来，这是夺了她的权。不露面、不批文件、不

组阁，她要做的事全没有了。同时，毛泽东又发出指示，周恩来“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他主持。江青等知道毛泽东上述指示后，采取了以守为攻的策略。11月19日，江青又给毛泽东写了信。在信中作了自我批评，信中说：

> “我愧对主席的期望，因为我缺乏自知之明，自我欣赏，头脑昏昏，对客观现实不能唯物的正确的对待，对自己也就不能恰当的一分为二的分析。一些咄咄怪事，触目惊心，使我悚然惊悟。”
>
> “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

在这封检讨信中，江青按毛泽东批评的思路，骂了自己几句，但紧接着是伸出了手，又要权力了。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是有极为深刻的教训的。“九大”以前，毛泽东给了江青不少权力。但一旦手中有了权，她什么事情都会干得出来的。毛泽东在这封信上又作了这样的批示：

> “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江青对“研究国内外动态”的工作早已十分不满了。她认为这是几十年来压她的一个借口。在“文化大革命”前要她做

这个工作，现在还是叫她做这个工作。她一而再地纠缠毛泽东。她通过王海容和唐闻生向毛泽东转告她的又一个意见："由王洪文任副委员长，排在朱、董之后。"对此，毛泽东对王、唐说：

"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

毛泽东的这句话，把江青所想的、所争的全部地揭了出来，既深刻又尖锐，使江青再也无法纠缠了。

1974年12月，王洪文再一次到长沙见毛泽东，又一次表现了夺权的野心。毛泽东当即批评了王洪文：

"你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

这是毛泽东又一次提及"四人帮"，并对王洪文、江青等作了批评。但是，在这段时间内的批评是不让他们争夺党和国家的权力，还是从教育他们出发的。在当时，毛泽东想法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团结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毛泽东对他们一方面是批评，一方面是教育。江青正是利用这点，长期地纠缠毛泽东。频繁制造事端，阻挠周恩来筹备四届人大，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以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但是，闹了几个月，毛泽东一再地批评她们，

不说一句对她们夺权有利的话，这就决定了江青一伙企图通过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夺权阴谋的破产。

1974年12月23日，周恩来不顾身患重病，乘飞机专程到湖南长沙，与在那里养病治病的毛泽东共商国事。此时此刻，党事国事，几乎身系一人。也只有毛泽东、周恩来才能一语定乾坤。此时，毛泽东对邓小平抓的各项工作表示满意，说：

"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

毛泽东称赞邓小平已不止这一次了。1957年，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参加莫斯科会议时，在各国共产党代表面前曾称赞过邓小平，说他年轻，能力强。在长沙，毛泽东与周恩来一起，共商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人选问题。历史证明，这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决定，使党和国家的权力交给了真正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1975年第1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1975年1月8日至10日，中国共产党召开十届二中全会。讨论四届人大筹备工作，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带病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会议选举朱德为委员长，任命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等12人为副总理。张春桥虽是副总理，但排在邓小平之后。会后，江青等人不得不承认："这次没有夺到什么权。"

8.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

进入70年代，毛泽东虽已步入暮年，但是他的思维仍然非常活跃。他思考着中国与国际关系的战略。在1972年内，他不失时机地打开了中美、中日的关系，使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为后来的对外开放创造了条件。到1974年，他形成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这不仅在理论上发展了他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思想，而且在实践上指导了中国在一个时期的外交活动。

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话时第一次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毛泽东说：

> “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
>
> “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①

毛泽东的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他根据当时国际形势的特点及变化，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结果。他并不完全根据过去以社会性质划分世界，而是以生产力发

① 《人民日报》1977年11月1日。

展的水平、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来划分的。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一般是把世界划分为：社会主义阵营、帝国主义阵营，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后来，由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先后独立与解放，把它们称为民族解放民族独立运动的国家。由于这些国家民族独立解放任务的完成，再用原来划分方法就不合适了。同时，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对当时的苏联，在毛泽东看来已变成修正主义统治的国家了。再用原来的划分方法和提法更不合适了。再加上世界局势从70年代起，已逐渐地向多极化方向发展。毛泽东思考了很长时间后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

但是，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已不可能对这个思想作系统的全面的论述。而作系统的、完整的、全面的论述的是邓小平。

1974年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作的发言中，系统地论述了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邓小平的发言得到了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和拥护。

1974年3月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派谁去参加这次联合国大会时，江青坚持不同意邓小平去。3月27日，毛泽东在写给江青的信中说："邓小平同志的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邓小平在联合国特别会议上的发言稿，先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后又报毛泽东审定。

邓小平在4月10日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对"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作了详尽的阐述：

"当前国际形势对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各国人民非常

有利。建立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基础上的旧秩序，遭到了日益深刻的破坏和冲击。国际关系激烈变化。整个世界动荡不安。这种状况用中国的话说，就是“天下大乱”。这个‘乱’是当代世界各种基本矛盾日益激化的表现。它加剧了腐朽的反动势力的瓦解和没落，促进了新生的人民力量的觉醒和壮大。”

“在‘天下大乱’的形势下，世界上各种政治力量经过长期的较量和斗争，发生了急剧的分化和改组。一系列亚非拉国家纷纷取得独立，在国际事务中起着愈来愈大的作用。在战后一个时期内曾经存在的社会主义阵营，因为出现了社会帝国主义，现已不复存在。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西方帝国主义集团，也已四分五裂。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又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①

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为我国在70年代的对外活动奠定了理论基础。联合世界上发展中的国家，争取第二世界的国家，反对第一世界国家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反对霸权主义，是中国外交政策中贯彻的一条统一战线。这

① 《人民日报》1974年4月11日。

是团结多数、反对少数的一条正确的方针。

邓小平出席联合国大会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会议期间,他展开了一系列的外交活动,表现了非凡的才能,也得到了国际友人的好评和国内人民的称赞。同时也表明,毛泽东的决策是正确的。

9.“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

四届人大后,江青不甘心失败。她深知,这次是毛泽东不让她“组阁”。所以,她还要纠缠毛泽东。她把王海容、唐闻生两人找来,要她们向毛泽东报告她对所有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意见。把除她一伙以外的政治局委员的意见都诉说了一遍。后来,王、唐向毛泽东作了报告。毛泽东听后说:

“她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

王、唐又问毛泽东:“你呢?”毛泽东说:

“不在她眼里”,“将来她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

毛泽东的预料是很正确的。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后,“四人

帮”一伙又闹腾起来了。

1974年12月间，毛泽东听取周恩来等关于四届人大筹备工作汇报后作了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这指示由于毛泽东处在多病时期，只提出学习理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重要性的问题，没有作新的阐述。可是，“四人帮”一伙控制着宣传机器，发动和掀起了所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

当时，毛泽东对理论问题说了这么几段话：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大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了。

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①

① 《人民日报》1975年2月9日。

综上所述，就是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

这就是所谓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这些理论，只要仔细地研究一下，不难看出它的内容是自相矛盾的，有些话是不确切的，相互间也不连贯的。关于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从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的十几年中可以说天天讲这个问题，在全国全党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正是这种情况，江青、张春桥等为了反对周恩来、邓小平。她们挖空心思地想出了“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提法，以此欺骗全党和全国人民。

1975年4月1日，张春桥经过几个月的苦心准备，发表了《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的大文章。他以党内所谓理论家自居，系统地论述了“全面专政”的思想。4月3日、4日、5日，江青在宣讲张春桥的上述文章时，反复地强调当前主要的危险是经验主义。并说，对它的危险性，要擦亮眼睛，要认识清楚，保持高度警惕。还说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从而把矛头指向了周恩来和邓小平，说他们犯了经验主义错误。

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按照党中央的精神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要求，从1975年上半年起对经济工作进行了全面的整顿，使工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都有了恢复和发展。毛泽东对此是满意的。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已经8年了，现在需要的是安定团结。而江青、张春桥等人没有在四届人大上夺得更大的权力，又闹起了所谓批判经验主义，这就严重地干扰了经济的发展。

1975年4月23日，毛泽东在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

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上作了批示。这个批示，是批评江青、张春桥等人的。

>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两者都是修正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
>
>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毛泽东在很多场合多次提到反对所谓的经验主义的，但他同时也反对教条主义，主张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所以，他说当前应提反对修正主义。

在这件事中，毛泽东已看出江青、张春桥为何不提反对修正主义，却提反对经验主义的根本原因。毛泽东在1975年4月27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一篇很长的讲话。这是几年来很少作的长篇讲话。这个讲话主要是批评江青的。毛泽东说：

> “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半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倒。”“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

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都讲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

“我看批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

“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因为经验不多。”

“江青不如王明，她没有写《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

“不作自我批评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

“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对江青等搞四人帮的问题，毛泽东又说：

“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毛泽东这次讲话，不仅使江青一伙批所谓经验主义批不下去了，而且把江青等人搞“四人帮”问题作为政治局内最大的问题了。毛泽东讲的这番话的份量，以及在党内的作用，江

青等人是有所估计的。

毛泽东的这次讲话，极大地支持了党中央、周恩来和邓小平对江青集团的斗争。中央政治局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召开会议，对江青等人展开了斗争。一时间，江青等人也摸不着毛泽东下一步对她们要采取什么行动，不得不暂时接受批评，还作了“检查”。

1975年6月28日，江青给毛泽东以及在京的各政治局委员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她作起了“自我批评”。她说：

> “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同志们的批评、帮助，思想触动很大。”
>
> “我在4月27日政治局会议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
>
> “当我认识到四人帮这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讲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

江青的检查无疑是很不够、很不深刻的。但她承认了自己搞“四人帮”是搞宗派，自己的自我批评不够等。

江青采取这个态度后，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也跟 着“检讨”起来。特别是张春桥，用与江青一样的腔调说：

> “主席关于不搞四人帮的指示，一定坚决照办，并尽可能地做好团结工作，至少不给主席增加负担。”

党中央政治局内前后经过两个月与江青一伙的斗争，使江青一伙反对周恩来、邓小平的活动，不得不收敛起来。这样，邓小平可以有一段时间领导全党全民对国民经济进行较大的调整，以克服“文化大革命”以来长期存在的问题，使工农业生产有一定的发展，国民经济有一个好转。这是全党和全国人民所盼望的，也是毛泽东所要求的。

10.评《水浒》

由于排除了江青等人暂时的干扰，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领导全党全民对国民经济进行了较大的调整。这次调整是包括各方面的。不仅在经济方面，而且还包括政治、军事、文化思想等方面，从领导班子到计划指标都在调整之列。经过调整，从1975年下半年起，国民经济发展的形势大有起色，出现了“文化大革命”以来最好的形势。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精神为之一振。邓小平在全党全国人民中的威望大为提高，痛恨“四人帮”的人也越来越多。人民群众不断地起来揭发她们在各方面的倒行逆施，揭发她们反党反人民、反总理反邓小平的信件，不断地寄向党中央，“四人帮”已处在人民的声讨中。

然而，“四人帮”借毛泽东读《水浒》、评《水浒》的机会，又对周恩来、邓小平发起进攻。

1975年8月前后，毛泽东患眼病，不能看书，只好请一位

研究《水浒》的北京大学的老师卢获给他读，与他边读边议。8月13日，毛泽东与卢获谈起他在1973年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对《水浒》一书的评价问题。在听念书的过程中，又发表了不少意见。这些纯属读书、念书中的议论，不是针对哪一个人的，然而，这些议论卢获认为很重要，作了记录，进行了整理。

毛泽东在听读《水浒》时发表的意见，经整理内容为：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的队伍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

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①

这就是毛泽东评《水浒》的内容。这些谈话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都没有联系到当前的什么事，只不过说到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

8月14日，卢荻将整理后的毛泽东的谈话，送给姚文元看。姚文元如获至宝，当日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姚文元在信中说：

"关于《水浒》的评论这个问题很重要。"

"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当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

姚文元这封信，一下子把毛泽东评《水浒》的话与当时的政治斗争联系了起来，并让《水浒》发挥"反面教员"的作用。这是姚文元的本事。同时，姚文元在信中还提出三点意见：

"为了执行毛主席提出的任务，拟办以下几件事：

一、将主席批示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

① 《红旗》1975年第9期

《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及北京批判组谢静宜同志、上海市委写作组。附此信。

二、找出版局、人民文学出版社同志传达主席指示，做好三种版本印刷和评论的工作。我还看到一种专供儿童、青年读的《水浒》，是根据七十一回本改的六十五回本，也要改写前言，增印鲁迅的话，否则流毒青少年。

三、在《红旗》上发表鲁迅论《水浒》的段落，并组织和转载评论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订个计划。

以上可否，请批示。

姚文元是"四人帮"中善于窥测方向，玩弄笔墨的人。他的这封信毛泽东阅后作了"同意"的批示。"四人帮"如鱼得水，又活跃起来了，反对周恩来、邓小平。

1975年8月起，江青一伙又借毛泽东评《水浒》的机会发起了向周恩来、邓小平的攻击。一时间，声势浩大，使人摸不着底细，以为是毛泽东的一个什么步骤。8月下旬，江青对浩亮、于会咏等人说：

"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党内有人架空毛主席。"

9月，江青在山西大寨大队说：

"不要以为评《水浒》只是一个文艺评论"、"历史评

论”，它“是对当代有意义的大事，因为我们党内有十次路线错误，今后还会有的，敌人会改头换面藏在我们党内”。“批《水浒》就是要大家知道我们党内就是有投降派。”

江青这两段话的矛头很明显地指向周恩来和邓小平。她给他们扣上了要架空毛主席、是党内的投降派、是又一次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等帽子。当时，邓小平对他们的阴谋进行了揭露：

“评论《水浒》是怎么一回事，主席把七十一回本读了三个月，读了以后，主席发表了这一通言论。有人借这做文章，想搞阴谋。”

“评《水浒》”毕竟是一场运动群众的历史闹剧，不多时，便草草收了场。

11.“一些老同志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

由1975年9月以后，毛泽东已迈入晚年时期中的最后年月。在这个时候，全党和全国人民虽然还能看到不少毛泽东的指示，但这些指示是通过有限的渠道传达出来的。因此，在传达中，也许完全按照毛泽东的原话、原意传出来，也许有所删改后传出来，也许有所篡改歪曲后传出来。

例如，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把邓小平第二次打倒，就是一个值得很好研究的课题。毛泽东坚持“文化大革命”，认为不能否定“文化大革命”，这是他一贯的思想。但是，他又认为“文化大革命”以来有不少的问题需要解决。邓小平起来整顿也是符合毛泽东本人要求的。因此“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怎样发动的呢？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1975年九十月间，邓小平领导的对国民经济的整顿工作已到了关键时刻，也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四人帮”使用一切办法否定整顿工作，把它诬陷为翻“文化大革命”的案，陷害邓小平。

面对重重压力邓小平作了这样的讲话：

> “老干部要横下一条心，拼老命，敢字当头，不怕，无非是第二次再被打倒，不要怕第二次被打倒，把工作做好了，打倒了也不要紧，也是个贡献。”

这段话充满着一位老革命家为党为国不怕任何牺牲的斗争精神。

邓小平坚持与江青一伙的斗争，毛远新是有看法的。他是站在江青一边的。此时，毛远新能起的作用是难以估量的。他到毛泽东身边，带进的和带出的无论是什么，都有千斤之重。毛远新接近毛泽东，给江青造成了一个极好的机会——由毛远新代替江青向毛泽东说话。在1975年9～11月间，毛远新向毛泽东作了多次汇报。其中说到：他现在“感觉到一股风，比1972年借批极左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时还要凶些”。他

"担心中央,怕出反复"。还说:"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搞上去了",其余两项都不提了。毛远新的这些看法,是有着明显的倾向性。他是反对邓小平的。而毛泽东出于坚持"文化大革命",是会接受或同意毛远新的这个意见的。此后,毛泽东向毛远新也谈了自己的看法。毛泽东谈到:

>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有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

江青一伙得知毛泽东谈话后,感到时机到了,认为这是向邓小平发动进攻的好机会。于是,她们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毛泽东的谈话也成了她们发动这个运动的尚方宝剑。

事情的开端是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写信向毛泽东反映他校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等人的问题引起的。在信中,刘冰详述了他们在清华工作中的问题,其中包括作风的问题。刘冰写信反映迟、谢的问题,在组织上是允许的。信中所举事实也是真实的。但是,毛泽东听了一面之言,对这件事作了不正确的判断。毛泽东说:

"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迟群不能走，迟群走了，不是又要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吗？"

"他们骂小谢，实际上是反对我，可又不敢，就把气发到她身上。"

毛泽东的这些话传出后，在清华大学引起了极大的混乱。两校（北大、清华）的大批判组忙得不亦乐乎，连夜赶写文章。1975年12月4日，《人民日报》转载了发表在《红旗》1975年第12期上的《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的重头文章。这篇文章说，"资产阶级每次搞翻案复辟活动，总是跳出来猖狂反对工人阶级领导的。""现在，教育界的怪论就是企图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进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改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于是，以教育革命大辩论为起点，逐步发展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兴起主要是由于江青一伙的掀起，但是也与毛泽东的错误判断有关。毛泽东认为党内的老干部中有人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这个判断被"四人帮"利用了。此时的毛泽东确实到了垂暮之年，不少事难以作出正确判断。他没有能够结束"文化大革命"运动，也最终没有下最大决心解决江青一伙、领袖的地位、终身制等等问题。

第六章

最后的岁月

（1976年春—1976年秋）

1976年，共和国历史上最多灾多难的一年。毛泽东病情加剧。

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说："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对"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

4月5日数十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遭镇压。江青攻击"邓小平是造谣公司的总董事，也叫总经理"，并称"将来管理国家的还是女同志"。

10月4日，"梁效"在《人民日报》等发表伪造的"按既定方针办"的临终遗嘱……

1976年,是毛泽东晚年中最艰难的岁月,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灾难最多的一年。

1月8日,全国人民最敬爱的好总理周恩来不幸病逝;4月7日,邓小平又一次被打倒,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党和国家工作处在混乱之中;7月6日,全党全军以及全国人民最爱戴的总司令、委员长朱德不幸逝世;7月28日,唐山发生强烈地震,24万多群众惨死在地震之中;江青集团进一步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党和国家处于灾难的深渊之中。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又于9月9日逝世。因此,党、国家、人民都被悲痛笼罩着。也正在这个时候,一场新的革命运动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四人帮"的倒台,使党、国家、民族终于获得了新生。

1.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总理

江青一伙发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越来越走向了他们愿望的反面:人民越来越看清了江青一伙篡党夺权的阴谋,邓小平的威望反而越来越高了。因为在批邓中,人民都在思考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1976年1月8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各族人民最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因病逝世。全党和全国人民沉痛悼念人民的好总理。

周恩来逝世后,江青一伙制造种种事端压制人民群众对周总理的悼念。同时又加紧开展批邓运动,为他们篡党夺权作准备。

1976年1月15日，北京举行周恩来追悼大会。毛泽东因病未能参加，会后百万群众伫立在十里长安街上，为敬爱的周总理送灵。

1月21日、22日，由毛泽东提议，经中央政治局通过，确定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一决定，虽然邓小平已作为"右倾翻案风"的代表人物被打下去了，没有让邓小平接替总理的工作，但是，也没有让张春桥当总理，打破了"四人帮"想当总理的美梦。

周恩来的去世，使毛泽东少了得力助手，他心里十分难过……

1976年2月2日，毛泽东批发了《中共中央通知》。通知说："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这个通知的下发，对江青一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们估计，原第一副总理邓小平已在批判中，也停止了他的不少工作，这次肯定出不来，总理的职位一定会落在张春桥的身上。可是，毛泽东并没有提张春桥，而是提了华国锋。张春桥在1976年2月3日写了有感："又是一个一号①文件。去年发了一个一号② 文件。真是得志更猖狂。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错误路线总是行不通的。可以得意于一时，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开始一个什么新时代了。他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已的力量。人民是决定性的因素。代表人民的利益，为

① 《中共中央通知》为1976年中共中央第1号文件。
② 1975年中共中央发出了第1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

大多数人谋利益,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人民群众一边,站在先进分子一边,就是胜利,反之,必然失败。正是:'爆竹声中一岁除,东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在这个有感中,可以看出张春桥是何等的无奈,对自己的失败又是何等的不甘心。他们要窥测方向等待时机。

1976年2月间,毛泽东在病中,接待了第二次来中国访问的尼克松。尼克松对当时的情景作了这样的记述:

> "76年再次来中国时,毛的情况严重恶化了,他讲话的声音就像一连串音节的咕哝和呻吟,不过他思想仍是敏捷和清晰的。他明白我所说的一切,不过在他要回答时,却说不出字来。如果他认为翻译听不懂他的意思,他就会不耐烦地抓过一张便条,把他的话写出来。"

此时的毛泽东,虽然他的思维仍然敏捷和清晰,但是能接近他的人太少了,只有毛远新和张玉凤等人。毛泽东听到的只是少数人向他的汇报,不可能全面地了解情况了。而传达毛泽东话的人,也只是少数几个人。在这个时候,江青等人哄瞒毛泽东,或"假传圣旨"是有便利条件的。

几十年来,毛泽东总想在革命斗争中挑选接班人,但是都没有成功。这次选上了华国锋,能否成功呢?

1976年2月以后,在江青一伙的鼓躁下,批邓运动更大规模地开展起来,但是,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也进一步步入高潮。

1976年2月25日,在江青一伙的左右下,以中央名义召

开“批邓打招呼会”。会议前夕，即在2月20日，江青对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黄涛、李彬山以及丁盛等人说：

> “你们是上海帮啊！你们知道吧，他们把我也说成上海帮啦！”“要集中火力，揭批邓小平，去年他斗了我几个月，我是关在笼子里的人，现在出来了，能讲话，我要控诉他。”“什么言论自由啊！他是一言堂，独立王国，法西斯！”

只过了几个月，江青就把自己的“检查”推翻了，要明目张胆地向邓小平报复。3月2日，江青在12个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中说：邓小平这种事，恐怕很多同志不知道内幕，当然我知道的也不太多。不过，我是一个首当其冲的人物。他在去年4月底，不请示主席，擅自斗争一个政治局委员。从4月底一直斗到6月。邓小平对“凡是造反都要整，凡是紧跟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都要整。我是首当其冲的。因为我是努力执行主席革命路线的。”“去年7、8、9三个月，全国谣言很多，据说一追就追到北京，就追不下去了。其实邓小平就是谣言公司的总经理。”江青认为，现在可以放手去批邓了。

江青是一个演员出身的阴谋家，她批评邓小平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她当女皇的美梦。她在3月2日的讲话中，还有一段极为精采的表白，那就是自诩自己是当代的武则天、吕后，这就彻底暴露了要当女皇的野心。她说：

邓小平整我,是有政治阴谋的,是对主席。别人造谣说我是武则天。我说,在阶级问题上,我比她先进。但在才干上,我不及她。他们没有历史知识,就是想拿旧社会那个传统观念来对付这两位封建的伟大的女政治家。她们比男人还厉害,而且是法家。

有人写信给林彪说我是武则天,有人又说是吕后。我也不胜荣幸之至。吕后是没有戴帽子的皇帝,实际上政权掌握在她手里,她是执行法家路线的。

武则天,一个女的,在封建社会当皇帝啊!同志们,不简单啊,不简单。她那个丈夫也是很厉害的,就是有病,她协助她丈夫办理国事,这样锻炼了才干的。

在这些话中,江青毫不掩饰地把她自己比作当代的武则天了。特别是"她那个丈夫也是很厉害的"一句中,用了"也是"的口气,这就露骨地表现了她的内心欲望。当然还有说得更明白的:

"他们就是用下流的东西诽谤武则天,诽谤吕后,诽谤我,目的是诽谤主席嘛。"

在这里,江青把她与武则天、吕后之间已画上等号了。

周恩来逝世后,毛泽东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他虽然不是江青一伙的人,但他是主张批邓的。2月25日,他代表党中央在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上的讲

话中说：

"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批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在这个总目标下，把广大干部、群众团结起来。"

"对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

"回去以后怎么办，提出几点意见，第一，最重要的是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和中央文件"；"第二，要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第三，要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第四，对犯错误的同志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打招呼会议后，批邓运动在全国继续进行。但是，从3月到4月的清明节前后，南京、上海、北京、西安等大城市先后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四人帮"的群众运动。

1976年3月5日，新华社报道了关于向雷锋学习的情况。但是，上海的《文汇报》在发表这个新闻时删去了原报道中的关于周恩来的题词，引起了群众的注意和不满。3月25日，《文汇报》发表了《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的文章。在文章中说："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是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他对没落的旧制度、旧思想、旧意识恋恋不舍，奉为至宝，而对社会主义的新制度、新思想、新文化却看不惯。他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迫不及待地刮起右倾翻案风；孔老二鼓吹'仁政'，党内那个走资派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孔老二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

这段文字完全是对准周恩来的,并且把周总理打成了"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这种恶毒的攻击,人民是不答应的。文章发表后,来自上海和全国各地的工厂、学校、机关、农村、部队的抗议电话不断地打到《文汇报》社,怒斥《文汇报》,声讨"四人帮"。顷刻,革命风暴掀起来了。黄浦江边,西子湖畔,珠江两岸,人民都在抗议着,而最激烈的斗争是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上。似火山,似海啸,似飓风,席卷中国大地。

3月24日,毛泽东批发了中央关于各地禁止来京上访的通知,劝阻学生来京,要求在本单位党委的领导下,不搞串连,不搞战斗队,在本地区、本单位搞好大辩论和大批判。批判"四人帮"的大字报、大标语,在3月下旬的上海、南京首先贴出来了。

1976年4月1日,毛泽东圈阅了《中共中央关于南京大字报问题的电话通知》。通知指出:

(一)据了解,最近几天,南京出现了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①的大字报、大标语,这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转移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你们必须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全部覆盖这类大字报、大标语,对有关群众要做好思想工作。要警惕别有用心的人借机扩大事态,进行捣乱、破坏。(二)对这次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人,要彻底追查。(三)所谓总理遗言,完全是反革命谣言,必须辟谣,并追查谣言制造者。(四)任何人不准冲击铁路。

这个电话通知,是为了保护"四人帮"的,并以镇压群众的口气下达的。这个通知虽然由毛泽东圈阅,但完全是"四人

① 这里的"中央领导同志"实际是指江青一伙。

帮”操办授予的。

从4月初开始，北京的群众纷纷来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下，敬献花圈，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4月5日，悼念活动达到高潮。天安门广场上花圈似海洋，群众似怒涛，猛烈地抨击“四人帮”。

4日晚，吴德在天安门广场发表广播讲话，并出动几百辆卡车，把几万个花圈一夜间全部收走。同时又出动大队人马围打留在天安门广场上的群众，有的以“现行反革命”被抓了起来，投进监狱。5日，几十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上高呼“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与，采取抗议行动。但当即遭到镇压。

毛泽东能听到的只是几个人的汇报。他看不到群众运动的场面，也听不到群众的呼唤、呐喊和挣扎声，当然也不可能真正地了解百万群众走向街头是为了什么。他在病中。4月7日，以毛泽东的名义圈阅的中央政治局讨论过的两个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这两个决议说明了什么呢？

一、即使在这个时候，毛泽东也没有把党和国家的权力交给江青一伙，而让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当然，中共中央主席还是毛泽东。这就决定了江青当不成武则天，当不成中共中央主席，张春桥当不成国务院总理。毛泽东虽然有时相信江青，但始终没有把权交给她。

二、毛泽东同意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第二次打倒了邓小平，并把“四五”运动定为“天安门反革命事件”。这个决定实际上支持了江青一伙，把中国共产党推向了极其危险的边缘。群众痛恨“四人帮”，不但没有推倒他们，反而又被他

们打成了反革命。这个决定,是毛泽东在生命最后时期作出的一个错误决策。对于这个决策,毛泽东要负多大的责任呢?在毛泽东圈阅这两个文件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会议,断定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根据会议决议形成了这两个文件。送到毛泽东处只是圈阅罢了。这是要毛泽东这个名字的权威。当然毛泽东东圈阅了,就要对这两个文件负责。

2.在最后的日子里

邓小平再次被打倒,江青一伙从4月以后极力把批邓运动引向深入,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1976年5月以后,毛泽东的病情更加严重了。7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逝世,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沉痛悼念戎马一生的朱总司令。7月28日,河北唐山发生强烈地震,全市房屋毁尽,死亡24.2万人,重伤16.4万人。全国人民忍痛抗震救灾。这对于中国人民、对于毛泽东来说,是一次又一次的打击。地震后,为安全起见,将毛泽东抬到屋外,安置在临时的抗震棚内。此时,毛泽东已卧床不起了。他身边没有亲人。8月28日,女儿李敏来看他,毛泽东还能看清她是李敏,握住女儿的手,闭目不语。李敏以为父亲睡着了,想把手抽出来,但毛泽东紧紧地抓住李敏的手,并睁开了眼,含着泪水,与李敏说话。

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作出最杰出贡献的毛泽东,此时此刻,他感到万分留恋。毛泽东的家庭与中国革命一样,历尽沧

桑，遭受过种种的不幸。特别是在这个时候，他需要有亲人的安慰。然而由于领袖的地位，由于复杂的斗争，他的亲人不能在他的身边。李敏的到来，还是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并且利用江青不在北京的时候，如果江青在北京，也是难于实现的。

此时，江青在干什么呢？她认为，毛泽东一去世，中共中央主席的职位当然是她的。所以，她急于干的是为她自己上台作准备。对于这一点，只要看她的日程安排就可以知道：

7月26日，江青到北京新华印刷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单位"视察"，企图以毛主席、党中央的名义看望首都人民，让人知道她快要接班了。

8月28日，江青到了天津小靳庄。在那里她放肆地攻击邓小平。说：

"邓小平是造谣公司的总董事，也叫总经理。他造毛主席的谣，也造我的谣，造革命同志的谣，分裂党，分裂中央，谁跟主席革命，他就打击谁，文化部、体委、小靳庄，都受邓小平的压。他要把迟群和小谢打入十八层地狱，还有我，他搞的那些比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还恶劣。他要登基，当皇帝。"

江青不让邓小平当，而要自己当。她说：

"将来管理国家的还是女同志。"

8月30日,江青到了山东济南部队某团"登城首功第一连"驻地,去"看望"战士。她身穿军装,斜挎军包,在军包带上还扎上一条白毛巾,装成一个"能文能武"的女统帅,突然出现在战士们的面前,想让人尊敬、想让人崇拜她。

9月2日,江青要去山西大寨大队。9月3日,她到了大寨。说:

> "你知道我这次来是干什么来了,我是和邓小平斗来了。""有人要想打倒我江青,要把材料送给毛主席。结果材料落到我们手里,他们的目的没有得逞。所以,我江青还活着。"
>
> "母系社会就是女人掌权,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还有女皇,也要女人掌权。"

从上述中可以看出,江青要当女皇已迫不及待了。

9月5日,毛泽东病情严重恶化。晚上,中央通知江青,叫她迅速回京。江青回京后,她对病危中的毛泽东百般折磨,她不听医生劝阻,一会儿要给毛泽东擦背,……一会儿要找文件……一会儿又要毛泽东翻身……

……

1976年9月9日零时15分,伟大领袖毛泽东与世长辞了。

9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发表《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和《公告》,

以极其悲痛的心情宣告毛泽东去世的消息。顿时，举国上下，一片悲哀，亿万人民无不失声痛哭。

《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和《公告》，高度评价了毛泽东伟大的一生，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的杰出贡献。毛泽东的去世，对我党我军和我国各族人民，对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他的逝世，定将在我国人民和各国革命人民的心中，引起极大的悲痛。中共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但是，江青不同。她竟说："我不流一滴眼泪"。

在发布的《公告》中规定：(一)9月11日至17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吊唁。(二)9月18日北京时间下午3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三)从9月9日至18日，全国各地和我驻外使领馆及其他驻外机构，一律下半旗致致，同时停止一切娱乐活动。(四)9月18日下午3时整，一切在机关、部队、厂矿、企业、商店、人民公社、学校、街道的人员及其在外行进中的人员，除不能中断工作的以外，均应就地肃立，静默致哀3分钟。有汽笛的地方和单位，如火车、轮船、军舰、工厂等，应鸣笛3分钟致哀。(五)对外国政府、兄弟党和友好人士要求来华吊唁，我驻外使领馆应表示深切的感谢，并转达我党中央和我国政府关于不邀请外国政府、兄弟党和友好人士派代表团或代表来华吊唁的决定。

同日，又公布了毛泽东治丧委员会名单。

9月18日，首都百万群众怀着极其沉痛和无限崇敬的心情隆重举行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下午3时，追悼大会开始，全场肃立。悲壮的哀乐，传到千家万户，传到城市乡村，传到高山大川，传到边疆、哨所，传到全国每一个角落，

祖国在静默,人民在落泪,肃立致哀。同时,在全国的各个工厂、矿山,在行进的列车上、军舰上,汽笛长鸣,声震长空,响彻寰宇。八亿神州在悲痛,举国上下在哀悼。

追悼大会后,江青、王洪文等便迫不及待地开始了夺权的工作。10月1日,江青到清华大学讲话。10月3日王洪文到北京郊区平谷县讲话。10月4日,以"梁效"名义发表《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文章,伪造毛泽东的"按既定方针办"的临终遗嘱。10月6日,中共中央对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采取断然措施,实行隔离审查,坚决地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赢得了十月的胜利。

1976年10月7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10月8日,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了关于建立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同日,中共中央又作出了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及以后各卷并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

10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10月21日、22日,北京、上海等地广大军民连日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热烈欢呼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10月23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军民连日举行庆祝会和游行。10月24日,首都百万军民隆重举行庆祝大会。10月25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伟大的历史性胜利》的社论。

一场历史性的大搏斗结束了。

……

毛泽东的老年和晚年是伟大的,他留给中华民族的财富,

如泰山那样宏伟、巨大。毛泽东的老年和晚年是战斗的诗篇。他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但又最艰苦的岁月。没有家庭的欢乐和团聚。他想为人类、为国家、为民族、为党多做些事业，他最终没有让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落在阴谋家、野心家手中。他盼望党、国家、人民能在短暂的岁月中，走出困境，奔向胜利。他相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毛泽东的一生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一生。半个多世纪以来，他把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在同国内外敌人的斗争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他把毕生的精力，都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同敌人作斗争。他在病中继续领导全党同江青一伙展开了斗争，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建立的丰功伟绩，与日月共存。他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热爱和崇敬。他在国际上有崇高的威望。他的思想、理论，似雨露阳光，滋润和浇灌着大地。他是中华民族中又一个杰出的人物。

他虽然逝世了，但他的思想、理论、事业、贡献都在人民的心目中。

中国共产党将永远地纪念他。

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永远地宣传他。

历史将永远地怀念他。

未来是中国人民的，也是他的。

人民，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民，潮水般地涌向毛泽东纪念堂内，瞻仰着这位伟大的领袖：毛泽东。

后　记

什么是毛泽东晚年？有人认为毛泽东晚年是错误的晚年、唯心主义的晚年、搞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晚年、给党和国家带来灾难的晚年。因此，毛泽东晚年是他错误的代名词。我认为，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其所以错误，首先是不符合历史事实。为此，我写了《晚年毛泽东》一书。

晚年，是人生旅程的一部分，无论是一个普通的平民百姓，还是一位叱咤风云、赫赫有名的领袖人物，当他们度过了朝气勃勃的青年时期、奋力拼搏的中年时期以后，就迈入了老年和晚年时期。这是无法抗拒和改变的自然规律。俗话说，吃了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人哪有不老的。生老病死，是常见的现象，是自然的法则。什么是人生的晚年？简言之，晚年是人生道路上的最后一个历程。对每一个具体的人说，那就有错综复杂的现象和不同的结果。有的人有晚年，有的人没有晚年。如果一个人青年时期是开拓年华、中年时期是耕

耘的岁月，那么，他的晚年时期便是收获季节，是幸福的晚年。如果他是虚度年华，或者干了不少错事、坏事，那么，他的晚年可能是痛苦的、悲惨的。一个人在青年和中年时期不管他有没有意识到，实际上都是为自己有一个幸福的晚年而奋斗。

晚年，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但也许是最悲惨的日子。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晚年在人生道路上可能是一瞬间。每个人应当特别珍惜晚年，要做到欢度晚年。人到晚年，他会越来越感到这个世界不是他的了。他会留恋自己创业的艰难，怨恨时光消逝得太快，对自己一生中未完成的事业感到无限遗憾，对自己所做的错事十分内疚，不堪回首。如再加上疾病缠绕或子孙不孝等，他的晚年就不能是幸福的。

一个人到了什么年龄才算进入晚年呢？由于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各个时代、各个人的实际情况不同，每个人晚年到来的时间也是不同的。在中国，人到60是花甲之年了，离休退休了；人到70已是古来稀了，无疑是晚年了。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疾病能得到及时诊治，人的寿命正在延长，人们的晚年时期到来的时间也在变化。

那么，什么是毛泽东的晚年？毛泽东的晚年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战略家、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的晚年，是一位中国人民公认的伟大领袖的晚年。他的晚年是伟大的、光彩夺目的，为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作出杰出贡献的晚年。他的晚年的功绩仍然是巨大的、主要的、举世瞩目的。他的晚年不仅和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中国的繁荣与昌盛紧密相联，而且为此奋斗不息。他无愧于民族和国家。他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与他作出的贡献相比，成绩是第

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的晚年，是一个伟大的晚年，璀璨的晚年。

毛泽东的晚年从什么时候算起呢？首先，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他和平民百姓有同样的晚年。但是他又是一位伟人、领袖，因此，他的晚年与平民百姓又有不同的地方。1953年12月26日，他六十大寿，可是有晚年的表现吗？没有。1963年12月26日，他七十大寿，又有晚年的特征吗？我看仍然没有。有人认为，毛泽东的晚年从1957年开始，为什么呢？他们认为毛泽东从1957年起犯有"左"的错误；也有人主张，毛泽东的晚年从1966年开始，为什么呢？他们认为从1966年5月起，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我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不科学的。不但用在毛泽东身上不科学，就是用在平民百姓身上也不准确。不能以"犯错误"、"发动文化大革命"作为划分毛泽东晚年到来的标准。毛泽东晚年的到来首先应从人生的自然规律上看，其次才与社会、政治、经济等有密切的关联。从这两方面考察，最明显的是1971年林彪"九·一三"事件以后，毛泽东确实进入晚年时期了。从1953年他六十大寿时到林彪事件以前为老年时期。林彪事件对他的震撼与打击是极为沉重的。从此以后，可以说疾病不断地降临于他，使他不能像年轻时那样，日夜不息地工作或著书立说；也不能像中年时期那样，雄心勃勃，神采奕奕，快步如飞。他是20世纪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代表和时代象征，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但正步入了人生道路的最后一个旅程。在半个多世纪中，他为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作出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没有毛泽东，中国的革命不可能在1949年就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还要在

黑暗中苦斗。所以,他的名字象征着一个时代,这就是独立解放的时代,建立社会主义中国的时代。他的思想是力量的源泉,是民族的智慧,是时代的产物,是最宝贵的财富。他有着伟大的气魄,坚强的毅力,超人的思维和记忆。他始终顽强拼搏、不畏强暴、战斗不息,他的性格为世人所不及。可是,他毕竟是人,他不可能不犯错误。当他进入老年时期以后,他要加快建设社会主义,使中国早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而搞了一个"大跃进"运动;他要全党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阶级斗争,于是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他要反修防修,使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所以搞了一个"文化大革命"运动。他主观上想办好事,但客观上成了错事。他虽然时时处处为国家和民族的兴旺发达考虑,但他脱离了群众,脱离了实际,他手中缺少真实可靠的材料,因而作出了许多错误的决策。他也常常思索,或与别人谈论人生能活多少年呢?他开始被疾病缠绕,使他有不少事想做而没有做到,想做好而没有做好。毛泽东的老年和晚年和普通人一样,没有什么神奇的地方。从另一个角度说,毛泽东到了老年和晚年以后,并没有从党中央的最高权位上退下来。他仍然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党和国家的大事仍然要由他来拍板敲定。再加上种种制度的规定和约束,使他离群众越来越远,甚至很少听到百姓的呼声。因此,他的老年和晚年具有神秘的色彩。他的生活起居、身体状况是绝密的,即使在他身边的人也只知其一二。所以,他的老年和晚年又不同于平民百姓,而是一位伟大人物的老年和晚年。

毛泽东晚年从 1971 年林彪事件以后开始,到 1976 年有整整 5 年时间。在这 5 年中,他察觉到了"文化大革命"带来

的一系列问题和错误，他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开始采取措施纠正失误；在这5年中，他为巩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独立和主权，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采取了一系列的果断决策。他打破了长期以来处在对立状态的中美关系，邀请尼克松访华，解决中日之间的历史难题，调整对台政策，使世界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变化。他重用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成第二号走资派的邓小平，使江青等人篡党夺权受到了极大的阻碍。他相信江青，但不重用江青。最后，他将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反革命集团定性为“四人帮”，使江青集团难逃覆灭的命运。

毛泽东的晚年仍然为党和国家作出了许多杰出的贡献。所谓毛泽东的错误，主要是在1957年到1969年，在他65岁至75岁期间。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犯错误呢？当然，有历史的社会的各方面原因，但无疑也与他步入老年时期有关。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诞生于在中国南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的一个农民家中。他的祖父、父亲都是农民，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的儿子。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农村十分贫穷，农民终日劳累而不得温饱。在毛泽东的家中，由于他的祖父和父亲勤耕善作、省吃俭用，家境尚算宽裕。毛泽东小时还能读点“四书”、“五经”之类的书籍。这在当时当地的农民家中还是不多的。到青年时期，他敢于离别家乡，于1913年到湖南省城长沙，求学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后来当上了教书先生。在这期间，他深刻地受到家庭和社会的影响。毛泽东的家庭和中国千万家农民一样，虽然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受尽各种欺压，但仍然不断挣扎，以艰苦奋斗、忠厚老实、顽强拚搏的精神培育自己的子女，毛泽东从小就表

现了聪颖好学，刻苦钻研，懂得了中国农民的苦难和中国社会的问题。当他读了第一师范后，更懂得了中国落后的根本道理，立下了为国家和民族求生存、求解放的志向。在同龄人中，他显示了非凡的才华。像这样的有志青年，在国家和民族蒙受深重灾难的时代，出路只有一条：走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只有投身于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事业中，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华，才能铸就自己伟大光辉的一生。对于毛泽东来说，时代造就了他，人民哺育了他，使他在几十年的人生旅途和革命生涯中，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并锤炼成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战略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他深深地了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以马克思主义的金钥匙，解开了中国革命道路上一道又一道的难题。他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系列独特的中国革命的理论，即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毛泽东思想"。他和他的战友们度过了一次又一次的艰难险阻，战胜了各种敌人，终于把中国革命引向了胜利。在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中，他赢得了人民的信赖和爱戴。在1949年的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大家公认他是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当他和他的战友们开始谱写中华民族更壮丽璀璨历史的时候，他已度过了一生中精力最旺盛的中年时期，迎来了老年时期的峥嵘岁月。

他经常提及自己已经老了，甚至还说自己最多还能活几年等等。可是，他并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更没有安排自己的老年生活。而仍然与青年和中年时期一样，掌握着中国革命的航舵，信心十足地为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建设一个繁

荣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可惜的是，当他的思想、地位、威望达到高峰的时候，他毕竟是一个老人了，不可能不带有老人的特点和局限性。人到老年，无论是行动，还是大脑的思维，都与青年或中年时期不同。也就是说有些错误，在青年或中年时期是不可能犯的，但到老年时期就难以避免了。一个伟大的领袖，在历史的长河中，能代表一个时代也只能是弹指一挥间，要求他长期地、永久地代表下去，是很难的。即使像毛泽东这样的伟人，也难以做到。毛泽东从 1957 年以后，在指导思想上犯错误，除历史的、社会的、制度上的原因以外，与他步入老年时期密切相关。因此，如何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实事求是地而不是主观主义地、准确的而不是歪曲地研究毛泽东的老年以及 1971 年以后的晚年，不仅能阐明毛泽东作出的杰出贡献，而且能找到犯错误的主观原因。所以，研究毛泽东的老年和晚年是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的。

最近几年的所谓研究毛泽东热，主要是集中在研究毛泽东的老年和晚年上。在这研究中，有不少观点是十分正确的，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是，也有人借研究毛泽东老年和晚年的机会，企图歪曲和否定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并进而否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历史，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恶劣的影响。这在历史上是有教训的。50 年代，当国际上掀起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时候，毛泽东十分尖锐地指出，对斯大林必须采取保护、批评的态度，从而顶住了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这场斗争仅仅过了 20 年，到 70 年代末，在中国又出现了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的思潮。在这个时候，邓小平明确地起来批判这个错误思潮，正确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使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内

坚持了正确的方向。后来，虽然有人把毛泽东老年时期所犯错误加以扩大化，妄图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但是，历史早已证明，这种目的是不可能达到的。当然，对于毛泽东老年和晚年的研究，也有一个方法的问题。有的人由于研究方法不正确，或者掌握的材料不全面，也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如有人说毛泽东为什么犯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呢？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大讲阶级斗争、大搞阶级斗争，如果不是这样，就不会犯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了。有人甚至以这样的观点去解释历史，去教育学生。毛泽东犯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原因并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大讲阶级斗争、大搞阶级斗争。如果过去不这样做，那么中国革命怎能胜利呢？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从成立开始，大讲阶级斗争、大搞阶级斗争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所以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不在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大讲阶级斗争、大搞阶级斗争，而在于大讲阶级斗争、大搞阶级斗争历史时期过去以后，他的思想认识不能随着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对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历史时期已经基本结束的论断动摇了、否定了，而仍然把阶级斗争放在社会主要矛盾的地位上，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这既有客观的（国际的、国内的）原因，但更主要是出于主观的错误判断。也就是说从1957年以后我国阶级和阶级斗争形势已发生深刻的变化，而毛泽东由于种种原因和其主观认识上没有随着变化而变化。所谓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就是阶级斗争不是主要矛盾而仍然强调它为主要矛盾、阶级斗争不是纲而仍然以它为纲所产生的错误。

总而言之，研究毛泽东老年和晚年是一个大课题，也是一

个大难题。为了克服和纠正在研究毛泽东老年和晚年中的种种错误，本书在写作中，不仅以最可靠的第一手史料，作详细的阐述，而且还请了不少专家进行审稿。其中有中共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档案处处长张景堂研究员审阅了全稿。他做了一辈子关于中共中央文件的有关工作，对毛泽东老年和晚年时期形成的文稿是十分熟悉的。由于他对本书的审阅订正，使本书在史实的阐述上更加准确、可靠。另外，还请了中央党校萧一平教授、中央党史研究室王朝美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张静如教授审阅了书稿。最后还有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专家们十分仔细地审阅了全书，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根据他们的意见，对书稿我作了多次的修订。我现在奉献给读者的可以说是一个吸取各方面成果的一部书了，谨在此对上述专家的支持帮助深表感谢。

作　者

1996 年 4 月 8 日